

《道德经》是得“道”经*

张澄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老子属于“思辨哲学”家, 建立以“道”为核心的深邃的哲学体系。老子论“道”不只是出于纯学理上的探究, 其目的是为了得“道”, 老子的“道”论是与人生、道德、政治密切相联系、是一体不可分的。老子的全部学说所要阐述的就是什么是“道”和如何得“道”。一部《道德经》即为一部得“道”经。老子哲学思想启示人们“道”和得“道”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 同时也启示人们对“道”和得“道”的探索也是没有止境的。这才是老子思想不息的魅力。

[关键词] 老子; 道; 得道; 《道德经》

[中图分类号] B2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01-05

1

老子和孔子谁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哲学家是迄今争论不休的问题, 不少学者从历史、文献中作了许多有益的考证, 这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必要的。且不说年代的先后, 就逻辑来说, 有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即孔子以“仁”为人的本体, 老子以“道”为哲学的“本体”,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比较确切地指出过, 孔子属于“道德哲学”家, 老子属于“思辨哲学”家。

正如“仁”这个范畴不是孔子首创一样, “道”这个范畴也不是老子首创。“道”本有道路、规律、原则的意义, 尤其是天道、人道之说早已有之。老子的功绩在于他从天道、人道中把“道”抽象出来, 提到了哲学最高范畴的高度, 并建立起了以“道”为核心的深邃的哲学体系。老子以“道”为哲学的本体, 从而使中国古代的思想首次真正进入哲学的领域, 上升为哲学这一意识形态, 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中国古代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始自春秋战国, 但夏商周时代, 在与宗教、鬼神、术数等相联系中已有哲学思想的萌芽, 并不断地发展积累着。与古希腊哲学开始时是自然哲学不同,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涉及天道与人事两项, 而且不是如西方古代哲学家所说由于人有了暇闲, 因好奇而去探索自然的奥秘,

而是直接从人事(包括人从事的生产活动)的凶吉祸福出发来考虑的。中国传统哲学是在实践中, 在生活中, 产生于人类要求驱凶避祸、趋吉得福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强烈愿望, 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也不例外。《道德经》的内容是朴素的、不完善的, 且给后人留下诸多争议和疑难。但《道德经》是一部得“道”经, 其中对哲学最高范畴“道”的探索不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意义深刻、久远, 更重要的是它是密切地与人类的实践——生产、生活、社会的实践相联系, 它是照耀人类生存和发展大道上无数星星中极闪亮的一颗。

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理解以及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要求客观, 要求不要背离原著的本意, 但受探索者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主观的观念、学养、意向甚至心境等因素的影响, 难免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观点的互相碰撞正是哲学思想进展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2

“道”是按辩证规律发展着的形而上的实存, 是无形、无象、无限因而也是无名的。

在中国哲学中, 有和无是一对重要的范畴, 其含义广且深。老子把有和无与道密切联系起来, 指出有和无同出于道, 是道不可分

*[收稿日期] 2011-03-28

[作者简介] 张澄清(1927-)男, 上海人, 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著名西方哲学史家,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割、不能独立存在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下引只注第几章)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老子虽对无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从多种阐述和描绘中都明显地看出无不是绝对的零和虚无。有和无作为一种关系,在老子那里具体为万物和“道”的关系。万物都是有形、有象、有限的,因而是可以感觉并且可以名的,是可以用语言、名词、概念说出来的。“道”是“无”,是不能感觉且不可名的,不能用语言、名词、概念表达的。“道”是无形、无象、无限的,因而也是“无名”(“道常无名”第三十一章、“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道”是“无”。这种“无”是“恍”是“惚”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道”是“无”,但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形而上的实存,也是有“象”有“物”有“精”的,只是与具体事物的物、象、精不同,是恍是惚的,是内在蕴含着的,因而称之为“无”。老子曾自释恍、惚说:“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第十四章)王弼注“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说:“欲言无耶。而物有以成,欲言有耶,而不见其形,”“实甚得其精髓。管子把道和德联系起来说明有和无的关系:“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管子·心术上》)德是得、是有,德是物得之于有和无统一的无形无象的“道”而成为有形有象的万物。“德是道之舍”是对老子关于有和无、道和德、道和万物的辩证关系的概括和发展。

“道”除了无形、无象外,还是无限的。老子虽没有明确的“道”是无限的提法,但在许多阐述中,都可以明显看到蕴含着“道”是无限的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道”是“一”。老子多次提到的“一”主要是指“道”。为什么要用“一”来指谓“道”,这是说明宇宙间除了这“一”个“道”之外,别无他物,因此这个“一”就具有唯一的、无限的、整体的、本体的意义。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常,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无相、无形、无声的“道”是不可穷诘的,“道”只是浑然一体的、整体的、无限的“一”,这个

“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十四章)的,这可以理解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能见其上下、首尾,都是无限的,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

2.“道”是“大”。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是无名的、勉强给它一个名,可以称之为“大”。这样的“大”不是现象界中大小的大,不是与小比较而言的大,而是本体意义上的“大”;“大”也就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所不包、无法言说的。“道”就是这样的“大”,先天地生而又超然于万物之上,是周行不息而又伸展遥远、伸展遥远而又回归本原的。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3.“道”是“自然”。什么是回归本原,就是回归于“道”,而“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回归于“道”就是回归于“自然”。道按自身的辩证规律而存在、而运动,这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也就是无限的。永恒不变的实存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永恒不变的辩证规律才是无限的,才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的。“道”之所以能永恒存在就在于道是按照“自然”及其辩证规律发展的,永恒不变的是永远变化着的“自然”及其辩证的规律,而不是不变的实在。

“道”是“一”、是“大”、是“自然”,显现了“道”是无限的,但老子尚未能对无限作出更多的发挥,而且如“周行而不殆”等提法也是语焉不详,容易产生循环的理解,特别是老子尚未能把有限和无限辩证地对立统一起来,对有限和无限作出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的是庄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道”不但是形而上的实存,而且是规律、辩证规律;“道”是按辩证规律发展着的形而上的实存。

有的学者把老子哲学中的“无”分为本体和现象两种既相联系又有不同的含义,使老子著作中原本没有区分而引起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长期争论不休、疑虑、困惑的问题得到了共识。推而广之,老子著作中的“一”、“大”以致“道”和“自然”都有本体和现象两种含义。本体方面的含义是哲学上的最高范畴,本质上都是不可名的,即不能用形式逻辑的概念思维来表达而只能通过现象中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来予以展现的。“一”、“大”、“无”以致“道”和“自然”的本质,都要通过现象中的辩证关系诸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曲全、枉直、敝新、少

多、强弱、雌雄、贵贱、动静等等诸多关系来表现的。老子关于辩证关系的许多论述都是为了展现、说明道的本质,启示人们要通过辩证关系来把握“道”。

对对应关系、相反相成的认识古已有之,如阴阳之说就富有辩证思维的因素。老子的功绩不但在于丰富了相反相成的具体内容,揭示了事物对立统一的两方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更重要的是在众多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概括出“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的原理,并把正和反对立统一起来说;“正言若反”(第七十八章)。有学者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老子已进入了相反相成是运动的源泉的辩证思维领域,已意识到了正中有反、肯定中有否定的更高思维方式——辩证的思维方式,从而成为辩证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可以看到,老子之所以能构成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正是由于辩证规律贯穿于其中。没有辩证规律,“道”是枯竭的、僵死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辩证规律的把握,就没有“道”的哲学体系,以致没有老子学说中的“道”本身。“道”和辩证规律是密不可分的,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道”是辩证发展着的“道”。

老子的辩证思想是极为丰富而卓越的,但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尚不能摆脱原始的朴素的性质。如他虽揭示了对立统一的两方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但尚不能提出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都是有条件的,因而陷入循环的危机;又如他虽然提出了具有否定意义的反,但还不能到达肯定和否定的更高的统一的思想等等。老子的思想之所以不能摆脱循环的危机,也与他不能达到肯定和否定的更高的统一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虽然强调“道”的复归,但未能指出“道”的复归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是在肯定和否定的更高的统一基础上的复归。

3 老子的“道”论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尔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但它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探究,老子论“道”的目的是为了得“道”。得“道”并不只是一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到达人生的最高境界、道德的最高理想、政治的最高成就,亦即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合一、和谐,其中包括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合一、和谐。老子的“道”论是与人生、道德、政治密切相联系、是一体不可分的。

老子的全部学说所要阐述的就是什么是“道”和如何得“道”。如何才能得道?简言之,就是他的“自然”和“无为”两个密切相联不能分割的学说。

老子提出了“道”是有和无的统一;“道”及有、无的统一都是“自然”,即是本然地、自然而然地不以天的意志,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而上的实存。老子又提出了“有为”和“无为”的对立统一,在老子那里,不论是“有为”还是“无为”都是“为”;“为”是作为,是行动,是一种能动的作用。在有和无、有为和无为中,老子强调的是“无”和“无为”。“无”和“无为”并不是消极的,有的学者称之为睿智的否定的思维方式:“无”不是绝对的零,绝对的虚无;“无为”也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作为,没有任何行动,从“反者道之动”中可以看到“道”本身是能动的。如果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其根源、作用等方面来说一定要与客观、外界相联系,那么“道”的能动性则是不需要任何外界的自动性。这种自动性是自身内在的对立统一形成的,是自身内在的否定性使然,道是自生自长的。如果把道看作不是能动、自动的,就会把“无为”理解为“不为”、“不能为”。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无为”不是不为,不是妄为,不是任意而为,而是顺其自然的辩证规律而为。老子的得“道”思想基本上就是这个“自然”、“无为”的道理,即使是有关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观点也是源于“自然”和“无为”。“自然”和“无为”遵循的就是辩证规律,反过来说,只有遵循辩证规律才是,也才能“自然”和“无为”。老子教导人们要学“道”,要像“道”一样地遵循辩证规律而“自然”、“无为”,才能无所不为,才能得“道”,即把握“自然”的、“无为”的有和无统一的“道”。“道”和得“道”的关键都是“自然”、“无为”,如果一定要有些区分,那末“道”重在“自然”,得“道”重在“无为”。

“无为”和“为”一样是一种行动,同时也是一种认识。老子认为道是无形、无限、无名的,是不能用感性和知性来获得的^①,而只能用他所说的静观和玄览来获得,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第十六章)虽然万物纷繁复杂,只要心灵坚守清静,虚寂到极点,就能体悟到万物出于“道”而又复归于“道”的道理。这里的静不能理解为绝对的静心、不动,虚寂也不是绝对的空虚,

① 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说法,把知性和理性明确区分开来,更能说明和理解“道”。

而是指去除主观、妄想。静作为万物的根源、本原就是回归于“自然”本性；“自然”本性是恒常的，把握恒常的“自然”本性，就获得了智慧，就认识、把握了“道”了。老子又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第十四章），也是同样的意思。如能涤除主观的杂念，达到静虚，如能像镜一样自鉴，使心灵毫无瑕疵，也就能把握“道”了。

“无为”不是不为，不是妄为，而是顺自然及其规律而为，也就是“为无为”。（第三章）但严格来说，即使是顺自然规律而为还不是真正的“无为”，还要做到“生而不有”（第二章）；“为而不恃”（第十章）；“长而不宰”（第三十四章）；“不争”（第三十七章）等等，才是真正的“无为”。也可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不争”等等，就是“无为”，顺自然而为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反之就不是“无为”了。“道”是“自然”，是自生自长的，没有意识，也没有目的，因而“道”本身其实是不存在什么有、恃、宰、争的，也无所谓什么不有、不恃、不宰、不争。但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因此要得“道”，要“无为”，就要求能做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不争”。这要求很高，是不容易做到的，这样的“无为”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道德的最高理想、政治的最高成就。这与“自然”、真理一样，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人只能愈来愈接近而不能最终到达。也就是说，人只能愈来愈得“道”，而不能最终把“道”得“尽”，因为“道”本身应是不断发展着的。

“道”是“无为”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无为”而得道，《道德经》很多的章节多涉及政治、伦理方面的“无为”。“道”是普遍，政治伦理等都是特殊、具体。“道”的“无为”是要通过宇宙生成，通过政治、伦理等各个具体领域表现出来的。在政治、伦理领域，老子重“无为”，孔子重“仁”、“仁政”。两者相异，又有共同点。其共同点主要是：两者都是企图寻求一条达到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道路和方法，而且都认为要达到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主要在于君王，在于君王的“仁政”和君王的“无为”。老子多次提到的圣人就是指得“道”的人，至上道德的人，而侯王就成为这种具有至上道德的圣人。老子明确提到侯王的，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曰静，天下将自定。”（第三十七章）又：“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为天下贞”（第三十九章）其意思是一目了然的。其他章节虽未明确与侯王相联系，但也可看到“无为”以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等等，主要也是对侯王的要求。

孔子提出“仁”作为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达到社会和谐的良好方，君王应施仁政以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等等。但孔子又提出正名，要求社会中等级森严，各安其位，君王是高高在上的施“仁政”者，人民应顺从其“仁政”的统治，在“仁政”之下，人与人之间也要做到“仁”，才能使社会和谐，孔子强调的是施予，所谓“博取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辩也》）而老子认为有德的君王首先要自己“无为”，要能“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样“功成事遂”了，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了，百姓都不知道这是君王的功劳，却说我自然就是这样子的。君王若能“无为”，则“万物将自化”，其中包括主要的、重要的人民将自化。君王的“无为而治”不是施于人民什么，而是要使百姓能自化，使百姓也能顺乎“自然”而为，也能“无为”，自我生化不止，生活丰盛富足，安居乐业、自由发展，这样天下就能也才能自定了，和谐了。人民的安居乐业，是以有德的君王的“自然”、“无为”为主，引导人民“自然”、“无为”而形成的，君王首先要得“道”。老子在贵贱、高下、强弱等等的关系中，重视贱、下、弱。老子说：“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耶？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第三十九章）孤王、寡人的原意并不是天下第一、惟我独尊的意思，也不是因高高在上而孤独的意思，而是自谦、低贱的称谓，说明侯王不要自我的提高和夸耀，不要把自己看作美丽晶莹的美玉，而要像那朴素无华的坚石，这样才能得“一”、得“道”。与孔子的“仁政”思想相比，《道德经》可说是另类的内圣外王思想。但不论老子和孔子思想的相同点和相异点，都预示着尔后儒、道哲学思想的逐渐融通，即使是相反的观点也会在一定条件下互相渗透的。

老子所向往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呢？就是集中在第八十章中所说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的思想，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老子这种小国寡民的思想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他不可能对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提出一个科学的范围，但究其实质，他的理想是要通过“无为而治”，使社会

成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兵祸，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安然相处的社会。这个理想是高尚的，是为人们所向往的，而且也不纯粹是空想。只是和谐、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只有在社会高度发展时才有可能达到的，这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4

在先秦初期，虽尚未有明确的天人合一的提法，但实际上却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贯穿于各派、各家的思想中。《汉书·司马迁》所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的“天人之际”以及有关天人之辩的事实，表达的就是天人关系，其中已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和人的关系是相分、相合亦即对立统一的，相分、相合是密不可分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对立中有统一。天人关系，天人合一是一个天人对立、相分，同时又是统一、相合的无限发展过程。在天人关系中，中国哲学重在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的最高的最美的理想境界，这是一个愈来愈合一而不可能最终达到绝对的合一的无限发展过程。不过，在理论上，有的哲学家重在说明相分，更多的哲学家重在说明相合。

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时，基本上是天人浑一以及主宰之天的天人合一观。老子的“道”论尚未能摆脱浑一的天人合一的阴影，而且尚未能有明确的天人合一的提法。但已有了比较明确的与天人浑一，主宰之天不同的天和人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表现在：

1. 明确把天道和人道区分开来。郑子产就有“天道远，人道弥，非所及，何以知之”的说法，有学者指出其中已包含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萌芽。老子进一步指出天道和人道不是浑一的，其不同在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养有余”（第七十七章）贬斥当时社会上弱肉强食的不平现象，指出天道的自然、均平、调和。意指只有按照天道的自然规律行事，把有余的拿出来供给不足，而且能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不夸耀自己的才智，这样的人之道才能合乎天道，这样的人也才能得“道”。人要按天道的自然规律行事，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

2. 把人与地、天、道区别开来。“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老子把人与地、天、道区别并列起来，称之为四大中的一大。老子的这一思想，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否定了天对人的主宰，天

和人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地、天、道都要“法”自然，这样，人、地、天、道在“法”自然的基础上合一起来了。在天人关系中，人也必须“法”自然才能和“法”自然的天达到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人的言行遵循自然的辩证规律，是人与自然及其辩证规律的合一，这也就是得“道”。可以看到，在老子那里，天和人的合一，“法自然”是其关键点。

老子所说的人、地、天、道以及自然都有本体和现象两层含义。人、地、天、道并列称之为四“大”，是在本体的意义上说的，四个“大”是一体的，都是按自然而然的辩证规律发展着的形而上的实存，也可简称为“自然”。就天和人的两者来说，如老子在第七章所说的“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在本体的意义上说的，而作为本体的天则是要通过现象界的天地万物的自然界来表现的，如老子第二十三章所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则是指现象界的天即自然界的变化而言的。至于人，除了作为四“大”之一外，基本上都是指现象界的人。

老子重视“自然”，也重视人，而重视“自然”本身并不是老子论“道”的目的，老子论“道”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人“法自然”，达到人和“自然”的合一即天人合一。“法自然”的人，按辩证规律行事的人，只能是个别的有个性的人，只有作为个别的人才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才能效法自然。老子把“法自然”而得“道”的人，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称之为圣人，得“道”的圣人应是完全能依自然的辩证规律行事的人，这样的圣人实际上已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升华为本体的、普遍的、一般的人了。这样的人应是彻底“无为”的人，是与“天”、“道”、“自然”绝对相合而没有任何个人的欲望，没有任何个性的人。这样的纯粹的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庄子称之为“天人”（《庄子天下》）似更为确切。没有绝对完美的圣人，只有愈来愈完美的圣人。天人不能达到绝对的合一，只能愈来愈合一。追求绝对将使任何伟大的辩证法思想家走向反面。

不论是老子哲学思想的辉煌成就还是不可避免的缺陷，都启示人们“道”和得“道”都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启示人们对“道”和得“道”的探索也是无限的。这才是老子思想的不息的魅力。

（责任编辑 刘守旗）

“教育家办学”的冷思考*

高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专业化导致大师存在土壤的消逝,除此之外,由于没有习得西方教育的精髓,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等特殊原因,使得国内教育领域中不存在大师。教育家应该有自己独创性的教育思想体系,有广泛的社会和教育影响,并在实践领域有所建树,据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没有教育家。在教育和学校丧失了相对独立之时,即使有教育家,也不可能办出好的教育。

[关键词] 教育家; 教育家办学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06-05

一、后大师时代

有人说:“中国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确实,当今中国大学弊病丛生,在大学里栖身的人,对此都有切身体会。但仔细想想,这话又不那么确切,因为不单是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大师,如今的西方大学同样培养不出大师。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西方大学的成功,他们的确比我们培养出了更多的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各个领域的专家,但这些科学家、专家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这样说,更不是为中国的大学辩护,中国的大学严格说来都只是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大师只是“一个传说”,培养创造性的科学家、专家几乎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样说,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当今时代是一个后大师的时代,根本没有大师生存的土壤。

一个学者,只限于自己的狭小专业领域,无论有多么优秀,即使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只是专家而已,算不得大师。那些能够成为大师的,都是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涉猎更多的人类领域,从更综合、更宏观的角度看世界、看人类,对人类发展、科学走向产生了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影响。比如,爱因斯坦“勉强”可以称为大师,因为他关注的领域不仅仅是物理学,还有人类社会的未来,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造诣也是出类拔萃的。但在布卢姆看来,爱因

斯坦也够不上大师的水准,因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裂自康德和歌德之后愈演愈烈,康德是最后一位在自然科学上也很有造诣的哲学家,而歌德则是最后一位相信自己的科学贡献超过自己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大师,他们之后,就再也没有大师了。

现代分工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对现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同时,现代分工也使现代人从事无巨细的繁杂劳动中“脱域”(吉登斯语)出来,只专心做好自己的“那一份事情”,起到了解放人的作用。但我们要清楚,精细分工在解放人的同时,也在“毁坏”人,用雅卡尔(A. Jacquard)的话说就是精细分工制造了“孤立的个体”、“残废的个体”、“失望的个体”。“孤立的个体”是指精细分工使人们局限于自己的狭小专业领域,越来越难以与专业外的人进行沟通;“残废的个体”是指精细分工使人只具有专业特长,特长之外的基本能力严重衰退,变得“单面、残废”;“失望的个体”是指细碎的分工使多数人看不到自己在最终产品或某项任务中的作用,觉得自己可有可无、什么也没做,没有成就感。

与社会分工遥相呼应的是大学的专业化。学科越来越分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要说学科间,就是学科、专业内部的沟通与承认都是非常困

*[收稿日期] 2011-04-21

[作者简介] 高德胜(1969-),男,河南信阳人,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难的；在大多数专业中，约有一半的从业者通常甚至不相信另外一半人跟自己同属于一个领域。^{[1] P.309}”经常听到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夸耀，自己所做的方向“全国能懂的人不超过20个”，“全世界能懂的不超过100个”，等等，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确切，却能从中折射出专业化的极端性。

专业化使“大学失去了它过去拥有的那种类似于城邦的性质，变得像是一只客船，乘客们只是偶然的同路人，不久就会下船各奔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只是行政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内容”^{[1] P.300}。三大学科间的关系，就像“偶然的同路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得不同处一个大学的屋檐下，却根本没有深入的交流与对话，更谈不上合作，有的只是相互的戒备和排斥。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排斥随处可见，就是自然科学内部，彼此之间的隔膜、敌对、攻讦也并不少见。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内部同样并不消停，学科歧视、成见到处都是。罗德斯将如今的大学比喻成一个“空心球”，球体周围是一个个学科专业的大本营，彼此之间竞争着生存的空间；在相邻的封地成员之间，几乎不存在有意义的联系^{[2] P.53}。“客船”也好，“空心球”也罢，表证的其实都是大学学科、专业间的部落化、封地化。

大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同学科专业的学者汇聚在一起形成学术共同体。而专业化的极端化对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损害是致命性的。在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似乎每个学者都行走无垠的黑暗里，能看到的只是自己的专业“手电筒”所能照到的那一小片天地，彼此之间没有共通与交汇，无法交流。另一方面，各个专业所创造的专门术语犹如一块块红砖，在彼此之间砌起了高墙，使得跨专业的理解如此之难。如果说社会的精细分工造就的是“孤立、残废、失望的个体”的话，那么，极端的专业化造就的则是“孤立、残废、失望的学者和学生”，哪里可能产生大师！

在一个没有大师存在土壤的时代，指望大学培养出大师，无疑是刻舟求剑式的思维。用这样的批评来指责大学，实在不在点上。也许更应该追问的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科学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家）。

二、当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教育家

与对大师的渴求一样，我们对大教育家也存在着类似的渴求。大教育家，也就是教育领域的大师。

在一个后大师时代，教育领域的大师实际上也没有生存的土壤。除了上述共同的原因，当代中国还有自己的特殊历史与现实境况。

现代教育是移植过来的，不是从中国历史传统中继承发展而来的。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想学好“拿来的东西”，没个一两百年，那根本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在实际还处在在学习阶段，不要奢想什么世界性影响。实际上，我们对现代教育的学习，是不是掌握了其精髓，笔者看来，这令人生疑。比如，有学者指出，到了今天，我们连一个完整的“儿童观念”都没有建立起来！

有论者以为，解放以后我们处在“太平盛世”，却还赶不上陶行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取得的成绩，实在是说不过去。这种观念明显是缺乏历史知识。实际上，陶行知他们那一辈教育学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不见得比当今差，他们那时能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根本做不了。建国以后，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之中，不单是教育学者，就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命运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生存都是问题，哪里谈得上创新？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得到了好转，但依然有很多惯性和旧习在支配着学者的生活，更何况我们的学术研究本来底子就薄，又荒废了几十年，哪能一朝就赶上！

如今，学者们的生存环境“变好了，也变坏了”。“变好了”是指生活条件和物质待遇有所改善，不再像过去那样可怜、穷困。有一些“聪明”者发现了很多生财之道，但也因此走向了与学术研究相反的道路。“变坏了”是指今天阻碍学者学术自由的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被当成了会下蛋的“母鸡”，学校、机构恨不得天天挤你的“屁股”，让你快下蛋、多下蛋！在这样的体制下，能够保持学者的良心，能够有一点学者的自尊，已经相当不易，还谈什么造就大学者、大教育家！

另外，学者的成长面临国际学术环境的问题。我们是后发的落后国家，这种落后是全方位的，包括教育研究。我们刚刚进入现代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学生的角色和地位，人家早就建好了一套学术话语体系，你研究中国教育，你用中文写作，你就无法进入这套话语体系，你就没有世界性的影响。有个别学者用英文写作，在世界性的教育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文章，但中国人又有多少人能够看到、愿意看呢？又能对中国教育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就是后发国家

的尴尬。实际上,我们的教育学者是无法真正参与教育研究的国际对话的。

“大教育家”的称号往往都是后世的事情,几乎很少听说一个人在当世就被称为“大教育家”。陶行知他们当时也只是普通的教育者,他们自己、他们同时代的人也并不把他们当作“大教育家”。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探索之可贵才被我们所认可,他们才渐渐被称为“大教育家”。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教育学者,很多人风头正劲,有人甚至写出了“当代中国的八大教育学派”这样的文章。这些所谓学派,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难说。相反,一些默默做自己研究的人,虽然相当低调,也不被社会、政府机构过分追捧,但因为真有真思想,也许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没准会被后人推崇为“大教育家”。

其实,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大教育家”,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一个有个人崇拜传统和专制文化遗毒的国度里,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所谓大家,多一些有个性、有自己独立性的学者,也许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三、教育家应具备的条件

如果非要用“教育家”这个称号,就得对其进行定义。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决定了“中国到底有没有教育家”这一事实判断。如果将教育家界定为类似于远的孔子、近的杜威,那当然是没有。如果像经济学者、哲学研究者、企业经营者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哲学家、企业家那种意义上的教育学家,也许能有几个。

也许是因为温总理曾经说过“要让教育家来办学”(按笔者的理解,温总理的话只是一种期待,不是事实肯定),最近总能听到“教育家办学”的声音。有些地方召开了“教育家办学”的研讨会,有的地方媒体开办了“教育家办学”的栏目,有的出版社甚至出版了“教育家丛书”,有的人甚至开始介绍“教育家办学”的经验。一夜之间到处都是“教育家办学”,似乎中国的教育家满街跑了呢。

所谓“教育家办学”,无外乎两个含义(1)有人已经是教育家了,由他或她来办学(2)在办学的过程中成长为教育家。“蛙声一片”所说的“教育家办学”,多是取第一种含义,那就意味着已经有很多货真价实的教育家在办学。果真如此吗?

前面已经解释了当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教育家,没有教育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在笔者看来,即使不以大教育家的高标准来要求,取教育家一般意义

上的含义,能够称得上教育家的,起码得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吧(1)有自己独创性的教育思想体系(2)有广泛的社会和教育影响(3)有实践上的建树。

教育领域能够得上这些条件的人,真的不多。在大学研究教育的人,如果不苛刻要求的话,有些人也许符合第一个条件。如果加上第二个条件,符合第一项条件的多数人则会被排除,因为这些教育研究者的影响往往只在很狭小的学术圈子里,学术圈子之外,甚至对中小学的影响都很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在教育学者个人,他们的理论的冲击力往往不够。另一方面也在中国教育的体制,现在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实只认一种影响:权力。不要说没有过硬的原创性思想,就是有,在权力面前那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再加上第三个条件,更多的人还要被排除掉。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绝大多数教育学者也就是在书斋做做理论思考罢了,像蔡元培、陶行知那一辈人可以直接掌管教育实践的人真的难觅踪迹。

教育学者对教育实践的集体性介入,新课程改革应该是一个起点。应该说,这次新课程改革不再是完全由教育行政部门唱独角戏的局面,教育学者比以往任何一次教育改革都要深地介入了这次新课程改革。但也不能高估教育学者对新课程改革的贡献。首先,教育改革拿课程开刀,本身就是一种避重就轻。因为教育危机的根本不在课程,而在体制。但体制的改革是非常难的,弄不好得“吃不了兜着走”。相反,课程在整个教育体制内的重要性要低很多,课程改革又最容易出成果,因为课程改革最容易弄出一些文本性的东西,白纸黑字嘛。更重用的是,不像体制改革风险大,切效果无形,课程改革风险小,效益明显。课程改革即使成功了,对整个教育的作用都不会很大,对教育危机的克服没有全局性的作用,更何况现在的课程改革成功与否,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其次,这次课程改革,教育研究者所起的作用基本上还只停留在文本上,包括课程标准和教材,对教学实际的影响其实很小,甚至比各级教研员的影响都小。因此,教育学者对新课程改革的介入,不足以改变中国教育学者无法、不能有教育实践建树的大局。

大学里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很难符合教育家的实践建树要求,而教育实践领域的一些人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人是不是可以称得上

教育家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一些特级教师，一些名校的校长，通过媒体的放大和包装，将自己打扮成教育家的样子，其实也只是一种炒作。

不是对一线的实践者有偏见，而是在中国这样的教育现实中，要想从中小学一线成长为教育家，基本上没有可能。现在的中小学教师，甚至没有了文革前斯霞老师成长的宽松环境。现在的一线优秀者，哪个不是优在学生的考试成绩上？很多很有名的特级教师，在介绍其成绩时总有这样那样的“填充物”，但真正的“硬通货”总是所教学生考试、升学如何。特级教师如此，名校长更是如此。这些所谓的名校长，不是名在他有什么教育思想，而是名在他们的学校的学生能有多少个考上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也就是说，即使从实践上讲，这些一线的名人，其实践成就只是或主要是考试成就。一个教师，一个校长，如果不重视考试，反而在实践中探索培养真正的人，不要说成名成家，生存都是问题，家长都容不得他！

至于衡量教育家的前两个条件，来自一线的人能够符合的更少。有一些特级教师，在教学和教育学生上确实很有一套，但更多的是一种“人格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主要是因为他具有某些特别的人格特质，是人格因素在起作用。笔者也曾经读过一些有名的特级教师的文字，真的发现这些人在实践中确实有过人之处，但形成文字，却非常朴素，既不成体系，又没有什么创新和深入思考。从这个角度看，一些被人称为教育家的特级教师，支撑他们取得成就的东西，不是思想体系，而是人格和经验。不是说人格和经验不重要，但如果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人格、经验的东西就不具有可传递性、可学习性，意义就下降了一截。而且，在交往中，笔者发现很多特级教师、名校长都有实践本位的思想倾向，轻视理论学习和理论思考，认为理论都是苍白的，只有实践才是真实有力的。就实践而言，这样的观念不能说有多大的错，但不是教育家应有的高度。没有理论的建设，只能停留在人格和经验的层次，那是永远无法“成家”的。

至于第二个条件，一线的教育实践者更是很难企及。很多自称或被称为教育家的特级教师或名校长，其实只是地方性的，只在本地有点声望，离开本地，那是不行的。一些在全国比较知名的，也不过是借助媒体放大的，而且，名字听起来耳熟，至于有什

么建树，则知道的人就少了。

四、教育家能办学吗

在我们这个现实条件下，不要说没有什么“家”，就是有，也办不了学，因为只有一个“家”在办学：“公家”。如果非要再找出一个能办学的什么“家”的话，那只能是“商家”了。

20世纪20至40年代，那是一个教育家办学的年代。蔡元培（北京大学）、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等在办大学，陶行知、陈鹤琴等在办中小学。那时的中国虽然灾难深重，却是教育史上的一段“好时光”，教育文化事业的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掌握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成为教育家）手里。这些知识分子一开始也并不是教育家，而是在办学的过程中与教育一起成长，才慢慢达到教育家的境界，被后人称为教育家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反右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夺取了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中国教育从此走向了政府办学，教育学者个人办学的历史由此结束。

新中国实际上是党和政府在办学，即“公家”办学。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学校与作为办学主体的党政机关“同质同构”，基本上是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比如党政机关有书记、行政首长、团委书记，学校则一样有书记、校长、团委书记。这样的结构甚至深入到学校的最底层——班级，班级里一样有班长和大队长（团支书）。大学也是如此，只不过名称有所变化而已。这样的结构，使得学校和大学牢牢掌握在党和国家手里，这在建国初期，也许有其必要性，但牺牲掉的则是学校和大学的独立性，使得学校和大学越来越远离教育机构的要求，越来越与行政机构趋同。

长期的“公家”办学形成了学校和大学只认政府权力，不认知识和思想，不认教育家的现有状态。很多对教育现状不满的人往往将怨气发在教育家或教育学者身上，说你们研究教育，却把教育弄成了这个样子！只要我们对教育现实稍有了解，就知道这样的指责是多么不公平，教育家与教育学者的知识和思想与行政权力比较起来，真的轻如鸿毛！

教育家办学是有条件的。最起码的条件是教育和学校的相对独立。如果教育和学校没有独立性，完全依附于行政权力，成了行政权力的附庸，教育家不可能进入学校的权力结构之中，（下转第13页）

教育研究方法概说*

周 岳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江苏苏州 215104)

[摘要] 研究教育需借助一定的方法。思想方法决定具体方法的选择,具体方法的运用体现一定的思想方法。教育研究的思想方法源自哲学。研究学校教育,可借鉴实用主义哲学中关于问题研究的实证思想,起源于实践中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过程显示为“问题与假设——资料与证据——结论与讨论”。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

[关键词] 教育研究; 实证; 思想方法; 具体方法

[中图分类号] G40-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10-04

科学研究需借助一定的方法。方法有两层含义:一指在宏观意义上指导人们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二指人们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所用的具体方法。教育研究方法也如此。它既指在宏观意义上指导教研人员和中小学教师研究教育的思想方法,也指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用的具体方法。二者虽有区别,但也有内在的联系。宏观的思想方法决定了具体方法的选择,具体方法的运用体现了宏观的思想方法。其中思想方法起着决定作用。

一、教育研究的思想方法

教育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理论一般源自哲学,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教育研究也不例外。研究人类社会之过程包括对自然的认识、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哲学,教育理论是哲学构成中的一个相关部分。一个较为完备的哲学体系,通常含有对教育及其研究思想方法的相关论述。有的比较直接,如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的比较间接,如马克思主义哲学。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教育研究思想方法。

在理解教育的本质以及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学校教育的育人目标等问题上,应秉持马克思主义

哲学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历史发展观: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人作为社会劳动的主体,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传承文化并运用这些文化成果发展自身,以增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主体力量,便产生了教育。学校是教育的主要场所,也是发展人的主要场所。

2. 实用主义哲学提供的教育研究思想方法。

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教育是头等大事,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家研究教育的相关理论,参与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其所制订的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既要符合教育的规律,又要符合相应的国情及其教育现状,并能给具体的教育实践以正确的导向和坚实的保障。作为基础教育及其研究体系中的理论工作者,一方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人之发展的大教育思想,另一方面,要研究关于教育实践研究的思想方法。当有关教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确立,后一方面的研究——对于研究教育实践的思想方法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实用主义哲学中对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思想值得借鉴。实用主义哲学有以下主要论点(1)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2)强

*[收稿日期] 2011-05-04

[作者简介] 周岳(1955-),男,江苏苏州人,江苏省外国语学校副校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

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3)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4)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5)理论只是对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6)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有什么效果。

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哲学需要批判,但其中(2)和(5)所提供的对于“问题”研究的“实证”思想值得借鉴。以杜威为例,他认为思维的自然规律不是形式思维,而是所谓“实验逻辑的反省思维”。且不谈形式思维与“实验逻辑的反省思维”究竟哪种思维真正揭示了或者说符合思维的自然规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这么说:在实然的“物理”世界里或者说社会中,定位于人之实践、定位于人对实证的不断反省的思维方式更有解决问题的实在价值(不排斥在实证、反省中运用数学等工具思维)。这种以实验为逻辑、不断反省实证的思维其实是一个对问题持续探究的过程。起点是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问题情境,从问题情境中揭示矛盾,从矛盾中寻找问题,然后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其过程表现为(1)疑难或问题的发现(2)确定疑难的所在和性质(3)提出假设,作为可能的解决方案(4)演绎假设所适用的事例(5)假设经试验证实而成为结论。这个思维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证实的过程。

3. 教育“实证”研究的两种思想方法。

承继这种思想,教育研究在哲学研究(主要包括思辨研究和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研究的思想方法——实证研究。尽管这两种研究方法内含的思想方法基本一致,起源于实践中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过程都显示为“问题与假设——资料与证据——结论与讨论”,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哲学研究以“逻辑思辨”的方式提供“资料与证据”,强调“逻辑推理”;实证研究以“调查”的方式提供“资料与证据”,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拿证据来”、“说话要有证据”。

哲学研究的使命就是为实证研究提示什么是“值得”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不“值得”关心的问题。帮助实证研究者和实践者建立“什么事情有价值什么事情无价值”的是非标准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善恶观念。这些是非标准和善恶观念成为科学研究者和实践者做事和选择的“方向”。

如果说哲学研究的话语方式是价值判断,或者说“应然判断”,那实证研究的核心精神是做“事实判

断”或者说“实然判断”。如果说哲学研究的典型话语方式是“论……的价值”,那么,实证研究的典型话语方式是“……对……的影响”。它的重点是探察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联系。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及人之发展的思想为教育在应培养怎样的人的问题上明确了方向,我们在朝着这个方向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如何研究,这就需要方法,首先就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思想。因此,不管是教研人员走进学校,研究或帮助中小学教师研究教育,还是中小教师在教研人员的帮助下研究教育,都要掌握关于“问题”研究的“实证”思想方法。

二、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

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调查研究(含现场调查研究和历史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

1. 调查研究。

(1)现场调查研究。为研究教育而进行调查,首先应调查学校教育的具体情况。学校是社会教育构成的基本单元。教研人员研究教育,应走进学校教育现场,通过各种方式(或直接观察,或问卷,或访谈)记下“观察”思考所得;中小学教师研究教育,也应该通过以上各种方式记下自身或他人的实践情况,为进一步研究积累资料。教研人员“观察”什么?中小学教师应记些什么?从学校教育的两个核心问题——培养或发展怎样的人(培养目标),怎样培养或发展成这样的人(课程)来看,不管是教研人员,还是中小学教师都应该“观察”学生在怎样的课程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应该记下怎样的课程实施使学生得到了怎样的发展。记下这些“观察”所得,其实还只是在研究的起始阶段,还未进入真正的研究范畴。调查以后怎样研究,或者说怎样在调查中进行研究,下文将有具体论述。

(2)历史调查研究。按前所述,调查研究分历史调查研究和现场调查研究。如查阅文献资料,所研究的是自己或他人在以往通过观察、问卷、访谈所得的情况,属于历史的调查研究,但有一些我们通常所说的研究方法,如“课例研究”、“案例研究”,其实也属于历史的调查研究。因为这些课例、案例(包括自己亲历和他人经历的),只要已成一例,就已成为了过去,成为了历史。

按理说,调查研究中的“调查”指的是获取信息资料的方式,课例、案例研究中的“课例”、“案例”指

的是信息资料的内容,那为什么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引申出了课例研究和案例研究?承前所述,学校教育有两个核心问题,如果将研究的方向集中于“课程”,由此而引申的一系列实证研究那就是课例研究。课程是什么?课程是指学校中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以及对这些内容的安排和进程。课程实施的基本单位是“课”。因此,研究课程——研究怎样培养或发展成这样的人,就应该把它落实于对基本单位——“课”的研究,这就是课例研究。如果将研究的方向着眼于“培养目标”——培养或发展成怎样的人,将对每一个学生或每一“单位”学生的培养或发展视为一个个个案,那由此而引申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就是案例研究。当然,在一定情况下,课例研究也就是案例研究。学校教育就是由一个个课例和案例组成。研究学校教育就是要研究一个个课例或案例,不管这课例或案例已经存在或正在发生。因此,课例研究、案例研究在本质上也就是调查研究。

2. 实验研究。

已经成为过去的每一种教育情况都是当时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我们回看研究这类教育情况时,首先应还原当时的教育情境,分析究竟是因哪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形成了这样的教育情况——其中哪些因素是形成如此教育情况的主要原因,如果调整包括怎样调整这些因素,情况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确是我们所期待的,那如何调整这些因素都应该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想解决问题——调整这些因素,就当制定如何调整这些相关因素的行动方案。所制订的方案是否能解决问题(我们也只能暂且假定它是可行的),如果可行,又需考虑该将此方案施行于哪个适用的事例;如果在所适用的事例中施行了该方案(也就是进行了所谓的行动研究),也就是进入了实验研究。如经实验,并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一定的结论,也就完成了一个实证研究的证实过程。实证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经验模型,如果我们再对这些经验模型或者说再以这些经验模型去不断的证实,那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丰富并越来越深刻,其中也包括对教育的认识。

3. 其他几种研究方法的归属。

前文分析了历史调查研究及其课例研究和案例研究。现场调查研究本质上与历史调查研究相同,只是所研究的对象情境有所不同——自己通过观察、问卷、访谈来收集资料。其中所观察的也许是个

课例,也许是个案例。把自己经观察、问卷、访谈所得的第一手情况,客观地叙述出来,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那就是所谓的“叙事研究”;如果自己对自己经观察、问卷、访谈所得或就是自己经历的课例、案例及其经验进行反思,即通常所说的“自我反思”,也就是自我的现场调查研究。再说一说“行动研究”。从广义上讲,以上一切研究都可说是行动研究。而实证研究中的“行动研究”主要是指整个“证实”(当然也有可能是“证伪”)过程中的“实验研究”。由于教育实验不可能做到严格控制和测量,几乎所有的教育实验研究都只是“准实验”,所以把这种“准实验”称为“行动研究”。

“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它们只是实证研究的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两种方式。质的研究以事实、故事的形态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量的研究以数字(统计、测量)的方式收集和析资料。实证研究属下的研究方法都既可显示为质的研究,也可以显示为量的研究。

而其他所谓人种志研究、现象学研究,在本质上也属于调查研究,只不过是显示了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深度。所谓解释学研究,其实主要就是指历史的调查研究——对历史文本(经典名著)的深度理解与阐释,尤其重视文本表面背后的“微言大义”。

因此,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从大类上分,只有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往往是实验研究的辅助方法——先调查哪些因素对某种现象的出现构成了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然后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去验证这些因果关系。这样看来,研究者在选择具体的研究方法的时候,完全可以简单而自信地宣布:“我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调查研究”、“我的研究方法是现场的调查研究”,或“我的研究方法是实验研究(行动研究)”。

三、结语

如果把研究做一个大分类,那么,教育研究可以分为实证研究和哲学研究。中小学教科研在实证研究和哲学研究两者之间,最好以实证研究为主,以哲学研究为辅。一旦确认了哪些主题值得研究之后,最好迅速转向实证研究。

作为中小学教师,最好不写或少写类似“论……的价值”或“论……的意义”的文章,研究报告的标题也尽量避免“应该……”、“必须……”、“大力弘扬……”,等等。不是说“论……的价值”或“论……的意义”的写作和研究没有意义,恰恰相反,价值研究

(哲学研究)是做实证研究的前提,它为实证研究提供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的方向。但是由于中小学教师做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课堂教学或班级管理的工作实践,所以,适合中小学教师做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实验研究,而调查研究往往成为实验研究的辅助方法——先调查哪些因素对学生的品德养成、学习成绩或学习兴趣构成了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然后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去验证这些因果关系。

中小学教师可以参考的实证研究的步骤:

(1)确定所要研究的对象,分析研究对象的构成因素、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因素,搜集并分类相关的事实资料。

(2)设定假设条件。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的行为是由其特征所决定,试图把所有复杂因素都包括进去,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为此,必须对某一理论所使用的条件进行设定。当然,假设的条件有一些是不现实的,但没有假设条件则无法进行

科学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法研究问题,必须正确设定假设条件。

(3)提出理论假说。假说是对于现象进行客观研究所得出的暂时性结论,是一个未经过证明的结论。假说是对研究对象之现象的经验性概括和总结,但还不能说明它是否能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4)验证。在不同条件和不同时间对假说进行检验,用事实检验其正确与否。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宏观的思想方法决定了具体方法的选择;具体方法的运用体现了宏观的思想方法。其中思想方法起决定作用。实证研究其实是一种思想方法。不管是调查还是实验,不管是观察、问卷和访谈还是叙事、反思和行动,也不管所得的或所研究的是课例还是案例,一切具体方法的选择,都应该统一于关于问题研究的实证思想方法。

(责任编辑 陈晓姿)

(上接第9页)何谈办学?即使在特殊力量(比如政府权力的冲动)的推动下,教育家“被进入”学校,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行政权力改造的命运。因为无论谁做校长,你都得上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生存,都得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否则等待你的只有是被淘汰的结局。如果教育家做了校长,按自己的思想来办学,不顾升学率等变态的教育游戏规则,不要说别人,家长就会将其轰下台。

教育家对教育的认识起码高于考试,但并不擅长抓考试,擅长抓考试的肯定不是教育家。现在的中小学校长的佼佼者,哪个不是抓考试的高手?以南京为例,前些年对素质教育还有些想法的校长,不

就是因为南京的“高考之痛”而纷纷让位于苏北那些会抓考试的校长吗?教育家办学,就连考试这一关都过不了!

[参考文献]

- [1] [美] 艾伦·布卢姆. 美国精神的封闭[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 [2] [美] 弗兰克·H. T. 罗德斯. 创造未来: 美国大学的未来[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刘敏慧)

从基础教育的基础性透视其本质*

董 丽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教务处, 广东广州 510091)

[摘要] 基础教育是什么?有各种界说和诠释,各种界说都有时代的背景和作者的判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准确理解基础教育的本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实施基础教育改革的立足点。本文试图通过理解基础教育的“基础”来认识其本质。

[关键词] 基础教育; 基础性; 本质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14-04

基础教育是什么?这一看上去非常简单的问题,却常常令人难以做出回答。自近代实施基础教育以来,就基础教育概念的表述来看,学者们讨论基础教育的文字各有不同,远未达成一致的见解。在《现代汉语辞典》中关于“基础教育”词条的解释是:国家规定的对儿童实施的最低限度的教育。^[1]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甚至没有“基础教育”一词的词条。该辞典将“基础教育”等同于“初等教育”,它的解释是:“初等教育,即小学教育,或称基础教育,是使受教育者打下文化知识基础和做好初步生活准备的教育。通常指一个国家学制中的第一个阶段的教育。”^[2]在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是这样表述的:“基础教育亦称‘国民基础教育’,是对国民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也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有的包括初中教育。学习年限为5~6年至9年。”^[3]从这些对基础教育的界定来看,它们不仅在外延上互有出入,而且,也没有揭示出基础教育真正区别于其他层次、类型教育的特征和独特意义,对基础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基础教育的本质内涵缺乏揭示与阐明。恐怕这些界定可能有与“普通教育”、“义务教育”、“应试教育”概念混淆之误^[4],同时也与当今现实不符。而国际教育组织对此的界定是:“基础教育是向每个

人提供的并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它的目的是使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幸福,并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和生产者,对所属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5] P.130}就笔者看来,要理解基础教育本质及本质属性,就要把握“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何为基础”这两个问题。

一、教育的本质

在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教育学》^{[6] P.7}中讲到: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是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或教育的本质。书中对教育的概念作出的表述是:“广义的教育指的是,凡是有目的地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增强人的体质的活动,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是无组织的,系统的或是零碎的,都是教育。它包括人们在家庭中、学校里、亲友间、社会上所受到的各种有目的的影响。狭义的教育是指,根据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未来的需要,遵循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受教育者获得知识技能,陶冶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一种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一定社会(或一定阶段)的需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人。那么在这一“教育”概念和“教育”本质之上,我们认

*[收稿日期] 2011-03-21

[作者简介] 董 丽(1980-),女,山西大同人,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教务处科员,助教。

为相对于其他类型和层次的教育,基础教育是一种奠基性的、全面性的、未来性的教育;并将基础教育理解为“奠定未成年人发展基础的教育”;基础教育的本质及本质特征就体现为“基础性”。在笔者看来,要更加准确地体认基础的本质及其本质特征,需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基础教育”中的“基础”含义。

二、基础教育的“基础”特性

《辞海》中把“基础”定义为“泛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7]“基础”就字面含义来说,指一个系统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部分,是其他一切部分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基点。关于如何理解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教育界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基础教育、理解基础教育,也就对基础教育的“基础”有不同侧重的理解。例如,“基础教育的基础是什么”,这是研究基础教育改革的立足点。基础教育应该奠定儿童、少年的健康身体的基础,公民品德素养的基础,专门人才的基础,从事劳动的基础。而这4方面基础的统一点就是文化科学知识。文化科学知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和轴心。^[8]“基础教育的‘基础’”包含多种因素,即素质、做人、成才与“三基”等。就是说,所谓基础教育,便是为受教育者打好素质、做人、成才与“三基”等基础的教育。而这些“基础”因素显然构成一定的层次,但又互为基础、彼此渗透。^[9]“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不仅是一种事实陈述,也是一种价值选择;不仅是一种结构性特征,也具有质的内涵;不仅是针对青少年学生的个体发展而言的,也是针对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而言的;不仅是有待实现的价值目标,也需要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保障。^[10]

上述关于基础教育的“基础”的理解都是合理的,这些观点已不是之前那种片面地强调“基础”的一面,如“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或“基本态度与价值观”,而是从综合层面上进行的分析与理解。所谓“人生有尽,知识无涯”,基础教育究竟要给学生打下什么样的“基础”,确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基础教育“基础”特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 基础教育的“基础”是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影响人的一种活动,它对人的发展有重要作用。^[6]如荀子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11]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说:“植物的形成由于栽培,人的形成由于教育。”^[12]康德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物。”^[13]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说:“我

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14]可见教育对人的发展、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它规定着人的发展方向,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给人的影响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刻,学校有专门负责教育工作的教师;此外,教育主导作用的实现,必须通过学生自身的积极活动,教育应遵循受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6]

由此看来,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更应当为人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人的发展包括身心两个方面。因此,基础教育的“基础”首先应从学生成长实际出发,顾及他们的自然需求与承受能力,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打基础。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应该按照学生的心智成长规律培养学生学习习惯、思想品德、智力、体力、能力、情感、意志等诸方面,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未来发展、终身学习真正奠定扎实的基础。对未成年人来说,基础教育时期,正是受教育者身体成长,世界观形成,个性发展,接受基础知识,为一生发展打基础的时期,是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所接受的教育,是每个人今后发展的起点、生长点和前提,是人生发展的基础。相对于接受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对于今后劳动和就业,相对于人才成长的更高阶段,相对于今后的发展和生活,基础教育是奠基的教育,它将影响着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因此,基础教育时期的主要任务应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发展学生探究、发现和初步的创造能力,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掌握从事终身学习的基本方法,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此外,基础教育具有向高级学校输送人才的功能,但这绝不是它的唯一功能,决不能仅仅以输送优质生源的多少作为唯一的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基础教育最根本的价值应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而在我国学校教育中长期伴随基础教育的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突出的弊端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甚至扼杀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他们不能够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儿童从开始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尊重、保护和不断发展儿

童与生俱来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使学校成为学生学习的乐园。因此,基础教育应坚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保护和不断发展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开发学生学习的潜能,才能使學生真正得到成长和发展。

2. 基础教育的“基础”是奠定生命教育的基础。

基础教育是为人的一生奠定基础的教育,基础教育不仅要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更要为学生幸福的人生奠定基础。叶澜教授提出基础教育的生命性,即基础教育面对的是处于生命中学习最集中时期的儿童和少年。对于每个学生来说,这是十分宝贵但自己却并不全然知晓其价值的生命时期;是缺乏生活经验,各方面都处在形成状态,又充满多方面需要和发展可能,充满生命活力和潜力的时期。这段时期的教育影响价值,远远超出该阶段而扩展到终身。^[15]在倡导生命教育的今天,基础教育要引导学生认识和善待自己的生命,认识并勇于超越自己。基础教育阶段,应让学生懂得珍爱生命,懂得生命的整体性,懂得这段时期对于生命的独特重要价值。这是基础教育又一质的规定。

人在世界上生存、生活,实际是延续与享受生命的过程。人之生命实际是生理的生命与精神的生命之统一,是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生命之统一,是现实的生命与理想的生命之统一。作为个体的人,其学习生存的本领、生活的经验以及认识世界、追求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生命过程有价值、有意义,使人生幸福。因此,基础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对生命进行正确认识,要使学生在认识生命、理解生命的基础上能够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学生领悟生命的意义,在于使自己精神、思想富有,对他人有所帮助,对社会有所创造,超越前人而又对后人有所贡献。然而,我国基础教育在长期适应选拔人才、培养“精英”的过程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缺乏生命意识,缺乏对生命意义的关注,使得受教育者在教育者的眼中成为一个非鲜活的、非完整的、非情感丰富的生命体。基础教育漠视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提升的一些做法,严重损害了受教育者的主动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而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缺失,又将影响到整个民族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鉴于此,在基础教育阶段,要关注学生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提升。重要的是:“不再把教育简单当作现存知识直

接传递的过程,而是看作生命与生命的交往与沟通的过程,只有有了这种生命的沟通,才能深刻地实现对生命发展的影响^[16](PP.133-135);对学生进行立志与理想教育,使学生知道人之生理的生命是宝贵的,但还有比生理之生命更宝贵的气节、理想、人格和道德情操,教育者要提升自己对生命的认识,提升自己的生存本领,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以本领传授本领、以生活示范生活、以生气唤醒生气、以激情感动激情、以理想鼓舞理想、以生命点燃生命^[17];教育者要有对学生一生的发展负责的意识,在基础教育阶段不仅要进行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育,更要进行基本态度、基本方法的教育,当学生离开学校、走上社会而开始自己的人生之旅时,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学到的东西就会融入其生命之中,伴随着他们生命的成长而成长。^[18]如此,我们的课堂、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基础教育才会充满生命的活力,我们培养的学生也才会充满生命的活力,基础教育也才能真正成为奠定生命基础的教育。

3. 基础教育的“基础”是奠定社会发展的基础。

对于整个社会教育而言,它是社会教育大厦的基石。基础教育的目标不仅体现了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生存、发展、参与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体现出基础教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叶澜教授提出基础教育的社会性,即基础教育要使学生认识社会、热爱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未来社会培养合格和出色的公民,基础教育与千家万户相关,要依靠社会和社区,向社会和全体公民负责。^[15]在当代,基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体国民的“基本素质”。基础教育是对所有未来国民实施的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它不是高等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而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而进行的不定向的非专门的基础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要为每一个人的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奠基。从此可见,基础教育决定了一个国家劳动力或公民的基本素质,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更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决定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水平以及文化创新潜力的大小,最终从总体上或根本上影响或制约这个社会和国家未来发展。^[19]如上所述,这就意味着基础教育不仅承担着满足和促进每一个人获得发展能力的使命,同时也具有提高民族素质的根本价值,承

担着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根本使命。基础教育不仅是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必需,它不仅要奠定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还要奠定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基础。不过,基础教育的这种基础性地位的确立或实现,反过来需要国家与整个社会的重视与支持。只有当整个国家与社会都认识到基础教育的这种基础性并提供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充分条件、资源时,基础教育的这种基础性才能充分实现。^[10]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基础教育是每一个人能在社会中生存和继续学习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教育,是每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它的本质在于“基础性”。概而言之,21世纪的基础教育应是:奠定个体未来发展的、充分发掘个人创造潜能的、赋予生命内涵的、提升生命价值的、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最基本的教育。

[参 考 文 献]

- [1]现代汉语辞典[Z].上海:商务印书馆,1994.
- [2]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 [4]陈桂生.“基础教育”辨析[J].上海教育科研,2002(4).
- [5]美]查尔斯·赫梅尔.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 [6]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1999.

- [7]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 [8]孙喜亭.基础教育的基础何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4).
- [9]燕国材.论基础教育的“基础”[J].新视野,2005(6).
- [10]石中英.如何理解基础教育的“基础性”[J].人民教育,2005(24).
- [11]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2]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 [13]苏]阳尔森·古留加.康德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 [14]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 [15]叶澜.“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理论纲要[J].上海教育科研,2001(2).
- [16]叶澜.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跨世纪思考[A].顾明远.素质教育的理论探讨[C].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 [17]王颢.论教师职业的内在价值[Z].两岸师范教育学术研讨会,2000.
- [18]程斯辉.试论基础教育的本质[J].中国教育学刊,2004(1).
- [19]彭泽平.我们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基础教育观[J].当代教育论坛,2006(2).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国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王维秋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实施义务教育对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将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我国当前由于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借鉴国外发展义务教育的一些经验,将有助于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逐步实现。

[关键词] 国外; 义务教育; 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3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18-03

义务教育又称为强迫教育,是国家用法律形式规定的免费对一定年龄的儿童实施的学校教育。义务教育的实施对整体提高国民素质以及促进社会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义务教育在中国的实施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后,义务教育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对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进行了规定,并提出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新的《义务教育法》。时至今日,普及义务教育这一目标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但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之间以及校际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当前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对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都有着重大影响。如何将稀缺的义务教育资源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一些国家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积累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国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相关经验

1. 英国义务教育相关法律演进及沿革。自1870年英国政府颁布《初等教育法》(也称为《福斯特法案》)开始,初等教育在英国开始转变为免费的和义

务的,这为该国后来义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在1876年的《桑登法》中,对父母对儿童接受教育的责任以及强制学校委员会推行义务和免费的初等教育进行了明文规定。1880年的《芒代拉法》则标志着英国义务教育体系的正式确立。到了1918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初等教育法即《费舍教育法》,规定了5-14岁为义务教育阶段,在小学阶段实行免费教育。1944年又通过了《巴特勒法案》,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15岁,并再次规定了父母对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1988年教育改革法》则将义务教育阶段延长到16岁,并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实行统一课程和统一的成绩评定制度,家长可以选择子女就读的学校并参与学校管理,教育资源的控制权也被下放到学校。

关于英国的义务教育拨款情况,由于各组成部分的教育体制不同,拨款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根据2002年的数据,在英格兰地区,政府教育经费的20%直接下拨到学校,剩下的80%由英格兰政府拨给地方,地方视学校具体情况按比例进行分拨。来自英格兰政府的经费占义务教育经费总量的80%,剩下的20%来自于地方政府,且教育经费开支通常占到地方政府总支出的40%-50%。^[2]而自2006年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促进江苏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09JYB003)。

[收稿日期] 2011-04-21

[作者简介] 王维秋(1987-)男,江苏东台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开始 英国的义务教育经费已经完全由国家负担。

2. 美国——“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美国实行的是 12 年制的义务教育 ,但由于各州以及州各学区在义务教育的权限上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 ,义务教育的质量因各地区之间资源配置不均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分化趋势。为此 2002 年布什政府颁布了著名的“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法案 ,以强制性的联邦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教育改革。自此 ,美国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了法律性保障。该法案中 ,对教师素质做了规定 ,即教师除必须通过州内统一的课程教学测试外 ,还需要具有与教学课程相对的专业学习 ,建立教师激励基金 ,国家对教学成绩显著以及主动到师资紧缺学校工作的教师进行奖励。此外 ,法案要求各州采用面向学生的统一的标准化测试 ,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统一衡量。要求地方政府、学区和学校必须保证使学业不佳的学生能够达到较高的学业标准。并通过额外的教育拨款对学业落后及经济困难的学生进行课后辅导。

美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于学区征收的教育税以及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拨款 ,且政府负担比例在逐渐增大 ,其中学区所占比例为 40.9% ,州政府比例为 49.5% ,来自联邦政府的所占比例为 7.3%。“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法案则规定了联邦经费与义务教育的目标相挂钩 ,并实行优胜劣汰的拨款方式。薄弱学校可以用增拨经费改善学校设备及环境 ,但是必须以改善教学质量为目标。成功者将获得进一步的经费支持 ,未达目标者则被削减经费乃至淘汰。^[3]此外 ,为了促进义务教育质量的均衡提升 ,联邦教育拨款中的科技拨款也优先向农村学校和家庭经济状况欠佳的学生较多的学校倾斜 ,使这些学校可以购置先进的科技装备用于教学。

3. 日本——教育机会公平与质量公平。日本早在 1886 年颁布的《小学校令》中就对小学义务教育进行了规定 ,自此开始实行 6 年制的免费义务教育。二战后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出于统一配置教育资源以及确保教育机会公平的考虑 ,对义务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规定 ,如将学制延长至 9 年 ,确保教育机会均等 ,在全国实行统一规范的教学要求等。同时实行教师流动制并对偏远地区的教育给予倾斜与扶持 ,进而促进学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日本开始重视义务教育的质量 ,并努力追求这一过程的公平。学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 ,并执行统一规范的教学要求 ,同时

实行教师轮流制 ,进而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之间教学水平的均衡发展。

二战之前 ,日本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 ,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由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为主。^[4]到了 1918 年 ,日本中央政府开始直接承担全国公立义务教育教师的部分工资 ,对义务教育部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战之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则是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并重 ,且基础教育经费开始占到日本国家教育经费的 70% ,这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保障。现今 ,日本的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政府分担 :中央政府负责确定义务教育的全国标准 ,并依法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补助 ,而地方政府则对义务教育实行管理 ,对教育财政支出进行明确分工。国家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 50% ,地方政府承担余下的 50%。此外 ,为了保证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日本政府实施了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并通过国库支出金和地方交付税的形式对义务教育实施补助 ,同时地方政府也对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实行补助。^[5]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日本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4. 法国——区域之间、校际之间、学生个体之间的均衡。法国的义务教育制度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通过《费里法案》即已确立。但是由于实行的双轨制中存在的等级性 ,义务教育的均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925 年 ,法国政府规定各初等教育机构从教人员需要具备相同的资格以及采用相同的考核标准 ,进而采用相同的教学大纲和内容^[6]并于 1945 年完全实现了小学阶段学校的统一化 ,或者称之为“ 并轨 ”。中等教育阶段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逐渐实现免费 ,这有利于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就学。1975 年的哈比改革则建立起了初级中学 ,至此 ,法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了单轨制 ,且义务教育经费全额由国家承担 ,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了条件。

为了实现地区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法国政府对全国内的学校布局进行了调整 ,对学校的数量、位置和规模进行系统规划 ,确定学校的招生区域 ,使学生就近入学并禁止择校。针对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教学质量的差异 ,法国政府还建立“ 优先教学区 ” ,对薄弱学校进行扶持 ,如增拨经费、增派教师等 ,并对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那些学生投入关注和支持 ,这些扶持手段在地区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后将终止。针对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政府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后辅导做了硬性规定 ,并使

辅导学业落后学生成为学校的职责之一,政府拨款为辅导教师提供相应经费。通过辅导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法国政府有效地减少了学业失败,给学生提供了公平的入学机会和相同质量的教育服务,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该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对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启示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对人的素质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公平的实现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带着免费性、公益性和普及性的义务教育,它的均衡发展,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改变社会分层以及促进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构建具有时代性和平衡性的义务教育法规。英国的义务教育立法和完善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并针对义务教育的改革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符合并适应该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状况。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义务教育的相关法律不断进行调整与完善。随着时间的变化,英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在进行不断的细化,法律的配套体系比较完备。相比之下,我国的义务教育相关法规尚不健全,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完善。英国的义务教育法规比较特殊的一点是,除规定父母对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外,对学校和政府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就使得义务教育各个方面的主体——政府、学校、受教育者及其父母的权利和义务得以明确并渐趋平衡,从而有助于义务教育的真正实现。这对于我国的义务教育立法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2. 保证处境不利者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校际之间的分配不均是影响教育机会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的因素之一,而这也是制约各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普遍问题。针对这一情况,美国和日本采取的措施比较近似,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模式。这有利于地区间与学校之间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缩小地区以及学校间的差距。而在我国,不均衡的义务教育对我国的教育机会公平与教育质量公平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建立对薄弱地区和薄弱学校的专项经费扶持制度,通过对口帮扶等方式,改变学校的教学环境,加大教师的流动,促进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进而保证学生享有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影响着学生的义务教育质量公平。私人资本的存在对教育质量有着很大的影

响,甚至会对学生接受下一级教育的机会造成影响。法国政府针对这一点所制定的政策可以这样表述:把最大的努力放在需求最大的那部分人身上,给匮乏者更多,特别是更好。要求学校对家庭条件较差和学业落后学生进行专门辅导将有助于给他们提供公平的入学机会,进而保证教育公平。这一点,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3. 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义务教育对于一国国民基本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公平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英法两国的义务教育经费已完全由国家承担,美日两国也呈现出中央化的趋势。美国政府实行的对薄弱学校实行的“优胜劣汰”投资方法,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与促进教学质量的项目实践直接关联,这对于提高学校的积极性以及义务教育质量的确保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与美国相似,但是某些薄弱学校却缺少提高教育质量内在的驱动力与外在压力。如果政府财政投入能够在实现均衡投入的基础上,将政府财政投入与学校的教学质量挂钩,可以促使学校将教育质量的提高作为主要目标,进而有助于保证义务教育均衡的实现。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我国也逐渐向着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靠近,而国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各种努力,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汲取国外的经验,并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将有助于实现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 胡先云. 英国义务教育法规的演进及启示[J]. 教学与管理, 2009(28).
- [2] 孙纲. 英国义务教育经费的拨款情况[J]. 世界教育信息, 2002(6).
- [3] 王梅. 美国“不让孩子掉队”法案对我国义务教育的启示[J]. 教学与管理, 2009(4).
- [4] 杨秉翰, 刘畅. 日本中小学建设标准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 [5] 蔡红英. 日、美、中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百年变迁及启示[J]. 宏观经济研究, 2009(12).
- [6] 孙启林, 周世厚. 大均衡观下的“略”与“策”——法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评析[J]. 现代教育管理, 2009(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及调控*

刘 平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北碚 400715)

[摘要] 网络政治信息在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中,能提升青少年的政治认知、培养政治责任感、塑造现代政治人格,也造成权威引导功能的弱化、青少年政治实践能力的欠缺。为更好地促进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应加强网络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构筑网上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培养和发挥网络中“意见领袖”的作用。

[关键词] 网络政治信息; 青少年; 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 G66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21-03

互联网的异军突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媒体“意见气候”,改变了社会公众和“理性讨论”的定义,改变了国家政治的文化形态,也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身,青少年作为网络中的主体无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它的影响。本文从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进行分析,力求寻找相应的对策。

一、网络政治信息的内涵及特点

网络政治信息是指通过互联网传输和传播的有关国家政治制度和个人政治生活的各种内容,并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广泛影响的媒介。它是在网络平台上流动的非经济的、生活的、娱乐的,特别是关于政治的内容,内容的影响力度及公众参与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其主要特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内容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网络强化了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还是政府加强政治意识控制、国际争夺的地方,更是各种反社会、反政府信息和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虚假及恶意信息的存在地。网络的开放性结构,使网络成为各种政治思想交汇的公共场所,每一种政治思想都能在网上“立足”,并相互影响;与此同时,网络中的各种政治思想又直接或间接地对现实社会中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种多元存在的政治信息,一方面可以使世界各国更易接收到以前不能接触的信息,丰富信息来源;另一方面

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源发散出来的信息,在别有用心背后会不尽真实,影响各国国内政治判断。

2. 传播主体的层次性。网络政治信息是网络中具有官方性质和非官方性质的传播主体利用网络这个平台进行的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信息。官方的指各级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政治组织以及政府领导下处于独立地位的官方媒体,比如新华网、人民网等,非官方性质的指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如一些社区论坛、聊天室等。传播主体的角色地位不同,传播的信息就有差别,从而形成的传播模式、意见模式和观念模式的结构特征也不一样。政治性较强的网站通常具有排他性,力求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信息有较强的政策性、政治性。非官方组织和个人则可以就自己的政治喜好发布政治信息,表达政治主张,其内容不受党派党性的限制。所以网络是草根人士和政治精英同时使用的工具,发布的符合自身目的的政治信息具有一定的层次性。

3. 信息空间的开放性和交互性。网络政治信息的开放性是指网络政治信息内容的开放性,交流不再是封闭的,具有网络为之提供的开放的交流空间。网络政治信息的交互性是指网络为网络政治信息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政治信息交流互动的空间。传统政治信息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而网络的互动

*[收稿日期] 2011-02-20

[作者简介] 刘平(1975-),女,重庆江津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平台为网络政治信息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沟通渠道,其传达的信息很容易为上级收到,彼此能共同互动。再者,网络一对一、一对多甚至多对多的互动模式突破了传统政治信息单—的交流模式,也扩大了信息的开放空间。

4. 传播速度的高时效性。网络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世界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地球村”。网络以比特的速度使信息传输更为方便、快捷、及时、同步,真正实现了信息的实时化、瞬时化和自动化。网络政治信息的高时效性主要是指传播意义上的高时效性。传统的政治信息的传播往往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需要较长时间传达到目的地,如口谕、印刷文件,且真实性和实效性难以把握,而网络政治信息传播效果则可以达到零距离的效果,网民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关于世界各地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报道,了解政治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也能同时获得其他个体对事件的评价。

5. 信息生成的高科技性。网络政治信息虽然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但物质基础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以电子为介质的高科技形式,使互联网能够储存海量信息,又能迅速地传播各种信息,且政治信息还能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帮助下以声、形、图并茂的形式更生动、更形象地展示出来,增强了信息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所以,网络政治信息的高科技性是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

二、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双面效应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1] (P.305)} 政治社会化既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关,也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作为一个更开放的环境,为人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青少年作为网络的利用者、参与者和创造者,可以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政治互动中实现自身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1. 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正面影响。新时代网络政治信息已成为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外部环境和因素。因此,认识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第一,极大提升青少年的政治认知。“政治认知是政治行为主体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政治客体,即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规范、政治功能等方面的

认识与把握。”^[2]通俗地说政治认知是指人们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是一种领悟和判断,而不是简单的理解。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以认知为起点、实践为终点的逻辑过程,个人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生活,必须要获取政治信息,了解政治动态。而政治体系也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将体系内的主导政治意识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扩散和传播,促进其成员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信息。网络则以自身的特征承载了这二者的需求,网络状扩散模式促进了不同群体、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们交往。青少年在交往中获得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活动等政治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同时也在交往中获得各种政治观点,构成了个体政治化的交叉压力,有利于形成政治理性,有利于形成自己对于政治的判断和评价。

第二,培养青少年的政治责任感。政治责任感是政治行为主体对自己在政治活动中所应承担的责任的自觉性。网络以其方便快捷、生动形象、实时互动的特点,提供了大量的政治信息,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及时了解政治事件、政治活动,也让其有机会参与其中。比如钓鱼岛事件,网络让青少年第一时间知晓了事件的发生、发展,很多网民在网络里表达了自己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国际不公平政治秩序的愤怒,同时,主流政治文化适时地给予引导,让大家很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每个公民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才能更好地保卫好自己的国家的政治意识,从而培养了青少年在政治活动中应该具有的责任感。

第三,塑造青少年的现代政治人格。我国公民的传统政治人格由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影响;“政治情感在传统政治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中经常起主导作用”,政治人格缺乏独立性,是一种依附权利生存的政治心理取向,在“政治参与中更过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排斥多元的社会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3],在较为封闭的政治环境下,缺乏开放性的政治意识。而在网络时代,网络政治信息的开放性和丰富性是前所未有的,促进网民对政治活动的有更深的、更为明确的观念,使青少年在政治参与中实现政治社会化过程。他们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学习政治文化,认识政治现象,并且获得适应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和政治技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人格。

2. 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负面影响。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政治信息在给青少年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给青少年带来一些负面

的影响。

其一,弱化权威引导功能。网络里的政治信息除了正面的政治信息外,还有一些别有用心、个体和政治组织发布的反向的政治信息,这样的反向信息会对个体产生一种渗透作用,形成一种反向政治认知,使“民众倾向于对政府及其活动,对官员及其行为进行负面认知或做出否定的判断。”^[3]反向政治认知造成政府与民间、官员与民间的政治裂痕,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会形成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抵触情绪,尤其是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带来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青少年易对现行制度和体制产生怀疑,权威的政治引导将大大被弱化。

其二,弱化政治实践能力。网络环境下,青少年获取政治知识、形成政治观念和政治立场,存在很大的虚拟特征,失去了人性世界里的社会属性,个体在网上的政治交往、政治行为等往往很少考虑现实政治生态环境的诸多人伦、道德约束,带有很大的理想主义色彩。当以鼠标点击速度的政治参与与现实政治参与程序相矛盾或不符的时候,易造成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同时在电脑屏幕前模拟的政治实践而形成的定式思维,会给现实政治生活带来障碍。

其三,拉大不同处境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差距。环境因素是影响个体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处境的青少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网络政治信息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培养其政治认知不可缺少的元素,个体政治认知越丰富,政治参与越广泛,个体政治社会化就越快。而处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青少年,少有机会接触这些必要的政治信息和政治经历,因此政治社会化的差距被拉大。

三、加强网络政治信息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影响的调控

网络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影响是必然的,要使网络政治信息的影响发挥良性效能,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主动出击,加强网络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网络技术以其特有方式催生和创造了一个没有强权、去中心的、全新的、平等的信息空间,传统的公众意见模式、观念模式、舆论模式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个性化及自由化的公共讨论使私人化和专制化的物化精神挤压得到“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公共权力机关的政治控制能力,但政府作为政治权

威,必须加强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创造良好的网络政治环境,及时传递全面、真实的信息,及时主动地解释反证谣言的虚假性和荒谬性,抵御不良信息的渗透,为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和政治人格提供保障。

2. 丰富内容,构筑网上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灌输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之一。网络时代下的灌输,并非传统式的填鸭硬塞,网络以其优势满足了青少年追求个性张扬的需求,因此政治社会化的实施,也应根据青少年生理、心理特点,了解青少年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优化网络政治信息资源,努力开发适合青少年政治心理特点的充满吸引力的网络政治信息资源,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以投其所好的形式进行有目的的灌输,使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应该接受的内容,把青少年的网上政治行为引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和轨道。同时,举办一些非政治性的活动也是隐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好形式。

3. 内外影响,培养和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在网络中也有这样的意见领袖,因此,在网络里政治信息的传播中要让这样的“意见领袖”成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指路人”和“导航员”,相关部门必须要注意发现和寻找这样的“意见领袖”,加强和他们的联系,有意识地灌输共产主义理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国人气节,通过“意见领袖”的辐射作用,让网上的青少年能更正确地认清形势,更理性地看待和分析政治领域里的问题,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 [1]李斌. 网络政治学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2]李亚宁. 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建构[J]. 理论导刊, 2006(5).
- [3]任丽萍. 从传统到现代: 政治人格的塑造与政治稳定[J]. 求索, 2004(1).
- [4]方付建. 要高度重视反向政治认知[J]. 学习月刊, 2010(2 月上旬刊).

(责任编辑 光 翟)

实现角色转换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以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校本课程建设为例

刘宏业

(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在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过程中,教师角色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教师经历了从点菜消费者到菜单提供者,从经师到导师,从教书匠到研究员,从独奏者到合奏者这些角色的转换,教学观念悄然改变,专业素质得到较好的提高。

[关键词] 校本课程; 教师; 角色转换; 专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24-02

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方面:学生个性的发展、教师专业的成长、学校特色的形成。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中获益,专业素质得到很好的提高,教学观念悄然改变,教师角色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校本课程从开发到实施过程中,凝聚着众多教师的智慧和努力,真实地记录着教师成长的历程。

1. 点菜消费者——菜单提供者。这一点,主要从校本课程开发的角度来说。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学与课程开发是彼此分离的。教师被当作一种课程实施的“工具”,是课程的“使用者”或“消费者”,教师的责任就在于忠实地执行。而在校本课程的开发过程中,教师不仅是课程的实施者,还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拿着统编教材的被动实施者,而应成为课程开发的主体,是课程的生产者和主动的设计者。如果说原来教师是“点菜消费者”,那么,在校本课程中,教师就转变为“菜单提供者”。

伴随着校本课程的逐步深入,教师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一个课程的实施者,而是以主人翁的姿态

关注课程的发展。教师主动参与到课程的修改和完善中,对学生发展的情况、对自己教学质量进行反思与探索,并提出改进的建设性意见。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设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辐射到各学科的教学,将有力推动学校校本课程工作的整体优化。

在成为“菜单提供者”过程中,教师将个人特长和学生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使提供的“菜单”能真正为学生所接受,让学生真正享受校本大餐。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座谈、家长访谈以及网上选课等具体形式来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结合教师的特长,确定课程的开设。初中思想品德课最初尝试和实践过两个栏目,分别是“小小法庭”和“新闻万花筒”。在具体实施中,这两门课程越来越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为此,两门课程的团队教师集思广益,又开发了“心智训练营”这一课程,开发补充和完善了初中思想品德校本课程的完整性,优化了初中思想品德课程的结构体系。校本课程的研发中,师生构成了校本课程的共同体,相互关联,互动推进,推动了学校校本课程的发展和教师自身的发展。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立项课题“都市初中校本课程品质提升的行动研究”(项目编号: D/2008/02/087)。

[收稿日期] 2011-03-11

[作者简介] 刘宏业(1973-),男,江苏灌云人,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教务处副主任,中学高级教师。

2. 经师——导师。这是从师生关系角度说的。《学会生存》一书曾做出精辟的论述：“教师的职责越来越少的是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的是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点而不是拿出出现成真理的人。”因此，在课程实施中，教师应把自己当成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遵循不干涉的原则，积极地旁观，掌握各种情况，考虑如何指导学生学学习。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育产生效能的关键。教师只要懂得如何与学生沟通，懂得如何去满足学生的需要，并引导学生懂得如何与教师合作、互动，师生建立相互信任、尊重、彼此接纳、理解的关系，教育活动就容易使学生产生兴趣。因此，我们把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作为一种教育能力来培养和提高。

在校本课程实施过程中，师生关系应该由教师单纯的“授业”转换为“亦师亦友”。“师”在于对学生的学进行适时、适当的引导；“友”在于和学生共同讨论，共同成长。在课堂教学中，要改变以往由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教师努力成为引导者，成为一名启动学生学习、探究的助推器。教学中要充分鼓励学生，调动学生的情感和经验，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学习研究的动机。这对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然也就促进了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自己。例如，在讲述“古埃及文明”这一课之前，教师将教学目的与学生能力相结合，确定研讨内容，把学生分成组，让每一组就其感兴趣的古代文明进行资料的收集。课上教师组织学生交流，适时评价。学生在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的搜集整理加工中，主动吸收消化了相关历史知识，对有争议的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从而拓展了历史知识，提升了知识迁移、语言表达、分析问题、合作探究的能力，与此同时，人文素养也得到提高。

3. 教书匠——研究员。校本课程的开发对教师专业的发展，最大的表现在于教师的观念转变上。开发初期，很多教师对教学任务的完成仅立足于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但随着校本课程的推进，教师越来越体会到现有知识是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的教学需求的。

教师专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教师缺乏知识的积淀，所以只有不断加强自主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内涵，才能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必须努力掌握三方面的知识，即扎实的专业知识、宽

广的其他学科知识和丰富的教育科学知识。教师在平时的实践中一定要积极努力积累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在研究校本教材的同时，还要阅读理论著作，关注最新的校本课程研究动态，积极与其他学科教师、校本课程研究专家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体会、积累，从与其他优秀教师的交流中汲取知识。

校本教研在于“以校为本”，其根本目的在于激发教师的教研积极性，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的领导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每个学期定期组织校本课程培训，让教师了解校本教研的价值所在，帮助他们提高校本教研的意识，激发他们主动参与校本教研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树立在校本教研中主动发展的自信心。每一个校本课程研发团队在主持人的带领下，积极营造良好的校本教研工作氛围，通过课程开发、教材编写、课程实施、反思总结等活动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同伴有效互助，实现经验共享，使每位教师在过程中学习，在过程中进步，逐步由一名教书匠成长为研究员。

4. 独奏者——合奏者。在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中，要坚决杜绝教师“个人专业主义”现象的存在，校本课程的开发，校本课程资源的培育，校本课程教材的编写，均需要多方合作。学校要努力引导和加强教师与同事、与课程专家、与学生的联系合作，加强专业对话、沟通协调和合作，通过相互交流分享经验，在合作中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的校本课程由责任团队组织实施。每一门课程均由相对固定的责任团队（3到5人）来负责，就课程开发、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以及课堂教学进行分工合作。每年暑期，专门进行为期3天的封闭式校本培训，专题研讨，整合教案教材，完善课程体系。在校本课程告一段落时，校方高度重视有效的评价，组织教师定期总结反思，通过恰当的渠道，把教学中遇到的困惑，与课程研究专家面对面交流，形成合力，不断提升教学层次。

此外，校本课程资源的培育、教材的编写也需要“合作”。正是各个课程研发团队的齐心“合奏”，才有每一个教师在校本课程中“百花齐放”的专业成长。

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可成功实现教师由传统型向创新型教师转变，顺利地实现教师角色的转换，有力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责任编辑 师 语）

浅谈校本课程开发中教师课程能力的提升*

——以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为例

钟丽萍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教师在参与校本课程的规划、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过程中,制定校本课程目标的能力、确定校本课程内容的能力、组织校本课程实施的能力、评估校本课程效果的能力得以提升。

[关键词] 教师; 校本课程开发; 课程能力提升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26-02

自国家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实施以来,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以下简称“分校”)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整体方案的基础上,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切入口,在科学实施国家课程的前提下,努力开发建设具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分校始终坚持全体教师在整个校本课程开发中处于核心地位,教师提升了多种能力。

一、制定课程目标的能力

对校本课程目标的准确定位是校本开发的重要一环。确定课程目标有4个基本环节:确定教育目的,确定课程目标的基本来源,确定课程目标的基本取向,确定课程目标。教师可以通过对学生需求、学校环境、教师能力等三方面的分析来确定课程目标。

1. 学生需求。为准确把握学生的实际需求,分校每年对初一入学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填写新生入学情况调查表,教师通过新生问卷调查表了解掌握每个新生的信息,从中分析提取学生群体的需求信息。除此之外,分校每年对已开设的校本课程进行

学生问卷调查,目的是使教师能够了解自己所开设的课程能否激发并满足学生的兴趣,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质量是否满意,对学生能否产生帮助。教师根据学生的需求和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以新课改的基本精神为指导,不断调整自己所开发的课程目标,在开发和调整的过程中提高制定校本课程目标的能力。

2. 学校环境。学校进行校本课程开发须建立在本校实际基础之上。学校环境包括学校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学校的内部环境包括:学校的办学宗旨以及校风、校训、校规校纪,学校的建筑和设备,学校内部的组织状况等。学校的外部环境包括学校的地理位置、学校的社会信息等。校本课程开发建设中应以课程改革基本理念为指导,结合相应课程特点,充分挖掘学校的内外各种相关资源,使其服务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建设。

3. 教师能力。教师是校本课程开发实施的主体。为确保校本课程的有效实施,教师要正确认识自身的特点,以便充分用己所长,将自身优势作为校本课程的重要资源之一加以挖掘利用。为充分挖掘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立项课题“都市初中校本课程品质提升的行动研究”(项目编号:D/2008/02/087)。

[收稿日期] 2011-03-01

[作者简介] 钟丽萍(1973-),女,四川成都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硕士,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教师的现有资源,校方可制定教师课程开发意向表,了解教师的能力和特长,也使其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制定校本课程的目标时量力而行,倾力而行。

二、确定课程内容的的能力

教师在校本课程建设中,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发现、挖掘身边符合本校学生发展的相关课程资源。分校通过理论培训、课外阅读等途径让广大教师充分认识校本课程开发的特点,并结合本校校本课程建设的理念,引导教师在校本课程内容选择方面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1. 综合性。要打破学科的限制,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基点,结合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展开教学内容的选择,实现多门学科的有机综合。

2. 针对性。面对可供使用的资源,教师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教师自身的特点,同时还要考虑到学校所处的环境及学校所能提供的相关条件等等多重因素进行筛选,以更好实现校本课程的设置初衷。

为此,学校可定期对教师进行封闭式校本培训,从学习校本课程开发的意义和总目标到如何编写课程纲要、课程计划;从如何确定课程内容到分小组讨论、整合、编制各小组能开设课程的统一教材;从如何开设单一的学科课程到如何开设综合性课程等等。分校对已有的资源重新整合,开发的课程立足本学科,体现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形成合科课程、融合课程。如物理、化学、生物3个学科组合提出的“探索与发现”,语文组的“语文嘉年华”,政史地组的“心智拓展训练”,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三、组织课程实施的能力

课程的实施是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决定课程质量的关键因素。课程实施是继课程编制后教师的又一个创造过程。在课堂上,教师不断将课程内容传授给学生,将静止的文本材料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内容,最终使其成为学生的经验。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如果教师缺乏课程实施需要的知识和能力,那么课程实施只能沦为一句空话。几年来,分校从几方面来提高校本课程的实施质量。

首先,引导教师建立课程的制度意识、理论意识、价值意识和开发意识。其次,教师要与学生沟通、合作,共建以教促学、互教互学。在课程实施中教师要与学生分享对课程的理解。再次,教师要紧

密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来选取恰当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分校每学期都对学生进行课程问卷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反馈给授课教师,帮助教师更进一步了解自己所授课程是否贴近学生生活,所教内容是否能成为学生的经验,同时帮助教师调整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同时每学期组织校内外专家组对所开课程进行地毯式听课和指导,期末对每位上课教师给予综合性评价反馈,对所开课程提出一些建议和修改意见。分校教师在不断了解并及时解决教学问题的过程中,实施课程的能力不断提升。

四、评价校本课程效果的能力

为保障校本课程的质量,对校本课程效果的评价是校本课程建设中教师必须具备的课程能力。

1. 制定评价方案。一个完整的评价方案包括五方面的内容:评价目的,它规定了评价方案的适用性以及评价预期可达到的结果;评价的准则,它规定评价的内容;各准则相应的权重,它表明了各准则的相对重要性;量表和标准,也就是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各类表格,用来收集各种信息。

2. 实施评价。要求教师按照以下3个步骤实施评价过程:首先是搜集信息,其次是分析信息,最后撰写评价报告,并对校本课程建设工作进行总结。综合各相关校本课程的评价实施情况,分校校本课程对学生的评价已经呈现多样化、趣味化、人文化。评价的方式有:学生上课出勤率评价,计为学时学分;课业完成情况评价,计为课业学分;档案袋评价,即将学生活动参与情况的记录、学生自己的感受、学生自己创制的作品、活动的录音、录像带及照片等原始资料建立一个档案袋,每个学生自我掌握;定期展示和评估,进行阶段性和总结性的自评、互评和师评;竞赛或表演评价:每学期学校都要评出校本课程各类之星,每学年学校要组织文艺汇演,演出的节目都来自校本课程。

在校本课程的评价实施中,分校教师还特别重视学生在评价中的个性化反应方式,倡导让学生在评价中学会合作,不仅重视学生学习的最终成果,更重视学生学习过程的参与状况。教师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改进自己的评价方案和评价方法,使之更科学合理。

(责任编辑 师 语)

浅议教师的情绪调控*

母松灵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在新课改进行的近十年间,教师情绪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有关教师情绪的研究越来越多。本文在意识到教师情绪调控产生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教师在情绪调控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帮助教师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保障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情感基调处于一个活跃、协调的氛围中。

[关键词] 教师; 情绪调控

[中图分类号] G6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28-03

教师情绪引导着教师的思维、判断、决策和行动,对教学过程、课堂气氛、自我心理和学生心理健康等都有深刻的影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教师不能成为良好的教师。为了保障教育教学活动顺利开展,教师情绪调控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情绪的概念

在心理学中,情绪是指那些具有不同类型的内部体验,并且经常伴随着较强烈的身体运动表征的心理过程。^[1]一般说来,当客观事物符合并满足人的需要时,就会产生满意、愉快、喜爱、兴奋等积极的情绪体验。当客观事物不符合、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时,就会产生悲观、忧郁、焦躁、愤怒等消极的情绪体验。

情绪具有独特的主观体验和外部表现,他们与心理基础一起被看做情绪的三要素。^[2]情绪体验表示情绪具有主观的体验色彩,不同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对于同一种情绪,每个人的情绪体验却是一样的。情绪的外在表现形式——表情,以有形的方式体现了情绪的主观体验,是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工具。情绪心理,是情绪产生时必然伴随着的生理变化。不同的情绪会产生相

应的生理变化现象,如激动的时候会出现身体颤抖、语无伦次的反应,生气的时候会阴沉着脸、冷漠无情的反应等等。

二、当前教师情绪调控的必要性

新课程改革以来,“知识建构者”、“共同探究者”、“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等词语开始频繁出现,并被越来越多地用以形容教师。可见,教师在迈向自身专业化的道路上,不仅要提高自身知识、技能和素养,而且还应该更加谨慎、更加严格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与他人的情感联系。

1. 新一轮课程改革对教师情绪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课改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教师先前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尤其对于一些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多年的教师而言,他们突然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感、舒适感和安全感,新课程改革的新要求与新变化使他们的情绪难免有一些波动。在新课改轰轰烈烈开展的背景下,限于对课改精神领会程度和对课改方案的掌握程度,有些教师只是在实践中将新课改的理念停留在表层,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内化,最终导致在实际

*[基金项目]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西南地区高中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师生适应状况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项目编号:10YJA880054);西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课程改革中学习方式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SWU0909524)。

[收稿日期] 2011-04-14

[作者简介] 母松灵(1986-),女,四川广元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盲目的做法,如为了追求课堂气氛的活跃,为了增进师生的互动交流,在一堂课中想尽办法“哄”学生高兴,将一些不适合本节课运用的教学方式生搬硬套地加以运用,最终不但没有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反而带来了教师的苦恼和困惑。新课改的实施意味着教师的整个专业场景将发生彻底的转变,教师以往早已内化为自我一部分的专业实践、规范、标准与价值观基本上都将在改革中失去意义,而在新的场景中重新建构身份认同也成为教师必须完成的使命^[3]。

2. 当前教师人际交往障碍需要教师情绪调控。

教学以人际互动为基础,教师从事的是“人的工作”。离开师生间的人际互动,言传身教根本无从发生。而情绪是人际互动的产物,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是影响个体情绪产生和变化的社会基础。教师在学校中所处的人际关系较为复杂,要处理好与领导、学生、学生家长的关系,以及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而每一种关系都极为重要。新课改的理念通过重组教师与学生、家长、同事以及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来影响教师的情绪活动。如:教学中的竞争,教师所持教学理念的不同,教师个性的不同,导致教师关系紧张;现代社会信息传播途径多种多样,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绝对拥有者,教师的职业权威受到了冲击;家长对孩子的百般维护,导致家长对教师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等现象都给教师带来了一种无形的人际交往障碍,从而影响教师的教学工作。

3. 教师超负荷的教学工作压力需要教师情绪调控。

1964年召开的国际心理卫生大会上提出,心理健康的人在情绪方面应是十分调和的;马斯洛认为心理健康的人能够进行适度的情绪表达与控制。可见,良好的情绪表达与控制能力是心理健康的标志之一。^[4]根据我国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受检教师出现心理问题是由于“工作太累”所致,其中有37%的教师每天工作超过了8小时。现代教师承载压力过大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人们对教师的高要求、高期望。21世纪是人才的竞争,这使得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不断高涨,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家长把对孩子所有的期待都转嫁到学校,最终体现在对教师的高要求、高期望上。对此,教师不得不不断地提升自己。第二,扭曲的“学生观”给教师带来困惑和迷茫。“一切为了学

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学生观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被学校、家长过于看重,以至于扭曲对它的理解,势必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在学生权利得到维护的同时,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需求而牺牲自己的权利,不良情绪的问题随之增多。

三、当前教师情绪调控面临的问题

教师能意识到自身情绪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是一种进步,但仅仅有这种进步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意识到自己在情绪调控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哪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针对这些问题对症下药。

1. 对引发情绪问题的原因缺乏分析。

现代情绪心理学研究认为,情绪产生是受环境事件、生理状态、认知过程3个条件所制约的,其中认知因素是决定情绪性质的关键因素。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沙赫特(S. Schachter)和辛格(J. Singer)曾以实验证明,对身体生理状态变化的认知性解释是构成情绪经验的主要原因。而理性学派也同样强调人的认知对情绪的影响。^{[1] (P. 289)}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不良情绪的产生,必然是因为某件事情或者某些事情引发的,在教师情绪问题产生时,不可避免地会带着这种不良情绪去解决问题,带着情绪去解决问题,则又会使教师心态更加不稳定。

2. 缺乏专门的教师情绪调控机构。

目前很多学校都有针对学生的心理咨询机构,但是独立设置教师心理咨询机构的学校并不多,有些学校虽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建立了被称为“聊天室”的教师心理咨询室,但是由于教师认识上的不够,以及教师羞于将自己教育教学中的“麻烦事儿”透露出来,导致教师情绪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情绪问题被大量积压。

3. 缺乏系统的情绪调控知识。

教师情绪调控不仅是对教师技术层面的要求,更重要的需要教师掌握系统的教师情绪调控知识。在系统地掌握了情绪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个人情绪发生发展的规律,采取积极有效的科学方法和艺术手段进行调整,使个体的心理得到健全而自然的发展。^[5]由此可见,只有在系统地掌握了教师情绪调控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提高教师选择适当情绪调控方式的能力。当前很多教师虽然知道一些简单的情绪调控的方法,如换位思考法、宣泄释放法、幽默诙谐法等等,但是在一种情境下需要采取哪种或者哪几种情绪调控的方法,却茫然不知。

四、提高教师情绪有效调控的策略

提高教师情绪调控能力能加大教师教学信心,增强教师教学满意度,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和职业满足感。教师情绪调控的策略有以下几点:

1. 发挥专长,自我疏导。

“专长疏导法”是教师通过发挥自己的专长,提高自己在同事和学生心中的地位,反馈到自身,就能刺激自身形象的提高,从而取得心理上补偿性的肯定情绪的调控方法。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面对麻烦和困扰,情绪会处于消极、压抑、沉闷的状态,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管理好班级,没有能力与学生进行友好的交流等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自己的身上,看不到自身的一点点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合理、客观地评价自己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看到自身不足的同时,多想想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在自己的优势中去寻找成就感和信心,用这种成就感和信心来消解不良情绪。如,现在很多教师在写作、唱歌、跳舞、体育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教师可以在自己专长发挥的过程中赢得赞誉和成就感,找到自我价值,这样就能有效缓解紧张和厌烦等消极情绪。

2. 不断完善教师情绪调控机构,建立教师情绪宣泄室。

教师情绪调控机构应该采取措施,鼓励有情绪问题的教师克服自身心理压力和世俗眼光,同时还应该采取多种渠道大力宣传教师情绪的相关知识。建立教师情绪宣泄室,是为了教师能够在这里畅所欲言,让教师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把思想上的压力释放出来,把堵塞的心灵通道疏通开来,让不良情绪得到合理的宣泄释放,进而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建立一个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和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事关系等,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

3. 进行全方位的教师情绪调控培训。

教育主管部门应联合教师情绪调控机构对每一位教师进行适当的情绪调控培训活动,开设有关教师情绪调控方法的课程,展示对教师情绪进行合理调控的案例,对如何将教师情绪调控策略运用到教学中进行一些实地教学演练,使教师真正切切地看到这些策略的效果。最终使教师能够对教师情绪调控的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能够系统掌握教师情绪调控的方法理论,将情绪理论知识灵活运用到教学实践中。

教师是活生生的个体,在从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情绪成为教师专业实践中无法忽视的一个部分。在当前社会的大背景下,教师情绪面临着来自多方面因素的侵袭,教师要想达到预定的工作目标,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就必须学会情绪调控。教师情绪调控不仅仅是教师个人的事情,更需要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倾注心血,为教师情绪问题的控制和解决寻求更多的方法。

[参 考 文 献]

- [1] 张大均,吕达. 教师心理素质与专业性发展[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2] 姚立新. 教师压力管理[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 [3] 靳玉乐,尹弘飏. 课程改革中教师的适应性探讨[J]. 全球教育展望,2008(9).
- [4] 续冰. 教师情绪问题调适的基本方法[J]. 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9(8).
- [5] 贾丽娜. 谈教师情绪的自我控制与调节[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4).

(责任编辑 晨 晓)

幼儿“入园难”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刘黔敏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师研究中心, 浙江杭州 310012)

[摘要]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近年来出现的幼儿“入园难”现象与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分割制度、社会组织垄断教育资源、空间区隔影响和对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排斥有关。应该通过消除制度性的户籍屏障、理顺幼教公共财政投入机制、施行教育补偿制度等途径缓解幼儿“入园难”问题。

[关键词] 幼儿教育; 教育公平; 入园难

[中图分类号] G6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31-04

近年来,幼儿“入园难”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针对该问题,国务院在2010年召开了全国幼教工作会议。在2011年的两会上,如何解决适龄幼儿入园的问题也成为关注的焦点。从表面看,这轮幼儿“入园难”与近年来的生育高峰有关,而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导致幼儿入园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幼儿入园难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一、幼儿入园难的原因分析

1. 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分割制度。

解放后我国陆续采取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逐渐完成了把城乡隔离开来的制度化过程,最终造就了城乡二元化的户籍身份等级体系,形成农民与市民两种基本身份群体。这种户籍排斥制度在幼儿教育领域内起着社会区隔的作用,客观上造成了部分幼儿入园难,影响到幼儿教育的公平性。

与户籍制度相对应,建国以来国家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倾向于城市,并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各种教育资源向城市高度集中。据统计,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全国阶层中所占比例为42.9%。^{[1] (P.22)}但是城市的公共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的公共教育机

构。一方面,教育财政投入导致农村幼儿园的办园质量无法与城市幼儿园相比。另一方面,农村幼儿家长由于经济收入水平也无法承担过高的教育投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的调查:农村的收入等级结构形态是一个蜡烛台形状,上层极少,中层和中下层的比例很小,各占1/7左右,下层所占比例接近70%。由于农业劳动者阶层收入很低,而农村中绝大多数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种情况决定了农村收入等级结构的基本形态。这一形态几乎在近期不太可能有大的改观。^{[2] (PP.137-138)}他们往往因为经济上的困境无奈选择一些低收费、低成本、低质量的民办幼儿园。这类幼儿园一般设施简陋,规模很小,缺乏户外活动场地甚至存在安全隐患,幼儿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障。有的农业劳动者干脆放弃了让子女接受幼儿教育的可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那些进入城市工作的人包括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也遭遇这种排斥,大量的农民工的子女往往因为户籍的原因失去接受幼儿教育的机会,造成了这部分幼儿“入园难”。

2. 组织垄断教育资源。

在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包括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2009年科研项目“社会分层对幼儿教育公平性影响之研究——以浙江省为例”(项目编号: Z200909311)。

[收稿日期] 2011-05-02

[作者简介] 刘黔敏(1978-),女,贵州凤岗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师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人物)往往是由组织控制而不是由个人拥有,因此,组织中的管理者实际上拥有了对所属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从而出现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经济地位差异。由于国家组织系统掌握着整个社会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拥有组织资源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在资源配置中处于明显优势的位置。在我国就突出体现为组织排斥,处于不同单位部门的人在享受的各种社会资源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其中也就包括幼儿教育资源。在幼儿教育领域这种排斥主要是通过不同组织单位的排斥机制实现的。在我国的阶层分化中,处于最顶端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这个阶层在国家制度分割体系中处于体制内的核心部门,他们拥有大量的组织资源,这就使得他们在占有和享受幼儿教育资源方面享有独特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城市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居住地区“街居制”为辅的社会管理体制。与这个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政府以不同的方式分配幼儿教育的支出。对于政府和事业单位所属的幼儿园,按照政府规定的人员编制和供给标准给予办园经费,列支在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经费中。这类幼儿园具体就是各级各类的政府机关幼儿园,这类幼儿园在公共财政投入和分配上享有更多的优势。2009年10月,广州市财政局网上公开了本市114个政府部门的2009年部门预算。这份预算显示,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人事局、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财政局、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港务局8个部门的9个机关幼儿园,支出预算共计7431.44万元,其中一般预算资金合计6001.32万元。这意味着,这些幼儿园总计计划支出7000多万,其中有6000多万来自财政经费“补贴”。在9家幼儿园中,有两家幼儿园预算超出了1000万元,预算最高的市第一幼儿园,预算支出为1997.91万元(其中一般预算资金支出为1546.11万元),市委市政府的两家机关幼儿园预算支出总额合计也超过了千万。^[3]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这类公立幼儿园并不采取“就近入学”,而是主要招收政府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子女,以及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的子女,剩下的入学名额则以捐资助学的形式向社会招生。与之对应的,不属于这个体系的很多幼儿教育机构却缺乏纳入经费预算的渠道。如部分街道幼儿园、小区幼儿园、农村幼儿园等无法得到政府的资助,这也就呈现出部分组织机关幼儿园越

建越奢华,而其他类型公办幼儿园的发展却举步维艰,而且规模很难扩大,这也在客观上使得部分民众子女面临入园难的问题。

3. 空间区隔影响。

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排斥理论提出了社会排斥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社会底层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另一种是社会上层自愿排斥,也就是所谓精英反叛,富人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出来。^{[4] (P.107)}城市是人口密度大、社会结构复杂的生活场,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社会各阶层共同生活,阶层隔离是显性的,其中空间的排斥尤为直观、明显。在社会学理论里,空间不能不参照社会实践而加以定义,空间不仅只是一个物质产物,而是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而牵涉于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由于城市规划和住房市场影响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富人居住区与穷人居住区相隔离并且都发生区域集中。潘泽泉指出:距离的维持实质上是划分阶层边界的一种外显的手段,城市精英和城市贫民的差异在空间隔离中被凸显。反过来,贫穷的集中会加剧社会分割和社会孤立,形成空间排斥,如此恶性循环。^[5]这种空间排斥同样致使部分幼儿“入园难”。

伴随着幼儿园逐渐成为居住小区必要的配套设施的发展趋势,居住区本身就开始承担起幼儿教育领域中的排斥功能。那些设置在高档住宅区的作为给予居住者教育服务的社区幼儿园必然要求家庭能够具有购买高档住宅的能力。我国阶层定型化主要体现之一就是阶层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就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尤其在城市中,居住区域的阶层化分割效应更为明显,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也就决定了可能接受的幼儿教育水平。财富精英形成了象征隔绝的自己的空间,对资源的控制和垄断变成了一种空间策略。这一切共同营造了社会空间的片段化或封闭性。这种空间排斥是一种个体排他策略,更不容易被察觉。在幼儿教育阶段,这种个体排他策略主要就是通过受教育者家庭的经济要求实现。一些低收入家庭因为其居住空间的地理位置就被排除在优等教育资源之外,甚至无法获得基本的幼教保障。以农民工为例,他们一般在城市中都属于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的贫民居住区域,在这些区域中要么根本没有配套的幼儿园供其孩子入学,要么昂贵的学费也超出了其承受的范围。

4. 对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排斥。

经济排斥是指个人和家庭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排斥主要有3个指标:劳动力市场排斥、收入贫穷和消费市场排斥。消费排斥主要就是由于经济状况拮据而被限制使用与之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并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的主流消费方式之外。消费市场排斥实质上是对低收入群体购买能力相对低下的一种歧视与认可。进城农民工面临的经济排斥之一就是消费市场排斥。教育也属于一种消费。

幼儿教育由于是非学历、非义务阶段的教育,这给教育产品的提供者和教育主体的承担者提供了更多双向选择的可能。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幼儿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幼儿教育的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国家学前教育经费无法顾及的部分,幼儿教育的优质资源通过市场化的力量开始整合,天价幼儿园、贵族化幼儿园开始出现,而享受这些优质的幼教资源就成为不同阶层经济资本博弈的舞台。市场运作的原则是等价交换,优质优价,为儿童提供的教育质量不同,收取的费用也有差异,高质量的幼教机构往往意味着高收费,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只能流向那些有经济承担能力的群体和个人。那些无法通过制度分割而享受到优质教育的人群开始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对于大量的城市底层阶层和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其收入只够勉强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至于子女的城市受教育费用,支付难度相当大。一方面是大量收费高昂的民办幼儿园不断兴起,另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这就使得一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员在没有机会进入公办幼儿园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化的途径获得幼教资源。事实上,社会上很多人在为子女进行幼儿园选择的时候并非无园可上,而是由于其经济能力的局限被排斥在了诸多幼儿园之外。

二、缓解幼儿“入园难”问题的策略

1. 消除制度性的户籍屏障。

如前所述,我国二元化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无形中剥夺了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受教育权利。这既损害了教育公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和谐。伴随着我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这种局面需要改变。针对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结构性排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以消除产生排斥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消除农村贫困固然需要,但是仅凭市场不可能自动消除贫困,更不能促

进幼儿教育的公正和平等。这体现在教育政策上面就体现为一方面要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一是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二是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享有社会福利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正是城乡户籍壁垒的存在,造成流动到城市里的农村人口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受教育的权利。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幼儿教育问题,消除这种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屏障具有重要意义。

2. 理顺幼教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如前所述,幼儿“入园难”的现象不仅是由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导致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财政性经费的分配方面没有理顺,如教育经费高度向一些组织单位集中,又通过组织排斥机制产生了一部分幼儿享受优质的资源,而其他一些幼儿则被排斥在幼儿教育之外。幼儿教育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幼儿园之间的分配是学前教育经费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关系到整体教育质量的提高,也影响到社会各个群体的切身利益。

幼儿教育经费一般由财政或税务部门转拨给教育主管部门,然后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划出用于学前教育的经费,并把这些经费分配到各个幼儿园和学前教育部门。政府有义务提供幼儿教育,但资源总是稀缺的,如果没有稀缺性,也就没有必要进行选择分析和决策,因此在增加幼儿教育公共财政投入的同时,要形成新的幼儿教育供给体系。曾晓东在《转型期我国幼儿教育发展体制》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认为,理顺幼儿教育的财政管理机制,就要求将各级各类幼儿园财政供给的渠道、结构、形式厘清。如在财政投入的渠道上,虽然主要矛盾体现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与财权不相匹配,但更加隐蔽和深层次的问题是教育财政投入按照隶属关系而非责任的类别加以分配。政府办园的经费预算在政府办公经费中列支,企事业单位和教育部门办园的经费也在各自的预算中列支,而不属于这个体系的幼儿教育机构却缺乏纳入经费预算的渠道。真正为一般民众服务的幼儿教育机构,如街道幼儿园、小区幼儿园、农村幼儿园等无法得到政府的资助。^[6]这在客观上也使得社会的底层无法享受到更多的幼儿教育资源,造成了部分幼儿“入园难”。但在条块分割的幼儿教

育体制下,教育部门很难实现幼儿教育事业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单位剥离社会服务职能,因此需要打破幼儿教育服务的单位樊篱,建立起社会公共服务性的、开放的幼儿教育体系。

3. 对弱势群体进行教育补偿。

个体幼儿教育资源的享有量与家庭的阶层状况有着重要的关系,而隐性的排斥无法通过制度性的设定解决,如农民阶层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被剥夺失去幼儿教育的机会,但幼儿教育作为阶段性教育的起始阶段,无论是对幼儿个体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有着重要的价值,由此幼儿教育事业应该具有社会公共服务性质。建立教育补偿制度,尽量缩小个体间因教育造成的差距应该是促进幼儿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

幼儿教育阶段个人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尤其容易受到先赋因素的影响。如果不对来自社会较低阶层的个体采取适当的教育补偿措施,就极有可能造成教育不利的累积性效应,使不利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背景正义”。如罗尔斯指出的,背景正义是指确保正义心向及行为的背景条件,因为任何个体对公正行为的向往和公正行为的发生都是在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这种社会背景正义与否制约甚至决定着正义是否能够在社会背景中畅行。属于基本结构的那些制度的作用将确保正义的背景条件,各个体和联合体的行为正是在这些正义的背景条件下发生的。^{[7] P.282}教育制度就是基本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影响着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成长,影响着个体的天赋才能能否得到正常的发展,影响着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成功机会。在我国幼儿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教育资

源配置首先应该向社会处境不利群体提供基本的幼儿教育保障。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以美国为例,从1965年开始施行“先行计划”,旨在向贫困家庭的3~5岁及残疾幼儿免费提供学前教育、营养与保健;1994年提出了“早期开端计划”,把教育服务对象延伸到贫困家庭的2岁孩子;1998年又提出了“幼儿教育五年计划”,增加对开端计划的投入,增加招收名额。国外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原有的体制之外将增加幼儿教育投入与政府幼儿教育供给的优先顺序结合起来,在提供足够教育资源供给的前提下,还要保证社会中下阶层享有这一公共产品的权利。

[参考文献]

-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2]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3]<http://www.gzfinance.gov.cn/zwgk/sjtj/czysbg/subindex.html>.
-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5]潘泽泉.社会空间的极化与隔离:一项有关城市空间消费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科学,2005(1).
- [6]曾晓东.转型期我国幼儿教育发展体制[J].幼儿教育,2005(3).
- [7]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刘敏慧)

解读幼儿园绘本教学中的教师人格魅力*

——以公开课《狐狸爸爸和鸭儿子》为例

余春瑛

(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幼儿园绘本教学成为当前幼儿园语言研讨活动的热点,研究者多关注教师对活动的设计及组织策略。笔者对多例优秀绘本活动进行分析,发现教学效果与教师的人格魅力不无联系。本文以某公开活动为例,深度解读教师在其中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有利于教师和幼儿的双向发展。

[关键词] 幼儿园; 绘本教学; 人格魅力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35-03

教师人格是指教师在自己原有人格的基础上,为适应教师这一社会角色规范的要求,在教育教学中,在师生相互交往活动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思想道德和心理行为特征,这些特征能够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绘本”即图画书,是指以大量图画为主体,结合较少文字,或没有文字,以图画来讲故事或向幼儿传递信息的读物。绘本以其独特的图书形式,逐渐成为当前幼儿园开展早期阅读活动的重要媒介。绘本教学作为幼儿园语言活动的一种形式,它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有更多的情感沟通机会。绘本教学开展得成功与否固然离不开教师对绘本材料的选择和活动方案的设计,但教师的人格魅力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潜在的教育能量,会辐射到每个孩子,最终影响活动的效果。笔者以公开课《狐狸爸爸和鸭儿子》为例,探究幼儿园绘本教学中教师的人格魅力。

一、得体的仪表

教师的人格魅力首先来自美好的外在仪表,对教师这个特殊职业来说,仪表美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端庄、整洁、美好的仪表可以使人产生好感,给

幼儿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从而为教育教学的正常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服饰是幼儿教师仪表非常重要的方面,其服饰打扮应该简洁清新、美观大方,充分把个人服饰的色彩美和个性美呈现给幼儿。教师仪表所透射出的个人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对儿童是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在绘本教学中在某种程度上能吸引幼儿积极参与活动,提高幼儿的阅读能力和发展认知水平,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教师得体优雅的仪表自始至终贯穿在绘本教学中,对活动效果起到一定的作用。公开课《狐狸爸爸和鸭儿子》中,执教教师仪表端庄,态度亲切自然,稳重中不乏爽朗和活泼,孩子们虽然初次和该老师接触,但观摩者从他们的眼神和表情能看出他们在第一时间接受了教师。

二、优美的语言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育的艺术首先包括谈话的艺术。”教师的语言修养是成功开展幼儿园语言活动的重要前提,能对学生的语言能力产生极大影响。幼儿园语言教育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幼儿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实践证明,教师的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

*[收稿日期] 2011-03-05

[作者简介] 余春瑛(1978-),女,江西九江人,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讲师。

决于语言表达能力。绘本活动《狐狸爸爸和鸭儿子》执教教师所体现出来的语言美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并富启发性。

在本次绘本教学中,执教教师发音准确,吐字清晰,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处理得较好。语言表达准确简练,语调和悦悦耳,语气亲切自然。幼儿置身于这样的语言环境,身心愉悦。对听课者来说,也是一种享受。绘本教学是以绘本为纽带的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心灵对话,要想开启孩子的内心世界,让他们感知、理解和表达对绘本的阅读感受,教师的语言启发不无重要。

其次,语言表达极富感染力。

语言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它的美离不开言辞的热情、诚恳和富有感染性。因此,绘本教学中教师需要努力把灵感和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话语中去,使情动于中而言溢于表。教师应善用语言,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来引起和维持幼儿的阅读兴趣,让幼儿在美的语言中获得美的感知和对文本美的体验。教师语言的感情色彩,来源于教师积极的人生观,来源于教师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孩子的赤诚之爱。在绘本活动《狐狸爸爸和鸭儿子》中,执教教师语言生动,亲切真诚。从教师的话语中,观摩者能感受到她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对工作的热忱。活动一开始,教师热情洋溢的一句自我介绍“我姓祝,祝你快乐的祝”引发了孩子们一片笑声,笑声中,孩子和教师的心理距离一下就拉近了。随着活动的层层递进,教师用她独特的语言魅力带领孩子去思考,去想象,去表演……轻松中透着严谨,活泼中带着安宁,这与教师的语言魅力不无关系。

三、广博的知识

对于幼儿园教学来说,教师学识渊博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学的有效性。绘本教学同样也反映出对教师多样性知识的要求。因为绘本融合了多方面的知识,上自天文地理,下至市井风俗,教师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杂家”,丰富自己的阅历,才能将课堂驾驭得游刃有余。有些教师在绘本教学时平淡无奇,把一个幽默诙谐的绘本故事组织成一堂看图讲述活动,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知识储备不足,无法拓展延伸。《狐狸爸爸和鸭儿子》执教教师的知识面较广,能一定程度上即

兴拓展话题,对幼儿的语言反馈有利于孩子语言能力的提升。此外,教师能够自如应对幼儿提出的各类问题,有效性较高。如此看来,教师具备了广博的学科知识有益于增强绘本教学的效果,唤起幼儿强烈的求知欲,也更能促进教师和幼儿的双向发展。

四、幽默与机智并存

教师具备良好的幽默感,不仅有助于充分应对专业实践中的各种问题,而且对有效组织课堂教学,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为儿童提供良好的情感和发展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幽默运用于教学领域,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沟通师生情感,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学习趣味性和轻松感,启发幼儿的智慧。具有幽默感的教师能以轻松愉快的情绪感染幼儿,使幼儿在笑声中受到教育,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幼儿教师的幽默感常常体现在幽默语言之中。《狐狸爸爸和鸭儿子》执教教师的幽默感贯穿活动始终,不时引来幼儿与观摩者的阵阵笑声。如:教师问到“爱是什么”,某幼儿回答“爱是跟你抱在一起”,教师随即张开双臂招呼该幼儿并说道:“来,宝贝!我们拥抱一下看有没有爱出来。”一句话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再如:教师和幼儿模拟鸭儿子破壳而出这一瞬间情景中的语言对白,教师的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教师激动地对着幼儿扮演的狐狸爸爸喊:“爸爸!爸爸!”该幼儿站着一动不动,不知所措。教师取下鸭儿子头饰说道:“哦,第一次做爸爸都这样,太激动了!这叫不知所措。”教师随后又问:“这是一类爸爸,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没有激动得能说出话来的爸爸?”教师请第二位幼儿继续扮演狐狸爸爸,听到鸭儿子喊爸爸后该幼儿也是有点发愣,随后发出一声惊叹“哇!”教师在幼儿的一片笑声中补充道:“老爸激动得用拥抱代替所有的话,哇,儿子哟!”……诸如此类的幽默诙谐不时出现在活动的各个环节,气氛热烈,幼儿积极性非常高。教师幽默感不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需要乐观的人生态度予以支持,需要教育机智,也需要充分了解儿童,更需要一颗不泯的童心,如此才能创造出既令幼儿高兴又符合教育要求的环境和话语来。

五、民主宽容的胸怀

教师必须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才能胸怀博大,容得下兴趣各异的孩子,才会真正地爱孩子。教师爱

孩子首先就在师生之间架起了一座信任、友谊的桥梁,使师幼关系融洽,使幼儿尊重老师;教师关心尊重和信任幼儿,他们才会更加倾心于教师,自觉地接受教师的教诲,这个过程不是被动和痛苦的,而是积极的情绪体验。民主宽容不仅是一种方法和态度,更是一种精神和美德。在《狐狸爸爸和鸭儿子》中,教师身上的民主宽容精神时时散发:她鼓励孩子思考狐狸爸爸看到鸭蛋后会怎么办,肯定各类回答,并给予提升总结,教师悄悄对一位不在状态的孩子一番耳语……;在结束环节,她用动作接受了所有孩子送过来的亲吻,说道:“噢,我好幸福,有你们这么多的爱!”随后某幼儿大声喊:“啊,要吐了!”几个字引来大家的一片哄笑,教师也笑了,接着非常镇定地说:“但是你们的爱我不会吐出来,虽然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在肚子里翻滚着翻滚着,但它不会涌出来,因为我会牢牢地把它藏住。”教师直面尴尬,不逃不避,这需要勇气,更需要宽容的胸怀。

在许多教育场合,当孩子们所给出的答案不符合教师的预设时,为了不带来麻烦,教师往往会采取回避方式。本活动某环节中,教师不断追问幼儿“当狐狸爸爸看到鸭儿子诞生会怎么样”这一问题,应该说教师是期望孩子们说出蕴含“爱”的话语,但在问题层层递进中,不断有孩子说出“把它吃了”“终于可以吃了”“养大了再吃”等答案,教师并没完全回避,而是顺应孩子的心理,与他们一起欢笑,并开玩笑说“看来你们都饿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话语体现的是教师宽容的人生情怀,也体现了教师对孩子的理解和尊重。

民主宽容的胸怀体现的是教师的教育态度。在活动中,教师容忍孩子们的“坏点子”,接受他们新的想法和创意。面对每一个有个体差异的孩子,教师不以个人的眼光去取舍,不排斥那些上课开小差、捣乱、爱恶作剧的孩子。在活动中,教师尊重每一个孩子,连上课时对他们的称呼都是各有特点,如“想去埃及的男孩”“想得到奖状的女孩”“说不出来话的爸爸”等。教师的宽容是孩子成长的空间之一,在教育过程中,给予孩子耐心和宽容会为他们留出一个积极思考和自我反省的心理空间。宽容的前提是理解孩子,理解他们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理解他们独特的精神需要,如顽皮、恶作剧、好动等。具有民主宽容的胸怀,并不意味着对孩子放任自流,更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与迎合。教师的宽容也不排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它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教育方式。民主宽容的胸怀是教师自身价格魅力的体现,客观存在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精神。

上述几点是基于活动《狐狸爸爸和鸭儿子》总结出的教师人格魅力。本次活动的教学效果引发了参与者的讨论热情,在总结反思中,大家一致感叹是教师的人格魅力赋予了本次活动鲜活的生命。但是,教师的人格魅力不是天生就有的,它是在教师长期的职业生活中,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个人反复的磨炼,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锤炼逐步形成的。

(责任编辑 师语)

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园长 - 教师互动参与心理的调查报告*

田 燕

(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根据访谈调查结果、文献与资料, 编制问卷并检测了园长 - 教师互动参与心理维度划分的可靠性, 描述、分析了园长 - 教师互动中的互动者参与心理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参与者特别是教师“认知被动激励”、“情感被动激励”特征明显, 教师教龄作为客观性因素, 是通过影响主观性因素——专业化发展需求而对教师参与心理产生影响, 园长任职时间作为客观性因素, 是通过影响主观性因素——管理观等观念性因素对园长参与心理产生影响。

[关键词] 幼儿园教研活动; 园长 - 教师互动; 认知互动、情感互动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1696(2011)04 - 0038 - 06

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园长 - 教师互动是指在幼儿园教研活动中, 园长与教师(群体或个体)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包括互动双方彼此之间由于信息交换、行为影响而产生的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的影响和改变。在此过程中, 既包括主体双方对对方(客体)行为的认知、情感体验, 又涉及双方行为策略的调适, 其中, 互动中的认知心理, 指互动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对自己和他人的言行进行分析、理解、判断和选择的过程, 也包括对于完成分析、理解、判断、选择任务的策略的认知, 情感互动, 反映互动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在情感和态度方面的相互影响, 包括对于完成情感互动任务的策略的情感体验和投入。互动者在参与研讨时, 是侧重于进行认知分析、理解, 还是侧重于情感、态度的影响? 参与者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认知分析、理解或者情感、态度的影响? 这类关于互动者参与心理特征的回答将有助于回答“要不要改善教师、园长参与教研活动状态”、“如何改善”等问题。据此, 我们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 一是园长 - 教师互动中的认知、情感参与心理结构可靠性如何, 二是园长 - 教师互动中互动者的参与心理现状如何, 三是影

响园长 - 教师互动中互动者的参与心理特征的因素有哪些。

一、调查设计

1. 研究对象的选择。正式测验中, 研究者选取调查对象时采用整体抽样的方式, 在江苏省南京市、南通市、常州市各抽取 50 名幼儿园教师作为教师问卷被试, 抽取江苏省南京市、常州市、浙江省杭州市的园长各 25 名作为园长问卷被试, 教师问卷共发放 150 份, 回收 148 份, 回收率为 98.7%, 剔除 6 份无效问卷(填写不全或随意作答, 如选项全部一致), 有效问卷 142 份, 有效率为 94.7%。园长问卷共发放 75 份, 回收 68 份全部为有效问卷, 回收率 90%, 有效率 90%。

2. 调查工具的编制。研究者所用的调查工具为自编调查问卷《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园长 - 教师互动问卷》, 包括教师版和园长版两部分, 问卷的编制经过几个步骤。

首先, 进行半开放式访谈调查。研究者对南京市幼儿园园长 8 人、教研组长 3 人、一般幼儿园教师 23 人进行半开放式访谈调查, 以收集园长、教师对彼

*[收稿日期] 2011 - 03 - 16

[作者简介] 田 燕(1977 -), 女, 山东邹平人, 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此互动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反应方面的资料。

其次,参考美国心理学家贝尔斯对群体互动行为分类及亲师互动研究中的互动心理维度划分结论^{[1][P.67][2]}将上述访谈中获得的资料与之进行对照,以此分别形成了包括19个项目的教师问卷和18个项目的园长问卷。

第三,修改原始问卷。研究者请5名幼儿园教师和3名幼儿园园长对原始问卷内容的可读性及其与幼儿园教研活动的符合程度进行评定、修正。

第四,问卷初测和修改。研究者选取南京市某本科函授班42名幼儿园教师和园长培训班中25名幼儿园园长进行小样本初测,对结果进行效度、信度分析,删除题-总相关低于0.3的项目,最后形成了包括15个项目的教师问卷和18个项目的园长问卷。

3. 统计分析。调查数据分析处理采用SPSS11.5和Amos4.0软件进行。

二、调查问卷信度、效度分析

1. 初测问卷结果与分析。研究者主要采用计算题-总相关系数的方式进行初测问卷的项目分析。

问卷调查初测抽取江苏省南京市幼儿园教师42名,进行《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园长-教师互动评价问卷调查》预测。在已有维度结构假设下,使用SPSS11.5软件,计算各维度总分与每个项目之间的题-总相关,删除问卷中项目区分度均小于0.30的项目,结果(见表1和表2)显示,认知互动维度删除项目3、项目4和项目7后,维度的Cronbach'sAlpha=0.7139,情感互动维度删除项目9后,Cronbach'sAlpha=0.8019。说明项目初测问卷大部分项目区分度较为理想,只有少数几个项目例外。慎重考虑,初测问卷19个项目中删除4个,仅剩15个项目。

问卷调查初测抽取江苏省幼儿园园长31名,进行《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园长-教师互动评价问卷调查》预测。在已有维度结构假设下,使用SPSS11.5软件,计算各维度总分与每个项目之间的题-总相关,删除问卷中项目区分度均小于0.3的项目,结果(见表3表4)显示,认知互动各项区分度很好,维度的Cronbach'sAlpha=0.8778,情感互动维度中除项目5由于为侧反题,所以为负值,总体说来各项目区分度较好,Cronbach'sAlpha=0.7664。说明项目初测问卷项目区分度较为理想,保留初测问卷的18个项目。

表1 认识互动题-总相关分析结果

认知项目	区分度	Cronbach'sAlphaifItemDeleted
SMEAN(Q1)	0.3564	0.6208
SMEAN(Q3)	0.1676	0.6690
SMEAN(Q4)	0.1608	0.6567
SMEAN(Q6)	0.3906	0.6127
SMEAN(Q7)	0.1504	0.6610
SMEAN(Q10)	0.3311	0.6274
SMEAN(Q13)	0.4719	0.5879
SMEAN(Q16)	0.5261	0.5728
SMEAN(Q18)	0.4114	0.6101

注:删除前维度的Cronbach'sAlpha=0.6539;删除项目3、4和7后,维度的Cronbach'sAlpha=0.7139

表2 情感互动题-总相关分析结果

情感项目	区分度	Cronbach'sAlphaifItemDeleted
SMEAN(Q2)	0.6771	0.7417
SMEAN(Q5)	0.5761	0.7609
SMEAN(Q8)	0.5645	0.7630
SMEAN(Q9)	0.1924	0.8019
SMEAN(Q11)	0.4133	0.7808
SMEAN(Q12)	0.5914	0.7578
SMEAN(Q14)	0.5282	0.7642
SMEAN(Q15)	0.3546	0.7845
SMEAN(Q17)	0.3775	0.7830
SMEAN(Q19)	0.3894	0.7825

注:删除项目9前,维度的Cronbach'sAlpha=0.7909;删除项目9后,维度的Cronbach'sAlpha=0.8019

表3 认识互动题-总相关分析结果

认知项目	区分度	Cronbach'sAlphaifItemDeleted
SMEAN(Q1)	0.7032	0.8585
SMEAN(Q3)	0.5998	0.8677
SMEAN(Q4)	0.7158	0.8559
SMEAN(Q7)	0.8577	0.8423
SMEAN(Q10)	0.7591	0.8571
SMEAN(Q14)	0.5819	0.8682
SMEAN(Q15)	0.4930	0.8451
SMEAN(Q16)	0.3069	0.8862
SMEAN(Q18)	0.6199	0.8649

维度的Cronbach'sAlpha=0.8778

表4 情感互动题-总相关分析结果

情感项目	区分度	Cronbach'sAlphaifItemDeleted
SMEAN(Q2)	0.6713	0.7091
SMEAN(Q5)	-0.3350	0.8317
SMEAN(Q6)	0.6558	0.7088
SMEAN(Q8)	0.7538	0.6918
SMEAN(Q9)	0.5962	0.7218
SMEAN(Q11)	0.7863	0.6962
SMEAN(Q12)	0.5360	0.7344
SMEAN(Q13)	0.3647	0.7560
SMEAN(Q17)	0.3833	0.7536

维度的Cronbach'sAlpha=0.7664

2. 正式问卷结果信度、效度分析。(1)正式问卷的项目分析。本研究主要采取计算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的方式对正式调查问卷进行项目分析。结果表明,教师版和园长版正式问卷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都在0.3以上,都达到了显著水平。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教师版、园长版正式问卷各项目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其调查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园长-教师互动现象。

(2)正式问卷信度分析。信度反映了测验工具所得到的结果的一致性 or 稳定性,是被测特征真实程度的指标。本研究采用计算Cronbach系数的方式来分析问卷的信度。统计学上一般认为,一份信度系数好的量表或问卷最好在0.8以上,0.7~0.8之间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分量表最好在0.7以上,0.6~0.7之间可以接受。^[31 P.435]从表5表6可以看出,教师版问卷和园长版问卷的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和总量表系数均在0.81以上,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作为测量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园长-教师互动现象的工具是稳定可信的。

表5 教师版问卷 Cronbachxishu、分半信度表

	认知互动	情感互动	总量表
Cronbach 系数	0.7600	0.6120	0.8179
分半信度	0.7072	0.6438	0.8275

表6 园长版问卷 Cronbachxishu、分半信度表

	认知互动	情感互动	总量表
Cronbach 系数	0.8160	0.6665	0.8677
分半信度	0.7923	0.6585	0.8406

(3)正式问卷结构效度检验。本研究在编制问卷的过程中作了审慎的文献查阅和项目甄选工作,初测问卷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出各问卷的项目大多符合问卷的理论构想和统计要求,所以,正式问卷与初测问卷基本相同,共有两个维度,即认知互动和情感互动,经验证性因素分析,教师版问卷中15个项目因素载荷均大于0.3,符合要求全部保留,园长版问卷中18个项目因素负荷均大于0.3,符合要求全部保留。正式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记分方式,1表示很符合,5表示很不符合。

正式问卷的结构效度分析采用因素分析的方式和计算维度模型整体拟合指数的方式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教师版正式问卷的取样适当性KMO指标为0.839,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759.576,显著水平0.000,这表明因素分析的结果能很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园长版问卷同样如此。因此,本

问卷比较适合做因素分析。

我们采用主要成分分析法提取因素负荷矩阵,为了更好地对主因素进行解释,我们使用了Varimax法进行因素旋转以便使因素负荷矩阵两端集中。结果显示,认知、情感维度假设是成立的,说明教师版问卷是由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两个维度组成,并且,对于不同文化程度、职称或者来自不同级别、规模幼儿园的教师均可接受。

同时,本研究采用AMOS4.0对教师版问卷和园长版问卷进行两维度模型进行拟和度检验(见表7、表8)。根据Chou,Bentler&Pentz(1998)和Byrne(1998)提出的优良模型拟合的判定标准,GFI、AGFI、NFI、IFI和CFI的值一般应大于0.900,RMSEA的值小于0.080。卡方/自由度接近2,即可认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从表中的结果看出各项指标均在拟合模型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从整体上数据与定义模型拟合较好,接受该模型的假设。

表7 教师版正式问卷两维度模型整体拟合指数

χ^2	df	P 值	χ^2/df	GFI	AGFI	NFI	IFI	TLI	RMSEA
277.630	89	0.000	3.1194	0.824	0.850	0.896	0.883	0.825	0.09

表8 园长版正式问卷两维度模型整体拟合指数

χ^2	df	P 值	χ^2/df	GFI	AGFI	NFI	IFI	TLI	RMSEA
192.649	116	0.000	1.661	0.849	0.869	0.873	0.838	0.802	0.084

同时,我们对问卷两维度进行因子间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教师版问卷的认知互动与情感互动相关系数为0.478,维度之间达到中等相关;园长版问卷的认知互动与情感互动相关系数为0.562。这表明,各维度既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又有相对独立的特征和特性,也就是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从整体上讲,本研究所编制的问卷结构效度比较好,并具有可接受性。

三、数据统计结果与分析

1. 园长-教师互动参与心理维度的结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无论是初测还是正式测试,问卷效度、信度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确认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园长-教师互动的认知、情感维度是成立的,并可以进一步阐述其内涵。

认知互动维度是园长、教师在互动过程中对自己和对方言行中的认知需要进行分析、理解、判断、选择的过程,认知接受、认知发现、策略的认知是该维度的核心含义。其中,认知接受是指在互动过程中,个体接受外部的以定论方式而出现的学习内容,并把相应内

容内化或结合到其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在以后需要时能够再现或派作他用,认知发现是指在互动过程中,个体根据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情境,亲自去寻找、发现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并在使用的过程中将它内化到自己的认知结构中,策略的认知发现和接受是指在互动过程中,个体对在认知互动中所涉及的互动策略的认知接受和认知发现。

情感互动维度是园长、教师在互动过程中对自己和对方情感投入程度的体验、共鸣、反馈的过程,情感体验、情感投入、策略的情感体验投入是该维度的核心含义。其中,情感体验是指互动过程中,个体在特定教研环境中产生的内心感受、体味,情感投入是指互动过程中,个体在特定教研环境中对教育对象、教育教学工作的热情或教育教学内容的主动投入的情感程度;策略的情感体验和投入是指在互动中,个体对情感互动所涉及的互动策略的情感体验和情感投入。

2. 园长-教师互动参与心理整体水平的结论。我们分析园长和教师互动认知、情感维度及其次级维度上的状态,考察各具体维度的平均数及标准差。结果显示:

(1)教师问卷、园长问卷的总分及各维度的平均分均低于理论中位数3分,即在调查范围内,幼儿园教师和园长对幼儿园教研活动中的园长-教师互动的评价是较高的;

(2)教师问卷中认知互动评价平均数为2.2477,情感互动平均数为2.3740;园长问卷中认知互动平均数为1.8023,情感互动平均数为1.9624。这说明,在幼儿园教研活动的园长-教师互动中,教师和园长对认知互动的评价均高于情感互动的评价;

(3)教师问卷和园长问卷中,认知维度中认知接受的均值最高,分别为2.080、1.707,而情感维度中情感投入的均值最高,分别为2.253、1.725;

(4)对照表教师组和园长组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园长对认知、情感互动维度的评分普遍高于教师评分。

3. 园长-教师互动参与心理的影响因素。在影响园长-教师互动参与心理特征影响因素方面,问卷中主要涉及两大类,一类是互动个人客观因素,如年龄、教龄、职务、学历、职称,一类是外在的园所类因素,如所在幼儿园的级别、规模、管理风格、现有资源等。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1)教师问卷调查中,教龄对认知互动中的认知

发现、策略认知接受发现影响显著,对于情感互动中的情感体验影响显著,对于其他互动维度影响不明显,年龄、职务、学历、职称对于任何维度影响都不显著;

(2)教师问卷中,教师所在园所级别、园所规模对于任何维度影响都不显著;

(3)园长问卷中,园长的任职时间对认知互动中的认知接受和情感互动中的情感体验影响显著,对其他互动维度影响不显著,园长年龄、职务、职称、学历对任何互动维度影响都不显著;

(4)园长问卷中,园长所在园所级别、园所规模对任何维度影响都不显著。

四、讨论与分析

1. 园长-教师互动参与心理特征及其对参与研讨的影响。(1)参与者(园长和教师)在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关注点倾向于不平衡,形成参与者特别是教师认知被动激励的参与特征。这主要体现为认知互动评价高于情感互动评价、认知接受评价高于认知类其他评价、情感投入评价高于情感类其他评价3个方面。也就是说,在幼儿园教研活动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园长,都比较关注认知方面的改善,而认知互动方面则比较注重接受外部的以定论方式而出现的学习内容,对个体自己去寻找、发现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有关人际互动策略的内容则相对关注不足;在情感互动方面,比较关注个体对教育对象、教育教学工作的热情或教育教学内容学习的主动投入,而相对较少关注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感受、体味。在教研活动中,如果教师关注认知学习多于情感学习,关注认知接受多于认知发现和策略认知接受发现,那么教师就会更多地以被动接受他人所规定的或期望的方式参与教研研讨,以便获取专业角色。富兰曾指出,现代教育变革需要的不仅是教师个体的激情与发展,更重要的是专业性激情与发展;“我们需要的不是个别教师的孤立的激情,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包括但又超越个体的激情。它是更大规模的、更具有群体性的行为,每一个个体都自发地作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和贡献;同时又把自己看作是与其他人相互关联的个体,不只在局部,而是超出局部”(41P.16)。所以,从意义与激情体验的角度思考幼儿园教研现象,既是一种基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思路,同时又不仅仅局限于专业化问题。如果组织幼儿园教研活动时仅仅从外部行为改善来考虑问题,或者仅仅提出各种口号而不去理解参与者特别是教师的参与心理特征的话,那么改善实践就只

能是一句空话。

(2)与其他维度相比,参与者(园长和教师)对互动中的情感体验评价不积极,并且教师和园长都对互动中的对方情感体验程度较高,但是对自身在互动状态中的情感体验程度相对较低,由此容易形成参与者特别是教师情感被动激励的参与特征。

本研究结果显示:教师和园长对互动中的情感体验评价普遍低于情感维度中的其他项目,在对互动对方的情感体验评价项目上得分较高,例如“我对园长在教科研活动组织中的表现感到很满意”或“我对教师在教研活动中的努力和肯态度能给予发自内心的认可和肯定”项目中,高评价的人数显著高于低评价的人数,而对互动中自身状态的情感体验评价项目上较低,例如在“一般是园长请我时,我才对教科研活动组织效果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想法”项目中,高、中、低评价人数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幼儿园教研活动的组织过程中,情感体验,特别是对自身状态的情感体验相对受到忽视。

在幼儿园教研活动中,如果参与者关注情感投入多于情感体验,关注对外在人或物的体验多于对自己的体验,那么就会倾向于按照别人的要求对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工作投入情感,并以同样的方式参与教研研讨。欧用生先生曾建议,缺少或较少关注自我体验、忽略存在论意义(ontological meaning)的参与是很难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动力的。于是,由他人发起的被动情感激励成为教师参与教研研讨的特征。

2. 关于互动影响因素的讨论。(1)教师问卷调查中,教龄对互动中的认知发现、策略认知接受发现、情感体验的影响显著,青年教师对互动中认知接受和情感投入的评价高,对认知发现、情感体验评价低,教龄超过5年的教师则相反。也就是说,不同教龄的教师在教研活动中的关注点是不同的。

关于幼儿园教师的相关研究发现,不同教龄的教师不仅在教研活动中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在整个职业生涯和专业化发展需求上也是不同的。美国学前教育专家丽莲·凯兹提出,幼儿园教师会因工作经验、年资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专业发展阶段性特征,每一阶段的教师各有独特的需求与要完成的工作。对此,丽莲·凯兹建议,不同阶段的教师接受培训或者参与研讨时,研讨内容和探讨问题的层次应

该是不同的;成熟阶段的老师可能觉得强化阶段、求新阶段的研讨内容很无聊,而相对的,求新阶段的老师则可能会认为成熟阶段的老师喜欢的内省探寻性讨论,太过空洞而觉得无聊、无用^{[5] P.207}。所以,可以说教龄作为客观性因素,是通过影响主观性因素——专业化发展需求而对教研中互动产生影响的。国外的另一项研究也提出,与青年教师相比,有经验的骨干教师与他人(包括园长)互动时更关注自己的发现、情感体验以及互动的策略,能够随时担任其专业领导的角色和职责。^{[6] P.206}可见,教龄作为个体的客观性因素是通过影响教师在互动中的需要、关注点,进而影响其参与心理的。

(2)园长问卷中,园长的任职时间对认知互动中的认知接受和情感互动中的情感体验影响显著,任职时间在2年以内的园长对互动中的认知接受和情感投入评价高,而任职时间在5年以上的园长则对互动中的认知发现、情感体验及互动策略的评价高。

为了深入分析园长任职时间因素对其互动关注点的影响,研究者对幼儿园园长及教师进行访谈,多数被访谈者认为,任职时间并不直接影响园长在教研活动中的行为特征,而是通过影响其组织经验进而影响其互动特征。一位直接“管理”园长的行政领导则直接指出:“任职时间是通过影响园长的管理观、发展观和课程观,进而对教研中互动产生影响的。”^①可以说园长的任职时间作为客观性因素,是通过影响主观性因素——管理观等观念性因素,进而对教研中园长参与心理产生影响的。

上述调查结果说明,与当前校本教研、园本教研对自主品质、自我引导的价值观相比,幼儿园教师和园长在互动中的被动激励特征比较明显,教师教龄和园长任职时间是通过教师的发展需求、园长的管理观等观念性因素而影响其参与心理的。所以,建构并发挥激励性的人际影响力以改善参与者的参与心理,这是改善幼儿园教研活动组织时非常重要的切入口。

五、建议

1. 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实践自我领导。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在教研活动中倾向于以认知接受和情感投入的方式参与教研,关注与自身实际需要距离最近的研讨内容,教师教龄通过影响专业

① 引自无锡市锡山区教研员蒋丽芬老师的发言,特此致谢!

化需求而对互动产生影响。所以,改进教师参与教研状况的重要措施就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使其全面参与教研活动,并发展自我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具体表现为教师对幼儿的引领和对自我的引领。

(1)在自主学习中发展教师对幼儿教育引领力。教育教学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德性解放,是人生幸福的达成问题^{[7](P.2)}。关注儿童完整的德性生命的自主发展及人生幸福的实现是教育教学及课程活动的根本所在,是教师所从事的一切教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意味着教育必须具备鼓励并引导师生共同探究、体验生活的意义,也只有充分探究、体验生活的意义,教育的德性培育本质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在幼儿园教研活动中,互动双方要围绕“如何认识幼儿学习特征”“练习各种教育活动组织技能以解决”“如何与幼儿互动”等问题进行研讨。通过这些问题的共同学习和讨论,教师可以进行较为有效的自主学习,并能引领幼儿自主学习意愿的发展,实现有效迁移的自主学习策略的拓展。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承担并实践了对“引领幼儿对意义生活寻求、获得成长”的责任。

(2)在分享经验过程中发展教师对自己及他人的教育引领力。教师不仅承担着引领幼儿发展的责任,也承担着鼓励自己、同事对意义生活追求的责任。在教研活动的运作过程中,教师通过参与探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收获、情感体验,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等,以此产生对他人的影响。教师表达或与他人分享的内容可以是理性认知的内容,也可以是较为感性和具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情感体验。当分享得到了园长肯定,就会产生激发其他教师参与教研动机的效果,而且在树立角色楷模(学习者)的同时,也为人际关系氛围的改变提供了榜样。这种分享,不仅会激发参与者的工作热情,更重要的是使全体人员逐步形成一种共同成长的关系,而不是评价与被评价、帮助与被帮助的关系。

2. 园长在引领教师的过程中引领自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园长在教研活动中更关注教师认知方面的改善,园长任职时间通过影响管理观等观念性因素而参与心理产生影响。所以,改进园长参与教研状况的重要措施就是鼓励园长改善管理观,参与教研活动时既要督促教师“有所收获”,也要承担起鼓励教师和园长自己追求有意义生活的责任。

(1)提升园长对教师引领的责任。园长对教师的引领主要表现在互动前了解教师、互动中接纳并保护

教师、互动后能够提升研讨内容3个方面,而且不少被访谈的教师也表示希望园长在这3个环节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互动前了解执教教师的种种努力,了解教师的发展需要,知道什么样的核心话题才是教师感兴趣的,互动中抓住发言教师的闪光点,根据教师学习风格和个性的差异给予恰当的反馈,并保护教师免受危机情境的冲击,互动后能够帮助教师提升研讨内容,这就是当前园长在引领教师时所应做出的种种努力。Hurst认为,这些主动倾听、有效观察、反思性对话等措施在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是园长卓有成效的引导价值的体现。

(2)提升园长自我引领责任。通过履行对教师的引领责任,园长同样能够从中获益,在与教师互动过程中,园长能够对学前教育专业理解更深入,与教师的关系更密切,同时在体验自己专业知识、技能更新所带来的成就感的基础上,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也能迈向一个新的高峰。幼儿园教研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领导者(包括教研员和园长)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和教师共同研究和解决问题,引领意味着先行一步,对某些问题作先行思考,引领也可以是在与教师一起探讨的过程中思维方法的引导,比如向教师袒露自己正在思考但还没有结论的问题,用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影响教师,有时甚至可以提出自己的困惑,用请教的方式引起教师共同思考。笔者相信,通过与教师的对话,教研员也好,园长也好,都会不断受到启发。所以,提升园长对自己的引领责任、鼓励自己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也是园长-教师互动的目的之一。

[参考文献]

- [1]袁方,王汉生.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郝若平.家校合作——亲师互动对学生学习品质与心理健康的影响[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2007.
- [3]张红兵.SPSS宝典[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 [4]加[加]迈克尔·富兰.变革的力量——深度变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 [5]美[美]丽莲·凯兹.与幼儿教师对话——迈向专业成长之路[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6]Jillian Rodd.早期教育中的领导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7]吴安春.德性教师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刘敏慧)

幼儿园实施英语游戏教学的策略探究*

纪曼然

(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外语系, 江苏南京 210004)

[摘要] 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的目的是让幼儿在游戏活动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把英语知识学习融于游戏活动中,以培养幼儿的情感、意志、灵感、直觉等主体人格特征。本文通过描述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的现状、分析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 幼儿园; 游戏; 英语; 策略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44-02

游戏是幼儿最基本的活动。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是将游戏的机制引入教学活动中,不是游戏与教学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游戏与英语学习的联结点,将其统一起来。游戏和英语教学的结合是指在同一个目标引导下的幼儿自主的游戏活动和教师指导下的教学活动的相继关系。游戏与教学虽然不可相互替代,但具有互补性,因为教学虽然是来自外部的要求转化为受教育者内部的需要,变成幼儿自己的行为,可是要实现这一转化,必须以幼儿的主动学习和主体性发展为主要特征,体现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兴趣与能力并重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活动范式。幼儿在游戏过程中不仅可以获得与英语学科或与幼儿身心发展有关的学习经验,而且游戏活动本身的方式方法就是幼儿学习的对象与内容。由此可见,游戏不仅是幼儿园英语课程实施的途径,也是课程生成的重要源泉。本文将根据目前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的现状来分析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两方面提出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的实施策略。

一、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的现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尝试开展英语游戏教学活动,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深入,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的理念以及实际设计和组织更具有“幼儿教育”特色。在英语教学中,很多老师努力创设游戏情境,加强可操作性,尽量避免枯燥的机械操练。此外,使用英语组织活动,通过直观动作、

图片或情境帮助幼儿理解老师的语言。不过由于教学活动时间仅限于短暂的英语课内,场所仅限于教室,教学内容仅限于某套固定的教材,很多英语教师忽视了语言环境和英语学习的一致性,从而过分侧重英语的知识性,忽略了英语作为语言的交际功能。此外,幼儿英语教师在游戏中的英语语言信息量输入过少,把英语教学仅仅理解为英语知识和技能传授,忽视了它也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的-一个部分。

二、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实施中的问题

目前幼儿园英语游戏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过分强调学习的认知结构,而忽略了幼儿在活动过程中学习英语的策略以及英语学习动机和态度方面的目标,将学习英语单词或句型作为英语活动的主要目标;(2)幼儿被动回应有余而主动参与不够,教师始终控制着活动的进展,而幼儿只能按照老师的指令被动完成相关的任务;(3)对幼儿已有经验(包括英语经验和汉语经验)的利用和扩展不够。一方面,这些问题与促进幼儿全面素质、强调幼儿学习主动性和主体性等观念相违背,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幼儿认知学习负担;另一方面,要求幼儿在一个活动中就学会2~5个单词的发音、词义也不符

*[收稿日期] 2011-03-28

[作者简介] 纪曼然(1980-),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外语系教师。

合幼儿语言学习的规律。儿童语言习得研究认为,对同一语言形式的获得需要多次在不同情景下听懂才会初步理解、模仿学习,然后才能学习说和在具体情境中使用。结果也许幼儿能暂时记住某些单词,但幼儿未必能学会如何在实际的交往、游戏中有效使用这些单词。

三、幼儿园英语教学中游戏的实施策略

幼儿园英语教学中游戏的实施目的在于促进幼儿的英语游戏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展,在各发展阶段中产生最大的英语教育效果,并有助于幼儿个性的全面发展。其具体的实施策略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方面,在幼儿英语游戏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要有策略地观察。观察的对象可以确定为幼儿和教师两个方面。首先要观察幼儿,幼儿在英语游戏中会有最真实的表现。通过观察,英语教师可以了解幼儿近来的英语游戏兴趣、方式、技能和水平,确立需补充的英语知识经验和需要给予的特殊帮助。其次要观察英语教师先期工作的效果,即英语环境的设计是否有利于幼儿英语活动、交往,是否能实现渗透在英语环境中的英语教育意图,投放的英语游戏材料和环境的空间结构是否为幼儿提供了探索和发现的英语学习机会,是否为幼儿提供了与他人共同游戏、分享、合作的机会与经验等。这一观察可以为英语教师帮助和指导幼儿更好地融入英语游戏活动提供依据。幼儿园英语教学中游戏观察的方法、范围及作用见表1。

表1 幼儿园英语教学中游戏观察法的应用

方法	范围	作用
整体扫描	全班	能够全面观察整个班级的活动状态,获得整体印象,可以适时调整空间结构和英语游戏材料,及时地解决纠纷并给予帮助。
区域观察	活动角	以某一英语活动角为观察对象进行连续观察,判断该英语活动角的地点、大小、游戏材料分配的恰当与否以及在该区域的幼儿人数,游戏时间长短,游戏方式等。
个别跟踪	单个幼儿	以单个幼儿为观察对象的追踪观察,了解该幼儿的英语游戏内容、方式,以及在英语游戏中的交往和其专注性、坚持性等品质。

另一方面,幼儿园英语教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施幼儿英语游戏教学。

1. 外部指导。指英语教师不参加到英语游戏中去,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英语游戏做出评价和建议,要求英语教师按照幼儿的兴趣、需要和已有的经验、印象以及最近接触的事物给予帮助。提供可能被幼儿选用的英语游戏材料,启发幼儿回忆,用第二语言(英语)唤起幼儿的表象,去丰富英语游戏的情节和内容,甚至改变英语游戏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指导方式下进行的英语游戏,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孩子的活动,却显示了英语教师的用心。应当注意的是,外部指导不是干预和命令,英语教师应避免事先得导演游戏过程,并对英语游戏过程设置许多清规戒律,或者被动地跟在孩子后面,出了乱子就指责他们,这只会让幼儿产生不愉快的英语游戏体验。

2. 内部指导。指教师参加到英语游戏中去,担任某一游戏角色,通过与幼儿共同游戏的方式加强幼儿英语游戏的目的性。教师以游戏角色的身份可以示范幼儿从未见过或使用过的英语游戏行为,教会幼儿英语游戏的技能。这种技能包括结构技能、运动技能、交往技能、表演技能。教师通过自身的榜样教会幼儿履行角色规则,表现对人、对物的态度,并使英语游戏产生新的变化。教师还可利用角色身份指导英语游戏进行的方向,并随时纠正幼儿的某些不符合英语文化习俗的表现,但要注意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幼儿。教师也应利用英语游戏的大好时机对幼儿进行个别指导。对于英语活动能力强孩子要设置英语问题情境,引导他进行新的英语学习探索;对于胆小害羞的孩子要引导他们参与英语游戏;对于英语能力差的孩子可采用动作示范进行解释的平行游戏或个别辅导的方式为幼儿提供英语模仿学习的机会。

总之,指导的关键是要让每个孩子在他原有的英语能力基础上得到进步与发展。这种指导是在尊重幼儿的意愿,尽可能多地给幼儿自由思考和想象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英语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实施的。英语游戏的成果正是在英语教师的有效指导下,不断呈现出新的成果,逐步达到更高的水平。作为幼儿园英语教师,应当根据英语游戏类型、目的的不同以及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水平差异,灵活、创造性地介入英语游戏教学的实施过程之中。

(责任编辑 南山)

中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质性比较与价值考量*

宋振超 黄 洁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中美两国学生事务管理有相同点,也有很多的不同。作为高等教育历史比较长的国家,美国有非常重视学生工作的传统,在学生事务管理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专业化管理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较中美两国学生事务管理之间的差异,加以本土化,有利于提高我国高校学生工作的管理水平。

[关键词]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 质性比较; 价值考量; 中美比较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46-04

国外高校没有专门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说,但是在学生事务上有专门的一块领域,普遍的称谓是学生事务。曾经有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中没有学生工作,教育照样办得很发达。事实并非如此,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高等教育历史比较长的国家,向来就有重视学生工作的传统,在学生事务管理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的专业化管理模式和经验。我们要借鉴国外学生事务管理的经验加以本土化,以提高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水平。

一、学生事务、学生工作、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分析

学生事务这一概念在国外高校学生管理中比较常用。学术事务(academic affairs)和学生事务(student affairs)是相对而言的。在早期的美国大学里并没有这样的区分,只是从19世纪开始,学生事务才从学术事务中分离出来,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专门的用法。一般认为,学术事务通常涉及学生“学习”、“课程”、“教室”和“认知发展”等,而学生事务则涉及“课外”、“学生活动”、“住宿生活”、“感情或

个人问题”等。有专家指出“学生事务习惯用来描述校园内对学生课外教育负责的组织结构或单位”。中国学者方巍认为:“学生事务,指的是学生非学术性活动或课外活动”;“所谓学生事务工作,指的是学生课外的一切活动及其管理”。^[1]学生工作这一术语虽然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是关于它的定义却歧义互见。国内出版的几部颇有影响的高等教育学或高等教育管理学著作和学生工作辞典里都找不到它的踪影,在大量出版的学生工作的论文和编著中,叶骏和金永发给出的解释比较贴切。他们认为:“学生工作是指那些直接作用于学生,由专门机构和人员从事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养成、提高学生政治、思想、品德、心理、性格素质和指导学生正确的行为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2]从工作的对象、性质、内容和范围来看,美国的学生事务与我国高校的学生工作类似。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我国高校的学生事务主要是政治教育及其有关的活动,学生事务只是学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时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这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信息化视阈中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项目编号:09SJB880072);南京邮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校级规划项目“新时期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XC208024)。

[收稿日期] 2011-04-13

[作者简介] 宋振超(1980-),男,山东临沂人,南京邮电大学组织部讲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洁(1979-),女,江苏南通人,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讲师。

一时期的学生工作。拨乱反正时期,人们出于对此前学校工作片面强调“政治统帅”的反思,提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只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部分,而不再具有凌驾于学校工作之上、可以冲击一切的“特权”,从这时开始,此前一般称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改称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即“德育”。学校教育强调“德育首位”,这一时期“学生工作”就是“德育”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但相对来说,“学生工作”比“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更广泛的涵义,而今天我们所讲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即为广义的德育。

从上述概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学生工作又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学生事务和学生工作类似,所以我们在研究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时,可以借鉴国外学生事务方面的经验,提高学生工作的水平,从而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有效。

二、美国高校学生事务与中国高校学生工作的质性比较

1. 管理体制的不同。

美国大学实行学校集中管理的体制,院、系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其机构设置和权限分配只在学校一级进行,并分别由各个办公室直接面向学生和学生组织开展工作,多头并进,条状运行,其组织机构根据职能设置,分工细致,机构庞大。美国学生事务管理几乎囊括了关于学生的所有非学术性事务,实际工作机构具有专门化特点,针对性较强。比如,健康服务中心、住宿办公室、财政资助办公室等。由于学生事务繁多,因而组织机构从数量上来说比较庞大。而且随着学生校园生活的渐趋多样,大学受社会影响的日益广泛、深刻,一些大学会根据学生的特殊需要,在学生事务方面增加服务项目,组建新的机构,比如旧金山州立大学针对爱滋病、公共安全、预防性骚扰和性暴力、学生申诉等成立专门的机构处理相应事情。

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是分层管理,校、院、系都有学生工作队伍。我国的学生工作长期作为政治工作的附庸或等同于学校的德育工作,加之考虑到大学生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将学生工作划归党务系统,由政工人员负责学生工作的传统由来已久。另一方面,随着思想教育的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学生事务出现大量的新情况,导致

学生事务中行政事务大量增加,学生工作行政化越来越明显,从而要求强化其行政功能。所以学校一级的学生工作由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共同负责,党委副书记总负责,或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任副校长,在校一级成立校党委、校行政领导下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对学生工作做出部署,提出目标和任务。学生工作处(部)、校团委是学生工作管理的主体,学生工作处和学生工作部“部处合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或“合署办公”。奖、助、贷学金、勤工助学、就业等方面的管理由学生处和就业办负责;学生的课外活动由团委负责。教学和学籍管理由教务处负责;生活管理由总务处或后勤公司负责;招生工作由招办或教务处负责。院系一级设立学生工作组,党总支副书记和副主任共同负责制,系党总支副书记任组长,成员由院系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政治辅导员组成,他们在工作上既受学生工作处(部)、校团委等校级职能部门的领导,又受院系党(委)总支、行政的领导。高校内部的学生工作形成了党政合一、两级管理的体制,具有较强的行政功能,无论是学生工作处(部)还是院系学生工作组都可以直接面对学生,条块结合,形成网络。

目前我国高校与美国高校在学生管理上有共同之处,也开始成立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勤工助学指导中心、心理咨询中心等专业性机构,差别最大之处就在于美国高校学生管理以单线为主,分工比较明确,服务功能比较突出。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特点是党政共管体制,有专门的辅导员队伍对学生进行管理,学生和学校的关系密切,便于开展日常的教育和管理,但是存在多头管理带来的职权不分问题。

2. 管理方式的不同。

美国高校学生管理的特点是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强调服务功能。一方面美国学生事务管理贯穿着学生发展理论,倡导“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在管理中把学生当作“成人”看待,尊重学生的意见,积极为学生创造个性鲜明、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机会。美国的学生社团(Student Association/Student Society)活动丰富多彩,制度也较为健全。^[3]在学生事务工作部门成立专门的学生活动办公室,对社团活动具体负责指导,社团的成立要得到学校的批准,学校为社团活动提供教室、活动空间等服务,社团的活动经费除了部分来自广告、募捐等,大部分由学校拨给,为减轻学校负担,学校允许社团在校内开办一些盈利场所,其利润作为活动经费。学生社团完全由

学生自发组织建立,种类繁多,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另一方面服务功能比较突出,美国的大学重视心理、法律咨询和酗酒、药物的监督,强调咨询和监督,其学生事务管理主要是“窗口服务式”,在学生需要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提供服务。这种指导思想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应该加强服务意识,根据学生的需要和个人发展潜质,为学生成长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

以儒家教育为核心的中国教育传统强调顺从,价值观念中渗透着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于大一统的价值观念,强调的是群体价值,我国的学生管理强调的是“管理”,保证学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虽然现在也开始强调既为学生服务又为学校服务,但是我国的大学更多地是从学校的角度出发,强调在管理中为学校服务;美国的大学则是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强调在服务中体现学校的管理。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两国高校学生管理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管理工作日益受到重视,学生由纯粹的被管理者参与到学生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学生管理问题,理论与实践得到很好结合,学生管理的内容、形式等发生了变化,学生管理日趋规范。但是,相比较而言,我国学生管理的政治色彩显性化,美国学生管理的政治色彩隐性化;在我国的学生管理中,学生参与少,在美国的学生管理中,学生参与多;我国的学生管理重“事”,美国的学生管理重“人”。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意识不够,没有很好地满足和实现学生的利益要求。我国已经开始意识到存在的问题,逐渐开始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强调服务意识,开展主体性德育,注重培养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意识。

3. 队伍建设的不同。

在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已成为一种职业方向,学生事务管理者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但主要的部分是一支具有相应学历、层次分明的专职队伍。在管理人员的聘任、提升具有较为明确的要求和程序。根据其岗位职责,学生事务管理人员可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3个层次。一般而言,申请初级岗位的人员应具备心理咨询、学生事务实践、学生发展等方面的硕士学位。这些管理人员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后,若要取得中级层次的管理职位,还要拥有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有的则是毕业于学生行政专业并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的专家。对于高级管理人员,丰

富的学生管理实践经验也不可或缺。在人才培养方面,一些专业协会和高等学校的某些相关专业还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提供职业培训。美国有近百所大学设有培养学生事务硕士研究生的专业,为大学学生事务部门培养数以千计的专门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同时将学生事务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研究。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博士的培养计划中,就有针对学生事务的培养方向。南加州大学高等教育计划适用的职业领域首先是学生服务,哥伦比亚大学也将学生人事管理列为高等教育博士培养计划的适用领域,在培养高等教育博士所开设的62门课程中关于高校学生的就有12门。^[4]

中国有上百所大学设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含研究生学位)为大学学生事务培养专门人才,同时又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研究,但是辅导员队伍的理论掌握仍不够熟练,不够专业化,没有形成一条直接向高校输送学生管理工作专职人才的道路。就各高校学生工作队伍尤其是作为学生工作基层工作者的辅导员,其选用聘任还不规范,一般都是从本校的优秀的应届毕业生中选用,其专业背景也很广泛,真正具有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背景的只占一部分,另外在这些人员的培训、晋升方面也缺乏良好的保障机制,其社会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常常被认为是可有可无,谁都可以干的简单事务性工作。结果,美国的学生事务管理岗位被视作有竞争力的职业,有一大批专业人员(不仅是学生事务专业的,还包括其他多种专业人员如心理、法律、社会学科和理工科)选择学生事务为职业而且当作事业追求,学生事务管理队伍建设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而我国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却陷入了发展的困境。

目前,由于中央以及各级教育部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各高校也开始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学校在选拔辅导员的时候提高了门槛,有意识地吸收优秀的人才进入到学生工作队伍中来,但是相应的其他的培训、晋升、待遇等方面的配套措施还有待完善。在这些方面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的专业化、职业化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三、借鉴美国的学生事务工作经验,提升我国学生管理工作效率和水平

当前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职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影响其发展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西方社会文化的个体本位取向以及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等。尽管我国高校和学生工作的背景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两国学生管理工作的比较和借鉴的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高等教育进行重大变革的今天,美国的学生管理工作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状况,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启示。

1. 管理体制合理化。

目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体制问题,主要表现就是多头管理,为此造成工作上的职责不分,辅导员工作压力大,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学校的各党政管理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学生处、团委都可以向辅导员布置任务,而大多数院校辅导员因人事上划归院系管理,院系从自身工作角度出发又使辅导员承担了众多的教学秩序管理和行政工作的事务。多重管理,多重考核,使辅导员事实上是戴着教师的帽子干着学生的“保姆”、“警察”、学校机关部门的“勤务兵”、院系的“服务员”工作。党政合一、条块状管理构架不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我们可根据自身特点,广泛吸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经验,改条块管理为垂直管理,以促使工作效能的提高。

2. 管理方式人本化。

西方社会文化的个体本位取向,使他们树立了生本意识和至上的理念。美国大学之所以在学生事务方面搞得有声有色,成为校园生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键是把学生放在首要位置,有“以学生为本、服务至上”的理念,这些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我们应该更新观念,减少一点“管人”、“训人”的思想,增加一些市场体制的观念,树立生本意识和至上的理念。我们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和利益出发,自始至终贯穿主动、积极为学生服务的思想。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做学生之所需。在学生管理上应该强调学生的自我管理,美国的学生社团十分活跃,充分满足了学生课外活动的需求。在我国高校中也有学生社团,但是作用发挥的不明显,活

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缴纳的会费和广告赞助,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健全的制度,学校给予一定的技术指导和方向性引导,并在财力上给予支持,让学生自己把社团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既可丰富学生业余生活,也可锻炼学生的管理能力、团队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在另一方面也可减轻学生工作者的工作负担。

3. 队伍建设职业化。

为了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加强辅导员的身份认同感,调动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队伍的稳定,辅导员职业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对我国而言,目前可在以下方面进行尝试。第一,设定岗位的进入标准,规定达到相关专业的一定学历层次才能从事此项职业。鉴于学生工作的复杂性,从事这项工作需要具有更广泛的专业知识,包括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生工作更加需要有综合理论基础的复合型人才;第二,提供在职培训,提升管理人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工作人员提供在职攻读相关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出国进修考察等机会。第三,制定职业标准,制定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比如工作人员伦理准则、工作手册、工作考评体系等等。目前上海市一些高校已经率先开始探讨辅导员职业化发展的道路,希望越来越多的探索可以为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开辟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 [1]蔡国春.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概念的界定——中美两国高校学生工作术语之比较[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00(6).
- [2]叶骏,金永发.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规范与指导[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1.
- [3]于伟,韩丽颖.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工作的理论基础与职能[J]. 外国教育研究 2003(4).
- [4]蔡国春.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专业化发展及其特征[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02(3).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对话教学——寻找大学精神、回归大学本质的途径*

刘东霞¹ 刘金玉²

(1.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马鞍山 243000;
2. 马鞍山二中, 安徽马鞍山 243000)

[摘要] 大学的教学不仅进行着知识的传授、发现和更新,也进行着大学精神的传承,而当前的大学教学现状使大学精神渐渐地遭遇迷失。在教学中,创设“我—你”对话空间,唤醒学生内在的精神境界,理性反思对话冲突,实现价值共享,回归对话实践,追求教育人性化的三大对话教学的举措,可以追寻迷失已久的大学精神,真正在对话教学的境界中,实现大学教育“以人为本”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 对话教学; 大学精神; 大学本质

[中图分类号] G64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50-03

一、大学精神的迷失 缺失对话文化

在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中,主体对象是教师和学生,高校教师在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大学生则居于主体地位,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不仅要考虑到适合教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学生主体性的发挥,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而目前大学课堂教学中仍在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有相当多的教师仍习惯于讲授法,启发少,讨论少,知识和信息都是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流动,这是目前大学采用的最典型、影响面最大的教学方法。这样的教学方法注重知识的单向传授,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久而久之,导致了学生创造能力差,习惯于接受而不习惯思考,更不习惯怀疑与考证。大学的教学不仅要进行知识的传授、发现和更新,也要进行大学精神的传承。没有怀疑,怎么会有对真理的探索与不懈追求?没有考证,怎么会有“去伪存真、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

同时在大学,有相当一部分课程仍然采取大班教学的方式,这种情况在大学低年级表现尤为突出,刚入校的大学生很难适应大学的学习环境,这无形中使得教学活动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班级容

量过大,给教师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主性带来了难度。现实的课堂教学难以摆脱灌输式的“存储行为”,在这里作为“讲解主体”的教师不是同学生进行平等对话、沟通合作,而是让“倾听客体”的学生耐心接受、记忆和重复存储材料。学生变成了知识的“容器”,变成了可任由教师灌输的“存储器”,师生关系处于“反对话关系。”^{[1](P.40)}师生之间存在的这种“反对话关系”会加速学校“反对话文化”现象的产生。作为教育主体的师生关系都不融洽,何以产生和谐的学校文化和学校精神?大学倡导的批判与创新的精神,在目前的大学教学现状下渐渐地迷失。

二、大学精神的归宿 和谐的大学人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和灵魂,是大学的精神支柱,是一所大学历史弥新、久负盛名的价值所在。英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认为:“理智的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真正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思想或理智。”^{[2](P.97)}可以看出,大学的使命把培养具有良好思想素质的公民放在首位。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现代大学精神的核心,所以大学精神应该是一种以追求人文

*[收稿日期] 2011-03-10

[作者简介] 刘东霞(1982-),女,山西平遥人,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刘金玉(1976-),男,安徽寿县人,马鞍山二中教师。

关怀、以人为本的精神。

大学精神产生于西方的欧洲,伴随着现代大学的发展而发展。在西方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把“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作为大学的校训,成为了哈佛人学习和做人的第一准则,它把追求真理作为最高的准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可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正是在这种精神的熏陶下,哈佛才得以在美国的名牌大学中保持着独一无二的特色。所以,大学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培养人们独立探索的科学精神。大学精神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不断交融的结晶。

要探讨大学精神的本质,追寻大学的灵魂,还必须回归到研究大学教育的本质上。只有对大学教育的本质探讨清楚了,才能追寻到真正的大学灵魂。《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通过教育与熏陶发扬人性中本来的善,培养健全的人格;“止于至善”是指通过教育使整个社会达到古人所谓至善的境界。所以,大学教育的本质目的在于培养健全、和谐的人。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不少学校在强烈追求学校发展规模的同时,忽视了人性的发展,注重传授知识忽视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培养社会精英忽视了人内在的精神需求。所以,实现大学教育的本质回归,培养和谐的大学人,已经成为目前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大学精神的追寻 对话教学

1. 创设“我—你”对话空间,唤醒学生内在的精神境界。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一个接受教育的人,成为真正的人。布伯认为,要成为真正的人,就要进入“我—你”关系。那么,关系发生在哪里?关系发生在一个“际的领域”,这个“际的领域”是一切对话得到展开和实现的场所,同时也具有本体论的色彩。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马丁·布伯认为“人际间”也存在问题,因为“人际间”也有“真实的”(being)和“似是而非的”(seeming)的二元性。被“真实”支配的人自愿把自己给予他人,而“似是而非的”人主要考虑别人怎么想自己。这里“真实的”对应于“我—你”;“似是而非的”对应于“我—他”。人际间的对话,重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要直接与他相遇,对他说出你,这是直接性的联系。因为我在对他说话,而不是谈论他,在谈论他的过程中,所有的联系都与

你无关。哈贝马斯也认为:“真理应该被定义为话语主体通过语言交往而达成的共识。”^{[3] P. 147}在所有人都进入与我的对话,赞同我对某一对象的思考时,我的想法才可被认为是真实的,所以,创设语言交往的理想对话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人类现象的对话,除了需要理想的对话环境外,“他”具有一定的构成要素,其中有两个方面(行动和思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对话要求有思维和进行行动,但思维和行动不能截然分开。如果在行动和思维之间没有固定的联系,就不是真正的对话,也就不会去实践,因而,可以说真正的对话是一种对世界的改造。但是,不真实的对话,会有损于行动和思维,成为连篇空话。空洞的对话是不会揭示世界的,因而也不可能去改造世界。另一方面,如果仅强调行动而忽视思维,那么这是为行动而行动,是一种行动主义,他否定了真正的实践,也阻碍了对话。德国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指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播,教育之为教育,正在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4] P. 78}所以,对话教学要真正地落实在行动上,必须在创设“我—你”的对话环境中,唤起学生的思维,唤醒学生内在的精神境界。

2. 理性反思对话冲突,实现价值共享。

参与对话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因地域、文化等的差异,在思维、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差异。这些先于对话所带入的观念和看法会形成思维假定,影响着对话的进程。有了思维假定的渗透,伴随对话教学的深入开展,冲突便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冷静地审视,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冲突是促进对话向着更深层次方向发展的催化剂。在对话的过程中因为坚持一己之见而僵持的时候,对话者是否能倾听对方的意见,就显得特别重要。在通过倾听了解对方思想观点的同时,把自己由思维假定而产生的反应悬置起来,把自己当作审视的对象,对对话中产生的冲突进行理性的反思,冲突中的嬗变就具有了创新色彩,冲突也可能向着创造性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在处理对话冲突的过程中,产生其他对话的主题,使对话教学超越它的预设性目的,真正体现出对话的无限性,确保对话教学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和自由的境界,亦是大学对话教学的精髓所在。对话教学的目的是获得真理,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二者不期而遇。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是研究高等学术之圣地,并非养成官僚之

所。要发扬大学精神,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不行,被禁锢的思想不会有创造力。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而对话教学在形成“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学生的对话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正是在对话教学中得以提升。对话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必要手段,有了对话,人类才能更好地沟通,人的思想才会升华,文化才得以延续,社会才得以发展。而对话教学产生的理想境界是,在对话中实现思维共享、价值分享。这里的共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参与、分享”,第二个意思是“承担、分担”,共享的不仅有利益而且意味着责任的分担。^[5]所以说,表面看起来英语的“对话”(Dialogue)源于希腊词“dialogos”,Logo的意思是“词”,前缀Dia的意思通常是两个,但是在这里代表的意思是“穿越”),所以对话是多个层面的过程,它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谈话和交流。

3. 回归对话实践,追求教育人性化。

日本学者佐藤学在综合杜威和维果茨基的学习理论后,提出了他的对话教学观。他把对话教学分为3种形式:第一种对话实践,是同客体的对话。儿童直面教育内容、原理和结构,运用概括化的概念,建构客体的意义世界。第二种对话实践,是同自己的对话。第三种对话实践,是在同他人的沟通这种对话的社会过程中实现的。包括师生之间和伙伴之间的对话。^[6]结合大学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论述师生之间的对话实践,师生之间对话教学的意义之一是追求教学的创造性质,之二是追求教学的人性化。^[7]对话教学要回归对话实践,追求教学的人性化,首先要从学生出发,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不要求学生接受教师的权威,相反,教师要求延缓学生对那一权威的不信任,与教师共同参与探究,探究那些学生所正在体验的一切。”^[8]在体验中培养师生的生成性思维。生成性思维是针对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教学一直在实体性思维的模式下运作而提出来的。所谓实体性思维,就是把知识看作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教学就是引导学生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是单纯的求知活动。

而大学教学仅仅满足于目前这种只求学生掌握人类已有的科学知识,只注重科学知识在量上的积累,长此以往,将会越来越远离科学的本质。美国布朗大学校长斯蒙丝认为,美国的大学更倾向于做一些创造性、开拓性、研发性的工作,更多是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而中国大学在学习上非常严谨,注意力非常集中,但中国大学生较少关注社会影响力,很少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这也是中国大学目前的问题所在。生成性思维指导下的对话教学,将意味着教学从传递知识向生成知识的转变,知识的价值不再是给人现成的结论,而变成了知识不断创造的起点,所以生成性思维支配下的对话教学是一种体现教学创造性品质的教学形态,是一种旨在解放师生、追求生命意义的教学形态。这样的教学,回归到了学生的生活世界,把人的实践活动还给了人,把人失落了的世界还给了人。

对话教学用主体间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实现了师生的双向互动;用对话中产生的顿悟来建构自己的意义之城,提升了每个人的思想境界,使人的内在需求得到满足,创设了和谐的校园对话文化,使大学的校园充满了灵性与活力,使大学教育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终极目标不再是理想。

[参考文献]

- [1] [巴西] 保罗·弗莱雷. 被压迫者教育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2] [英] 约翰·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想[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3] [德]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性研究及其补充[M].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1984.
- [4]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 [5] 袁春平, 范蔚. 戴维伯姆对话思想及“对话教学”浅析[J]. 大理学院学报, 2008(1).
- [6] [日] 佐藤学. 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 [7] 刘庆昌. 对话教学初论[J]. 教育研究, 2001(11).
- [8] [美] 小威廉姆·E·多尔. 后现代课程观[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微博兴起视野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陈燕红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 作为一种新的网络传播工具, 微博(Twitter)也在发挥着塑造大学生思想的政治功能。微博的兴起在带来挑战的同时, 为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视角、新理念和方式, 促使我们充分利用机遇, 全面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

[关键词]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教育; 微博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53-03

微型博客(Microlog、Twitter, 微部落格、微型网志)是一种结合即时消息和博客特点发布消息的系统, 允许用户及时更新140字之内的简短文本。^[1]微博的理念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只言片语的形式与人分享, 用户也可以上传图片或影音剪辑和出版。

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网络传播工具, 具有传播快捷、操作方便、成本低廉等特点, 自2006年诞生以来, 就广泛拥有世界范围内的网络用户, 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群体。在微博迅速将言论自由引向深入的情况下,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得不直面这一爆炸式发展的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何抓住微博带来的机遇, 应对微博构成的挑战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一、微博兴起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新机遇

以美国的Twitter和中国的分享、叽歪、嘀咕、腾讯滔滔、新浪微博等为代表的微博首要特点即“微”, 其传播的内容是“微内容”: 一句话、一张图片等; 传播体验是“微动作”: 简单的鼠标点击就能完成选择、评价、投票等功能; 传播渠道是“微介质”: 手机等。^[2]“微博”的出现标志着个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其中青年大学生是微博用户的主力军, 他们不但思想前

卫, 且接受能力强, 聚百家之长于一身的微博的出现必将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契机。

1. 微博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创新, 拓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提出, 要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3]运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的有益尝试, 为高校在网上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一个新渠道, 为教育者把握大学生的思想脉搏提供了新窗口。微博既可以进行单向信息传播, 又能实现多样化的互动交流, 即师生既可双向交流, 亦可组建博客圈展开多向交流讨论, 既可同步在线即时交流, 也可异步在线延时交流, 信息交换相当充分。^[4]微博弥补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 将学校教育与自我教育、网上教育与网下教育相结合, 使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从传统的“面对面”发展为“键对键”, 使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变得更为宽广, 教育内容变得更具时效性, 教育双方的沟通交流变得更为平等、开放。

2. 微博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共享, 促进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力量的整合。“越分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微博平台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模式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4-08

[作者简介] 陈燕红(1985-), 女, 福建莆田人,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助教, 硕士。

享越多”的利他性的共享精神是微博的魅力精髓。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建立自己的微博,相互成为跟随者,就工作中的问题展开探讨,分享他人的工作见解,共享双方的实践经验。同时,思想政治工作者经过知识收集、提取后获得知识上的提高,通过短小精悍的微博发布,学生可以对信息内容进行评论和引用,也可把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上传分享,形成广泛的知识共享。因此,通过微博这个提供共享资源的平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研究,提高专业水平和能力;大学生也能充分汲取营养,接受广泛的教育和熏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微博既是家庭、学校了解学生思想感情动态的一面镜子,也是教师、家长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学生成长、交流协同的平台。目前中国的饭否、滔滔、新浪微博等的开设和运行,为教师和学生、家长和教师、家长和学生、学校和社会之间互通信息、统一思想、汇聚力量,合力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微博延续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优化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限于教室、校园等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效果不甚理想,而微博的即时、互动、立体的传播方式,能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极强的渗透性、覆盖性,延续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微博通过移动设备等多样化的途径特别是能通过手机发送短信传播即时信息并跟随他人的微博,不需上网双方就可随时随地进行沟通。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更长的时间内开展,受教育者也能不受地域和工作时间的限制,无时不有地接受在线教育。另外,微博为大学生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心灵对话、思想交流、观念碰撞提供便利,使他们在相互感染、相互帮助、相互塑造中不知不觉地共同自我教育。而且,通过微博进行自我倾诉、宣泄,或微友间的交流、劝慰、赞赏,师生都能够排遣消极情绪,释放心理压力,增强信心,使自己的心理趋于平和健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微博优化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

二、微博传播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1. 大学生思想引导难度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预见性受到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预见性,这样才能在具体的工作中明确特定的教育对象、内容和方法等。但是微博带来的信息传播的渠道迅

速被打开,大量难辨良莠真伪且带有个性化和感情色彩描述的信息方便快捷地进入大学生的视野,考验着他们的判断力和辨别力。而大学生在寻求彰显自我的同时,更有可能不加辨别地人云亦云,进而误入与主流意识形态偏离的歧途。一旦某个“跟随者”众多但别有用心的人,将扭曲的,甚至恶意的社会信息通过其影响力左右其“跟随者”的观念和言行时,所产生的舆论影响和社会后果就难以控制和预料。同时,由微博汇集的舆论和社情态势快速变化,在现有的条件下不易管控、评估和预测。因此,在社会言论更加自由、开放且不能再靠以往的绝对封闭控制手段解决思想问题的今天,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将微博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亟待思想政治工作者作深入的整体性思考和筹划。

2. 大众传媒为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受到影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遭遇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要借助一定的载体。目前,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依赖传统媒介如电视、报纸等,虽然高校也开始重视网络,却更多地局限于单方面信息发布,对大学生影响有限。而微博符合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接受信息的习惯和渠道,符合他们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这就逐渐对传统的舆论导向模式和思想文化阵地占领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不断侵蚀和影响大众传媒所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另外,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育、树立典型、感染教育等方法,有意识地选择合适的材料对大学生集中地、持续地、高强度地传播含有特定内容的信息,以促进他们的思想、行为发生转变。然而,微博使信息的传播脱离了政府、学校及家长等权威的控制,微博上的内容与教育者所灌输的信息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现象将非常普遍,这会引起大学生思想上的疑惑、混乱。因循守旧的思想教育方式已经很难跟上微博时代的步伐,如何利用“微博”这个平台,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向,探索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3. 微博传播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受到挑战。在传统的高校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者是信息的传播者。随着微博的兴起,若思想政治工作者不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和掌握最新信息传播技术的能力,主动介入到微博空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话,那么将丧失以往的信息传播主导权。大学生通过微博可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而思想政治工作者却不知道学生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甚至其所讲授的内容大学生早就知道,而他们嘴里蹦出的新名词和新鲜事思想政治工作者却可能闻所未闻。传

统思想政治工作在微博广泛普及的社会中,已不可避免地面临思想教育灌输的尴尬。因此,如何提高自身素质,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对微博空间的监管和指导,是“微博”给思想政治工作者带来的挑战。

当然,微博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方式,促使我们充分利用机遇,全面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径。

三、微传播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探索

1. 树立积极研究微博的新理念,拓宽“微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域。高校应该充分认识到微博具有的建构观念的强大政治功能,必须端正对微博的态度,树立积极研究微博的新理念,加以引导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应客观理性、全面深入地介入到微博的世界中,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需求,建立自己的微博阵地,有效抑制不良观念对大学生的侵蚀,有效促进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

微博的兴起拓宽了“微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域,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积极扮演好引导微博传播的新角色。首先,建立特色微博网络。这些网络应该主题轻松活泼、议题时尚新颖,具备吸引力大、凝聚力强等特点,能够吸纳大量的青年学生。其次,始终保持“微博态度”,习惯使用“微博语言”。要真正使用网络聊天和虚拟交谈的自然沟通方式,消除思想政治工作给人的政治说教刻板印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擅长“微博议政”,以年轻人的语言与年轻人交流,充分展示亲和力和感召力,在自然生动的语境中营造主流舆论氛围。

2. 加强队伍建设,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见微知著”的新理念。首先,各级教育权威部门要成立专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培训一批专门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者,提高信息素养和掌握最新信息传播技术的能力,加强对微博空间的监管和引导。其次,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树立见微知著的理念。人们的思想问题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和暴露的过程,社会思潮的形成亦有一个萌芽、酝酿和传播的过程。在个性化的微博空间里,人们的所思所想能够得到真实的表达,某种观点在微博中所激起的反应能够被真实地记录。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被动地进行“善后”,必须主动介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要充分利用微博,仔细研究科学预判,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思想问题,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另外,“微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能善于体察学生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对

他们的精神需求做出积极响应,转换视角,更加关注个体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健康,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

3. 利用微博平台开展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首先,紧密跟踪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通过微博即时发布热点新闻、政策及理论学习心得的网络地址链接,策划提供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社会议题,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注度和吸引力;其次,在微博上针对热门话题发起讨论,让学生大胆发表意见,在讨论中培养青年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其学习政治理论的自觉性;再次,注重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内容对“微时代”各种亚文化内容的统摄和整合作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微博空间多样的文化形态和多元的文化内容进行分析甄别,将其纳入主流文化的轨道。

在工作方法上,首先,要积极发挥大学生的自组织能力,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化的进程。微博的一些自发公益活动说明了蕴藏在广大学生中巨大的行动力,这体现了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力量,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其次,要改进“微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传播方式。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充分利用互联网、3G网络、手机等载体,整合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形成融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为一体的多元信息传播网络。再次,要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如传统的教育以单面式说理为主,“微时代”的说理应更加注重互动式、探讨式说理,要讲究语言艺术和方法,空洞的说教在微博世界中只会成为没有跟随者的独白,只有尊重和关心大学生,才能利用好微博聚拢人气,从而提高网络教育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陶文萍. 微博客:图书馆服务的网络手机[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10(3).
- [2]何国平. 微传播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0(4).
-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EB/OL]. http://www.hainu.edu.cn/sxzz/asp_hainu_show.asp?id=29233 2006-05-31.
- [4]白小光. 博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建设性作用[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0(6).

(责任编辑 师 语)

“90后”大学生思想特点调查与分析*

楼启炜

(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随着“90后”大学生进入高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90后”大学生的成长背景与上一代人明显不同,因而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都有其鲜明特色。我们必须先探究“90后”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才能探寻出对“90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90后”大学生; 思想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56-04

“90后”指代整个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从2008年开始,“90后”大学生逐渐成为大学生群体主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大学生很多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将面临新的挑战。那么“90后”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呢?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部分首批进入高校的“90后”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力求探求“90后”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一、对象与方法

2009年底,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南京邮电大学各学院部分“90后”大学生进行了大学生思想动态的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976份,回收有效问卷926份,回收率为94.9%。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统计如下:调查对象的专业兼顾理科、工科、人文、管理类等,其中理科占10.9%,工科占66.1%,文科占3.2%,管理类占19.8%;男、女比例为66.7%、33.3%(这主要是由学校的专业设置以理工科为主决定的)。调查对象的政治面貌的组成包括团员、党员、群众,其中团员867人,占总人数的93.6%;民族以汉族为主,其他民族39人,占总人数的4%;此外,调查对象的家庭所在地的分布情况为:大中城市18.9%、县城19.8%、乡

镇29.5%和农村31.9%。

二、结果分析

调查问卷共设计题目33个,涉及学生的政治观、人生价值观、择业就业观、人际交往观、文化审美观等方面。本文所引用的数据材料均来自于此次调查,使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1. “90后”大学生的政治观。

“90后”的大学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和“80后”的大学生相比,他们思维更加活跃,视野更加宽广,是富有理想和抱负的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思想政治上能够积极要求进步,拥护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社会热点问题较为关注。

关于自身政治信仰的问题,58.5%的“90后”大学生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说明他们政治信仰的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在充分肯定“90后”大学生政治信仰主流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高校大学生政治信仰的走向出现多样化趋势。有18.4%的人选择了信仰“其他”,此外,仍有22.1%的人对自己的政治信仰不明确。通过了解,这其中有一部分学生认为有无政治信仰无所谓或不需要政治信仰,

*[基金项目] 南京邮电大学2009年思想政治教育规划项目“南邮‘90后’大学生思想现状调查及行为模式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XC208001)。

[收稿日期] 2011-04-05

[作者简介] 楼启炜(1983-),女,浙江义乌人,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讲师。

这种现象的产生部分是因为社会现实让他们把价值取向关注于具体的事情,而非抽象的理想信仰,转而注重物质层面。另一些学生则是至今尚未考虑清楚自己的信仰问题,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校在政治信仰的教育中缺乏系统性,教育内容枯燥,吸引力不足,理论与现实相脱离。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加强对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方式等的思考,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信仰。

2.“90后”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

“90后”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价值观定型的关键时期,他们人生价值的选择与追求又是如何呢?对于自己的人生信仰,选择“服务社会”的学生占16%,选择“高尚精神追求”的学生占26.9%,选择“永不止步的探索”的学生占24%,选择“高品质的生活状态”的学生占33.1%。对于人生价值的判断标准,43.8%的学生认为是“对社会贡献的多少”,17.4%的学生选择了“社会地位的高低”,31.5%的学生觉得是“他人对自己的尊重”,只有7.3%的学生看重的是“金钱多少”。对于人的尊严和金钱的关系的判断,70.3%的学生认为“金钱和尊严都重要”,但不能以金钱换尊严;17.9%认为“人的尊严重要”;只有5.4%的学生认为“金钱重要”,6.4%的学生认为“两者都重要,为了金钱可以失去尊严”。从“90后”大学生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解答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生态度总体是积极向上的,对人生价值的认识是比较明确的,但价值观往往更加现实。

“90后”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们的人生追求与现实行为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并体现出合理利己主义倾向。例如在是否认同“即使自己吃亏,也应该帮助别人”这一问题上,大部分的人表示不大同意或完全不同意。

此外,“90后”大学生的人生价值选择趋向多元化。对于自己渴望的生活方式,选择小资生活、白领生活、行游生活、田园生活的各有一定的比例。相比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视野比“80后”的大学生更开阔,消费意识更超前,价值观也更加国际化。

3.“90后”大学生择业就业观。

大学生择业、就业既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又是大学生面临的严峻挑战。“90后”的大学生,对于当前就业形势的认识主要表现为:59.6%的学生认为通过提高专业技能等自身的努力可以找到工作,17.5%的学生觉得现在就业困难大,22.7%的学生表示对就业形势担忧。将大学生就业难归因为自身

能力不足的学生占到了36.5%,归因为连年扩招的人数占21.1%,认为是用人单位不愿意录用应届生的占14.4%,觉得是自己所学专业人才太多和所学专业需求太少的分别占到了21.1%和6.9%。对于理想中的工作,将今后的发展空间作为考量的首选的比重最大,占到了50.1%,其次是工作环境占21.9%,薪金占20.7%,专业对口占4.6%,2.7%的学生会优先考虑解决户口。

以上说明“90后”大学生对日趋紧张的就业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就业难的原因认识比较客观,更多的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同时对择业就业的态度也比较积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职业规划不太清晰。例如多数学生希望毕业后能去大中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就业,愿意到西部地区就业的极少。绝大部分学生对公务员这一职业比较青睐,尽管认为公务员工作单调、不利于发挥创造,但还是把它当做就业压力下的首要选择。对自己的事业蓝图,选择“还不是十分清楚”的占到了64.4%,选择比较清晰和没有考虑过分别占13.2%和17%,已经开始行动的只占5.4%。因此我们对“90后”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急需加强。

4.“90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观。

“80后”大学生开始接触网络大多是在中学以后,而“90后”的这一代大学生大多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90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行为与网络等现代化信息媒介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断发展的信息科技对“90后”大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

调查显示,在“拇指文化”的背景下,手机(选择人数占到了72.1%)成为大学生最主用的联系工具;使用QQ等即时聊天工具联系的占了16.1%,选择书信联系的学生占8.3%,而经常用E-mail、博客等网络平台联系的占3.5%。而在这样一个信息网络时代,学生结交朋友、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广泛。在如何与班级外的人交朋友的方式上,网络也成为了继协会、老乡会等传统方式之外的一大重要方式。在获取知识的首要渠道中,19.9%的人选择了图书;7.9%的人选择了广播影视;有16.7%的人通过人际交流获取知识;选择互联网的人数最多,比重达到了55.5%。

由此可见,“90后”大学生多数能积极主动地适应信息社会发展,大量接触并利用网络,但与此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题,如对网络的利用效益较差,娱乐

性倾向较突出。在上网的主要活动中,学生对聊天和检索资料的选择次数相当,分别为606次和626次,占到了22.9%和23.6%;玩游戏和看时政新闻的选择次数分别为329次和323次,比例占到了12.4%和12.2%;看体育报道有245人次选择,占9.2%;看娱乐消息有209次选择,占7.9%;上网没有目的的有174人次,占6.6%;网上交友的有138人次,占5.2%。

此外,通过对“90后”大学生谈恋爱的出发点和与人相处的态度等问题的调查可以发现,“90后”大学生比“80后”大学生有更强烈的独立意识,他们敢问、敢说、敢闯,善于交际,但往往缺乏集体主义观念,缺乏对他人的理解与包容,较为自私且承受挫折能力弱。

5.“90后”大学生的文化审美观。

说到“90后”大学生,许多人都会提到“非主流”这个词,现在流行于大学校园之中的“非主流”文化是一种特指,即“张扬个性、另类、非大众化,不盲从当今大众潮流”的文化。“非主流”文化讲究符合自己心性的服装、衣着、言行,这与我们通过调查总结的“90后”大学生的行为举止、心理体验、审美倾向等方面特点是相一致的。

“非主流”文化崇尚反叛,追求“酷”、“个性”和“另类”,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审美实践中,告别种种心理定势,依据自己的好恶来精心设计自己的外在形象和内在个性。这种自我化的审美活动和审美实践,充分地展现了他们的自由意志,使得他们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而又独特的个性特点。在言行举止上,“90后”大学生也喜欢远离主流的文化和审美观,打破固有的界限,颠倒习惯化的表达方式,通过装扮、阅读、写作、文字等来彰显自己的个性,例如现在在网络上泛滥的“火星文”,很受推崇的“手机自拍”等等。

总的来看,“非主流”文化让“90后”大学生们敢于和勇于追逐审美潮流,注重个性发展,他们喜欢寻求刺激、追求新鲜感,从衣着外表到兴趣爱好都希望独树一帜,极力表现与众不同,自信且个性张扬,思想早熟且相对开放。^[1]

三、成因探究

“90后”大学生出生和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最快、成就最大、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最为激烈、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人们思想观念最为解放、意识形态也最为多元化的时期,其身上具有明显的时代

烙印。人是环境的产物,因此“90后”大学生思想特点的形成,与他们经历的生长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密不可分。

1. 社会文化的影响。

“90后”大学生成长在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带来了观念的深刻变革。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生存环境,“90后”大学生相对于“80后”大学生,多了些理性的态度,更早懂得了成人的世界规则。

“90后”大学生生活在一个主张多元化、追求多样化的社会。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能更快地接受外界的思想,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等各方面也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同时,这些“多样化”不仅给“90后”提供了多样选择的机会,也给了他们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创造了广阔的舞台。他们并不满足于纯粹的接受,还在接受的同时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不断发展着自我的个性。

2. 家庭环境的影响。

“90后”大学生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代,大多为独生子女,出生在一个以其为中心的“4+2”的包围圈中,既4个老人加上两个大人共同抚养一个孩子,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6位忠心耿耿的“奴仆”可供驱使。^[2]在这种环境中,“90后”备受关怀和溺爱,父母尽可能给予他们优越的物质生活,他们逐渐习惯于更多地关心自我,习惯于从家庭和社会索取,追求时尚、享受生活,造成了他们任性、敏感、自我为中心。由于过度被保护,抗挫折能力不强,心理素质比较差。

“90后”的家庭突破了很多传统,父母的生活态度有了很大改变,主张独立与开放,追求的是成功的事业与高质量的生活,所以对孩子的教育脱离不了金钱,不能从情感的角度去感化孩子,势必使“90后”大学生产生叛逆的心理。此外“90后”的很多家庭都有重组的现象,这无疑带给他们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创痕,使他们变得冷漠与自私,缺乏应有的温暖与安全感。

3. 教育背景的影响。

一方面,“90后”的孩子接受的是义务教育,经历了多次教育改革,这个时代的学生承受了较多的学习压力、升学压力、繁重的课业负担和心理压力,这使得“90后”学生中存在丧失学习兴趣甚至厌学

的现象,他们往往把考入大学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因此进入大学之后就很难保持高中时代的学习状态,对自己的未来缺少规划。

另一方面,正规的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全面开展也使得“90后”大学生比其早出生的人思路更开阔,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富有创新精神,自我选择性极强,有个性、有主见。他们更希望按照自己的兴趣,形成以自己为主体的模式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他们注重生活的质量,善于与他人沟通、交流,善于表达自己,并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

4. 信息时代的影响。

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信息渠道大为扩展,科技的日新月异使“90后”走在了信息的前沿,成为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90后”的生活。^[3]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90后”大学生可以更便捷地接受各种知识,他们观念更新快,开放程度高,对于新事物的学习和接受能力也是前人无法企及的,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愿望。互联网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网络信息的透明、快捷,网络的交互性、平等性,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大为提高。但同时,网络内容的不确定性和网络交往的不稳定性也使部分“90后”大学生过分依赖网络甚至沉迷网络,逃避正常的社交,因而不利于他们健康人格和正确人生观的塑造。

四、结语

总体上看,“90后”大学生个性张扬、乐于表现、自主独立、思想开放、思维活跃、追求时尚、创造性强,又因为多种原因的影响,“90后”大学生也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偏离、集体主义精神缺乏、以自我为中心、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者,面对“90后”这个崭新而特殊的大学生群体,我们应该改变原有的思想观念,做到与时俱进,实施因材施教。重视学生在思想上的差异,针对其制定适当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摒弃以前“以不变应万变”的“模糊管理”而引入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因此,教育者自己要先实现几个转化: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由片面强调整齐划一向包容个性转化;在教育模式上,由单向灌输向双向和多向沟通转化;在教育重点上,由过于理想化的宏观目标教育向宏观目标与人的自身需要相结合转化;在信息化手段上,向网上疏导与网下引导相结合转化。

我们要牢牢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积极了解“90后”大学生思想的新特点和新走向,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有针对性、有特色地做好引导、培养“90后”大学生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 [1]崔景贵. 90后大学生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J]. 教育与职业 2008(12).
- [2]孙杰. 浅谈“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J]. 华章 2008(9).
- [3]胡邦宁. 浅谈“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J]. 时代文学 2008(11).

(责任编辑 晨 晓)

大学辅导员在高校学风建设中的工作策略探索*

宋文秀

(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学风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学生工作队伍的主力——辅导员则在其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影响高校学风建设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辅导员在促进学风建设中的工作策略。

[关键词] 高校; 学风建设; 辅导员; 工作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60-03

学风是指学生对知识、能力的渴求和在学习中是否勤奋刻苦、学习纪律是否严明等,是学生在对待学习这个问题上所展示的精神、态度、风格、方法和习惯等要素的综合体现。^[1]加强学风建设不仅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更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要认真研究大学生学风建设的规律和特点,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促进高校优良学风的养成。其中辅导员作为专职的学生工作者,班级工作的领导者,在学风建设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本文首先分析影响高校学风建设的内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辅导员在高校学风建设中的工作策略。

一、学风建设的影响因素

高校学风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学生、教师、学校以及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因素之间也相互影响。影响学风建设的因素在这里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前者是指高校内部对学风产生影响的因素,后者则是指校外即家庭和社会因素。内部因素中又分为学生因素、教师因素、教学管理因素,这些因素对学风产生了主要影响,我们把它们叫做内核因素,除此之外如校园环境和教学设施是其他因素。如图1所示。^[2]

1. 影响学风建设的内部因素。

(1) 学生因素。大学学习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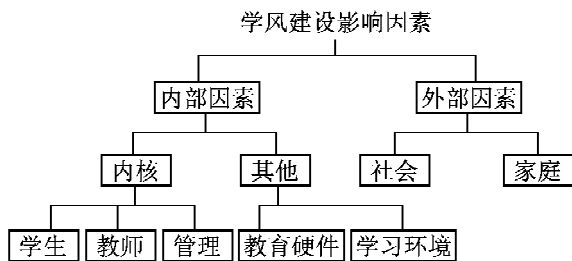


图1 学风建设影响因素

教室,也没有班主任的刚性约束和管理,学生上课、自习和课外活动主要靠自觉。大学生要主动学习,要具备端正的学习态度和踏实的学习作风,然而一部分学生自我约束性不强,自我控制能力差,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有一些学生进校后难以尽快适应新环境,也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最终出现“掉队”现象。

另外随着完全学分制的实施,选课自由度的提高,跨专业、跨院(系)选课使班级概念渐趋模糊,宿舍和社团概念不断加强,它们是大学生们课外交往的两大空间,与第一课堂同学间关系的一样,成员间是一种重要的同伴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同类或同伴的影响,如果人们发现某种行为已经成为其同类中的一种流行行为,他们往往也就会跟着做。^[3]相对而言,这种从同伴身上习得的态度、理想、情感、意志与兴趣等,对于

*[收稿日期] 2011-05-20

[作者简介] 宋文秀(1981-),女,安徽巢湖人,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学生辅导员,硕士。

形成学生学习的意识、动力、习惯和技能等方面的作用更为深刻,影响也更为持久。

(2)教师因素。很多大学的教师都认为,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所以不需要他们不断的督促和教导,导致他们对学生学习的重视度不够,还有的教师由于忙于科研和自身学习,教学工作投入的精力非常有限,还有部分教师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改革没有创新激情,整堂课程都是采用一成不变的照本宣读模式,在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和氛围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要想改善学风,先要让学生在学中找到乐趣,教师如何在课堂上吸引学生的兴趣是每个教师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另外,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管理人员承担的工作量增大,很多管理者忙于一般事物性工作,对学生的思想工作无法细致深入,学生管理工作往往重管理而轻教育,而学生管理工作的整体弱化将使学风建设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抓手。

(3)教学管理因素。部分高校自身教育管理和教学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对教育发展的要求,表现在:一方面,专业设置门类多,但缺乏足够的特色专业并且不能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教学模式老套,教师仍以讲授课本知识为目标,忽略学生兴趣爱好和个性化多元智能的培养;教学内容和仪器设备落后,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学校对学风建设虽然有足够的重视,但是相对应的策略和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另外即使学风建设制度完善,可是由于主客观的影响因素并没有真正将这些管理制度完全落实下去,导致学风建设收效甚微。

2. 影响学风建设的外部因素。

(1)家庭因素。家庭教育是学风建设的后战场。在大学生的家庭教育中存在这样两种误区,一是虽然孩子已经步入大学校园,但是家长还像对待中学生一样的对待孩子,要求孩子在学习上拿高分,而忽视了大学学习的真正目的是培养能力、陶冶情操,使得很多学生仍把学习看作为应试而学习;二是有些家长自从孩子进大学后,认为督促孩子学习的任务已经完成,把责任推卸一空,不再关心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态度,这就导致了很大大学生非常的散漫,没有学习的压力和紧迫感,最终出现了掉队现象。因此家庭的配合与支持是高校学风建设的坚强后盾。

(2)社会因素。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给学风建设带来了较大阻碍。社会上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风气和思想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高校学生中来,给学生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形成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随着高校网络的普及,各种信息良莠并存,各种错误思潮、观念混杂其间,极易感染青年学生,混淆学生的视听,这无疑将加大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学风建设工作也因此受到较大阻碍。

二、辅导员在促进班级学风建设中的工作策略

基于以上对高校学风建设的影响因素的探讨,笔者仅从辅导员角度对加强高校班级学风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强学生思想教育,明确学生学习目的,端正学生学习态度。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学风建设的关键。抓好思想教育,尤其是针对新生的入学教育,是加强学风建设的先导。思想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想和信念教育、诚信教育以及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等,这些教育应该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并要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采取不同形式和内容。思想教育的方式可采用专题报告、座谈讨论、个别交流、典型事例宣传等方式。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力度,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当前的社会现象,增强他们对事物的鉴别力,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通过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 and 道德修养,通过诚信教育,将诚信内化为学生的行动,防止各类舞弊现象的发生。总之,辅导员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他们的头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学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2. 加强学风制度建设,强化三级管理。

制度建设是学风建设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管理更是学生工作的重要手段。辅导员必须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结合本班实际制定一套科学而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学风建设检查制度等来规范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行为,同时要建立健全考核评价监督机制,通过表彰先进,带动后进,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辅导员一个人

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所以辅导员要优化管理方法,尤其是要注意发挥三级管理网络的作用,即:辅导员——学生骨干——学生自身。辅导员在面上进行监督,而学生骨干包括班委、党员则在点上进行督促,最后是学生的自我管理。在管理中对于违反制度的学生要严格按照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以端正学风。另外辅导员可以将学生出勤、作业情况与考试资格、学年评奖评优、发展党员等直接挂钩,加强对不良学风的约束力。当然在对违纪学生进行处理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重在教育,使他们真正认识错误并积极改正。

3.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学风建设的主动性。

学风建设的主体是学生。加强学风建设,必须发挥他们在学风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首先,要发挥学生在班级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开展学风创建活动过程中,要求每一位学生按照学风要求进行自我检查,确立学习目标,寻求改进学风的办法。其次,要发挥学生在文明宿舍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学生在寝室文化、卫生、纪律等方面的积极主动作用,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形成积极向上的氛围。最后,要发挥学生在党团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辅导员要重视培养和锻炼一大批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形成学风建设的核心和主流,在思想、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促进优良学风的形成。

4. 以人才和就业为导向,引发危机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辅导员应如何激发班级的学生的学习动机呢?笔者认为可以在强化学生专业意识和激发学习内驱力方面进行如下努力:一是分析就业现状,尤其是所学专业近几年的就业状况,引发学生的危机意识;二是讲解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强化学生的学习意识;三是阐释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激发学生的专业意识。以就业指导为导向,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是将学风建设与学生的中长期利益即就业利益联系起来,从内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针对学生所处的不同阶段,实施循序渐进的就业教育,增强学生的就业意识与紧迫感,从而增强学习动力和学习的针对性,进而达到促进学风建设的目的。

5. 引入竞争机制,开展学习竞赛。

辅导员应充分利用学校有利的外在环境,在班

级内部引入竞争机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如:为鼓励学生们形成良好的阅读书籍习惯,可开展“知识竞赛”、“校阅览室积极分子”等读书竞赛活动;为激励学生积累社会实践经验,可开展“暑期优秀社会实践评比”、“优秀实践报告”等评比活动;为强化学生的专业意识和增强专业素质,可开展体现专业素养和水平的科技创新和学习竞赛活动。班级竞争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可以为学生创造有利于他们成才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对学生的专业学习、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等单项和综合的考核评估,使学生在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竞争,可以不断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为促进学风建设做好准备。

6. 加强与任课教师以及家长的交流和合作。

辅导员一方面要注意收集学生对课程的合理化建议和意见,并且及时向任课教师反馈。这样任课教师可以针对性地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以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另一方面辅导员和家长应保持联系,并及时向学生家长通报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并且要掌握学生在家里的一些基本表现,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辅导员要联合家长共同做好科学的引导以及提供实质性的指导和帮助。通过与任课教师以及家长的交流和合作可以从外部环境上促进学风建设,提升学风建设的效果。

高校优良学风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长期的齐心协力和通力合作,而辅导员作为其中的骨干力量一定要增强自己的责任心、使命感,不断思考新方法、探索新举措,为促进高校学风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赵平.应当把学风建设作为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J].中国高教研究,1998(4).
- [2]常江,岳敏,王蓉.高校学风建设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2008(2).
- [3]宋国英.学风建设视野中社团文化建设与宿舍文化建设整合研究[J].社科纵横,2009(9).

(责任编辑 晨 晓)

人格与情绪理论在高校师资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张志行

(江苏教育学院组织部,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师资工作是高校人力资源工作的重中之重,研究教师的个体行为,对于高校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人格与情绪理论对于做好高校师资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一需建立基于人格模型的师资选录模式;二要注意师资培养的个体差异;三是师资考评应兼顾教师的情绪与心理。

[关键词] 高校师资; 组织行为学; MBTI 测验; Y—G 人格测量量表; 情绪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63-03

组织行为学可以看成是行为科学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即组织行为学是研究组织中的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及规律,以提高管理人员预测、引导和控制人的行为的能力,从而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科学^{[1] P.16}。高等院校作为承担社会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任务的组织,为更好地实现其组织目标,师资队伍的建设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作为承载教育教学与社会科研双重任务的个体,若能将组织行为学中对个体的人格与情绪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高校师资工作的各个方面,使个体的工作与组织的目标达成一致,必然对于高等学校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建立基于人格模型的师资选录模式

人格理论作为组织行为学中个体行为的基础理论,认为人格是十分复杂的心理现象,体现为一个多维结构,准确的评估与测评人格特征,对于人才的招聘录用直至组织最终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在高校的招录过程中,人事部门往往只注重应聘教师的学历水平、研究能力等因素,而忽视其人格的健全程度、性情态度以及从事高校教师的适应力,结果许多高校为此尝到苦果。有些新教师徒有高学历,但走上讲台面对学生却无所适从;有些新教师虽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能力,但是缺乏正常的心理素质,不能适应工作环境,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等

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体现出高校目前新教师的选录模式很多缺陷。在基本素养与能力都符合要求的前提下,个体的性格因素俨然成为左右教师工作能力与实绩的主要因素。多年来世界范围内对于人格理论的研究已为我们准确判断人的理智、情绪、意志、态度等特征提供了大量模型与方法,引入这些模型,在教师招聘中对招录对象进行人格特征判断,并将结果与高校学科教学、科研的总体要求进行对比,建立基于人格模型的师资选录模式,可以协助人事部门选拔出与岗位最匹配的新教师。

1. MBTI 测验的启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测验(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简称 MBTI),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人格模型及人才甄别工具。在 MBTI 测验中,被测个体将被要求回答 100 道测验问题,通过四项二元轴来测量人在性格和行为方面的喜好和差异。这四项轴分别为(1)人的注意力集中所在和精力的来源:外向和内向(Extraversion vs. Introversion)(E 或 I)(2)人获取信息的方式:感知和直觉(Sensing vs. Intuition)(S 或 N)(3)人作决策的方式:思考和感觉(Thinking vs. Feeling)(T 或 F)(4)人对待外界和处世的方式:计划性和情绪型(Judging vs. Perceiving)(J 或 P)^{[2] P.57-58}。测试结果通过 4 个轴的 2 元排列组合形成了 16 种性格类型,并归纳出每种性格的特征,如表 1 所示。

*[收稿日期] 2011-03-17

[作者简介] 张志行(1983-),男,江苏南京人,江苏教育学院组织部组织员,助理研究员。

表1 MBTI 人格类型表

类型	人格特征
ISTJ	有逻辑性,安静,专注,追求全面性与可靠性
ISFJ	体贴、友好、有责任感,注重他人的小细节
INFJ	有服务心洞察力,希望了解什么能够激励人
INTJ	有批判精神,独立思考,有决断力
ISTP	灵活、忍耐力强
ISFP	享受当前,喜欢有自己的空间
INFP	理想主义,浪漫色彩,寻求帮人实现潜能
INTP	喜欢理论性事物,热衷于思考和分析
ESTP	注重结果,觉得理论的解释非常无趣
ESFP	外向、友好,热爱生活
ENFP	热情洋溢,言语流畅,有很强的即兴发挥的能力
ENTP	反应快、睿智,有激励别人的能力
ESTJ	果断,有一套非常清晰的逻辑标准
ESFJ	洞察力强,乐于帮助,有责任心
ENFJ	热情、有鼓舞他人的能力、有责任心
ENTJ	通常见多识广,博览群书,喜欢同他人分享

在高校新教师的招聘过程中若能进行 MBTI 测验,汇总结果后将应聘者根据不同的人格类型进行归类,能够在最短的接触中对应聘对象的人格特征有大致的把握,为人事部门的录用决策提供依据与协助。例如,在同等的教育背景与学术能力前提下,我们可以发现 ENFJ 类型的应聘者因为具有责任心与帮助的意愿,要比不愿意多做理论解释、不愿做重复劳动的 ESTP 类型的竞争者更适合从事教师的职业,而 ENFP 类型的应聘者若能发挥其天性,将是课堂上富有激情、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

高校新教师招聘中,若能再进一步结合各个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和各院校的实际师资情况,将每个独立的教学岗位所需人才的人格特质加以概括,再与 MBTI 测验的结果进行逐一比对,所需特质与 MBTI 结果高度相符者,可以作为较合适的人选加以重点考察。例如,某高校招聘法律专业教师的个性需求条件自我概括为:理性,洞察力、分析推理能力强。仅仅通过一两次普通的课程试讲与面谈接触,很难把握应聘者此方面的特质。而引入 MBTI 测验后,人事部门通过将自身需求与表中的 16 种性格进行比对,发现 INTP 类型人群的特质描述与自身要求最为接近,那么就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符合其他基本条件并且测验结果为 INTP 类型的应聘者中去。又如 ENTJ 类型的应聘者由于天性博学,讲授人文历史类的课程必定信手拈来如数家珍;INFP 类型的应

聘者因为人格特质中的幻想与浪漫主义色彩,是艺术类学科教师的合适人选,选择数学教师,逻辑性强的 ESTJ 类型更为合适;而选择幼教方面的教师,有语言与即兴发挥优势的 ENFP 类型可以重点关注。

2. Y—G 人格测量量表的运用。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田部达郎根据美国的吉尔福特的个性量表修订而成的 Y—G 人格测量表是另一套人格测量模型,由 130 个测题、13 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 10 题)组成,量表根据 12 种不同的性格特质区分出 5 种典型的人格类型:(1)A 型人格:不引人注目的平均型;(2)B 型人格:不稳定积极型,情绪不稳定,社会适应状况差,容易有异常行为的趋向;(3)C 型人格:稳定消极型,内向,情绪稳定,社会适应状况佳;(4)D 型人格:稳定积极型,外向,情绪稳定,社会适应状况佳;(5)E 型人格:不稳定消极型,内向,情绪不稳定,社会适应状况差,易患身心疾病。研究人员的结论是:D 型人最适应在组织中发展成功,而 B 和 E 型最不适合。

团队协作是近年来在任何组织中都一直被提倡的工作态度和求,高校也不例外。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教学工作上不仅需要与院系秘书、教务、学工等部门密切配合,还需要有积极稳定的心态对学生加以引导,科研工作上,任何重大的科研成果,都不可能仅仅由一个人独立完成,更需要集体的智慧、同事、同行间的相互交流与紧密协作,所以选录心理健康、性格外向、情绪稳定、能够快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新教师将为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高校选录新教师过程中,辅以 Y—G 人格测量,预先判断出不适合的 B、E 类型的候选者,将大大缓解今后这类教师人际方面的工作困扰,为广大教职工提供更为宽松与温馨的工作氛围。

二、师资培养需寻求个体差异

排除学校、学科与职务职称的限制,高校教师按其个人特长与工作偏重的不同,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教学型教师”,一类是“科研型教师”。不可否认,存在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俱佳的教师;但是对于大多数高校教师而言,由于个体差异,存在着对于教学工作或是科研工作二者之一的偏好。那么,高校对于教师的培养与培训,何不转变思路,不再一味强求教学科研的面面俱到,而是变“通才”为“专才”,因地制宜,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根据教师的偏好,培养教学型为主的教师和以科研型为主教师呢?

不同教师个体的差异,导致了高校“教学型教师”与“科研型教师”的并存。要对不同类型的教师做区别化的培养,重点是要准确判断教师的个性类型,以此为根据来决策是给予更多教育教学方面的培训还是给予更多学术研究方面的指导。近年来,大量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证实,5项人格维度构成了所有人格因素的基础。这5项人格维度为(1)外倾性,即个体对关系的舒适感程度。外倾者喜欢群居与社交;内倾者表现为内向少语。(2)随和性。高随和性的人是合作的、热情的;反之则冷淡而不受欢迎。(3)责任心。高度责任心的人是负责的、有条不紊的;而低责任心的人容易精力分散、不可信任。(4)情绪稳定性。情绪稳定性较好的人给人感觉平和而安全,较差的则给人以紧张、焦虑的感觉。(5)经验的开放性。开放性高的人富有创造性、具有探索精神;开放性低的人则很保守,仅对熟悉的事物感到舒适和满足。^{[3] PP. 173-179}此人格的五维度模型若能运用到教师类型的判断中,通过对教师个体行为的5个维度区分,相信对于寻求教师类型的差异会有很大帮助。实际运用中,高校可对教师个体的行为进行观察与总结,其中具有高度外倾性与经验开放性较低行为特征的教师,对于有着众多听众的课堂和重复次数高的教学劳动必定有着独有的偏爱,更适于培养成为“教师型教师”,成为教学能手、学生爱戴的授课教师;反之,个体行为中外倾性程度低却具备较高的经验开放性的教师,大体而言,则更适合向“科研型教师”培养,静下心来发扬探索精神与创造性,在学术上有所突破。

三、师资考评应兼顾教师情绪与心理

1. 巧设考评标准。情绪对行为的影响理论中,认为人情绪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人的活动能力与工作效率。实验证明,中等程度的愉快水平可以使智力劳动达到最佳的效果,如果兴趣和愉快结合起来,相互作用,能为智力活动和创造性工作提供最佳的情绪背景。此外,适度的紧张情绪下的工作水平较高,而身心完全放松和高度紧张情绪下的工作水平都较低。实验同时证明,焦虑使人的认知水平和操作效率下降;挫败感使人的行为变得冷漠、固执与退化。^{[4] P. 7}高校教师的工作,多为智力活动与富有创造力的工作,运用以上理论,我们可以把握设立自身教师评价体系的宗旨,即通过对教师的考核与评价,维持大多数教师中等的愉快水平,并努力将个人兴趣与工作的愉悦结合起来,以达到教学、科研劳动的

最优效果。运用以上研究成果,在设置教师的评价标准时,应把握好以下几点(1)为保持中等程度的愉快水平,优秀的评价标准不宜设置过低,同时,合格及以下的评价标准不宜设置太高,这样才可以保证大多数教师得到的评价不过悲也不过喜。(2)为了维持教师较高的业务水平,对于教师的考核标准应设置在使大多数教师适度紧张的水平线上,过低与过高都不能起到促进作用。(3)对于考核评价中落后的教师,应采用鼓励与关怀为主的引导措施,谨防引起其自身的焦虑与挫败感,导致恶性循环。

2. 调试心理契约。心理契约是组织与成员之间的一种相互期望,是一种心理理解与感知。高校与教师之间不仅存在着人才资源的契约,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心理契约。如果双方的期待和承诺得以实现,那么双方的心理契约关系就会持续下去。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感觉到已达成的心理契约没有实现,就会主动的改变心理预期,并发生行为上的改变,导致心理契约的违背。^[5]高校维持好教师间的心理契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保持政策的连贯性,特别是维持考核评价政策的连贯性。例如高校学术评价标准特别是核心期刊范围名录的年年调整,损害了不少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导致教师对于学校的心理契约的违背。(2)考评后的奖惩工作需照顾个体差异,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科、年龄、性别、职称教师间的差异因素。例如,文科在刊发学术论文上的难易程度与成果的时间周期上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奖惩也应差别化对待。(3)探索心理契约违背后的调试方式,倾听教师心理的诉求,满足教师合理的要求,以维持心理契约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 [1] 张德 吴志明. 组织行为学[M]. 长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 [2] Quenk , Naomi L . . EssentialsofMyers—BriggsTypeIndicatorAssessment [M]. Hoboken : John Wiley & Sons , Inc , 2009.
- [3] 汪重鸣. 管理心理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4] 陈兴淋. 组织行为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 [5] 田晶华. 心理契约在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中的应用[J]. 江苏高教, 2011(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高校办公室管理运行现状及创新初探*

戴海光

(江苏教育学院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宏观背景下,分析研究高校办公室管理运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大力推进管理创新,必须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队伍创新为关键、以载体创新为依托、以机制创新为保障,不断适应新时期高校行政管理需要和挑战,开创高校办公室工作新局面。

[关键词] 现代大学制度; 高校办公室; 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66-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高校办公室作为高校党政综合办事机构和工作枢纽,研究和探讨其基于现代大学制度背景下的运行现状和管理创新,对于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一、高校办公室管理运行的基本情况

1. 设置模式。

由于办学和管理体制的差异,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办公室的设置模式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一是单独设置校长办公室,另有党委办公室,其特点为“两块牌子、两套班子”,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

二是校长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合署或与其他机构合署(挂靠)办公,对外行使各合署(挂靠)机构的工作职能,其特点为“两(几)块牌子,一套班子”,除较为常见的校办与党办合署办公外,有些高校办公室还与网络管理中心、外事办公室、发展规划处、校友会(基金会)等机构合署(挂靠)办公。

三是党政合一,将校长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合并为学校办公室或党政办公室,其特点为“一块牌

子、一套班子”,如北京林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前我国高校办公室存在以上3种不同类型的设置模式,但校长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从“分设”到“合署”直至“合一”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一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设置模式已为很多高校所实施。这种高校内部体制改革的现实走向,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部门整合与职能整合相统一”的发展趋势,也符合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内在需求。

2. 内设科室。

一般来说,高校办公室主要设置以下或设置其中部分科室:行政科或综合科(负责领导勤务、文件运转、印章管理、报刊收发、对外联络、车辆调度、办公资产管理等工作)、秘书科(负责党政文件、领导讲话、请示报告、会议纪要等各类文字材料的起草修订等工作)、接待科(负责会务安排、来电来访接待等工作)、信息科(负责有关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和年鉴、简报、通讯的编撰等工作)等。由于合署(挂靠)单位的不同,有些高校办公室还设有专司网络信息审核和发布、外事联络与服务、发展规划起草与修订、校友接待与基金会事务、办公自动化系统维护等工作的科室或部门。有些高校办公室尽管没有设置

*[收稿日期] 2011-01-15

[作者简介] 戴海光(1981-)男,江苏滨海人,江苏教育学院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文秘科科长。

具体科室,但会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岗位人员分工,如文字秘书、行政秘书、机要秘书、档案员、文印员、信息员等,各岗位在办公室主任的领导下,完成各自工作职责的同时更加强调团队协作、相互配合,总体上形成“分工不分家”的办公格局。

3. 工作职能。

高校办公室主要具有以下3项工作职能:

一是综合协调职能。这也是办公室作为区别于其他职能部门的重要特征。办公室既是一个具体办事部门,更是高校“综合协调的核心部门”,其业务范围的界线有很大的模糊性。在学校内部,很多工作都需要办公室作为牵头单位,统筹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协同办理。

二是管理服务职能。为教学、科研一线服务是办公室的工作宗旨。学校重大会议、活动的组织安排,各类公文的运转和印章的管理,学校的对外联络等等,这些琐碎、复杂、个体的事务性、服务性工作构成了办公室工作的主体。

三是决策参谋职能。办公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好领导的“左右手”,协助领导处理日常事务,为领导科学民主决策承担信息源和参谋库的角色。

二、高校办公室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以科层制为基本架构的高校行政管理体系中的一环,办公室同其他部门一样容易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1. 囿于条条框框,工作活力不够。

受限于等级严格的组织层级,办公室工作有时会被动地等待领导批示或按照既往的规则和习惯行事,办公室人员成为机械的执行者,办公室缺乏民主氛围,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很好地体现。

2. 部门利益至上,协调效果不佳。

学校内很多工作需要办公室的牵头协调下通过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但在实际工作中时常会有某些部门只看到自身利益而忽视学校利益、只强调职责分工而忽略协同配合的现象发生,这给办公室行使综合协调职能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和压力,统筹协调效果也大打折扣。

3. 事务工作繁重,行政效能不高。

办公室作为上传下达、下传上达的枢纽和桥梁,对上要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和决策完成有关任务,对下要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进行统筹协调,事务

性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信息调研和决策参考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在一些高校,校讯通平台、内网办公系统等信息化办公手段尚未得到有效应用;“文山会海”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行政效能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4. 管理理念滞后,创新意识不强。

在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管理工作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办公室工作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必须具备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但在工作中少数管理者视野狭窄,大局观念不强,办公室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被长官意志所替代,权力意识清晰,权责观念模糊,缺少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忽视管理的服务功能。

以上几方面既有客观存在的体制弊端,也有主观存在的问题,这些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高校办公室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三、高校办公室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要进一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和挑战,应当从理念、载体、队伍、机制等方面着手,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队伍创新为关键,以载体创新为依托,以机制创新为保障,大力推进高校办公室管理创新。

1. 以理念创新为先导。

管理理念决定高校办公室管理的方向和态势以及职能的拓展和强化,对办公室管理运行的其他要素起着制约和引导的重要作用。办公室工作水平的高低,不仅与管理手段和管理技术密切相关,更离不开管理人员思想观念上的创新。

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进一步强化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工作意识,严格遵循“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教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宗旨。在实施管理工作过程中切实贯彻人本管理的思想,把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利益放在心上,切实为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办实事。

二是树立和谐理念。通过对学校党政事务的统筹协调,从而实现对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对物的资源的有效整合、对人与物关系的理想协调,以达到最佳的运作状态与管理效益。

三是强化责任意识。始终牢记办公室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牢记领导的信任和教职工的重托,把思想集中到干事业上,把精力凝聚到办实事上,把功夫施展到抓落实上,兢兢业业地完成任务,卓有成效地履行职责。

2. 以队伍创新为关键。

办公室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管理运行的效率和质量,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办公室管理队伍,是推进管理创新的关键。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并不是指管理人员数量上的增加,重点在于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一是组织管理人员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高校规章制度,强化法制意识,提高政策水平,使办公室管理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制度齐全,纪律严明。

二是加强管理人员专业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引导管理人员提高管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以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建立健全管理人员定期轮训制度,支持管理人员到兄弟院校和有关单位进行进修学习和工作实践,鼓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三是改善和优化办公室管理队伍的学历、年龄和能力结构,积极鼓励中青年管理干部在职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提升学历水平和综合素养,使办公室管理队伍逐步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迈进。

3. 以载体创新为依托。

推进办公室管理创新,需要按照巩固和提高已有载体、拓展和创造新型载体的目标要求,加大力度推进电子政务在办公室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实现办公室工作适应性的不断提升、覆盖面的不断扩大、操作性的不断增强。

一是构建全面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强化服务协调职能。充分利用校园内网办公系统、校讯通、校长(书记)电子信箱等途径,推进办公室信息化建设,构建新闻通讯、文件运转、会议通知、网上信访等信息管理平台和与校内其他部门互联互通的办公信息资源库,将管理人员从繁重的文件、会议和指令中解放出来,进一步节约办公资源、提高管理效能。

二是构建科学高效的信息分析系统,强化决策参谋职能。办公室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基础上,应及时把握国家方针政策与高等教育动态,加强信息调研和工作研究,建立信息分析系统,强化对信息的收集甄别工作,提高信息的共享性、流通性、层次性,积极为领导的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有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4. 以机制创新为保障。

推进办公室管理创新,必须高度重视内在机制建设。

一是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整合。积极顺应“简约化、扁平化”的高校组织结构发展趋势,推进高校党委办公室与校长办公室由“分设”或“合署”逐步向“合一”模式发展过渡,建立更加综合高效的高校党政办事机构,同时依据职能对内设科室进行重新整合和科学设置。对于合署(挂靠)单位过多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整合其合署(挂靠)单位,成立新的独立的职能部门,以减轻办公室工作负担。

二是强化协调合作机制。办公室内设科室虽分工不同,但共同目标都是保障办公室各项工作有序运行,在涉及学校和办公室中心工作时,各科室应群策群力、团结协作,确保思想一致、步调一致。出现问题时,各科室不能互相推诿,应协商解决。

三是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健全完善绩效考核评估办法,对管理人员的思想品德、管理能力、工作积极性和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同时还要收集各院系、部门对该行政人员平日表现的反馈意见进行综合考评,使管理人员有章可循、依章履责、违章必究,从而使行政管理目标清晰、责任明确、制度齐全、纪律严明,进一步促使管理人员增强责任心、发挥积极性,为高校各项事业改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 陈晓姿)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高校校园治理与纠纷解决新机制*

吴 峰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 江苏南通 226010)

[摘要]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校园的支撑。面对日益增长的高校校园纠纷, 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已不能适应高校办学发展需要。本文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 在对高校校园纠纷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对当前高校校园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 并建议在高校引入人民调解制度。以人民调解方式解决高校校园纠纷, 不但可以推动高校依法治校水平的提升, 也可以促进高校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 和谐社会; 高校校园管理; 纠纷解决机制; 人民调解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69-03

当前, 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高校作为培养、教育社会各方面人才的专门机构, 所面临的校园纠纷也在逐步增多。而校园纠纷解决机制的单一、失灵等缺陷,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稳定。调解作为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 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 它是人类合目的性的需要。^[1]因此, 在大学校园引进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机制, 有助于及时化解学生之间、教职员工之间, 以及学生、教职员工与学校之间的各种矛盾纠纷, 推进和谐高校社区建设; 同时还有利于推进“平安创建”这一系统工程的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

一、高校校园和谐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越发凸显。与此同时, 高校在校园管理中所面临的社会争议也此起彼伏。高校作为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因子, 其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能否顺利解决, 不但关乎高校自身校园的和谐, 而且还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和谐。因此, 促进高校校园的和谐稳定, 既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高校促进和

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1. 高校校园的和谐稳定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

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高校始终担负着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 因此“教书育人”是其根本任务。而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高校校园的和谐稳定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因为只有校园和谐稳定, 才能为大学的学习和成长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同时, 也只有校园的和谐稳定, 才能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提供一种制度和精神上的保障。

2. 高校校园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培育和谐文化。

高校在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直接起着引领社会发展与文明的重要作用。高校是大学生作为“学校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校期间, 其所接受的文化熏陶对其以后走上社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 通过加强和谐校园建设, 促进高校校园的和谐与稳定, 有利于在高校内部培育和养成深厚的“和谐文化”, 从而对和谐社会文化的构建产生能动的促进作用。

3. 高校校园的和谐稳定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建设和谐社会, 离不开人才, 更离不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因此高校作为面向社会、依

*[基金项目]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重点课题“‘大调解’背景下高校校园纠纷解决机制构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HYKJ/2010A04)。

[收稿日期] 2011-02-28

[作者简介] 吴峰(1980-), 男, 江苏通州人,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

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承担着为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重任,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负有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和质量责任。”并且高校还“直接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2]建设和谐校园、确保高校的和谐稳定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有利于从深层次上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

二、影响高校校园和谐的因素

诚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但应当是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安定有序的社会。^[3]因此,和谐校园也不是没有纠纷和矛盾。但和谐的校园应当是矛盾与纠纷能够在冲突与协调的过程中趋向统一,是通过一定的机制使得纠纷得到妥善、有效的解决。因此,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基础。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我国公民的法律素养与权利意识也普遍增强。而随着高校的持续扩招、办学规模不断扩大,“高校与社会之间人际活动频繁,因此校园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校园化的情况时有发生。”^[4]这些校园纠纷能否妥善解决,事关高校校园和谐与稳定的大局。

1. 行政型纠纷。

所谓行政型纠纷,是指高等院校在进行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校内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与校内的师生员工所发生的纠纷。由于该类纠纷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属于或类似于行政法律关系,因此,笔者将此类纠纷统一归类为行政型纠纷。在该类纠纷中,当事人的一方为高校,另一方为师生员工。由于高校依据法律规定或国家授权而掌有一定的公权力,因此纠纷的当事双方实际处于一种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在实践中,此类纠纷又可以细分为高校教育行政纠纷和高校的内部行政管理纠纷。其中,高校教育行政纠纷主要是涉及高校在学生的学籍管理、学位授予、毕业资格认定等方面;高校的内部行政管理则表现在教师职称和职务的评聘、学生的日常管理以及学校改革(如:人事制度改革、教学改革)等方面。

2. 民事型纠纷。

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国绕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所产生的争议。该类纠纷一般发生在教师或学生之间、师生与学校(含学校相关部门如教务部门、后勤部门等)之间,有时亦有可能发生在学校与学校所处的社区之间。尤其是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民事纠纷最为常见。特别是随着高校后勤管理和服务设施的社会化改革进程的推进,围绕学生的住宿、饮食、医疗以及日用

品交易所发生的纠纷与日俱增。

3. 学术型纠纷。

这类纠纷是因高校在学术活动或者与教学活动相关的场合行使学术权力、实施学术行为与学生及教师发生的纠纷。众所周知,高校的学术管理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学术活动与学术管理也是高校和科研机构里所特有的现象。而围绕高校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活动的开展,发生的纠纷也与日俱增。其中,有发生在高校与学生之间关于专业课程设置、开课时间等教学内容的安排、学生的成绩评定、论文水平认定等方面的,也有涉及教师科研成果的认定以及专业学术评价等方面的。

三、现有高校校园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

1. 现有纠纷解决机制。

就当前的法律规定和高校的校园纠纷解决实践来看,高校校园纠纷解决尚不存在一个完整统一的解决机制。据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而且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时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而根据《教师法》的有关规定,教师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也有权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申诉理由,请求处理或重新处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师生与高校之间发生纠纷时,法定的维权渠道有两种:即教育申诉(主要是围绕学校的人事管理、学籍管理、学校行政处分等学校的内部行政管理行为向学校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诉)和提起诉讼(主要是围绕教学管理、后勤管理等学校的教育服务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或民事诉讼)。而对于高校校园内存在的一般民事型纠纷,就只能参照国家在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进行权利救济。在学术型纠纷方面,由于学术问题的专业性,无论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是法院,对此类都望而止步,不存在一种行之有效地争议解决机制,因此社会根本无法对高校的学术管理行为实施外部监督。

2. 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

如前所述,无论是高校校园内部的行政纠纷、民事纠纷还是学术型纠纷,目前均不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手段。在行政型纠纷方面,由高校对学生、教师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而现存的教育申诉制度虽然立意很好,但却因过于简单、笼统而收效甚微。例如,制度设计上存

在缺陷,缺乏正当程序;在执行上,由于受理申诉的行政机关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纠纷的解决公正性无法获得社会认同,从而无法对高校形成实质上的监督。“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教育行政救济制度申诉、复议、诉讼等存在脱节现象,并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机制。”^[5]而在实践中,通过人民法院解决高校教育行政型纠纷同样面临法律依据严重不足问题。行政诉讼作为相关纠纷的解决方式只是实践中的一种尝试,至今仍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在民事型和学术型纠纷的解决上,校园内部解决机制欠缺,主要依靠调解和诉讼两种方式。所谓调解,即是由学校或相关行政部门组织相关人员组成调解委员会,对师生因民事权利遭受损害要求赔偿时进行调停。虽然这种方式具有程序灵活、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但由于实践中这种民间调解缺乏终极的法律效力,而且我国高校都没有建立规范化的调解机构,也没有制定配套的调解规则,导致调解机制无法落到实处。因此,不少高校校园纠纷最终不得不上司法诉讼之路。这也是近年来涉及高校的诉讼案件日渐增加的重要原因。

诚然,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也认为,任何人当认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有诉诸法院的权利。长期以来,受纯粹的法治主义思潮影响,我国存在着迷信诉讼、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倾向。^[6]但是笔者以为,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也不是所有的矛盾纠纷都适合以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而且,“对人们的思想、情感、认识、信仰以及学术争议等问题,采用法律手段强行干预是不适宜的。那种近乎偏执的、不切实际地夸大法律功能的观点,不仅导致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而且会在实践中产生破坏性和负面效应。”^[7]某些情况下,这种冲突还会因国家(或社会)强制力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8]此外,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当事人双方不仅要为此投入大量的精力,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因此,无论对于高校,还是校内的师生员工,诉讼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因此,在高校校园内建立起一套具有专业性、中立性和综合性的法治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高校校园的和谐与稳定,就显得极为迫切。

四、建立高校人民调解机制

众所周知,“调解是一种传统的非诉讼程序。”^[9]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无讼”思想,老百姓心中普遍存在着“厌讼”情绪。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不但形式上比较灵活、成本低,

而且由于纠纷的解决是建立在纠纷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纠纷解决后当事人之间依然能够和睦相处,因此,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成为我国诉讼外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在预防和解决民间纠纷,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和缓解诉讼压力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大调解”运动的普遍展开,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在此背景下,鉴于当前高校校园纠纷解决机制所存在的弊端,国内部分高校也顺应“大调解”的历史发展潮流,对高校校园人民调解机制的构建展开了积极探索。比如,浙江万里学院、青岛黄海职业学院以及上海商学院等国内大中专院校就先后在校内建立了调解中心或人民调解组织,对校园纠纷进行调解,并且取得了积极地法律和社会效果。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校园纠纷的特点与人民调解制度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建立高校校园纠纷的人民调解机制,不但有助于高校校园纠纷的妥善解决,有利于维护高校校园的和谐稳定,而且还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为法治校园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更能够在深层次上提升所在高校依法治校的工作水平,并将有助于在深层次上促进高校校园的和谐稳定,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 [1] 胡旭晟,夏新华.中国调解传统研究——一种文化的透视[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
- [2] 邱祖发.高校人才培养与和谐社会构建[J].人民论坛,2010(2).
- [3] 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东方经验:人民内部矛盾的“大调解”[J].求是,2010(15).
- [4] 鄢永慧.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和谐高校校园建设[J].世纪桥,2010(15).
- [5] 谈玲,李煜兴.我国高校教育纠纷解决机制探究[J].法制与经济,2008(12).
- [6] 陈奎,黄筱蓁.沟通与平衡: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另一种建构[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5).
- [7] 秦惠民.构筑化解高校纠纷的完善机制[J].中国高教研究,2004(4).
- [8] 徐昕.纠纷解决与社会和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 [9] 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光 翟)

关于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

吴蓉蓉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0)

[摘要]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专业,需结合当今社会对现代物流管理人才的市场需求,对人才培养进行明确的定位,分析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探索有益的教学改革方案,着力构建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 高职教育; 物流管理; 实践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72-0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加入WTO,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物流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我国的物流专业起步较晚,物流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暴露出我国物流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难以适应现代物流业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因此,培养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能型人才迫在眉睫。面对机遇和挑战,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必须准确定位,以培养物流企业或企业物流部门一线操作人员与基层管理人员为目标,将能力训练和实践操作作为物流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实训室和实习基地的建设方面加大投入,这也是物流管理专业建设的主要方向。

一、物流管理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分析

现代物流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原因是现代化大生产与个性化需求之间需要流通环节的衔接。当今企业的竞争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企业原材料的及时供应、产品的分销都要借助于强大的物流输送能力,这为物流专业人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1]面对广阔的发展前景,高职院校理应将物流管理专业作为主攻方向,针对相关人才的市场需求,做好物流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定位。

1. 物流人才的培养结构。根据物流系统各环节的任务组成与岗位设置,从大的分类看物流业需要3

种人员:一是战略及规划人员,二是管理人员,三是一线操作人员。第一类人员需要大量的专门知识与相当的研究能力,属于研究生培养范围。第二类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与系统思考能力以及沟通协调能力,属于本科与应用型研究生培养范围。那么高职物流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应如何定位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是物流各业务环节的操作人员,进而提升到基层管理人员。这一层面应充分体现出高职培养技能型、综合型人才的特点。

2. 高职物流专业人才的能力构成。高职人才培养与本科教育不同,非常注重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与熟练的操作技能并上升到初级管理的水平,亦即着重培养操作型、实用型人才。具体而言,高职培养的人才应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与人沟通与表达的能力和不断学习的能力等基本能力之外,更应具备专项能力即以物流系统的基本流程为依据,熟练掌握存货、补货、理货、运输、配送等各环节的业务操作能力,并且应体现出应有的规范性与专业化水准。此外,应具备初步的管理能力与方案设计能力。^[1]

二、现阶段物流专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21世纪人才要求相比,现阶段物流专业教育大多存在以下问题:

1. 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没有突出实践教学体系

*[收稿日期] 2011-02-21

[作者简介] 吴蓉蓉(1981-),女,安徽铜陵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的整体规划性。通过对物流管理专业教学计划的分析,我们发现存在如下一些缺陷与不足:其一是在教学计划层面上没有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规划,在课程体系的安排上基本是采取以理论课程为主,把理论和实践部分合成一门课程,进行课时分配。事实上,这种设置仍是沿袭原来的教学模式,虽然按照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对专业教学计划做了修订,增加了实践教学的比重,但整个实践教学体系没有相对独立出来,从横向来看,是依附于理论课程,从纵向看,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只是单纯的、分割的实践教学环节。其二是课程设置不够科学,对课程开设缺乏研讨,存在着课程设置定位不当、课程内容重复或脱节等现象,造成学生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不能应用用人单位的要求。受师资和实践教学等教学资源的制约,在制订和修改教学计划过程中存在因人设课、依现有条件设课的现象。其三是大多没有实践课程的教学大纲,仅有的课程教学大纲仍沿袭学科教学方式,在教学内容和要求上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育,实践教学内容偏少。^[2]

2. 教学仪器设备投入不足和校外实训基地模式单一。实践教学资源不足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缺乏实践教学指导老师,特别是缺乏具有高学历、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物流人才;另一方面是缺乏构成实践教学内容的软件与硬件资源,即真实的物流实践活动、物流实践的相关环境。相对于其他管理类专业,物流管理专业对实践场地、物流技术、设施设备等的要求需要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因此,校内实训基地教学设备投入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充分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为解决实践资源缺乏的问题,许多学校也加强了同企业的联系,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但校外实训模式比较单一,大多企业只是接受学生毕业实习或参观,无法满足岗位技能训练的需要。

3.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过于传统,缺乏创新。目前很多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师在教学中更多地沿袭了学历教育的教学方法,偏重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实际上是缺乏实践教学资源的一种无奈之举。作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毕业实践课程,缺乏有序组织和专业指导,只是让学生自己联系单位实习,这种“放羊式”的实践教学方法无法保证教学质量。^[3]在教学手段上缺乏现代教学手段和现场教学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如在讲授《物流配送与仓储管理》课程时,教师尽管在黑板上不断地画出并讲解现代物流仓储业务流程管理,但这样学生不仅不能理解仓储管理理论,更不能演练现代物流仓储业务流程管理

技能。

三、建立合适的物流实践课程体系

实践课程体系设置是实现实践能力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课程的设置大致应包含3个层次,见表1。

1. 基础性实践。基础性实践主要包括计算机基础操作、电子商务模拟和网络应用等内容,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电子商务应用技能和网络操作技能。同时,在掌握这些技能的过程中,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课堂演示和上网浏览进行认识训练,让学生能够直观、感性认识并拓展物流方面的专业知识。基础性实践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演示实验、课程设计等方式,由教师设计具体的教学方案,在课堂上完成实践教学任务。^[4]另外,学生还可在基础性实践中参加相应的认证考试,如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认证等。

2. 专业实践。专业实践是学生在在校期间所完成的校内、校外实验实训操作,主要培养学生对物流各类活动的专业基本技能和专项技能,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是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核心。其中专业基本技能主要包括各种物流设施设备的操作,采购、运输、仓储、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国际货代、报关等基本物流业务操作和物流信息技术的应用技能,这是专业技能的基础,专项技能包括采购、运输、仓储、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国际货代、报关、物流信息技术应用等技能,是学生在社会不同岗位上应具备的职业技能。^[4]

校内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在一定的课堂教学或模拟实验环境下进行物流各个环节的流程操作和物流技术应用,主要包括案例教学、设施设备的应用与操作、物流信息技术和物流软件应用等内容。其中案例教学主要由任课老师提供具体的实际案例,联系理论教学内容进行案例分析,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物流设施实践主要是面向一线生产的操作训练,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充分了解物流行业中基础运营设备的使用;^[5]物流信息技术是物流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物流技术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通过对EDI技术、GIS/GPS软件、无线射频技术等演示与操作,以及条形码、标签的制作等,可以让学生认识和理解一系列新的物流理念和物流经营方式,提高学习物流管理知识的兴趣,物流专业软件实习则主要结合专业主干课程作专题实验,旨在巩固所学知识,熟悉采购、仓储、运输、配送等物流各环节的操作及其流程,为建立整体物流概念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物流是一个涉及诸多参与方协同工作的系统工程,仅凭理论知识和单个环节的操作很难理解

和把握整体的运作,物流综合软件操作就是把整个大物流系统连接起来,从订货、采购、仓储、运输、配送等全过程分岗位完成模拟的物流运作流程和单据流程,提高学生的物流实务操作技能,把握完整的物流概念,为今后能快速适应职业岗位要求作好充分准备。[6]

校外实践教学是校企合作、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认识实习、专业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等3个阶段。其中认识实习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本专业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本专业所涉及领域和岗位有一个感性知识,初步训练专业基本技能,为学习专业课奠定良好的基础;学生参加专业生产实习,可以对物流设施设备及其结构、性能、特点进行全面了解,学习物流技术、物流管理知识,通过学习方案的分析和比较,验证、巩固和深化所学知识,拓宽知识面,并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事业心、责任感。

3. 应用创新实践。应用创新实践主要包括物流案例分析实践和物流方案设计实践两个内容,着眼于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锻炼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利用所学的知识 and 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自学能力,使学生获取更多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应用创新实践可采用案例演示与分析、课外实习、课程设计、职业资格认证等多种方式组合来完成[4]。案例教学是专业教学中的一种重要的教学方式和手段,通过案例演示和分析,使学生能够深入地了解物流运作的实际情况;教师要制定一定的实践教学方案,引导学生参与课外实习训练;在应用分析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完成一项具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的设计,并能撰写方案策划书等。此外,还应鼓励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使学生取得“助理物流师”、“物流师”或其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物流方案设计实践可通过毕业课程设计的形式来实现,是学生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毕业实习,学生不仅能根据毕业设计(论文)题目,进行专业调查,搜集毕业设计(论文)资料,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物流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熟悉物流业务知识,提高实际动手能力,并在对企业的调查研究中培养发现问题、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从事职业岗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表1 物流管理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结构

实践环节	实践环境	教学内容	时间
基础实践	基础实验室	计算机基础操作、电子商务模拟、网络应用	第1-2学期
专业技能实践	专业实验室 实训中心	案例分析 物流设施设备:叉车、条码扫描器、自动货架等 物流信息技术:EDI、GIS/GPS、RFID 无线射频技术、条形码等 物流专业软件:仓储、运输、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等 物流综合软件:ERP等	第3-5学期
	校外实训基地	校外实践 认识实习 专业生产实习	第1-2学期 第3-5学期
应用创新实践	校内、外实训基地	案例分析 实践 方案设计 实践 采购、仓储、运输、配送、第三方物流、国际物流等 毕业课程设计	第3-5学期 第6学期

[参考文献]

[1]张睿.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仓储配送方向的教学方案研究[J]. 职业教育研究, 2007(6).
 [2]苟建华. 校企共建高职物流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探讨[J].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4).
 [3]莫高兴, 张尔利.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讨[J]. 高教论坛, 2006(5).
 [4]朱鼎勋, 邓永胜, 沐林英. 构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J].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6).
 [5]周勃, 张微. 面向工程实际的建筑设备专业实践教学平台体系的构建[J]. 高等建筑教育, 2009(6).
 [6]雷鸿斌. 对高校实践教学的探索与研究[J]. 科教文汇, 2009(12).

(责任编辑 光 翟)

夹缝岁月中的文学写作*

——重提《还魂草》

韦丽华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 1960年代前期,小说《还魂草》的创作及其随后的被批判过程,典型地体现出特定年代文学的谨慎与艰难。文学在时代的夹缝中努力表达自身,而变化的形势却更能左右文学的命运。同时,对《还魂草》越来越升级的粗暴批判也预示出文化暴力时代的即将到来。

[关键词] 《还魂草》; 夹缝岁月; 阶级斗争; 文学经验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75-06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安徽文坛上,曾经有过轰动一时的“《毒手》《报告》《还魂草》”“三大事件”。如今,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的意识形态氛围已经流散,其间的是非问题亦是一目了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事件时,我们或许可以有着超越是非之上的特别发现。比如在对《还魂草》的创作及批判的考察中,我们得以清晰地感受到特殊年代中的文学特别的困顿和尴尬。

一

《还魂草》是安徽作家江流的一个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安徽文学》1962年第5期,后收入作者的小说集《龙池》中。《还魂草》讲述的是解放前江南某地深受血吸虫病之苦,解放后新政府帮助人们战胜疾病的故事。小说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元宵节”,江南翠村高氏家族开祠堂议事,鉴于30年来村里男丁纷纷得“大肚子病”死亡的事实,族长宣告更改“杂姓之人不准进庄”的族规,允许收养伢子改为高姓以延续宗族繁衍。时年35岁的女主人公杨丽鹃在守寡20年后领养了北方逃难来的一对双胞胎小兄妹,并给他们更名为“高子君”、“高翠花”,同时又留下了他们的父亲并与之结为夫妻,丈夫改高

姓更名为“高韵德”。两年后,就在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以及新纳人丁的翠村人幸福平安地生活着的时候,“大肚子病”再次降临这个村庄,常下水田的男人们接连身亡。高韵德虽然没得病,他却在为根除怪病而“扒碣除怪”的村庄械斗中丧命。再次守寡的杨丽鹃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两个孩子的成长,直到儿子成家支撑门户,女儿长大乖巧美丽,而这已是又20年过去了。随着“大肚子病”的不断蔓延,巨大的灾难再次降临到杨丽鹃身上,儿子、儿媳、女儿全部染病,而这时,又有一个老奸商趁火打劫要重聘高翠花为续弦。在“难于避免的死的威胁”和“无法洗雪的生的耻辱”中,心如死灰的杨丽鹃终于迎来了新时代的来临,“现在是民主政府了”,政府派来的医疗组向村民解释“大肚子病”的来源,告诉他们这叫“血吸虫病”,并且医治好了高翠花以及高子君夫妻。小说的结尾是,当高家的新一代在两年之后的一个春天的黎明降生的时候,历尽劫难的杨丽鹃冲到祠堂门口,在想象中,她敲响了那口象征权威的古钟。而就在她骄傲地扯起的绳头上面,那“高高升着”的,其实是一面“鲜艳的红旗”。

小说的现实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防治血吸

*[收稿日期] 2011-05-05

[作者简介] 韦丽华(1971-),女,安徽临泉人,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虫病”本身就曾经是新中国50年代中期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大规模的群众卫生运动,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发出指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国务院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8年10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直接表达了对消灭血吸虫病的欣喜之情和豪迈信心。小说《还魂草》发表于1962年,虽然我们现已无从据实考证作者当时的创作启发、创作意图,但小说以血吸虫病带给一个普通农妇一生的磨难为故事的主导性线索,通过其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表达对新政府的热爱,这种取材显然是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小说在写到解放初期血吸虫病依旧肆虐时,更是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这也足以说明小说与现实极为密切的联系。

当然,这里指出作家创作的现实关联,并不是就意味着说这篇作品是作家对现实的简单图解。实际上,作品始终以村妇杨丽鹃的不幸命运为中心,作家的笔触始终紧贴着杨丽鹃的个人生命、情感和内心世界,并不曾有太多的游离,因此,作品的艺术性也是毋庸置疑的。而这里,本文所主要的考察意图是作家创作的现实关切,以及这种关切在特别的时代形势下所带给作家特别的个人遭际。

就在这里,我们又有了另外的发现和推论。

小说《还魂草》最初发表于1962年第5期的《安徽文学》上,是年《安徽文学》为双月刊,逢单月1号出版,因此《还魂草》最初面世的时间当是1962年9月初。而其具体创作时间则没有在当期发表的小说中体现出来,我们是在江流于1983年出版的小说集《龙池》中发现的。《龙池》共收录江流小说11篇,在最后一篇《还魂草》的末尾,作者标注道:“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完稿。”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标注,因为在《龙池》的“后记”中,作者回忆20年前的《还魂草》时依然不胜唏嘘,特意声明自己是把它“一字不改地收进这个集子”的,因此,这个相较于当初发表时所特别多出来的关于完稿时间的说明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了。关于这一完稿时间的特别标注,现有的文字资料已无从确证它究竟是当初发表时为编辑所删,还是作者20年后根据回忆的特别添加,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据此推测作品完成时间当是1962年2月初。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还魂草》当于1961至1962年间创作并完成于1962

年2月,而发表于1962年9月。

而2月和9月对于1962年来说却是两个有着特别意义的月份。

在新中国历史上许多个重要的年份中,1962年本身就显得特别不同寻常,或如研究者所言“1962正是处于中国当代两次重大政治事件(大跃进和文革)的夹缝之中”(11P.3),而2月和9月则分别密切关联了这两次“重大政治事件”。1962年1至2月间,中共召开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这就是《还魂草》文末所特别提到的“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的背景下召开的,在这个汇集了党的几乎全部政治精英的大会上,刘少奇作了主要报告,对“大跃进”以来的困难形势进行了分析、总结,并由此展开关于党内民主的积极讨论。会议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惨痛的大饥荒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停止的;同时,会议也显示出了党的领导层在思想认识方面的重大裂隙。而在1962年的9月底,也就是《还魂草》面世后不久,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透露了不断激化的党内的分裂和矛盾,毛泽东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批判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于是,在此后不断激进的阶级斗争中,当代中国终于走向了“文革”十年。

由以上简单的介绍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还魂草》的现实关切还远不止它的题材涉及血吸虫病防治这一当时的时代政治性的卫生运动,更在于它对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的把握和关涉,那就是对当时“大跃进”之后持续的“困难时期”的文学性眺望。由文末所特意标注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完稿”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更为深沉内在同时也更为热烈的现实情怀。小说《还魂草》极写女主人公杨丽鹃所遭受的磨难和痛苦,早年因“冲喜”而嫁人并青春守寡,中年再遭丧夫打击,老年时子女儿媳全部染病……“大肚子病”如同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头顶,随时会给惶惶不安中的人们带来灭顶之灾。这种来自自然的巨大的灾难以及死亡的大规模降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尚未完全摆脱的大灾难、大饥荒,它在当时也曾被宣传为“三年自然灾害”。这里我们还想提到的是,在目前所仅见的很少量公开的江流的日记中,我们读到了1961年关于“饥饿”的刻骨记忆。而至于《还魂草》文末标注所提到的“七千人大会”,我们知道,那是有着著名的关于“天灾”“人祸”和“三分”“七分”的争论的。同时,在

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认为《还魂草》是机智的,它在“大肚子病”这一来自自然的灾难上面,加上了人的无知愚昧的因素;“冲喜”、“扒碣除怪”、械斗等等都是对于灾难的人为的加重。由此,在《还魂草》那里,深刻体现出了作者强烈而深沉的现实政治情怀。

这里必须要提及的,还有就是1961年、1962年间文艺政策的调整。“大跃进”所带来的巨大的现实危机迫使形势不得不在60年代初实行全面的退却式的调整,在文学方面,随着一系列文艺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文艺八条”的出台,国家对文学的控制也在事实上有所减弱,因此,在6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了短暂的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尝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批历史题材的戏剧、小说创作,如曹禺的《胆剑篇》、吴晗的《海瑞罢官》、陈翔鹤的《陶渊明确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乡》等;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文学现象就是杂文的创作,主要有邓拓的《燕山夜话》专栏,以及邓拓与吴晗、廖沫沙一起以“吴南星”为笔名开辟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但是,也正是这种对历史题材和杂文体裁的偏好,更加清楚地显示出特定时期文学的谨慎和热情。对此,文学史学者洪子诚认为:“由于年龄、阅历、知识结构、职业特点诸种因素,又可能是接受了几年前的历史教训,和当时文学界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提倡(现实生活的严重问题,使作家感到难以表现,文艺界遂提出对历史题材的开拓),这些作家的创作(小说、戏剧、杂文等),大都不是直接接触及现实生活,它们从历史故事、传说等取材,来融入作家的现实评价。这种创作现象,可以称为象征性或影射性的叙述。”^{[2] P. 144}

或许,如洪子诚所言:“由于年龄、阅历、知识结构、职业特点诸种因素”,相对于此期的历史题材创作以及杂文的写作而言,江流的小说《还魂草》或许并不具备强烈的“象征性”或“影射性”色彩。首先,它是显而易见的现实题材的创作,新旧时代的对比明显是为了凸显当时的新时代意义;其次,它的明确的题材内容——“血吸虫病危害与治疗”,以及它的同样明确的主题倾向——“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使得它更有理由被视为是一篇“歌颂式”的而非“批评式”的小说创作。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还魂草》其实更是内在地蕴涵着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曲折发言,虽然这种发言并不具有批判性,如同当时的一些以“卧薪尝胆”为主题的历史剧一样;甚至是配合调整方针或鼓动人们的精神

力量^{[1] P. 22}。但是,形势发展的急剧变化,以及作品自身所特有的艺术上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使得《还魂草》甫一面世便迎来被批判的厄运。

二

关于《还魂草》的批判,在“文革”结束以后,有评论者说它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围剿”;被列入文联三大问题之一^[3]。多年以后,当时负责《安徽文学》评论工作的老编辑苏中在回忆文章中对此有着更进一步的说明:“加上江流的小说《还魂草》又作为鼓吹人性论的典型而重新提出来,于是就形成了安徽文艺界的《毒手》《报告》《还魂草》三大事件,在报刊上大举批判的同时,领导上又委派了庞大的工作组进驻省文联,以停止工作、停办刊物的大动作来进行所谓的文艺整风(后又改称四清)。”^{[4] P. 6}而根据资料查阅和研究,我们发现,关于《还魂草》的批判明显分为1963年和1964年前后两个阶段,1963年的批判基本还可视为文学范围内的观点之争,而1964年的批判则显然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围剿”了。

《还魂草》的批判无疑是和1962年9月份以后的形势发展密切相关的,因为在大量的批判文章中,提到最多的就是《还魂草》的阶级性问题,主要认为《还魂草》只是写了自然灾害而没有写阶级斗争,而这和《还魂草》发表以后阶级斗争理论再一次被突出强调密不可分。“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由于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且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5] P. 12}就这样,《还魂草》恰逢其时,当时代政治由其创作时期的“调整”转向其发表时期的“狠抓”时,《还魂草》的被批判也就不可避免了。

据《安徽文学》1963年第3期的“来稿综述”中说:“参加讨论《还魂草》的来稿很多,到二月中为止,我们已收到四十多篇文章了。”^[6]《安徽文学》最初从1963年第1期开始发表评论文章,并于第1、2期连续开办《笔谈还魂草》专栏。从《安徽文学》来看,1963年上半年对于《还魂草》的讨论较为热烈,而刊物的态度似乎也有所倾向。虽然《笔谈还魂草》专栏同时发表对于作品的肯定和否定的文章,但总的来说,肯定的分量大于否定。两期专栏共发表评论文章7篇,其中肯定的4篇,否定的3篇;并且否定文章的措辞虽然较为严厉,但态度还算是比较诚恳的,没

有无限度地上纲上线。比如在《安徽文学》所发表的最早的一篇批评文章中,作者开篇首先就承认“《还魂草》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明确的,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在于“作品的客观效果与作者的主观意图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7]这种批评虽然比较牵强,不过可以看出,批评基本上还是控制在文学范围内的,更可视作为文学观念上的冲突。作家本人应该暂时也没有受到特别的冲击,因为在接下来的《安徽文学》第4期上还发表了江流的小说《三个短篇》。

正是由于时代政治的原因,此时的《还魂草》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作品的阶级立场方面。首先便是作品题材的选择以及题材中所体现出的矛盾关系的性质。“血吸虫病危害”在批判者看来更多的是一个人与自然现象的矛盾冲突,作家未能在这个矛盾冲突之上充分体现出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作品在相当严重的程度上脱离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纯然孤立地表现了血吸虫病对人的危害,以致使人们看到的仅仅是血吸虫在左右着人物的命运^[7];整个作品只突出地写了人与血吸虫的矛盾,……没有通过这个矛盾的叙写,更好地联系到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进而反映出时代的主要矛盾^[8]。由此,作品的时代环境书写受到突出责难,特别是作品写到的由于修改族规,翠村添丁进口,村庄呈现出短暂的兴盛繁荣;在这富饶的山区里,过着不愁吃穿的神仙似的日子”。这一点尤其令批判者恼火:“那么阶级矛盾、阶级压迫呢?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阶级剥削难道在翠村就从来不曾有过?”^[8]《还魂草》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呢?^[6]此外,作品中写到的血吸虫病肆虐之前的翠村“赛似金銮殿”,杨丽鹃有了丈夫和孩子之后其家庭生活“充满着融融的天伦之乐”,以及解放后当高子君夫妇和高翠花也染上“大肚子病”后一家人的愁云惨淡等等,也均被批评者认为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对阶级关系的掩盖。

其次,关于作品的主人公杨丽鹃的形象,批评者更为关心的也是其所体现出的阶级性问题。批评者主要认为,杨丽鹃形象的阶级性体现得较为含混,在她的身上看不出劳动人民所承受的阶级压迫和所蕴含的阶级反抗,因此,人物是不真实的,不典型的。“从杨丽鹃这个形象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血吸虫病这一因素对她的命运发生着影响。……生活告诉我们:即使是没有血吸虫病或诸如此类的自然灾害,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是不幸福的。因为,在旧社会

中,劳动人民的苦难,最根本的还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杨丽鹃并没有还魂草那样的生命力,在她的身上明显缺乏劳动人民对于生活的反抗意志^[9]。同时,在批评者看来,时代的发展变化也没有在杨丽鹃身上体现出应有的阶级意义来。小说中,解放后的杨丽鹃照样因为血吸虫病的折磨而生活在悲观绝望之中,在“最强烈的新社会的阳光对她的照射”后,“我们仍然看不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任何变化”。^[7]而在杨丽鹃的个人生活中,其所体现出的个人理想、生活目标、情感状态、心理波动等等,则被认为“不象是一个在阶级剥削下肩负着生活重担的农民,而象是一个离开了现实生活或者是完全解决了生活问题的有闲阶层的寡妇”;^[8]另一篇批评文章则认为,小说中杨丽鹃所承受的苦难完全是情感上的,而缺乏对“更根本更直接”的“物质生活方面的重重苦难”的表现,因此而“给人以杨丽鹃是生物学上的人而不是社会学上的人的感觉”。^[9]同时,也有批评者认为,杨丽娟身上缺乏更高的社会理想,其传宗接代的生活目的也不能算是伟大的母性,不值得礼赞和歌颂。

最后,关于作品的抒情风格,批评者也承认:“抒情插笔和大量的心理描写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特色”,但批评者同样认为,这是“把不健康、不真实的思想情感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把应该否定的东西加以歌颂”;必然导致对劳动人民形象的不同程度的歪曲。^[7]这里,批评的逻辑仍然是用先验的关于阶级身份、阶级感情的判断来检测作家的艺术创造,而不是以艺术自身的规律来检验它。

以上考察的对于《还魂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1963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阶级斗争观点的再次重申,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阶级矛盾、阶级立场成为判断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而同时我们也发现,这时的《还魂草》批判基本还可算是文学范围内的观点冲突,或者说,是立足于作品解读之上的文学的“过度诠释”。此时的《安徽文学》在发表批判文章的同时,也更多地发表了肯定的、赞扬的文章,当然,肯定的文章大多也同样是以阶级的观点来解读作品,只不过从中读出的是苦难背后的阶级根源、主人公形象的阶级烙印等等。此时的批判基本还没有针对作家本人政治立场的暗示和攻击。

三

但是,到了1964年下半年,批判的调子突然变得十分严厉起来。《江淮学刊》在1964年第4期发表的批判文章中认为“在杨丽鹃身上所显示的许多

特征 都不能说明它的内在本质是劳动人民的”。^[10]而《安徽文学》第 11 期发表的两篇评论文章则全是批判性的,且措辞极为严厉粗暴,从题目上便可看出——《还魂草 是一篇具有反动思想倾向的作品》《这是为谁而创作?》,其中,后者不仅针对《还魂草》,还一并把作者的《三个短篇》一起批判,认为从《还魂草》到《三个短篇》“一脉相承地贯穿着一种与党的文艺方针相抗衡的、把腐朽当作神奇的思想倾向”,并由此而质问道:“一个革命的作家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又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11]至此,批判已经由对作品的思想倾向的揭示转向对作家本人的革命性质的怀疑了。而到“文革”期间,《还魂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株“大毒草”了,作家本人也遭到迫害。

这里我们能够愈发清楚地看出时代政治的持续激化所给予文学的不断施压。在 1963 年 12 月和 1964 年 6 月,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批示,指责“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2] (P.512 P.513)}由此,对文艺界的批判骤然升级,电影《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等一批艺术作品,以及“中间人物论”等文艺理论遭到大规模批判并被无限上纲。在安徽文艺界,对《还魂草》的批判也就突然变得分外激烈和严厉起来。另据知情者在“文革”结束以后回忆说:“在华东会演《毒手》遭到迫害后,《还魂草》也遭到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围剿。”^[13]这个回忆也从事实上直接证明了 1964 年对《还魂草》批判的急速升级。“华东会演”指的是 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为了配合江青的戏剧改革工作,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毒手》是安徽剧作家那沙的作品,在会演中受到粗暴批判);“柯庆施在会演开始时公开重申毛上月的指示,并谴责‘不健康的资产阶级情调和那些反动、荒诞、色情、迷信的东西’对群众的影响”。^{[13] (P.489)}

在 1964 年以后的批判中,虽则同样是以阶级的观点来评判作品,却明显可以见出措辞的凌厉、姿态的高调,并且由对作品的思想倾向的批判上升到对作家的阶级立场、政治方向的批判。不仅如此,批判还同时牵涉进前一阶段的争论内容,并予以立场的划分:“当前,在我国学术界和文艺界正展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两种观点的斗争,我们觉得,围绕《还魂草》展开的争论,也应是属于这

一斗争的范围。”^[14]批判的火药味已很浓烈,大时代的形势亦复如是。

1963 年间的批判主要指责的还是作品缺乏明显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立场,而在 1964 年的批判中,已经上升为对作品的资产阶级观点和作家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批判了。首先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者从小说主人公杨丽鹃的生命需求、情感需求以及儿女之情中发现“杨丽鹃这棵‘还魂草’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人生观的‘魂’”,从而认为,作品“通过一个农村地主寡妇的特殊遭遇和特殊心理状态,寄托了作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人生观”。^[14]其次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批判者认为《还魂草》只是写人的抽象的精神世界,切断人的社会联系,作品的人事判断缺乏一定的政治标准;“这样,就达到了作者通过故事宣扬‘共同人性’,模糊阶级界限的目的”,其实质则是“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代替人的阶级性”。^[14]最后,是资产阶级的“情欲”表现。从批判文字上看,这是令此时的批判者最为津津乐道同时也是最为道德憎恶的一个方面。小说中关于杨丽鹃守寡 20 年的心理波动,以及再婚以后的情感满足,每每为评论者所反复评述、引用,并予以道德上的嘲讽和厌恶:

“二十年来,七千多个夜晚(计算得多么精细呵!)除了孤独的哀叹声,如痴如病的梦呓声,和泪水倾滴在脚面和枕上的啪哒声而外”,不能象现在似的“熨贴在丈夫温暖有力的胳膊弯里”;“躺在温暖幸福的怀抱里”,得到性的满足。现在可好了,古风改变了,丈夫来了,男人来了,她可以躺在他的怀抱里了,她获得了每时每刻都能“体验到的那种生活的乐趣”了,这怎能不“令人心醉”呢,怎能不感到“就这样持续一整天,一个月、一千年、一万载,她也绝不会嫌长”呢?……看吧,这就是《还魂草》一往情深地在杨丽鹃的身上所发现的“青春的欢乐”;“爱情的喜焰”。多么恶心,多么腐臭!^[11]

的确,对杨丽鹃这个不愁吃穿的地主少奶奶来说,幸福就是永生躺在男人的怀抱里“一整天,一个月,一千年,一万载”,就是“用自己的肉体给丈夫留下一点骨血,以自己的肉体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无限地延长”,一句话,这就是“青春的欢乐”,就是最大的幸福。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幸福观吗?……现实生活里不断涌现出的巍然矗立的英雄

形象不去热爱,却对“躺在男子怀抱里一万载”就是幸福的糜烂不堪资产阶级情调无限热爱,这显然不是健康的艺术趣味。^[14]

许多类似这样的引用、品评和讥讽,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见出一个时代的强烈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要求,以及其中流露出的情感压抑状态下的窥探欲望。

此时的《还魂草》批判更是将矛头直指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认为作家“以融融天伦之乐,给旧社会贴金”;“大做死里求生的文章,将新社会抹黑”,进而质问道:“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的文艺究竟是站在哪一边?”^[14]同时,批评还把《还魂草》的创作和争论与当时的时代政治密切相关,从而清理出作家思想深处的“现代修正主义”根源以及文艺界的路线斗争。“读这篇作品时,如果我们同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联系在一起看,同文艺和社会科学界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看,那末,《还魂草》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现像,这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时代背景的。”围绕《还魂草》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之间的斗争,是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里的一种反映。^[14]

这时的批判文章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上纲上线,文章的逻辑也非常混乱,同时,文风也变得极为粗暴,特别是那个典型的“难道……吗”的反问句式充斥全篇。如《还魂草》是一篇具有反动思想倾向的作品中:“难道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吗?”“作家的这种情绪难道是没有任何思想上、观点上的原因么?”再如《这是为谁而创作?》中:“难道说,人吃人的旧社会竟是如此的可爱,如此的值得留恋么?”“难道说,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因而需要《还魂草》的作者为民请命,发出请下来救救我们的呼声吗?”“这难道不好说明作者的思想深处有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王国吗?”等等。

更为荒唐的是,有关方面竟然组织人员到作者

所采访过的地区进行调查,并整理出调查文章,证实作品主人公杨丽鹃的原型并非贫农而是一个地主寡妇,同时把这个寡妇的名字公之于众,并予以言辞上的侮辱。

至此,文学的批判已经完全演变为阶级的批判、政治的批判、语言暴力的批判,而时代的大波澜已是蓄势待发、呼之欲出了。

[参考文献]

- [1]陈顺馨. 1962:夹缝中的生存[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 [2]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3]章新建.《还魂草》必须还魂[N]. 安徽日报, 1979 - 03 - 31(04).
- [4]苏中. 七十自述[A]. 魂牵梦绕[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4.
- [5]朱栋霖,丁帆,朱晓进. 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6]记者. 关于《还魂草》的讨论(来稿综述)[J]. 安徽文学, 1963(3).
- [7]严云绶,陈育德.《还魂草》的根本问题在哪里?[J]. 安徽文学, 1963(1).
- [8]王远鸿. 谈杨丽鹃的性格[J]. 安徽文学, 1963(2).
- [9]徐寿凯. 杨丽鹃不是劳动人民的还魂草[J]. 安徽文学, 1963(2).
- [10]余惠敏. 文艺创作不能没有阶级观点[J]. 江淮学刊, 1964(4).
- [11]胡叔和. 这是为谁而创作?[J]. 安徽文学, 1964(11).
- [12]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下)[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 [13] [美]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 1965)[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4]李焕仁.《还魂草》是一篇具有反动思想倾向的作品[J]. 安徽文学, 1964(11).

(责任编辑 刘敏慧)

从《草莽集》看朱湘现代白话诗的创作特色*

刘 华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朱湘诗歌成熟期的代表作《草莽集》典型体现了朱湘现代白话诗的创作特点,同时对中国新诗的进程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朱湘是一位大将兼先行式的人物。

[关键词] 《草莽集》; 朱湘; 现代白话新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81-03

朱湘(1904-1933)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他的一生是短暂的,可谓生的寂寞死的寂寞,但是他留下的新诗遗产却是丰富的。1925年朱湘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夏天》,随后在1927年,他出版了个人最为重要的诗集《草莽集》。在朱湘死后,他人整理出版诗集《石门集》和《永言集》。在朱湘的诗歌创作中,阅读界和评论界普遍认为,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集子是《草莽集》和《石门集》,尤其是《草莽集》,是一部才情迸发的不可多得的新诗精品。笔者认为,要理解朱湘的诗歌理想和诗歌创作的特点,《草莽集》是必须特别重视的作品。

一、平静和谐的整体诗歌基调

朱湘一直被评论界认为是新月诗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虽然他很早就与徐志摩反目,参加了不到一个月就退出了新月派,他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最能代表新月诗派诗歌理念的诗人。朱湘的确是最认真地实践了新月派的“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沈从文很早就在《论朱湘的诗》一文中指出朱湘的诗“平静到使人吃惊”,朱湘诗中比较普遍的这种“缺少忧郁”的现象多少给沈从文留下了惊奇的印象,因为他的生活本是那样地饱含忧郁。朱湘一生才华横溢,却一直郁郁不得志,生活的折磨,性格的乖僻,失业的痛苦,家庭的不和,使他最终走上了投江的绝路。然而在他的诗歌中却绝少看到他痛苦的愤怒、

绝望的吼叫,他的诗歌中的情感是平静的,伤感和悲观在创作中被通达、健康、洒脱的绅士般的品格所化解。

在郭沫若以“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的我要爆了”这样的诗句荡涤着新诗诗坛之后,新诗中就普遍存在情感的泛滥和不加节制的直抒胸臆。在这种情况下,新月派提出了“理智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这里的理智指的是一种诗歌的自我克制的态度,而非诗的哲理化。的确,在朱湘的诗歌里,几乎全部基调都是平静,爱也好,怨也罢,甚至是流血或者死亡,都是一片和谐。沈从文指出,朱湘的诗歌“全部调子建立于平静上面,整个的平静,在平静中观照一切,用旧词中属于平静的情绪中所产生的柔软的调子,写成他自己的诗歌,明丽而不纤细”(L.P.119),说的正是这个特点。

《草莽集》的序诗《光明的一生》在一种恬淡平静的感悟之中,表达了诗人对光明的追求和向往。这不是对光明的呼唤和礼赞,而是一种浅吟低唱。在《葬我》一诗中,诗人写道: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缨花下,

*[收稿日期] 2011-04-07

[作者简介] 刘 华(1982-)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永作着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 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这是一首写死亡的诗，读起来却给人一种静谧安详的感觉，完全没有一般诗歌写死亡时常有的那种情绪，诗人像接受一件美好事物一般去接受死亡，真可谓是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在另一名篇《摇篮歌》中，诗人俨然化身为一位有教养的典雅的妇人：“不愁温饱，没有怅惘，也没有奢望”^{〔2〕}，内心是一片安详，不断地哼着“睡呀，宝宝”，宁静温馨。作者吸收了我国古代词曲讲究韵律节奏的特点；用东方人的声音，歌唱了东方人的母爱^{〔3〕}，把一个个具有东方情韵的意象完美地罗列，展现了东方女性的独特之美。全诗抑扬顿挫，音节回环温柔，意境甜美。

在《草莽集》中朱湘也创作了一些颇为“怒目金刚”式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虽然数目很少，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的所思所想甚至是抱负和胸怀。譬如《哭孙中山》，这是一首应时之作，显示了诗人对国家和革命的热情。在《哭孙中山》这首诗里，诗人把袁世凯比作“高踞帝位”的“狞笑的魔王”，那些爪牙帮凶都是吃人不眨眼的“魑魅”，把孙中山赞为“革命之旗”、“我国的栋梁”、“医治创伤的国医”，对孙中山先生进行热情、由衷的赞颂和呼唤，对孙中山先生的“壮士未酬身先死”表示最哀伤、悲痛的悼念。诗人最后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停住哭！”“停住四百兆的悲伤！”“华夏之魂已到了复活的辰光。”

朱湘认为：“在社会的方面：文学本是一种最有力量的社会工具，可以团结人民，可以激发爱国的热情，可以辅助教育，可以改造社会”^{〔4〕}（P.7），显然他是看到了诗歌除了诗人本身情感的寄托之外，对社会有教化功能，这种诗歌观在中国的诗歌史上自古就有。朱湘认为，真正伟大的文学家在创作的时候不能只表现自己的心声，只表现自我的情感，不能把诗作仅看作是自我“言志”的工具，反映自我情感要求的“喉舌”，必须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表现为国家为民族之忧而忧，为国家民族之乐而乐的“大我”的感情；“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可以作得他这国家、民族的喉舌——好象言为心声那样”^{〔5〕}（P.23）。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以平静为基调的《草莽集》中会出现诸如《哭孙中山》这样情绪比较强烈的作品。但是在《草莽集》中，朱湘的这类诗歌创作往往存在着主题先行和情绪的刻意灌注的毛病，从而给人一种力不从心、不可为而硬要为之的感觉，这样的作品是不能算是很成功的，在艺术成就上也稍显逊色。

二、新诗形式与格律的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现代白话新诗在初期是以对传统诗学的颠覆为目标的，胡适首倡“八事”，陈独秀提出“三大主义”，都是为了彻底地摒弃旧体诗，在向西方诗歌学习的基础上创造全新的白话诗。不过绝大多数新诗人在自觉地接受外国诗歌的营养的同时，不自觉地受到传统的影响。他们对本土传统诗学的反叛是不彻底的，许多人甚至有意在继承旧体诗歌的某些元素，正如胡适在《谈新诗》中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脱胎出来的。”^{〔6〕}（P.371）

针对初期白话诗诗体粗糙、诗感放纵的问题，以闻一多为首的新月派举起了倡导格律诗的大旗，格律是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特别强调的东西，新月派举起诗的格律这面大旗，也是对传统诗学观念的一次回归。在对闻一多“新诗格律化”主张的应和上，朱湘也是全心投入的，并以自己富有才情的作品树立了典范。在诗歌形式和韵律的探索上，朱湘的《采莲曲》是必须提到的代表性作品，它突出地表达了闻一多的新诗“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的三美主张。《采莲曲》通过跳动的节奏，向我们展开了一幅诗情洋溢的画面：

小船呀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
右撑，
莲舟上扬起歌声。
……

这首诗画面感效果出众，仿佛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江南水乡少女采莲的动人图画：清澈的湖泊中，田田的荷叶，微风拂来翩翩起舞，采莲的少女逆流而

下,情思倒映在粼粼的波光之中。同时,朱湘认为,诗歌应当“内容、外形、音节三者并重”^[5]。想象、情感、思想,三种诗的成分是彼此独立的,唯有音节的表达出来,他们才能融合起来成为一个浑圆的整体^[5]。所以朱湘特别强调诗歌的用韵,认为韵用得不好,不仅不能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能更好地发挥诗歌的审美作用。《采莲曲》整首诗韵律感十足,“左行,右撑”以及下面几段的“波沉,波升”等,用的都是先重后轻的韵,给人营造出一种划船摇桨般的节奏感,表现出莲舟随波荡漾的感觉。同时,诗人大量使用双声词和叠韵词,使得诗句上下对仗,前后共鸣。在这里,诗歌的外在用韵和内在的情绪韵律产生了一致,徐徐道来,取得了很好的抒情效果。

《采莲曲》除了在音节上给人一种“抑扬顿挫又婉转抒情”的音乐美之外,在形式上也是下了工夫的,可以说是一种新诗的诗体实验。整首诗采用的是整齐的长短句,各节对应的行的字数是一样的,错综中见整齐,在视觉上给人以整饬、均衡的美感。同时穿插其间的两个字的短句子又造成了一种灵动的美感,显得活泼生动,让人想到宋词和元曲的小令。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首朱湘的典范之作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对于形式的刻意追求,有较大的诗体试验的痕迹,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诗感的生成和发挥,从而使全诗稍显生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首朱湘的代表作,就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这句话是用来形容徐志摩其人其诗的,用在这首诗上也相当合适。应该说,朱湘的格律观是受到闻一多的影响,但是又不拘泥于此,就像沈从文说的:“朱湘的诗,保留的是中国旧诗词韵律节奏的灵魂,破坏了旧诗词的固定组织,却并不完全放弃那组织的美”^[1],这句话应该说还是十分准确的。

三、叙事诗的大胆实验

在《草莽集》中,还有一类诗歌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朱湘的叙事诗。朱湘的叙事诗是更能看出新诗在精神气质上和我们民族传统之关联的。《草莽集》中共有4首长篇叙事诗:《猫诨》《月游》《还乡》《王娇》。

《王娇》被普遍认为是代表作品,是朱湘最长的一首叙事诗,九百多行,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长叙事诗之一。它取材于明末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中《王娇鸾百年长恨》这则故事,说的是公子小姐私下定情,在公子负心之后,小姐自尽了结生命。在古代传奇戏曲中常常可以见到类似的故事,

很难想象在新文学刚刚震动了整个文学精神的时代,诗人会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去写这样一个毫无新意可言的故事,可能他只是为了纯粹的现代叙事诗的诗体实验吧。

总的来说,《王娇》叙事本身可读性较强,人物刻画也还算成功,诗人太过强调叙事这个目的了,整首诗的诗味显得寡淡,某些片段写得近乎粗俗,看不到朱湘诗歌惯有的抒情气质。这一首取材于古代文学的长诗,应该说是一次大胆的实验,其精神外来影响甚微,而与朱湘本人喜爱的中国古代文学密不可分。应该说,这是一首有诗形而无诗情的实验性质的叙事诗,这样的作品在《草莽集》中不能算是出众的。

总的看来,朱湘的《草莽集》的诗歌风格和特色还是比较统一的。不见大风大浪,没有重大题材,如寂寞平湖中的一抹微波,如淡淡花影下的一缕晨光,节奏轻缓,色泽淡雅。这种对东方静的美丽的抒写,带有明显的中国古典诗词甚至民间歌谣的痕迹,他的诗歌脱胎于传统中国诗歌之神韵,又能从西方现代诗中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具有相当清醒的开拓和建设意识,在白话新诗刚刚出现的不久,能够出现这样出色的作品实属难能可贵,朱湘用他的才情和努力为白话新诗的发展创造出许多可能。《草莽集》作为朱湘成熟期的代表作品,“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上,达到一个为一般诗人所不及的高点”^[1],对现代白话新诗具有深远的影响。诗人在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夏天》的序言中曾写道:“我的诗,你们去吧!经得住自然的风雨,你们就存在,站不住,死了也罢!”朱湘的诗显然没有被现代文学所忘记,在中国现代新诗从破坏到重建并向诗的本体靠拢的道路上,朱湘都是一座不可忽视的山峰。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论朱湘的诗[A].沈从文文集[C].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
- [2] 蓝棣之.论朱湘的诗歌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2).
- [3] 王伟.朱湘诗歌论[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2).
- [4] 朱湘.文学闲谈[M].北京:北新书局,1934.
- [5] 朱湘.朱湘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 [6] 胡适.谈新诗[A].胡适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师 语)

哈罗德·品特戏剧《月光》中的张力*

何军侠

(南京工程学院外语系, 江苏南京 211167;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4)

[摘要] “张力”是文学作品中的互补物、相反物、对立物间的冲突与协调。品特作品中存在虚与实、喜与悲间的张力。本论文拟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在张力理论框架下探讨其戏剧艺术的张力。

[关键词] 哈罗德·品特; 《月光》; 张力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84-04

哈罗德·品特被公认为自萧伯纳以来英国最杰出的戏剧大师,其戏剧创作生涯近50年之久,囊括了西方所有相关的奖项,其作品受到了人们的肯定,也多次在评论界引起激烈的争议,争议声中品特的声誉逐步增加。20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该消息令许多人鼓舞,是品特为该奖挽回了声誉,却让有些人觉得荒唐、可笑、甚至令他们厌恶。他的作品也如其人,充满两面性:荒诞中的现实性;威胁中的喜剧特色;对比鲜明的黑白、明暗色彩的应用;悲喜中、虚实间及时空间,这些对立的两极相互碰撞、融合,使对立面进一步凸显且高度融合,这就是“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张力^{[1] P.280},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但学术界对品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与荒诞派戏剧的归属、语言剧、家庭伦理、女性边缘身份、心理分析的研究上,对品特作品对立面的融合、统一的张力因素探讨却没有涉及。张力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广泛地应用于诗歌、小说等文体语言、结构层面的对立统一因素的分析、评价;本论文拟以品特创作成熟期——晚期的代表作《月光》为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戏剧艺术中虚实间、悲喜间的张力。

《月光》是品特最后一部以家庭为主题的戏剧,剧中将死的安迪和妻子贝尔在装饰豪华的房间一边不停地试图与儿子联系,一边回顾着往日里婚姻上

的背叛,隔壁房间两个儿子杰克与弗雷德玩着和父亲、“名字”有关的游戏,拒绝回应来自父母的呼唤。剧始之时,已死的女儿的幽灵游荡在月光下。剧中她死了,但好像还活着,像家中的一个成员在彼此隔离的父母和儿子间出现。剧末时即将面对孤独“长夜”的父亲对实实在在的儿子呼唤无果时,她出现了,她成了他临死前对儿女们近乎绝望的向往。剧中儿子的名字游戏、父母的婚姻游戏、女儿的幽灵使本剧虚虚实实,笑中带泪,充满神秘之感,也使本剧具有虚实间、悲喜间的张力。正如其莘先生所说:在品特的戏剧中,人物对话和现实生活很近,但是全剧的效果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感,给人以一种不可捉摸、模棱两可的感觉,而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是品特剧作的最大特点。^{[2] P.378}

一、虚实间的张力

戏剧作品以假定的真实表现生活,通过模拟生活中的动作、对话、情境及故事表现现实生活。“虚”指虚拟、假定、虚假;“实”指真实、现实。在品特看来,现实中最真实的语言其实是谎言与真言的混杂,人物使用语言不是为了表达他们想到和感受到的东西,而是为了掩盖他们真实的动机。所以,语言其实就像是一个面具,一层面纱,或是一张网。人物看似

*[收稿日期] 2011-02-20

[作者简介] 何军侠(1970-),女,陕西凤翔人,南京工程学院外语系讲师,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沉默 却赤裸地表达十分真实的意图 ;看似滔滔不绝 却是烟幕 ,掩盖真实的意图——静与动的张力 ;内涵不确定、动机不确定的语言却像“录音机录制的现实生活语言”——确定与不确定的虚实间的张力。

1. 静与动。

艾略特说“中国式的花瓶 ,虽然是静止的 ,但看上去却似乎在不断运动着。艺术家们认为 ,这种不动之动是艺术品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性质。”^{[3] P.50}德国美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艺术作品的静谧乃是动态的静谧而非静态的静谧 ,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 ,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4] P.189}品特戏剧静与动的结合体现在剧中沉默和停顿的应用上。剧中人物谈话会时突然陷入沉默和停顿 ,人物或由于记忆或由于交流无法继续进行而陷入沉默或中止。此时无声胜有声 ,似乎静止不动了 ,但人物的内心争斗、人物与人物间的权利争斗冲突却轰轰烈烈 ,如万马奔腾。因此在无声的沉默中 ,静是假象 动才是现实。

还有一种沉默则是一方滔滔不绝的讲话。这时 ,讲话实际上道出的是一种隐藏在话语下面的内容 ,听到的语言是我们所没听到的一种指引 ,一种必要的躲避 ,一种粗暴的狡猾的、使人痛苦的或嘲弄人的烟幕 ,其作用在于使另外一边安于其位。这种有声的语言在传统戏剧里被看做交流的媒介、沟通的桥梁 ,而在品特剧作里却是真实想法的牵绊 ,这种有声语言没有起到交流真实意图的作用 ,却使人们之间的沟通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有声、无声 ,运动、静止交织一起 ,使他的戏剧独特——在相反的两极之间的持续摆动。真正的静默降临时 ,我们还能听到回声 ,但更接近于赤裸状态。言语经常当作用来遮盖赤裸状态的一种计策。言语的作用有时候是用来掩饰内心深层的情感的 ,说话者企图通过说话来掩饰他的感情 ,甚至是达到让自己也暂时忘掉的目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沉默”。言语与静默这种相反的两极 ,在品特剧作中交织使用 ,很难分清。

《月光》中临死的安迪絮絮叨叨、强词夺理、言语粗俗 ,不停地羞辱妻子贝尔 ,但这不是他的本意。对孤独、漆黑的“长夜” ,他害怕甚至恐惧 ;他希望两个儿子来到床前 ,但是他的妻子想尽办法也无法唤回儿子 ,他对妻子的责备、粗暴蛮横其实是他见不到儿

子 ,与儿子之间感情冷漠、无法沟通 ,其内心烦躁、愤怒、希望无法实现以及对未知的另一个世界恐惧的外化。文章中多次出现谈话陷于沉默与中止 ,当安迪发泄到极度时 ,沉默来临 ,也许是安迪理屈词穷、也许是他意识到自己的过分 ,沉默的到来使他的本性、他的意图暴露无遗 ,他开始寻找得体的言语与妻子继续交流 ,他用粗俗的语言、他的不近人情其实只是烟幕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对亲情的渴望 ,希望儿子的到来 ;也想远离死亡、远离孤独与寂寞。“絮叨”不过是恐惧情绪的掩饰和欲望的宣泄 ,沉默、谈话中止的行动成为其释放自己心理与情绪的催化剂。不管是安迪的担心、恐惧 ,还是他的欲望 ,在言说之中让他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空虚和崩溃 ,最终无望地接受现实。与安迪的絮叨形成对比 ,受到修道院文化熏陶的妻子相对沉默 ,只是应付他的无理取闹。她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于是转移话题 ,避免矛盾激化。

2.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阅读品特的作品 ,感受最深的 ,就是他作品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感。品特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记忆”式话语模式——人物的对白大量地以“记忆”的形式出现。在这种话语模式中 ,虚构性和真实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朦胧 ,过去甚至昨天的记忆在它诞生的那一刻 ,就已经这样被扭曲 ,平添了今天的错觉。“记忆”内容本身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透露出了说话人眼下的真实思想 ,其中隐藏着企图掩盖但又无法掩盖的真实的动机。《月光》是一部记忆戏剧 ,剧中充满回忆 ,安迪对自己的青春、爱情、欲望以及恐惧进行了回顾 ,而这些回忆由于发生在过去 ,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和确定性。同时 ,剧情在过去的回忆和当前的处境之间来回转移 ,时间在过去、现在之间穿梭 ,现实时间和心理时间(或梦幻时间)相互交错缠绕 ,记忆中过去的生活与现实生活不停切换 ,过去不是过去 ,使现在扑朔迷离。人物语言的含糊、重复与躲闪 ,行为的怪异、动机的不明 ,为观众的欣赏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对观众和读者提出了特别的要求 ,要求他们自己去解释正在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而读者和观众有多大的可能性弄清他的想法、身份、他的成长过程以及他和别人的关系 ?有时人物会循环重复着相同的话题 ,重复相同的动作 ,既故意吸引观众的眼球 ,似乎想告诉人们什么 ,但又隐隐闪闪 ,半明半露。事实上 ,品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引导人们认

识世界,认识人性,诱导读者、观众通过作者塑造的人物去观察外部世界,在客观事物涂上一层人的主观感情色彩,使确定中有不确定,甚至可以说不确定因素是品特戏剧的客观真实。品特认为不确定才是生活的本质。人物是不确定的,人物的目的也是不确定的。由于这些不确定,观众一下就进入了一个含混、模糊、不确定的世界。

品特在诺奖感言中讲到:“真实与不真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真实与虚伪之间亦然,世上事物不尽然非真即伪,却可能是同时包容了真与伪。我一直信仰这种主张,在艺术世界里我依旧秉持着这种信念来探索。身为作家,我支持这种理念,作为公民,却不能这么做。身为公民我一定要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5] P.1)}这是品特1958年写下的话,一直是他的座右铭,在他的作品中,虚与实作为对立面同时存在,体现了张力的特点。

二、喜与悲交织的戏剧张力

品特戏剧呈现悲喜交集的戏剧张力。滑稽的语言、可笑的举止,笑中带泪,折射现代社会人们孤独无法救赎,只能寄托于虚无的严肃的社会问题;个人期望得到社会认可,却可望而不可即,反映了两者无法调和的矛盾,将死之父呼唤儿子们,一墙之隔的儿子们却继续开着父亲的玩笑,折射父子亲情冷淡、缺失。最终所有困扰这个家庭的事情都消失在黑暗寂寞的时空里。

1. 滑稽与严肃。

人物滑稽、可笑的举止背后探讨严肃的社会主题。像尤涅斯库一样,品特认为具有荒诞性的生活在本质上是滑稽可笑得到了一定程度。“所有事物都是滑稽可笑的,最大的严肃认真是滑稽可笑的,甚至悲剧也是滑稽可笑的。”^{[6] P.162)}《月光》中两对夫妻的关系混乱、荒谬、荒唐,传统观念中夫妻之间的、朋友之间忠诚荡然无存,家庭伦理的制约作用在此丧失。安迪与妻子贝尔的朋友玛利亚偷情,与玛利亚的丈夫拉尔夫关系暧昧,而安迪的妻子贝尔与安迪的朋友拉尔夫、玛利亚的丈夫也发生婚外情,他们对这种四角关系很认可、接纳,对对方婚外情的态度豁达、大度、洒脱,理智到让人不可思议。同时,在他们的交谈之中又难以掩饰地流露嫉妒,但是没有一般夫妻之间由于背叛引起的忌恨、夫妻反目、关系恶化。尽管传统婚姻关系维系的纽带——忠诚不复存在,他们各自的婚姻仍然继续着。这种荒唐的关系冲击着读者和观众婚姻中两性应该互相忠诚的观

念,是对严肃的传统婚姻观的挑战。

《月光》一剧让人感到滑稽的还有在该剧的开头、结尾处,惨白的、朦胧的月光下已经去世的女儿的幽灵体谅父母、深爱着父母,与父母心灵相通,是她安慰安迪和贝尔的;而在一墙之隔的两个儿子却听不见父母对他们的呼唤,继续开着有关父亲“玩笑”。父母与儿子间唯一的交流是在本剧快结束时,母亲告诉儿子他们的父亲快要死了,希望见到他们时,从孩子那里得到是答非所问、拒绝交流,父亲对儿子的深爱得不到儿子真实回应。那一刻,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一墙之隔的两个房间,父母这边痛苦地沉默,儿子那边则继续玩游戏,对父母的呼唤置之不理,这凄凉的画面展现的是亲情被隔离之感,他们对父母的亲情似乎已死,人间的亲情犹如埋葬到了坟墓。被儿子像路人一般冷漠拒绝后,已死的女儿是安迪由于亲情缺失而引发的孤独的解药,成了他即将来临的孤独“长夜”的陪伴。近在咫尺却如远隔天涯的儿子不能指望,父亲对亲情的渴望只能寄托于虚无——已逝的女儿在即将到来的漫漫“长夜”中,在另一个世界会陪伴他,这既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她对父母的爱只能是他们心里美好的幻觉,是绝望的期冀。品特通过父子间的矛盾这一现实情境传达出人类心灵深处对亲情的渴盼、对亲情的绝望、对亲情缺失后孤独无依的恐惧。本剧反映了亲情的缺失这一人类悲剧。延续亲情,排解孤独,从而获得幸福的人生,这是人类面临的一大严肃课题。

2. 个人期望与社会确认。

《月光》里,两个儿子都已成人,一个27岁,一个28岁,他们“懒得要命,游手好闲”,很年轻很健康却都不工作。安迪抱怨:“现在看看他们!看看他们什么样子!一对寄生虫,靠国家养活着。靠国家养活着!”^{[7] P.265)}严格的父亲期望儿子能够自己独立生活,有出息,但儿子在装饰简陋的房间玩着名字游戏,没有希望工作的意思,靠国家补贴、母亲偷偷地接济而生活。而大儿子只有设想,小儿子只愿意呆在床上;“呆在床上更舒服,在床上呆着更适合我,我不喜欢下床、出去,跟陌生人打交道,诸如此类的事情。”^{[7] P.275)}他们不愿意来到现实中,看来,父亲期望儿子独立自主生活的希望注定落空,即使这样,他在絮叨、埋怨时仍然不忘呼唤儿子:“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外面等待着吗?他们为什么不进来?”^{[7] P.287)}而儿子们整日无所事事,也不愿意看望期望见到他们的临终的父亲,给他以安慰。

妻子眼中的丈夫“在邪恶和疯狂的外表下存在细腻、诗意的、年轻人的敏感”；两个儿子弗雷德和杰克的游戏透露出父亲是报复心强、凶狠又傲慢的人，但同时他们却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男子汉，威风八面；情人玛利亚眼中安迪舞姿翩翩；朋友眼中他是位思想家；安迪也自认为过去自己是一个备受尊敬和赞扬的领导。回忆中安迪能够很好处理与同事、妻子贝尔、情人玛利亚、朋友拉夫尔的关系，从中得到自己价值的认同。但过去的成功代替不了现实中的无奈，事业、朋友、情人取代不了现实中最基本的亲情渴望——儿子的陪伴，与两个儿子感情远如隔着千山万水，这种隔膜、失去儿子亲情的威胁、对死亡的恐惧一直存在他的思想中。安迪作为社会人的成功，抹不掉亲情缺失带给他的人生痛苦。

三、结语

品特的《月光》具有显著的互相对立而又和谐统一的张力因素——虚实交织、悲喜交集。在对立的两极间摆动中，其戏剧艺术中对立的每一方被凸显和融合，使品特戏剧独具魅力。这是品特最后一部以家庭为主题的作品，家庭成员间本应彼此血肉相连，剧中人物间却分崩离析。作品仍然保留早中期作品中儿子对父亲的反叛情绪，但父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父权式的暴君，而是软弱、年迈、将死的老人，对妻子横加指责，对儿子却始终充满温情，但却得不到儿子应有的回应，亲情的隔离没有解除，父母期望

得到亲情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种悲剧是怎么造成的呢？作为给家庭主题打上句号的一部作品，《月光》中作者对婚姻及家庭矛盾尽管仍然困惑，但也试图进行解析，暗示父母与子女疏离的关系也许是由于父母们不负责任的“婚姻游戏”对子女伤害造成的。^{[8] (P.271)}

[参 考 文 献]

- [1] [美] 罗吉·福勒. 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S].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1987.
- [2] 何其莘. 英国戏剧史[M].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 2008.
- [3] [美] 莫瑞·克里格. 批评旅途 : 六十年之后[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8.
- [4]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2009.
- [5] [英] 哈罗德·品特. 送菜升降机[M].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 2010.
- [6] [英] 马丁·艾思林. 荒诞派戏剧[M].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3.
- [7] [英] 哈罗德·品特. 归于尘土[M].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 2010.
- [8] 陈红薇. 战后英国戏剧中的哈罗德·品特[M]. 北京 : 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 2007.

(责任编辑 南 山)

熟悉的画中人*

——内米洛夫斯基小说的自传性质

徐鹭杨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内米洛夫斯基秉承19世纪的现实主义风格,对自己的生活与环境做了无保留的刻画与剖析。其作品游走于小说与自传之间,拥有前者的力度与后者的真实。本文列举的三部小说,反映了作家全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勾勒出作者的人生与命运。

[关键词] 现实主义; 肖像; 传记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88-03

2004年,法国雷诺多文学奖第一次颁发给一名已故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这位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俄裔法国女作家,以其近期被发现的《法兰西组曲》手稿,于逝世60年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

伊莱娜·内米洛夫基于1903年出生于犹太富商家庭。1929年,这位年轻的母亲首次匿名发表了长篇小说《大卫·格德尔》。该书的出版商惊叹小说对现实老辣无情的冷嘲热讽,不敢相信作品出自一个生活富足无忧的年轻女子之笔。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是作者的创作高峰,先后有《孤独之酒》(1935)、《猎物》(1938)、《狗与狼》(1940)等作品出版。1942年8月,在法国南方避难的伊莱娜被纳粹逮捕,随后死于集中营。《法兰西组曲》为战争爆发时作者未完成的遗作。

新世纪之初,桂冠降临,作家已香消玉殒多年。这也许并非偶然。她本来并不属于风云迭起、众说纷纭的20世纪,不属于任何二三十年代遍布巴黎、作家云集的咖啡馆。她太传统,她的特别不在于标新立异,却在颠覆一切传统,探索一切可能的声浪中安静而孤独地坚守现实主义。21世纪,法国文学在

经历了数次摧枯拉朽地推倒重来后,又悄悄地重归传统写作。“我们一定不要低估这股传统的力量……艺术避免不了同现实打交道,不管我们怎样缩小现实的意义或者强调艺术家所具有的改造或创造的能力。”^{[1] P.216}可以说,20世纪的法国文学,内米洛夫斯基是最后的贵族,她的作品是19世纪彻底淡出人们视线之前的最后回声。

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作家。她只写她熟悉的人和事——犹太人和金钱是她作品的关键词。作家的几十部作品中,从贫民窟走出,以悲惨方式结局的暴发户,刻薄、虚荣而自私的女人,早熟敏感的少女,这几个形象如幽灵般反复出现。内米洛夫斯基出生于犹太家庭,有个腰缠万贯的银行家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十分冷漠。事实上,作家1942年死于集中营时,她的母亲只身带着巨额财产逃亡美国,继续她纸醉金迷的生活。内米洛夫斯基不同于描绘广阔社会的巴尔扎克,后者的作品“像是一个有许多窗口的房间,读者从不同的窗口望去,看到的是不同的天地,有不同的人物在其中活动。”^{[2] P.67}”她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精描细画她自己的小世界。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形形色色,但无一能逃脱金

*[收稿日期] 2011-04-07

[作者简介] 徐鹭杨(1982-),女,江苏连云港人,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助教。

钱与命运的诅咒。小说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串话语,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暴露了人物贪婪而软弱的特质,并且预示着他们狂乱而悲惨的结局。作者为回忆而写作,在写作中生存。她无意写传记,但她的全部小说,就是她早年生活环境的记忆,是她对身边世界的描绘再现。她所有的作品无一例外地以悲剧结尾,正如她自己的人生。可以说,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是带有传记性质的小说,或者说,是虚拟的传记。她从生活中汲取无尽的题材,她有力的写作又给予了她的人生完整而精美的文学空间。

《孤独之酒》是内米洛夫斯基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传性质最强。主人公是一位叫埃莱纳的犹太少女。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叙述者,主人公,这三者的关系十分微妙。叙述者讲述少女主人公的童年经历,与家庭女教师的快乐时光,傍晚河边的散步,而在写到少女与母亲的争吵时,叙述者与主人公似乎合二为一了。母亲狰狞的面孔,鲜艳而扭曲的红唇,精心打理却让人毛骨悚然的长长的指甲,这幅可怕的画面出现时,叙述者无法冷静地观察描述下去,他跳进少女的身体,与她一起颤栗,一起在心中呐喊。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传神的心理描写。作者并未采用巴尔扎克描述现实的“上帝之眼”的视角,而是不知不觉地把读者带进人物的内心深处。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刻画如此真实,震撼,如此不着痕迹,整个作品似乎是这个犹太少女敞开心扉的忏悔录。埃莱纳对父亲充满怜悯,对母亲满腔憎恶,又悲哀地承认自己永远不能摆脱家庭对她的影响,注定要成为让自己厌恶的人。纵观通篇作品,镜子是重要道具。埃莱纳观察镜中的自己一天天长大,看到自己愤怒的情绪与扭曲痛苦的脸庞,就如作者在仔细地审视自己。小说的结尾,少女选择离家出走,屋外凄清的雨水混合着冰冷的泪水。这可是作者的画笔勾勒的不存在的自己?作者是否在以切身经历为创作源泉的同时,又以自己为主人公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

《大卫·格德尔》是作者的又一重要作品,也是作者最早发表的作品。小说情节线索简单明了——犹太暴发户幻灭记。内米洛夫斯基的传统,体现在她对时间轴的绝对遵从上。她是个细心谨慎的记录者。所有的素材,按照时间顺序,得以妥善安排。小说情节的安排也十分严谨,以主人公的两次重要赌博为轴心。^{[3] P.49)}从破产那一刻起直至病死客船,大卫一步步陷入绝望与迷惘,死亡的恐惧无所不在。

小说出版之初,有评论言此作太过无情,作者身为犹太人,竟把自己的同胞描写得如此丑陋,生活得如此不堪。人物对话中充斥着尖酸刻薄的甚至肮脏的语言,这是很多人不能忍受的。大卫和妻子,这对犹太夫妇的谈话毫无家庭的温情可言,爱情与忠贞在对金钱赤裸裸的渴望面前一钱不值。面对父亲的破产,女儿为了维持高消费的生活,委身于曾是父亲生意对手的猥琐老头。这是对道德的挑战,对自己民族的蓄意抹黑!面对人们的质疑,作者的回应冷静而简单:这是我看到的事实!描绘自己亲眼所见,多么传统而有力的笔调。在某些人眼里的疯狂,对内米洛夫斯基来说是诚实,是童叟无欺地暴露自己的经历与灵魂。那些认为大卫被夸张被丑化了的,主张用平和“真实”的手法“客观”地表现生活与社会的人,他们与内米洛夫斯基相比,未必更具有作家的资格。根据法国《读书》杂志的评价,内米洛夫斯基所有的才华在其第一部小说《大卫·格德尔》中已经展露无遗:她有着冷冷地注视和仁慈的心灵。有人认为《大卫·格德尔》这部小说体现了某种“忏悔的意味,扭曲而陈旧的宗教情怀,有时无意识的虐待倾向,以及顽固的念头:即生活中一切努力皆白费,人兽无别”^{[4] P.211)}。把大卫这个人物与作家的银行家父亲进行类比是徒劳无益的。作者描绘的大卫,是父亲,同时也是自己,是所有身边的犹太人。大卫承载的是犹太人的集体命运。谁能逃脱命运无情的诅咒?作者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命运的牺牲品。就像《狗与狼》中,本与哈里两个犹太青年,一个住在犹太贫民区,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完全符合作家常用的比喻:人如狼;另一个出生富裕家庭,被父亲一手送进了法国上流社会,但充其量,是被驯化了的狼——狗。如果认为内米洛夫斯基是反犹太人的,那么毫无疑问她首先把自己当成犹太人的“典型”进行残酷地冷嘲热讽。大卫是作家创作的犹太人集体肖像。内米洛夫斯基是个颇为合格的肖像画家,她善于观察,大胆反映,不放过任何细节。灵魂的任何邪恶丑陋,如何能不在脸上留下无情的痕迹?一如给作家文学启蒙的王尔德笔下的道雷安·格雷肖像。纵有奇术保持童颜不老,画中那龇牙咧嘴狰狞可怖的自己永远要去面对。写犹太人大卫,正如作家写自己,她对这一切太熟悉。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中没有幻想与掩饰,一切都被拉到明处,经由现实与讽刺的洗礼,还原为琐碎的人生碎片,映照出人生的浅薄与命运的无情。这种透彻(下转第128页)

《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弗洛伊德解读*

刘 舒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外语系,江苏泰州 225300)

[摘要] 本文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分别对菲茨杰拉德与其小说中的人物盖茨比及尼克进行分析,探究他们命运发展的不同以及必然性。在菲茨杰拉德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之间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本我、自我和超我三种人格之间不断的矛盾、约束而统一。

[关键词] 《了不起的盖茨比》; 弗洛伊德; 人格结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90-03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这位心理学家首次提出该学说时在自己的祖国奥地利深受非议。然而,精神分析学说却漂洋过海,对美国20世纪初期的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受其影响较大的美国作家之一便是菲茨杰拉德,其代表作《夜色温柔》明显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的影响。对于他的另外一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学者们则更多将研究的方向聚焦在它独特的叙述角度上。菲茨杰拉德作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其一生荣辱与该小说中的两位主要人物盖茨比和尼克均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但细读起来又存在许多不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及尼克两个角色诞生的原因之一。在菲茨杰拉德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之间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本我、自我和超我3种人格之间不断的矛盾、约束与统一。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

20世纪初,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并在其后出版的《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提出了“三重人格结构学说”。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有3个层次,即为人熟知的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人格的这3个层次能够通过努力相互协调,使得各自能

够在自己所处的部分正常运作。然而,一旦这3个部分不能够调节彼此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格实体的人就会对自己产生不满,对外界不满,从而导致这个人的心理问题或者是疾病的产生。首先,最低层次的本我不受逻辑、理性、社会习俗等等一切外在因素的约束,仅受自然规律即生理规律的支配,只要求欲望立即得到满足,遵循“快乐原则”。与此相反,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总是清醒地正视现实。自我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对本我进行控制和压抑,从而挽救它免遭灭亡。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次,由良心和自我理想两部分构成。它代表道德方面的要求,受“道德原则”的支配;超我的职能在于指导自我去一直本我的冲动,不断以内疚或犯罪来纠正偏离及违反道德规范和理想的行为”。^{[1] P.28)}

弗洛伊德的这一“三重人格结构学说”对哲学、艺术、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指出有这么两种作家:一种作家像写英雄史诗和悲剧的古代作家一样,接收现成的材料;另一种作家似乎创造他们自己的材料。我们的主人公菲茨杰拉德很显然属于后者——“作家用自我观察的方法将他的‘自我’分裂成了许多‘部分的自我’,结果就使他自己精神生活

*[收稿日期] 2011-04-01

[作者简介] 刘舒(1985-),女,江苏泰州人,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外语系助教。

中冲突的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现。^{[2] (P.36)}

二、矛盾的自我：菲茨杰拉德

几乎所有的作家在创作作品时都会有意无意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其中，菲茨杰拉德充满着矛盾与冲突、理想与困惑的一生，使得他有着强烈于常人的欲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分别属于自己性格矛盾双方的角色。

菲茨杰拉德 1896 年 9 月 24 日出生于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然而待小菲茨杰拉德过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似乎走入了穷途末路。父母为了不让儿子失去做贵族的体面，将他送入了最好的私立中学学习，少年菲茨杰拉德也是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1917 年，21 岁的菲茨杰拉德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惑，放弃了学业应召入伍。此后他爱上了一位法官的女儿娜尔达，并且和她订婚。大战结束以后，他回到纽约谋生，收入微薄，前途渺茫，未婚妻立即解除婚约。绝望之际，菲茨杰拉德修改并出版了《人间天堂》，从而一举成名，如愿以偿地和拜金的娜尔达结了婚。婚后的夫妇俩沉湎于奢侈的生活中，挥金如土，成为纽约和巴黎社交界的名人。这种狂热的生活使得菲茨杰拉德经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去写一些自己也不愿多读的作品来维持体面的生活。《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后不久，娜尔达就得了精神病。此后他的作品便再也没有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最终在《最后一个大亨》刚写出 6 章时结束了悲剧的一生。

生活中的起起伏伏以及在奢华生活与捉襟见肘间的飘忽不定，给了菲茨杰拉德双重的人格。一方面，他似乎是超然于世、远离尘嚣、专司写作的作家代表。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又少不了透露出一种被现代人称作商业气息的味道。正如人格结构论所陈述的，自我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具有现实感，遵从将欲望延期之行的现实原则，使用各种防御机制处理内心的焦虑。带着少年时就建立起来的文学信仰，菲茨杰拉德却还能够“屈尊”去写一些自己都觉得羞愧的作品，这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充分发达和成熟“自我”的人，在面对艰难的生活或精神上的压抑时能够灵活处理，以维持自己与现实的和谐关系。当然，这种和谐仅仅是表面上的：一方面，他深深沉迷于这种及时行乐的生活，梦想着一夜暴富便能拥有一切，恣意狂欢；另一方面，他内心又郁积着对上流社会寄生虫般生活的不屑与敌意，时常告诫自己在道德上要与之划清界限，来追求一种纯洁的自我

理想的实现。

三、冲动的本我：盖茨比

读者在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过程当中，往往会觉得盖茨比这个人物颇为可笑。作者加在他名字之前的这个修饰语“了不起”，就好像是皇帝的新衣一样，实无却有，令人发笑。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出身于中下层阶级的盖茨比，不像汤姆那样有优良的血统，不如菲茨杰拉德那样有杰出的才华，不比尼克那样身处泥潭却保持纯净的品格，从地位、学识、道德方面都称不上“了不起”，算不上“大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暴发户，却在自己的豪宅之中夜夜笙箫，极尽奢华之能事。花费血本大操大办似乎是有收买人心之嫌疑，而企图收买的又是早已一个嫁入豪门的少妇之心。家产万贯，窈窕淑女何以难求，又为何非要在黛比这棵已有主的雏菊花上吊死？这显然又不太像一般暴发户的所作所为。说到底，就是因为站在暴发户身后的人是菲茨杰拉德。盖茨比这个人物就好像一匹野马在菲茨杰拉德心中奔腾，美国梦的逐渐破灭使得野马在内心的挣扎更加狂暴。然而菲茨杰拉德不能这样，内心再怎样痛苦、矛盾，解脱束缚的心再怎样急切，他也不能逃避一个社会人的社会责任。终于有一天，野马挣脱了束缚，跳出了囹圄，跃然于纸上，化身为盖茨比。

盖茨比就是这样一个由“本我”支配的人，他自私、任性、缺乏耐性、浅薄。正如尼克所说，盖茨比代表了他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当然，这一切也是菲茨杰拉德所唾弃的。另一方面，菲茨杰拉德又不得不承认，盖茨比“对于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并称之为某种“创造性气质”——“一种异乎寻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3] (P.4)}这是作者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发现过的气质，而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就是作者自己，只是它从未挣脱出作者的内心，或者换句话说，他一直隐藏于菲茨杰拉德的潜意识之中。这一点可以从弗洛伊德的压力理论当中获得印证，这种潜意识不断在受到来自主体的压抑和抵抗，这种被压抑的东西最终就被合并到本我当中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

四、道德的超我：尼克

尼克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见证者，参与者，我们可以称其为“作画的画中人”。这位画家冷静、理智、总览全局而又超然于世。他既是小说中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也是小说中代作者发表其道德评判的发言人,他代表的是介乎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美国中西部的传统观念和道德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拥有纯真道德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成功地塑造了尼克这一人物,见证了一战后美国的物欲横流和道德败坏的社会风貌。尽管尼克在故事的一开始也曾经为“发财梦”所吸引,为盖茨比所拥有的财富而炫目,甚至与富家女乔丹发展了一段似有似无的缱绻故事,然而在如海市蜃楼般美丽的生活向他涌来时,他却选择了退却。退却不是懦弱,菲茨杰拉德似乎想用尼克的退却来证明其看透一切的清醒以及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纯净。回过头来看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创作年代,在深深陷入了那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之后,菲茨杰拉德才发现自己已无法自拔,现实中的救赎已然没有可能,只有在作品中才能实现自己少年时那似乎迷茫但现在看来愈发清晰的梦想。

通俗地讲,尼克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道德化了的菲茨杰拉德。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通常讲的良心,二是自我理想。在小说的第一章,尼克的父亲就教导过尼克“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各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的条件”(31P.3)。很显然,有人特意在尼克身上附加了这种“道德优越感”或者说是一种“道德纯净”。这个人并不是小说中那个虚构的“父亲”,而是作者菲茨杰拉德。可见在小说创作的初始,菲茨杰拉德就致力于把尼克塑造成一个自己梦想做到却又完成不了的道德模范:“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的

姿势。”(31P.4)尼克面对自己迷恋的“富家女”,尽管不舍却能勇敢离开;在深陷这样的泥沼之后,仍能“全身而退”。这种“全身而退”正是菲茨杰拉德追求的,也是他做不到的。人在现实的潮流之中往往只能随波逐流,文学家实现理想状态的最佳方式就是塑造一个代表自己“超我”人格的人物,实现自己在现世不能完成的理想。

五、结语

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分析,本我、自我、超我是很难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中出现的,它们会彼此冲突,相互抑制。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中,作为问题解决者的自我——菲茨杰拉德,却用文学创作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我、自我、超我分别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中,以主人公、作者、叙述者的角色出现,使得这三重人格在同一场景下相遇了,也使得读者在读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同时,能够发现他内心的“撒旦”和上帝,使得作者这个本应只站在作品之后的人物,来到了幕前,变得更加生动、立体。

[参考文献]

- [1]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2]林骧华.现代西方文论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 [3]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南山)

从面子理论看短篇小说《被窃的信》的人物关系*

徐 薇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本文运用 Brown 和 Levinson 的面子理论对短篇小说《被窃的信》的对话进行分析, 突出了“面子”在表现人物关系以及对推动故事发展所起的作用, 从而进一步体现了面子理论在交际中的价值。

[关键词] 消极面子; 积极面子; 人物关系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93-03

一、前言

“礼貌”本身是日常生活行为中具有道德或伦理意义的一项行为准则, 这一概念一旦进入到语用研究的领域, 就有其独特的理论内涵。^{[1] P. 225} 1978年 Brown 和 Levinson 提出了其礼貌理论——“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 Theory, 简称为 FST)。他们将面子划分为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和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消极面子是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 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 积极面子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Brown 和 Levinson 认为,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意欲为自己挣得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 但是有些言语行为具有固有的威胁面子的性质, 而讲究礼貌就是要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面子带来的威胁。^{[1] P. 226}

本文试以 Brown 和 Levinson 的面子理论为基础, 以短篇小说《被窃的信》的对话为语料, 探讨“面子”在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关系以及对推动故事发展所起的作用。

《被窃的信》是世界公认的侦探小说的鼻祖——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杜宾系列的最后一个故事。爱伦·坡的侦探小说情节跌宕起伏, 人物性格鲜明, 愚蠢的警察与天才的侦探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比。较之《摩格街谋杀案》和《玛丽·罗杰疑案》, 爱伦·坡在《被窃

的信》中运用了大量的对话, 更直接地展现了警长 G 先生和侦探杜宾之间的冲突。

无论是骄傲自负的警长, 还是孤傲阴郁的侦探, 爱面子都是其性格上的一大特点。在故事中, 他们或是针锋相对地争面子, 或是各为所需地给面子, 面子的较量已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一大动力。在这场面子的博弈中, 两人或紧或松、亦敌亦友的关系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以面子为中心分析人物关系

1. 争面子——针锋相对。

故事是以警察局局长 G 先生在一个傍晚拜访杜宾, 向他请教一件公务为开端的。王室丢失了一封重要的信, 警方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被 D 大臣取走, 而且信就被这位大臣藏在家中。然而警方费尽心思办案却一无所获, G 先生只得向杜宾求助。

“If it is any point requiring reflection,” observed Dupin, as he forbore to enkindle the wick, “we shall examine it to better purpose in the dark.” “That is another of your odd notions,” said the Prefect, who had the fashion of calling everything “odd” that was beyond his comprehension, and thus lived amid an absolute legion of “oddities”.

“Very true,” said Dupin, as he supplied his visitor with a pipe, and rolled toward him a comfortable

*[收稿日期] 2011-03-30

[作者简介] 徐薇(1979-), 女, 江苏徐州人,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讲师。

chair.

伴随着对话,面子的较量也拉开了序幕。侦探杜宾来自一个高尚显赫却已没落潦倒的家族,他敏感机智而又消沉避世,暂居在某个荒僻地带的古老官邸,一味地沉浸在个人的世界中,终日沉迷于由黑暗引发的狂想里。可见,性格孤傲的杜宾极为重视自己的消极面子,厌恶受到外界的打扰,而警长的拜访恰恰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听说警长是来请教公务,杜宾随即提出在黑暗中谈论的要求,这是对自己消极面子的自觉维护。

对于杜宾的建议,警长没有断然拒绝,只将其称为“怪念头”。身为巴黎警察局局长的G先生不免傲慢自大,可偏偏此次是来请教问题的,所以一贯嚣张的态度不得不略有收敛,但收敛的同时又禁不住自以为是对杜宾讥讽一下。

尽管警长小小的挑衅伤害了杜宾的积极面子,但杜宾不仅没有放在心上,甚至还表现出极力的赞同。这并非是杜宾的自我贬低,而是在满足对方积极面子的同时更为自己争得了消极面子,这种以退为进的做法既达成了杜宾自己的心愿,又缓和了与警长的关系,使得谈话可以顺利进行。

“Why, yes; and not exactly that either. The fact is, we have all been a good puzzled because the affair is so simple, and yet baffles us altogether.”

“Perhaps it is the very simplicity of the thing which puts you at fault,” said my friend.

“What nonsense you do talk!” replied the Prefect, laughing heartily.

杜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警长口中所谓的麻烦事的症结所在,对于这帮终日碌碌无为的警察来说是切中要害的。身为警长的G先生自然心知肚明,对于杜宾的不留情面,他一边开心地大笑起来,另一边又称其为“胡说八道”,予以坚决的否认,这符合其既要面子又老练圆滑的处事风格。

杜宾威胁警长积极面子在先,警长伤害杜宾积极面子在后,但毕竟警长是来求教的,所以这几句争执最终在警长的哈哈一笑中告一段落,紧张的关系又变得轻松起来。

“Why, I will tell you,” replied the Prefect, as he gave a long steady, and contemplative puff, and settled himself in his chair. “I will tell you in a few words; but, before I begin, let me caution you that this is an affair demanding the greatest secrecy, and that I should

most probably lose the position I now hold, were it known that I confided it to any one.”

“Proceed,” said I.

“Or not,” said Dupin.

即便说起了正事,警长也不免官腔十足、故弄玄虚,还没有步入正题就要求听者必须严守机密,对听者的消极面子不屑一顾。而杜宾恰恰又极为珍视个人的消极面子,面对警长那副官场派头,他毫不客气地说“要么别讲”,表现出其高傲的个性和不以为然的态度,同样威胁了警长的消极面子。

在此,警长伤害杜宾消极面子在先,杜宾威胁警长消极面子在后,妄自尊大的警长受到杜宾的回敬,气焰平息了不少,也不再故意拿捏着说话,老老实实地交代起事情的始末。

2. 给面子——各为所需。

费了不少口舌警长才将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尽管警方对此一筹莫展,警长仍不忘记炫耀自己得到王室的信任而备受重用,于是他和杜宾之间就产生了这段令读者回味无穷的争执。

“Than whom,” said Dupin, amid a perfect whirlwind of smoke, “no more sagacious agent could, I suppose, be desired, or even imagined.”

“You flatter me,” replied the Prefect, “but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such opinion may have been entertained.”

面对警长的自鸣得意,孤傲的杜宾没有直截了当地奚落,他采取面子策略正话反说,含蓄地进行了回应,从而减轻了对警长积极面子的威胁。而世故的警长也不可能听不出杜宾的言下之意,但是直接揭穿杜宾的意图不仅威胁对方的积极面子,而且也会使自己难堪,于是他故意装傻,将其理解成一种恭维,并给予充分的认可。不可否认,在业务上总需要别人帮忙的警长在为人处世上确实圆滑世故,给别人留了面子的同时也给自己挣了面子,还有效地避免了尴尬的场面。当然一向自负的警长也并不甘心受人愚弄,紧接着话锋一转,再次标榜起自己,充分满足了自己对积极面子的需要。

警长和杜宾的争执还不止于此,当谈及窃信的大臣也是位诗人的时候,警长表现出的对诗人的蔑视立刻引起了热爱诗歌的杜宾的不满。

“Not altogether a fool,” said G. “but then he is a poet, which I take to be only one remove from a fool.”

“ True ,” said Dupin , after a long and thoughtful whiff from his meerschaum , “ although I have been guilty of certain doggerel myself. ”

警长对 D 大臣藏信之事毫无头绪 ,却不思反省 ,自以为是地认为诗人几乎就是笨蛋 ,这对推崇诗性智慧的杜宾来说是极为受伤害的。杜宾再度使用“反语”来回应警长 ,表面上是对警长的赞许 ,看似是为了维护听话人的积极面子 ,不得不贬低自己 ,牺牲了自己的积极面子 ,实际上却利用这种自嘲表达出强烈的讽刺意味。毕竟精明的警长被口中的笨蛋大臣弄得不知所措 ,反过来又要向另一个热爱诗歌的笨蛋求教 ,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

大概过了一个月 ,警方再度搜寻后仍然一无所获 ,沮丧的警长再次拜访了杜宾 ,重新谈起那封失窃的信。

“ How much was the reward offered , did you say ?” asked Dupin.

“ Why , a very great deal——a very liberal reward——I don't like to say how much , precisely , but one thing I will say , that I wouldn't mind giving my individual check for fifty thousand francs to any one who could obtain me that letter. The fact is , it is becoming of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every day ; and the reward has been lately doubled. If it were trebled , however , I could do no more than I have done. ”

杜宾开门见山地问起这个案件的赏金 ,警长吞吞吐吐最终也只是含混地说不介意开张五万法郎的个人支票。一向注重积极面子的警长这次异乎寻常地在乎起自己的消极面子 ,其中利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关名利警长就兜起了圈子 ,其老奸巨猾的官场形象暴露无遗。

“ I really——think , G. you have not exerted yourself——to the utmost in this matter. You might——do

a little more , I think , eh ?”

“ How ? ——in what way ?”

“ Why——puff , puff——you might——puff , puff——employ counsel in the matter , eh ?——puff , puff , puff. Do you remember the story they tell of Abernethy ?”

当警长急切地等待着杜宾的指点时 ,杜宾也转弯抹角地讲起话来 ,杜宾在这里运用隐喻讲了一个吝啬鬼不愿出钱 ,费尽心思地请医生阿伯内西给他开处方的故事。故事似乎与这起窃信案毫无瓜葛 ,可杜宾正是通过故事的寓意迂回地使警长了解自己的意图 ,同时又避免了直言不讳带来的尴尬 ,从而降低了警长消极面子受威胁的程度。最终 ,警长拿出了支票 ,杜宾也顺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虽然孤傲的杜宾对警长不屑一顾 ,但毕竟显赫的杜宾家族已经没落潦倒 ,杜宾不可能不面对现实的生活 ,既顾及了警长的颜面 ,缓和了与警长的关系 ,又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这才是杜宾的聪明之处。

三、结语

通过以 Brown 和 Levinson 的面子理论为基础对短篇小说《被窃的信》的对话进行分析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面子”在表现人物关系以及对推动故事发展所起的作用 ,从而进一步体现了面子理论在交际中的价值。“言语交际中的礼貌策略只是一种手段 ,使用礼貌策略这一手段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较好地达到交际目的 ,满足人们的面子需求。”^{[1] (P. 226)}

[参考文献]

- [1]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南山)

《四库全书》与文化闭关探析*

蔡怀舜

(江苏教育学院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四库全书》是乾隆举全国之力编纂的中国最大一部典籍,它的问世影响深远。本文拟从四库全书角度就乾隆禁教,修书在整顿中国文化思想方面互为表里以及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中国文化流向的影响的论述,阐明它是乾隆闭关政策在中国文化领域进行的产物,从而对《四库全书》作出新的认识。

[关键词] 四库全书; 文化闭关; 传教士; 文化流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096-05

一、引言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力亲为严格监控下完成的一部宏伟巨制。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仅颁布“圣谕”在《四库全书总目》就收录有25道。^{[1] (pp.1-8)}举全国之力,直接参与者多达4000余人,其中包括一时学术俊杰,如纪昀、谢墉、戴震、周永年、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等名儒300余人,耗时19年(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五年)。四库全书收录典籍凡3461种、79309卷;四库全书存目收录典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1] (p.3)}全书涵盖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学术领域,汇集了中国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文化典籍。其编修君臣一心、收书之广、耗时之长,确实前无古人。自问世以来,便以它独特的魅力不断吸引着文人学者对其进行探讨研究。

自清末以降,对《四库全书》的研究评价一直褒贬不断。褒者认为官修《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文化典籍,乾隆“文治武功”“盛世修典”。贬者认为官修四库是乾隆皇帝为满清统治,镇压士林反清思想而禁毁图书,给中国文化典籍造成一场浩劫。不可否认官修四库既然是举全国之力,那就是一个极大的文化事件,也可说是一个极大的社会事件。它必然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事件发生联系,也必将不同程度地反映同时代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共性特征及普遍

性问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颁布“一口通商”旨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颁布《防夷五事》,对洋人贸易的闭关在经贸领域首先完成。而在文化领域,对洋人传教活动的禁止及对民间反清思想(如文字狱)的镇压仍在继续,虽经过乾隆十一年(1746年)席卷全国的禁教高峰之后,稍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有所收敛,但传教活动更趋隐秘,甚至有的与民间反清活动相互混合。

适此等社会背景,乾隆三十七年开编《四库全书》就绝非仅为盛世修典,也非乾隆为了保存中国文化典籍或其自诩的“稽古佑文”,而是与禁教互相配合,针对反对、违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和天主教异端邪说进行清整,特别是要扭转西方天主教义人文思想对中国儒教文化产生的影响和冲击,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官修四库全书实质是乾隆闭关锁国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进行的重要一环,这一环能否进行顺利,还有待于朝廷对天主教禁绝一环的协助,即外来影响没消除,对内谈何拨乱反正。因此传播天主教义文化思想的传教士首先遭到乾隆的残酷打击。

二、禁教——禁断西方文化输入的文化闭关

前清统治者为何如此痛恨天主教,完全是由天

*[收稿日期] 2011-04-20

[作者简介] 蔡怀舜(1956-)男,江苏南京人,江苏教育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相冲突引发的结果。

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很早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典章制度和高度发展的礼仪文明,而尤以儒教学说居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并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和统治基础的正统思想体系。满清以外族入主中原之后,也很快选择了正统儒学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在清统治者看来,只有传统儒学才是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维持其政权统治的最佳选择,也是其本身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1704年罗马教廷圣礼部通过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决议,即所谓“七条禁约”,禁止中国教民敬孔祭祖。^{[2] P. 89-92}从而引发了满清禁教的导火索。这之前西方传教士自利玛窦始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历时近120余年,至康熙末年,各省的天主教徒,人数已达30万,拥有教堂、住院300座以上。^{[3] P. 117}这么大的规模怎不引起统治者的忧心?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传教士宣扬的天主教义,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意志自由”、“自主自立”、“原罪”等,逐渐被社会中下层民众所接受,突破了封建儒教思想的范畴。其次,为了追随上帝可以“舍其父母,后其君长”以及“一夫一妻”等天主教义,与中国封建等级制度和儒教伦理道德格格不入;传教士宣扬西方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体制、君民同受法律约束的思想,更不被以“皇权至上”的满清统治者所接受。雍正就明确指出:“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4]所以清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让天主教蔓延开来,会削弱传统的文化思想,违背儒教的纲常大义、伦理道德,社会将失去稳定并将会威胁其统治。因此禁教成了清统治者必须做的大事。

然而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就开始禁教,雍正禁教也可谓严矣,但传教活动禁而不止。乾隆秉承先朝禁教政策,一改雍正驱逐教士撤毁教堂教民改宗做法,采取更严酷措施:对犯禁传教士直接予以处死,对信教民人实行流放。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福建福安县引发的全国性禁教风暴,处死费若用等4名传教士。次年苏州多明我会的葡萄牙人黄安多与意大利人谈方济,也以“散布邪说,煽惑良民”罪被绞死。同年,传教士李世辅在江西鄱阳县被捉,处以“永远牢固拘禁”。此次风暴历时三年,捕获传

教士十余名,捉拿中国教徒上千人,并搜缴大量经书、图像等宗教用品。对于抓获的信徒,处流放或刑杖。如乾隆十二年抓获黄安多与谈方济一案,与两位传教士同时被抓的还有苏州、常熟、嘉定、太仓、丹阳、上海等地的百余名信徒。经过三县会审,“判西洋人拟绞、唐德光、沈陶氏永流边外;其余杖一百,枷一个月”^{[5] P. 49-50}由于传教士继续私入内地或民间对天主教义有所接受,传教活动仍有秘密进行,其“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统治者对传教活动与反清活动有否勾连心存疑惧。乾隆十七年(1752年)湖北发生马朝柱反清案,朝廷怀疑与传教士有关。该案马朝柱言称“西洋出有幼主”,其所建天堂寨又与天主教义宣扬的“天堂”二字相符,因而引起官府对传教士的怀疑,把传教士当作马朝柱的同伙而一并搜捕。^{[6] P. 197}前者乾隆那么坚决关闭贸易口岸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止西方传教士私自潜入中国。但也有少数传教士不顾朝廷禁令铤而走险,其结果依然被捉还累及地方官员监察不力或罢或贬。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湖北查获过境意大利传教士四人又引发乾隆时期第二次大规模的禁教高潮。禁教波及十余省,拿获的四名传教士供认自广东登岸,途经广东、湖南、湖北三省,辗转近千里,至襄阳始遭查获。乾隆深为地方官员疏于盘查而恼怒,加之捉拿传教士时充当通事(翻译)的中国教徒意外走脱,负责传教士入境及行程安排的中国人蔡伯多禄又久捕不获。乾隆在批阅奏折之时,多次严词训斥:“屡经传谕各该省督抚严切查拿,已隔两月有余,未经就获,足见一切废弛,又安用此地方文武为耶?”^{[7] P. 86}该案持续两年,搜捕传教士数十人,中国信徒数百人,获罪官员若干。^{[7] P. 86}诚如传教士所言“自从传教士来到北京之后,……没有一个皇帝比乾隆皇帝更严厉地禁教。”^{[8] P. 212}此后传教活动在中国逐步走向衰寂,再也未能形成规模和气候,禁教终于由乾隆得见成效。

禁教表面上虽是对传教士聚众煽惑人心,信奉天主的传教活动,实质上是对传统中国儒教思想体系的稳定性的维护,为清除国内“异端”思想做好准备。禁教的结果是传教士越来越少。由于传教士在中国“学术传教”的特点,即以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方式来传播天主教。他们传教的主要方式:一是口耳相传的聚会活动,一是著书立说的书籍流通。所以仅其译著西书记载就有“437种,其中宗教类251种,占57%;人文科学55种,占13%;自然科学131种,占30%。”^{[9] P. 39}可见,传教士的译著虽以宗教类

为主但也涉及了其他科学领域。应该看到西学的传播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不仅开阔了中国文人对世界认识的眼界,也促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科学实学”的诞生。传教士实际上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驱逐镇压传教士客观上切断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中国又与外部世界割裂而形成文化闭关。这在统治者看来,从源头上断绝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既有助于整顿西方宗教人文思想对儒教文化已形成的破坏,又有助于重塑儒教才是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维持其政权统治的正统文化。因此他们不允许天主教在中国生根蔓延,也就顾不上自然科学文化对中国社会有多大益处了。

三、修书——摒弃西方文化的最后终结

与禁教相配合的是对传教士已传播的西方文化的摒弃与清理,乾隆是以修书来达此目的。历朝官修大型图书都是通过典籍的取舍,外显或内隐的批评,力图重新构建一个凸显统治合理的文化秩序,为其统治的合法性寻求解释权,显现着官方思想和主流思想的立场。《四库全书》更莫能外,与以往历代修书所都不同者,是皇帝的认知更明确,做到直接监督和亲力亲为。修书伊始,乾隆就为《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划定了严格的采集标准:“唯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说,盖不准收录”。^{[10] I P. 140)}关于西人书籍,史载1620年传教士金尼阁来华,随身所带图书7000余部;1689年传教士汤若望赴华时,携带个人藏书达3000余卷^{[11] I P. 170)}。尽管这些书籍因文字隔阂,鲜有人问津提及,但传教士在华的撰著口译,数量也相当可观。检查《四库全书总目》,除纳入《四库全书存目》的13种之外,传教士以及与中国合作者的著作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仅著录21种。从收录的图书种类可见,《四库全书》对天主教义人文思想之书确实一本没收,天主教思想学说与违碍满清统治的思想著说一样,都是被处异端之列,体现了乾隆编书思想。但有趣的是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态度,乾隆对传教士的西学实绩于不顾,如测量大清版图,修订历法,制造火炮等等,依然秉承其先祖康熙“东来说”的思想,完全表现出“华尊夷卑”的天朝气势。四库馆臣深刻领会圣意,为表明中国文化远远胜过西方文化,极尽牵强附会贬低西学,使《四库全书》成了评定中西文化优劣名分的官方宣言。

首先,西学落后于中国古学。如《四库总目》对

收入四库的利玛窦《乾坤体义》评价说:“《乾坤体义》二卷,明利玛窦撰。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1] I P. 894)}总目指明了利玛窦天文算法,在中国古代典籍早有记载。再如《四库总目》对《周髀算经》的提要中,提到《周髀》“其本文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原”,又说“明万历中,欧罗巴人始别立新法,号为精密。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隕而下也。……西法多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9] I P. 891)}

其次,西学师法于中国古学。如对于南怀仁的《坤輿图说》《四库总目》评论:其所记述有与中国古代之《神异经》之所载相合者;“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船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粉饰,而不尽虚伪。存光异闻,固亦无可也。”^{[1] I P. 634)}是说西方人到了中国,看到中国古学典籍,就师法中国古学再加以变化而已。

第三,天主教文化荒诞,西学实属异学。如《四库全书》对待《天学初函》即西学的态度。该书是李之藻晚年编印的一部西学丛书,分理编和器编。理编收入《西学凡》《天主实义》《辩学遗牍》《唐景教碑书后》《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七克》《灵言蠡勺》《职方外纪》10种。器编收入《泰西水法》《简平仪说》《浑盖通宪说》《同文算指》《几何原本》《圆容较义》《表度说》《测量义法》《天问略》《勾股义》10种。李之藻在书前题词中特意说到,西学“显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根宗”。但《四库总目》对于该丛书的评价却是:“西学之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故不深辩,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之藻等传其测算之术,原不失为节取,乃并其感诬之说而刊布之,以显与六经相龃龉,则甚矣。今择其器编十种可资测算者,别著于录。其理编择惟录《职方外纪》,以广异闻,其余概从屏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1] I P. 1136)}《四库全书》以儒学纲常名教的价值观,把利玛窦传播的天主教义视为悖乱纲常,不可施行于中国的异端。因

而不仅对是书理编“概从屏斥,以示放绝”,而且大黜编者“左袒异端之罪”。同时,对于器编中的个别著作《四库全书》也依据“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原则作了删减。如阳玛诺《天问略》《四库总目》认为“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但“盛传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欲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11 P.895]故在收录时对此类内容进行了删除。即使将理编的著作如《西学凡》“存其目与杂家”,也不能幸免斥评:“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11 P.1080]

第四,否定排斥科学实学。如对《奇器图说》的评价,该书是传教士邓玉函和王徵从多部西文力学著作、西文机械著作及部分中文书籍中选取内容,将力学理论和机械知识撮合为一的科学著作。其成书的年代,正是欧洲科学发生革命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其核心恰是在近代科学产生的过程中具有先行和典范意义的力学。王徵编译该书则针对中国的现状完全是以实用为目的,希望唤醒社会对科学实学才是经世致用的根本性认识。该书的问世,可说是中国士大夫有识之士为改变中国文化认知的一次努力。而《四库全书》馆臣对《奇器图说》盛赞力学的“美好”很不以为然,称其“俱极誇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诞恣肆,不足究诘”。^[11 P.984]以此表明了官方对自然科学地不屑的态度,此非为正统治学之道。可见所谓的“节取其技能”并不是为了向国人推广学习之用,而只是“以广异闻”而已。

凡此种种,其例不一而足。西方宗教文化荒谬“技能”之学也不足取,只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圣人之学,能够经世致用。作为官修《四库全书》的态度就是乾隆的态度。乾隆以天朝上国自居,把天朝以外的国家都视为蛮夷,断绝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以为以儒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经世致用的文化。对此,陈旭麓先生曾批评说:“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12 P.172]抑或说官修四库全书的基本精神就是维护中国儒教文化的千古不变以守其正统之位。“洵乎大圣人制作,万事无出其范围者矣”。^[11 P.898]至此官修《四库全书》以对西方文化的批判黜伐的定型而成为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终结者。

四、《四库全书》后中国文化发展流向

《四库全书》的问世给 18 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带

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文化思想又重新统一于儒教文化的范畴之内,以至扭转了中国文化学术研究刚刚新兴的务实之风。在乾隆以前的 200 多年间,耶稣会传教士为传教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中国的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接受天主教同时,也成为了传播和利用西学的带头人。其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明清之际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徐光启重视天主教不仅在于其宗教理论能“补儒易佛”,更在于那种“格物穷理之学”。他撰写《农政全书》,研究兴修水利;“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急务也”。^[13 P.817]李之藻通过与中国传统的学术理论相比较发现:“西学”精及性命,博及象纬舆地,旁及勾股算术,有中国儒先累世发明未晰者”。^[14 P.501]把这些先进的知识吸收过来,才能够“切生民之日用”。杨廷筠则因为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有直接补充传统儒学体系缺乏的短处,所以将西学称之为“实学”;“取西来天学与吾儒相辅而行”;“西贤之行皆实行,其学皆实学也”。^[15]徐霞客接受西方地理学重视“实测”的方法,他多次深入蛮荒之地,写出《徐霞客游记》。其书中“江源考”还否定了一向被视为神圣经典的《禹贡》关于“岷山导江”的观点,证明长江导源于金沙江。据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征事考实,书之不足信如此”。^[16 P.60]之后有王锡阐、梅文鼎、焦循等人也从讲求实行、实证、实用、实效出发,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逐渐形成所谓中国“科学实学”。王徵在其《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中说:“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17 P.298]在朝廷禁教之前,中国文化又一次表现出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士大夫阶层接受西方文化而出现的人文启蒙思想以及学问于实用的治学方法,基本上与欧洲文化进展相一致。如张广达先生言:“这样地务实下去,恐怕没有哪一天能够走上系统地研究客观规律的道路”。^[18 P.104]或从而能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

然而文化闭关的结果,使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才有的探求西学新知植根实学的活力,复溶化于传统的冰火之中。既然《四库全书》以官方权威宣布西学源自中国,自然地学术研究就转向了学术考古,去“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了附会西法不是以探求知识向前看,而是为证明“西学之源”向后看。阮元就提倡说:“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之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妙,有非西人

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言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19 I P.429] 数学家罗士林研究方向的改易，可以看作是士大夫知识阶层复古倾向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例。罗年轻时“ 陋习西法、几以比例、借根为止境 ”，但后来受同乡阮元影响，相信昌明古法就能使“ 中学兴而西人退 ”。于是“ 幡然改辙，尽废其少壮所业，殫精乎天元四元之术……墨守终老，惟以兴复古学，昌明中法为宗旨 ”。^[19 I P.598] 以致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所谓“ 乾嘉学派 ”不断壮大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学风，弄到士林“ 人人以谈经名高，考据风炽 ”。^[20 I P.8] 在此种社会氛围所谓“ 科学实学 ”已无生存基础，它的研究既不被以儒教文化为经世致用的上层统治者所重视，又不为中国农耕社会以经验就能安身立命的下层人民所必需。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中国和日本受到不同对待就是例证。在西学不如国学的谬说推动下，整个社会视西人为“ 夷狄 ”，视西学为“ 异学 ”，士大夫知识阶层集体转向，考据学成一时之选。士子生员复埋头科举之路，背诵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至此，中国文化发展的流向终于又被扭回到传统的轨迹之上。

五、结语

乾隆亲自领导了编修《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如此身体力行，自然其意深远。除镇压反清思想外，中国社会政治统治的文化根基不容天主教文化破坏。但禁教在禁绝天主教义传播的同时，也拒绝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而纂修《四库全书》实际上就是对已发生的中西文化碰撞的一次大纠查，以官方的名义重新奠定了中国儒教文化的正统地位。《四库全书》的问世标志着乾隆奉行的“ 闭关锁国 ”政策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基本得以实现。

[参 考 文 献]

- [1]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M].北京 :故宫博物院 ,

1932.

- [3]郑琪.雍正时期禁教政策与禁教时期的天主教[J].理论界 ,2010(2).
[4]雍正五年七月癸酉谕[A].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五九)[C].
[5]徐允希.苏州致命纪略[M].上海 :上海慈母堂刊 ,1932.
[6]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M].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7]马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查禁天主教档案述论[J].历史档案 ,1999(2).
[8]朱静.洋教士看中国朝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0]计文德.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M].台北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1991.
[11]徐先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成因浅析[J].新西部 ,2007(6).
[12]陈旭麓.陈旭麓文集[M].上海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3]徐光启.测量法义[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八九册子部[C].
[14]朱维铮.利玛窦中文着译集[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15]杨廷筠.代疑续编·踏实[J].我存杂志 ,1936.
[16]张践.明清实学是西学东渐的思想土壤[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07(2).
[17]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A].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C].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8]张广达.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08.
[19]阮元.畴人传·利玛窦[A].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一六册史部[C].
[20]郑师渠.思潮与学派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南 山)

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的检索*

刘 枚

(江苏教育学院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查阅我国历史人物资料,检索我国地方志中人物资料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主要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编辑出版的大批国内外方志丛刊和各种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的目录索引以及数字化网络数据库收录方志情况,供需要检索者参考。

[关键词] 地方志; 人物; 索引; 检索

[中图分类号] G2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01-05

地方志记载一个地方的全貌,内容十分丰富,是我国特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地方志保存了我国各地自然、地理、物产、社会、经济、人文等多方面的资料,在我国古代书籍中许多无法找到的资料,在方志中却有保存。因此,不论研究我国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要搜集资料,查阅方志是不可或缺的。查找我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料,亦是如此。方志记载的是一个地区的人物资料,许多在正史等有关书籍中无法查到的人物生平事迹资料,特别是一些不很著名人物的资料,往往在方志中可以找到。正因为如此,查找人物资料,查阅方志是必不可少的。

要查阅研究所需的人物资料,就需要了解我国各地区省、府、州、县乃至乡镇编有哪些方志,何时间人所编,这些方志的收藏情况等,这就需要借助于方志目录的工具书。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两部重要的著录方志目录的工具书。朱氏《综录》1935年商务印书馆印行,1958年增订出版,著录方志7413种;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联合全国有关单位在朱氏《综录》的基础上,编辑了《联合目录》,著

录方志8264种,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是检索方志目录必备的工具书。又,台湾地区现亦存有方志,1985年王德毅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亦可供参考。^①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我国省、市、区190个图书馆所收藏的方志,主要是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各大图书馆和著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图书馆所藏方志。由于这部目录是1985年所编,其著录的方志都是1949年以前的刊本,不少方志只有少数单位有收藏,孤本方志、稿本方志只有个别单位有收藏。《联合目录》著录的方志和收藏情况是这样,所以要查阅方志书籍,不在这些收藏单位城市的研究者查阅不易,就是在这些收藏单位城市的研究者,有些为数甚少特别是稀见罕见方志,也不易查阅。更何况国内外所藏方志,约有2000种左右,《联合目录》未能收录,更难查阅。值得称许的是,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有了很大改变。国内收藏的大批方志、先后编辑

*[收稿日期] 2011-02-20

[作者简介] 刘枚(1965-),女,江苏南京人,江苏教育学院图书馆馆员。

① 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家也都藏有中国地方志,编有书目,亦可供参考。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録》,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198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録》(英)安德鲁·莫顿(Andr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中国方志目录》(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法)赫·涅艾特(Y. 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

为丛刊影印出版,有些国内没有收藏流失在国外的方志,也得到影印出版。与此同时,我国目前最大的古籍数字化开发中心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推出了一系列古籍数据库,其中有“中国方志库”,计划收录中国地方志10000种,内容包括全国总志,各省、府、州、县、村镇志等,涵盖全国2000个县市。原先不易查阅或无法查阅的方志,现在只要研究者所在地购藏了这些方志丛刊或研究者上网查阅“中国方志库”,就可以很方便地查阅所需方志。因此,要查阅检索这些方志,就要了解近20年来大批地方志丛刊影印出版的情况和网上“中国方志库”收录方志情况。

20世纪60年代,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全书107种,68册,是出版整套方志的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以后中断了20多年。1981年上海古籍书店将《选刊》重印出版,到90年代,许多出版社开始了大规模影印出版方志丛刊,先后影印出版的方志丛刊如下: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09种,32开精装,72册,上海书店1990年出版。《续编》所收录方志其中84种是世间孤本,15种是仅存2部的珍本,其余也是极少见的本子。

《宋元方志丛刊》,40余种,8册,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32册,精装16开本,199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罕见中国地方志汇刊》,200种,50册,中国书店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合作1992年出版。

《中国西北罕见方志》,9册,精装16开本,1994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

《中国西北罕见方志续编》,10册,精装16开本,199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

《明代孤本方志选》,12册,16开精装,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出版。

《清代孤本方志选》,60册,76种,线装书局2001年出版。本书所选方志为清前期(顺治、康熙、雍正)的府、州、县志中的佳作,内含河北8种、山东11种、河南5种、山西6种、陕西6种、安徽6种、江西15种、湖北5种、湖南1种、福建13种。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20册,精装16开本,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本书共收集流失海外为日本收藏、国内罕见的地方志16种。其中11种为明代所纂,5种为清代所修,多为国内无收藏

的罕见之本。

《孤本旧方志选编》,33种,精装16开,26册,线装书局2004年出版。

《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19种,32开精装4册,繁体排印,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出版。丛书按现在上海市行政辖区范围收录1949年前编纂之已刊本、未刊稿(抄)本旧方志。一地而有多种方志,全都收录。每种方志均标点分段,书前有“整理说明”。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罕见方志丛刊》,20种,精装16开,2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出版。

《陕西省图书馆罕见方志丛刊》,55种,精装16开,1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本书所收方志几乎涵盖了整个陕西:关中23种、陕南18种、陕北11种,另有外省地方志3种,其中30余种为陕西省图书馆独家收藏,每种地方志都进行了版本甄别并写了提要。

《南京罕见文献丛刊》,李海荣、金承平主编,南京出版社2006年陆续排印出版,其中有几种方志,如《明孝陵志》《盩山志》及近人编的《首都志》等。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罕见方志丛刊》,29种,22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出版。《丛刊》多为明、清两代抄、刻本,少数几种为民国时期的油印、石印或铅印本。其中10余种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独家收藏。

《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8种,8册,精装32开,排印,200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罕见方志丛刊》,28种,16开,40册,国家图书馆2008年出版。所选方志的收藏单位均不超过三、四家。书前有编者序言及各志提要。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罕见方志丛刊续编》,32种,精装16开,26册,200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地方志丛刊》,39种,精装16开,7册,巴蜀书社2009年9月出版。四川大学图书馆从馆藏清代和民国旧方志中挑选了首批39种海内仅存1至3部的四川地区珍稀方志加以影印出版,这批方志,均为巴蜀书社所出《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所未收,因此本《丛刊》可视为《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的续编。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14册,2009年6月,杭州出版社出版。

《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6册,10种,

2009年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16种,20册,国家图书馆2010年排印出版。

《复旦大学图书馆稀见方志丛刊》41种,精装16开,5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32种,精装46册,2010年出版。其中广东方志26种,省外方志6种。清刻本10种,清及民国间稿(抄)本16种。

《中国地方志集成》。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影印出版方志丛刊中,《中国地方志集成》这套方志丛刊,是大陆出版的最系统全面、规模最大的地方志丛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改名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3家出版社联合从1991年起开始影印出版。全书准备收录方志3000多种,47000多卷。《中国地方志集成》依我国现行行政区划,按省、直辖市、自治区分编为各辑,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专辑)等。所收方志包括通志、省、府、厅、州、县、乡镇志,时限下限为1949年。每一地有几种方志时,选用资料较丰富,使用价值较多者,一般采用最后一次所修之方志。方志选用较好版本,所用版本如有缺损或字迹不清之处,则用配补方法,以其他版本替换或修描。现知《中国地方志集成》已出版26辑,1000多册,16开本精装,其余4辑各册正在陆续出版中。已出各辑如下:

《江西府县志辑》87册99种,《上海府县志辑》10册22种,《西藏府县志辑》1册19种,《江苏府县志辑》68册109种,《浙江府县志辑》68册123种,《安徽府县志辑》63册88种,《福建府县志辑》40册79种,《湖南府县志辑》86册110种,《湖北府县志辑》67册113种,《广东府县志辑》51册109种,《山东府县志辑》95册180种,《山西府县志辑》70册174种,《黑龙江府县志辑》10册32种,《吉林府县志辑》10册49种,《辽宁府县志辑》23册55种,《陕西府县志辑》57册173种,《甘肃府县志辑》49册104种,《宁夏府县志辑》9册13种,《青海府县志辑》5册16种,《北京府县志辑》7册17种,《天津府县志辑》6册8种,《河北府县志辑》73册162种,《海南府县志辑》7册18种,《贵州府县志辑》50册126种,《四川府县志辑》70册207种,《云南府县志辑》83册99种,《台湾府县志辑》5册,17种。《乡镇志专辑》32册254种。丛辑只剩下河南、广西、内蒙古、新疆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省未辑成出版。

在20世纪6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的同时,台湾成文出版社从1966年到1985年影印出版了一套规模巨大的《中国方志丛书》,印出2035种,16开精装,5359册。这套丛书把我国主志分为七大片归类,省区按旧时行政区划分:

A华中(01江苏、02浙江、03安徽、04江西、05湖南、06湖北、07四川)B华北(08山东、09山西、10河南、11河北、12陕西、13甘肃)C华南(14广东、15广西、16福建、17云南、18贵州)D西部(19新疆、20西康、21青海、22西藏)E塞北(23宁夏、24绥远、25热河、26察哈尔、27蒙古)F东北(28辽宁、29安东、30辽北、31黑龙江、32兴安、33吉林、34合江、35松江、36嫩江)G台湾(37台湾)七大片区归类。

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最大的古籍数字开发中心,推出了系列古籍数字库,其中有中国方志库。“中国方志库”计划收录中国地方志从汉魏至民国时期的方志10000种,20余亿字,1000余万页图像,包括宋元明清民国中港台澳2000个县市,现在收入数据库的有江苏、浙江、广东(2005年推出)、山东、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湖南、安徽、福建、海南(2006年推出)15个省市自治区的方志初辑等。详情可上网查询:爱如生”网站: <http://www.ero7.com>。又可查询: <http://www.greatman.com.tw/fangchiku.htm>。又,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决定,在海内外率先采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建立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数据库,现已完成《中国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地方志书目检索系统》等项目。

大批地方志丛刊的影印出版,为查阅原有地方志文本提供了方便,但方志内容十分丰富,包含门类甚多,册数卷数成千上万,如能将方志中各门类内容,分类汇集出版,那就更便于研究者查阅使用了。国家图书馆有鉴于此,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着手进行这一工作,首先将地方志中人物传记资料汇编为《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这就为查阅地方志中人物资料提供了更大的方便。这部丛刊的编辑出版情况如下:

《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国家出版社藏有我国地方志6400多种,丛刊参考对照这些方志,选出其中约3000种,再在这3000种方志中,选录人物传记资料以及职官、选举、艺文等类与人物有关的资料汇编为丛刊,影印出版。丛刊中人物有数万人,时

限自上古至民国。这是一部收录人物资料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人物传记资料汇编。丛刊按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六大卷:西北卷,东北卷,华北卷,华东卷,中南卷,西南卷,已出版有下列各卷:

西北卷,全20册,精装16开本,2001年第1版。西北卷是从明清及民国时期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近600种方志中选取228种影印而成。

东北卷,全12册,精装16开本,2001年第1版。东北卷是从民国时期东北三省近200种地方志中选取228种影印而成。

华北卷,全66册,精装16开本,2002年第1版。华北卷是从明清及民国时期华北天津、北京、山西、河北、内蒙1100多种地方志中选取400种影印而成。

华东卷(上编),全80册,大32开本,2007年出版。从明清至民国时编撰的山东、江西、福建、台湾四省300种地方志中收录涉及4万多人物传记资料。

华东卷(下编),从明清至民国时编撰的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地方志中选取人物传记资料影印,正在编辑整理中,即将出版。

以上各卷每卷按省、府、厅、州、县、乡排序,每卷均编有总目,每一册编有细目,细目录入所选方志类目,类目分职官志、选举志等目,类目下又分大中小三级类目,如选举志下分进士、举人、贡士等。每卷后附有《人物姓名拼音索引》《人物姓名笔划索引》,单行一册《索引》与每册细目相互补充。《索引》统人,细目统类,构成非常方便的检索系统。

《历代释道人物志》(百部地方志选辑)苏晋仁、萧练子辑,1998年巴蜀书社出版。此书辑录100部地方志中释道人物传记资料。

检索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的最好工具书,当然是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的索引。我国最早编制的方志人物索引是1939年江苏省立图书馆曹允源编的《吴县列传人名索引》。这部索引,收录人物5000千余人,每一人物下标明朝代、籍贯及方志书名、卷数、页码等,但仅限于吴县人物,所引用的方志种数也很有限。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朱士嘉编制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新1版。此书收方志人物传记及职官、杂录等类中涉及的人物资料,共3949人,标名所收人物的姓名、字号及引用方志的卷数页数,以姓名笔画排序。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方志书籍特别是方志丛刊的影印出版,为配合研究者对检索方志人

物的需要,许多图书馆及有关研究人员编制各种方志人物传记目录索引以供研究者检索,陆续出版了以下方志人物传记索引工具书:

《福建通志列传八种人名索引》,福建图书馆编,1980年(福州)福建省图书馆出版。

《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沈治宏、王蓉贵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根据《宋元方志丛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四大方志丛书所收302种方志编制而成,收录宋代人物资料10.4万条。只要是方志中涉及的宋代人物,无论是传记资料还是散见各处的零星资料,一并网罗。是检索宋代人物资料非常有用的工具书。

《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续编》,承接前书,2002年出版,收录了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中国省志汇编》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中国边疆丛书》中37种通志中的宋代人物资料10.4万条。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人名索引》,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上海书店1997年版。此书根据《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中107种明代方志编制而成,收录自秦汉以迄明代中叶及以前各代人物资料11万条,其中宋元以前约3万余条,明代约8万余条,107种方志中有姓名的人物,无论何朝何代,一并收入。索引中标明人物的时代,可与前书互补。“检索明代中叶以前人物之绝大工具书,无过如此”(胡道静《序》)。

《中日现藏三百种明代地方志传记资料索引》,王德毅编,2册,台北大化书局1986年版。日本学者山根幸夫于1971年编制了《日本现存三百种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油印问世。原稿是据明人姓名之威妥玛氏(WADE)汉字罗马拼音顺序编排,多有拼音不合者,使用不便。其所用之三百种地方志在台湾亦可见到十之八九。台湾王德毅依油印本原编各方志,加注台湾有关收藏单位,并改用《康熙字典》笔画部首顺序,重编中日两国通用本,定名为《中日现藏三百种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由大化书局排版印行。

《福建省96种地方志传记艺文志索引》,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方品光编,1981年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出版。

《山西通志人物传记索引》,池秀云编,山西省地方志编委会1984年印。根据现存6种山西通志编成,共收入物15808人,著录内容依次是姓名、朝代、

籍贯、出处、卷次、页码等。

《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高秀芳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按北京、天津两市现属各县历代73种方志（北京50种，天津23种）编辑而成；所收人物，上自上古，下迄清末；凡志中人物、官师、选举、杂记、学派、遗闻、金石、艺文以及列女等志之传记的人物均收入在内。索引条目包括姓名、别名、字、号或其他异称，生活时代和里籍”。

《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分黑龙江卷、吉林卷、辽宁三卷。《吉林卷》，吉林省图书馆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收100种方志，主条17753条，互见3672条；《辽宁卷》，辽宁省图书馆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收93种方志，主条43155条，互见13678条；《黑龙江卷》，高岚岩编，黑龙江省图书馆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收63种方志，主条10264条，互见2285条。《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是我国目前较大规模的方志人物传记索引工具书。所收除人物志、耆旧录等有传记者外，兼收职官、选举、氏族、艺文、金石、行政、教育等类中涉及生平、业绩的有关传记资料。索引条目包括人物的姓名、时代、民族、氏族、别名、字号、封谥、籍贯、生卒、年龄、出处等。索引以人物的姓名或主要称谓做主条，以其他别名、字号、封号、谥号等作互见条目，以达到检索的完备性。索引按姓名笔画编排。书后附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表，汉语拼音与四角号码对照表。

《广东地方志传记索引》潘铭燊编，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2册。本书收编广东省志2种、府志9种，共11种方志之传记，计收10222人、传记二万余篇。上册为汉语拼音排列之人名索引，下册为依方志原书次序之人名表。由于人物有同名异人及同人异名之情况，而各志所收人物又有重复现象，体例亦极不一致，故此确定一篇传记之传主往往出现困难。编者采取逐篇核对之法，务求无误。

《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广西通志馆旧志整理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本索引收录广西方志204种，索引专备检查1949年以前现存广西历代方志中所记载的人物。该索引收录了广西方志中的人物、列传、名宦、流寓、将略、乡贤等类目有传记的人物，编排上采用四角号码为序。

《台湾清代二十五种方志暨连雅堂台湾通史人物传记索引》，盛清沂编（台湾）《台湾文献》1969.20.1。

《台湾清代23种地方志列女传索引》，1969年，台湾盛清沂辑，见《台湾文献》第二十卷第三期上。

《清代台湾三十三种地方志采访册纪略人名索引》蔡志展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2000年出版，上、下2册，此索引以清代台湾33种方志、采访册、纪略和台湾通史为范围编制而成，约收录77300余则资料。

（责任编辑 南山）

罗马帝国分裂的语言因素探析*

骆新强

(江苏省响水中学, 江苏响水 224600)

[摘要] 罗马帝国的分裂,是学术界尚未充分讨论的一个问题。拉丁语和希腊语都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分别通用于罗马帝国的西部和东部。拉丁语和希腊语并峙是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对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这种语言对峙的结果,是罗马帝国大体上沿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分界线一分为二。

[关键词] 罗马帝国; 分裂; 拉丁语; 希腊语

[中图分类号] K5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06-06

近两个多世纪来,罗马帝国的衰亡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国内学术界对此也有大量的讨论。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罗马帝国的分裂,国内学术界还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在西方学术界,吉本在解释罗马帝国的衰亡时,认为:“罗马的衰败可是过分雄伟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于成熟。毁灭的原因随着领土的扩张而不断增加。”^{〔1〕}即罗马帝国疆域过分扩张使当时的土地、商业和交通运输手段无法满足需要,必然导致帝国的衰亡,罗马帝国靠军事征服占领了遥远的土地;“当帝国中央政府不能保卫自己的边疆时,罗马的统一就不复存在了。”^{〔2〕}从中可知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的庞大是其分裂的重要原因,罗马帝国是武力维系的大拼图,统一的基础是很脆弱的。目前学界也多从政治和地域角度解释罗马帝国的分裂。

罗马帝国的分裂有无其他原因?笔者认为文化(包括语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罗马帝国的东西两部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使得罗马帝国一直未能融合成一个整体。“希腊和拉丁的分裂,则又因为永远存在的语言、习俗、利益,甚至宗教方面的差异,而更为加深。”^{〔3〕}吉本在研究罗马史时对此进行过考察;“吉本论述了一个众人皆知的道理:拉丁语没有在东部行省扎下根来是罗马帝国最终走

向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3〕}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根基,它不仅固守住了一种文化,也区隔了别的文化。帝国的东西两部分的并立,是两种文化的并立,这种文化的并峙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则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并峙。希腊语通行于东地中海地区,是东地中海文化上统一的重要原因,也使东罗马帝国在文化上明显区别于西罗马帝国,从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分裂。

一、希腊语与东地中海的统一

世界共通语是近代全球一体化以来才有的现象,但共通语却有着漫长的历史。古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贫乏,所谓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方言林立,离的很近的地区也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但军事征服、商业贸易、传教等活动加强了语言这一人类最重要交流手段的传播,并逐渐形成了地区共通语。

东地中海地区最早的共通语可以说是阿拉米语(Aramaic language)。公元前6世纪以前,古代语言阿卡德语的两种方言——亚述语和巴比伦语在近东颇为通行,但到公元前6世纪,阿拉米语逐渐将它们取而代之,成为古代近东的通用语言和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全书》中有一部分

*[收稿日期] 2011-01-20

[作者简介] 骆新强(1981-)男,山东济宁人,江苏省响水中学教师,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就是用阿拉米语写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历史传说认为,耶稣也使用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阿拉米语作为东地中海共通语,极大地便利了当地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是东地中海地区统一的重要基础。

对东地中海地区影响最大的共通语是希腊语。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希腊语族。从语言学角度讲,它和欧洲绝大多数语言都有亲属关系,因为除匈牙利语等少数语言外,欧洲的语言几乎都属于印欧语系。从文字学来看,欧洲语言所用字母基本上源自希腊字母。希腊语有着光辉的历史,总的说来,古希腊语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古风希腊文、古典希腊文和普通希腊文。在第三个阶段,希腊语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共通语。

古希腊城邦林立,与这种政治状况相对应的是,古希腊语也分为多种方言,主要有依奥利亚(Aeolic)方言、爱奥尼亚(Ionic)方言、阿卡狄亚—塞浦路斯(Acado-Cyprian)方言、多利安(Doric)方言。约在公元前9世纪出现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就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成的。各方言不仅存在发音上的差异,所用的字母表也不同,与中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之前的文字不统一状况有相似之处。现在欧洲的两大文字体系,拉丁字母是西部字母经由埃特鲁斯坎字母发展而来,斯拉夫字母则是东部希腊语字母经由拜占庭希腊语发展而来。^{[4] P.16)}在以后的几百年中,随着雅典的兴起,以属于奥尼亚方言的雅典方言(阿提卡方言)为基础,产生了打破方言格局的普通希腊文。

希腊语走出希腊半岛,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共通语是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在希腊时代,希腊语还是一种地方性语言,局限于希腊一隅。随着马其顿国家的兴起并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统治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希腊语作为马其顿人的语言也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官方语言,取得了通用于帝国的通行证,取代阿拉米语成为东地中海广大区域的通用语言。“公元前三世纪以后,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出现了一种希腊普通话,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各地。”^{[5] P.1)}这种通行于帝国的希腊语即“古希腊共通语”(Koine)和局限于希腊一隅的古典希腊语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阿提卡方言,使用广泛而持久,影响较大。汤姆森认为

这是柯因内语的基础;二是源自多立亚方言,为时不长,即告衰落。以阿提卡方言为基础的古希腊共通语,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部分方言,因而带有混合色彩;“Koine”在希腊语中也就是“共同”之意。^{[6] P.50)}

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希腊语渗透到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柯因内语(Koine)的传播比希腊化城市的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语言也是《新约圣经》所使用的语言。到了罗马共和晚期,希腊语作为地中海世界的国际语言已被广泛接受,罗马帝国时期这一状况仍旧。在近东,这一状况要一直持续到公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陷落。^①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不少著名作家的著作,都是用这种“古希腊共通语”写的。

由于希腊语的强势,希腊化世界内各种方言的地位下降了。那些已经希腊化的土著纷纷学习这种比古典时代希腊语简单的柯因内语。中东诸民族中希腊化程度最高的小亚细亚的一些民族,甚至忘却自己的本族语,改操柯因内语。塞琉古王国政府的公文命令用希腊文写成。凡是由希腊人和本地人进行的商业活动,大多用希腊文写成文书。直到安息王朝时,希腊语仍然是官方语言之一。后人发现,波斯边境偏远乡村的居民有用希腊文写租契的事例。^{[6] P.51)}总之,柯因内语流行很广,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希腊语是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通用的语言。而“希腊化”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就是“讲希腊语”或“像希腊人一样行动”,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说希腊语,那他就被希腊化了。总而言之,柯因内语是希腊化世界文艺和科学的语言,是希腊化君主国和希腊城邦的文牍语言,不仅是人种上的“希腊人”的语言,而且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希腊人”的语言。它以不同程度广泛流行在非希腊的地方居民中间,有力地加强了希腊文化的传播。

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和希腊文化的广泛传播,东地中海进入了希腊化时代,该地区的统一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陈恒把它和全球化进行了比较,并认为,希腊化和全球化两者具有很大共同性,文化诸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7]希腊语作为希腊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介,是东地中海希腊化和地区统一的主角,并且它本身就是东地中海文化一致性的重要内容。

① 柯因内语,即普通希腊文或古希腊共通语流行于公元前300到公元600年之间。

二、拉丁语的兴起

拉丁语(Latin language)的得名源于其发源地亚平宁半岛的拉茨(Latium)地区,那里是拉丁姆部族(拉丁人)的故乡。公元前6世纪,拉丁人开始用源自希腊字母的拉丁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后来,拉丁人的一支罗马人成立的罗马城邦,四处征战,控制了东起幼发拉底河和黑海,西至不列颠岛,北接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和莱茵河流域,南达北非、尼罗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军事的地界也是文化、语言的边界,……语言的成功,似乎首先要靠能打仗,靠肌肉发达。”^[2 I P.97]拉丁语随着罗马军队的武力扩张广为传播。

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时,拉丁语被定为国语。作为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帝国境内的行政、司法和军队的唯一用语,同时它也是各地上层人士的共通语。“显然,采用某一民族语作为世界共通语,必然会赋予该民族以超等的特权。”^[8 I P.16]其他部族的人要想出人头地,迈入社会的中上层,成为官员、教师、商人等,必须学习拉丁语。因为拉丁语是文化和教育的语言,是法律和军队的语言,也是权力的语言。^[9 I P.115]

拉丁语的传播不仅依赖武力,也借重优秀的罗马文化。罗马人虔诚地向希腊人学习,创造了辉煌的罗马文化,甚至在法学、建筑、军事等诸多方面超越了希腊人。罗马文化对落后的蛮族人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在接受罗马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拉丁语。这些蛮族的语言,如凯尔特语等,和拉丁语一样几乎都源自原始印欧语。虽然同源,但是拉丁语和蛮族语言之间已不可能进行语言上的交流。这些蛮族人的语言大多数没有成熟的文字,或者根本没有文字,在拉丁语的冲击之下相继消亡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发现这些语言的原始文献资料。“希腊和罗马的学者对其他语言没有兴趣,这些语言未能被记述下来,因此我们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少。”^[9 I P.115]

值得注意的是,推行语言的正确策略也是拉丁语通行于帝国的重要原因;“罗马人没有在希腊语范围之外的领土上强迫所有的臣民和外国人使用拉丁文,反而把拉丁文的使用变成一种有待于追求的特权,从而增强了拉丁文的吸引力。即使在同有着类似希腊语的文化和文学基础的语言和方言竞争时,拉丁语也总是胜利者。”^[10 I P.267]

拉丁语本身的迅速发展也是其成为帝国共通语的重要原因。拉丁语原来也是一种很幼稚的文字,

历史也不长,最早的拉丁铭文是刻在一个金属饰针上的一句话,经考古学家鉴定,时间是公元前600年前。但拉丁语的发展非常迅速,由于罗马帝国的强盛,拉丁语的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都发展起来,作为这些伟大成就载体的拉丁语在词汇和语法上不断丰富起来。对拉丁语语法的研究也在发展,公元前1世纪,瓦罗在研究希腊语法的基础上写成《论拉丁语》,公元4世纪,多纳图斯撰写《语法术》,对拉丁语语法进行了概括。特别是公元6世纪初,普利西安撰写《语法原理》,详尽描写了古典拉丁语,这本书广为流传,左右了整个中世纪的语法学和语言哲学。这一切终于让其他语言望尘莫及,拉丁语由此也增强了与希腊语抗衡的实力。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大一统国家为贯彻和维持其统治创立了一些具体制度,……主要是地理上的交通系统和语言上的沟通系统、都城首府、大一统国家创建或采纳的文官制度。”^[10 I P.267]拉丁语成为帝国的共通语提供了语言上的沟通系统,对罗马帝国的统一有重要意义。汤因比也明确指出了语言文字对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性,他认为:“一般而言,一个大一统国家总会有一套用于思想交流的官方媒介系统,他们不仅包括一种或多种口头交流的语言,而且还包括某种基于书面符号的视觉记录系统。”^[10 I P.258]但是,在罗马帝国广袤的领土上,希腊语还不是拉丁语的竞争对手。罗马人有意识地给希腊书面语以正式地位,使之在中央行政管理中与拉丁语平起平坐,凡是他们发现已经正式使用希腊书面语的地方,就认可继续使用这种语言。这是罗马人面对现实作出的选择,两大语言的并峙将对帝国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语言固守的边界

西罗马帝国因为通用拉丁语被称为拉丁帝国,同样,通用希腊语也是东部罗马帝国引人注目的特色,语言的边界成为东西罗马帝国的边界。“早期拜占庭的版图界定于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的区域。它沿着东地中海,从非洲海岸的黎波里和托勒密开始,绕过亚得里亚海后伸展至都拉左西部,并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分界线重合。”^[11 I P.105]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界线与东西罗马帝国的界线基本重合不是偶然现象,希腊语和拉丁语分别固守了自己代表的文化的边界,这是帝国分裂的重要原因。

拉丁语能够取得和希腊语抗衡的地位,固守拉丁文化不被希腊文化同化,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迅速

成长,另一方面是罗马人对自己语言的珍视。

拉丁语原是一种不发达的语言,有着不长的历史。当罗马人开始与希腊人、希腊文化接触的时候,他们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落后。希腊人确实在许多方面(包括语言)要优越于罗马人。罗素说:“布匿战争之后,年青的罗马人对希腊人怀着一种羡慕的心情。他们学习希腊语,他们模仿希腊的建筑,他们雇用希腊的雕刻家。罗马有许多神也被等同为希腊的神。罗马人起源于特洛伊的说法就被创造了出来,以便与荷马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拉丁诗人采用了希腊的韵律,拉丁的哲学家接受了希腊的理论。”^{[12] I P. 351}罗马人被希腊文化和希腊语折服了。罗马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拉丁语,在日常生活中,罗马人使用的是拉丁语,但希腊语备受推崇,许多领导人就是由希腊奴隶和家庭教师教育的,从第一代恺撒到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皇帝们接受的主要是希腊典籍的教育。他们大都认为希腊语更优美,表达力更强。罗马帝国早期的文化繁荣,主要是罗马共和末期引进希腊的教育制度并积极吸收希腊文化的结果。

但罗马人没有抛弃拉丁语,一些人近乎自大地固守着拉丁语和拉丁文化,比较典型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期,以加图为代表的传统派曾对希腊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但是,更多的人学习希腊语以丰富和发展拉丁语。

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拉丁语终于发展成为一种可以与希腊语抗衡的语言。一般来说,衡量一种语言的发展水平及其地位,主要有3个标准:首先是持续的科学、思想和哲学的创造及其表述,就是说,该种语言能不能成为最新创获的科学、思想和哲学的原表述语言;其次是文学的标准,看看一种语言能否产生激动人心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最后是一种语言在日常交流中应用的普及程度,就是说,是不是有数量众多的人口在使用这种语言作日常交流。^[13]罗马文化达到了一个可与希腊文化比肩的高度,出现了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在文学上,更是涌现出维吉尔等众多拉丁文学大师;罗马人还努力扩张他们的语言,拉丁语在帝国西部广为传播,“罗马人对于语言和民族形象的关系问题十分敏感;因而用武力来推广对拉丁语的使用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一件事。”^{[1] I P. 36}这样一来,无论就语言本身的发展水平还是语言的使用范围,拉丁语都可以和希腊语相提并论。

拉丁语的发展对固守罗马和罗马文化的边界、

抵抗希腊文化的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希腊文化这种新形式的出现是以另外一种语言为载体的,这大概是罗马试图统一地中海世界最为重要的结果。”^{[14] I P. 448}拉丁语和罗马文化把帝国的西部统一在一起。

但拉丁语的扩张没有威胁到希腊语。从大的方面来说,希腊文化要优越于罗马文化,如古希腊罗马史权威M·罗斯托夫采夫在《希腊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史》中所讲:希腊主义世界的“罗马化”是轻微的,而扩张的拉丁世界的“希腊化”则是明显的。^{[15] I P. 19}实际上,在罗马统治下,希腊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像同样被罗马征服的西部地中海世界诸民族一样罗马化,而是作为一个“文化民族”将其传统的民族认同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前夕为止。结果是希腊人自己没有推进罗马化,罗马人也感到无法将其文明在东方推行。西方的蛮人迅速接受了罗马文化,获得罗马公民权,东方却无动于衷。^{[16] I P. 90}希腊人不仅抵制了罗马化,也抵制了拉丁语。希腊人非常珍视自己的语言,甚至可以说对希腊语有一种自恋情结。很多希腊人对外族语言有歧视,甚至拉丁语也不例外。“众所周知,由于对希腊文化优越性的确信不疑,希腊人不愿意学习其他语言。”^{[9] I P. 115}“barbaroi”这一对非希腊外族人的蔑称,原就是一个嘲笑外族语言的词语。这种语言上的优越感使希腊人对学习外族的语言包括拉丁语没有兴趣。“虽然波斯帝国中供职的希腊人、希腊商人和殖民者以及娶非希腊妇女为妻的希腊人很可能都会某种或某些外语,但大多数文化水平较高者和文化精英却只会希腊语一种语言。”^[17]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不会外语,他的历史调查通过翻译进行,希腊学者也没有兴趣研究外族语言,通常他们只是简单地把语言分为希腊语和蛮族语两种。

希腊语在罗马帝国享有很高的地位,和拉丁语并列为帝国的两大官方语言。“在讲希腊语的帝国东部,主要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行政管理就使用希腊语,罗马送往希腊的法令、公文和书信也都是先翻译成希腊语。”^{[9] I P. 115}虽然是被征服者的语言,希腊语仍然得到广泛的应用;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希望自己掌握两种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演说家昆体良认为儿童在学拉丁语之前应先学希腊语,希腊语在外交活动中广泛使用,一个特别的例子是公元前131年的小亚细亚总督会讲5种希腊方言,到了西塞罗时期,希腊人在元老院演讲有时可以不用翻

译了。^[9 I P. 115]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都是得到广泛应用的语言。

当两种语言同时在一个政治实体(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交际媒介的作用时,会发生下面3种情况:同化、共处和冲突。如果其中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主导地位,另一个逐渐被同化或融合,不再起公用语的作用,甚至自行消亡,这就是同化;如果甲乙两个语种的使用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势均力敌,形成均势,就会出现两种语言共处的状况;语言之间的冲突指的是两个语种的使用集团发生矛盾,语言上对立的引起两个集团的对峙甚至战争。^[18 I PP. 367-368]

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一组语言属于第二种情况,罗马帝国内部形成了拉丁语区和希腊语区共处的语言分布格局。“东部人不像西部人那么容易接受胜利者教给他们的语言。这种明显的差异使得帝国的两半染上了迥然不同的色彩,这色彩虽在罗马的繁荣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在夜幕降临到罗马世界的时候,却慢慢显得十分耀眼了。^[19 I P. 36]当帝国衰败、武力不能维系庞大的帝国时,罗马帝国就按着文化的界线、语言的界线一分为二了。

四、帝国分裂后的希腊语和拉丁语

经漫长的中世纪直到现在,欧洲都是由特色鲜明的两部分组成,这也构成了欧洲统一的一个最难跨越的障碍。追溯其起源,首当其冲的就应是罗马帝国大致按拉丁语区和希腊语区一分为二,它是欧洲最深刻的分裂。

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缺少了统一帝国内的交流和往来,两个地区的差异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沟通。这一状况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对方语言在自己地区内的逐渐消逝。

在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人对拉丁语和‘蛮族’知识的排斥^[20 I P. 480]。拜占廷皇帝利班尼奥斯声称不学“野蛮的”拉丁语。4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教育界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在塞奥多西二世任命的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中,希腊语教授多于拉丁语教授。在拜占廷帝国众多教育和学术中心的名单里,贝利图斯法律学校是惟一的拉丁语言中心。但“据记载,在贝利图斯法律学校中,教师使用拉丁语语法学教材,但是完全用希腊语讲授。^[20 I P. 484]拉丁语的领地只在法律文献和实用技术领域。到6世纪末,查士丁尼时代结束之后,拉丁语几乎已经完全

让位于希腊语。

相应地,在中世纪的西欧;整个说来,12世纪以前的特色就在于不懂希腊文。^[21 I P. 226]罗马人征服希腊人之后很长时间,很多人仍继续使用希腊文写作。不仅希罗德德时代的希波克拉底用希腊文写医学著作,公元2世纪的盖伦也是同样。但希腊文在西部的使用越来越少,在西庇阿时代(Scipionic age)之后已经没有对希腊著作的直接译本,只有一些改编本流行。由于语言上的原因,东部帝国的文化也只在希腊语区传承下来。欧几里德的继承者是亚历山大的数学家和公元160年左右的托勒密地理学和天文学。而希腊新柏拉图主义者则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帝国西部同样如此。公元5世纪和8世纪的百科全书学者收集古代知识的时候,他们吸收的仅仅是拉丁语的资料。著名学者博提乌斯(公元480—525年)曾接受过古典教育,在翻译古籍和注释经文方面颇有成就。古典文明行将灭亡时,他试图做一些挽救的工作,将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学的论文译成了拉丁语,改编了希腊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在随后的动荡时期大多丢失了。一些勤奋多产的编撰者—如伊西多尔和比德,他们不懂希腊文,因而所用资料必定局限于拉丁文,只能利用罗马帝国晚期简而又简的手册,把微不足道的古代知识带给中世纪的世界,致使他们的科学著作空洞枯燥并且常常荒诞不经。

希腊文的痕迹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很快就消失了,偶尔能见到的是一些术语、字母表、和一系列荣誉年号。在中世纪抄写员的笔下,希腊词变成无意义的符号,成为被删掉的语言;“grecum”一词对他来说就是所有的希腊文,那些被删掉的语言就由它取而代之。^[21 I P. 226]12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也不懂希腊文,他“从来不用一个希腊作家著作,除非有拉丁文译本”。

语言上的无法沟通,加之宗教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使欧洲东西部的裂痕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这种差别依然清晰可见。

五、结语

朱利安·班达在《对欧洲民族的讲话》一书中认为:“如果欧洲的居民们想联合起来,那么他们就应该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将优先于他们的民族语言,如同在各自的民族中,民族语言高于方言;而且,他们要给予这种共同的语言一种道德优先

性。^{[22] P. 57}朱利安·班达的这段话探讨的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建立后的欧洲统一问题,实际上,语言问题一直是欧洲统一的重要问题。“语言的本质功能是交流,交流就产生一种亲和力,一种认同力,是各个国家任何政权都非常重视的。^{[23] P. 407}共通语在凝聚认同,进而促成政治统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阿拉米语和希腊语先后作为东地中海的通用语言,对东地中海的统一产生了重要影响。拉丁语和希腊语都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通用于整个帝国,为帝国统一提供了语言沟通系统,分别对帝国西部和东部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拉丁语主要通行于帝国西部,希腊语主要通行于帝国东部,东西部在语言文化各方面的差异使得帝国未能真正融合成一个整体,最终一分为二。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对方语言在自己地区内逐渐消逝,这反过来又加深了欧洲的裂痕。

[参 考 文 献]

[1] [英]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荷兰] 彼得·李伯庚. 欧洲文化史(上)[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3] Joseph Farrell. Latin Language and Latin Culture,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刘小枫,凯若斯. 古希腊语文教程[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罗念生,水建馥. 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前言)[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 陈恒. 希腊化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 陈恒. 从希腊化文化的传播看全球化之起源[J]. 世界历史,2004(3).
 [8] [俄] E. 德雷仁. 世界共通语史[M]. 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9.

[9] Simon Hornblower. Antony Spawforth.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iviliz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英]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 [法] 罗伯特·福西耶. 剑桥插图 中世纪史[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12] [英] 罗素. 西方哲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3] 林岗. 语言的命运[N]. 羊城晚报,2004-11-13(4).
 [14] [英] F. I. 芬利. 希腊的遗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5] 田薇. 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16] A. H. M. Jones. The Roman Economy, Studies in Ancient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History[C]. Oxford, 1974.
 [17] 徐晓旭. 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J]. 历史研究,2006(11).
 [18]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9] [英]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0] 陈志强. 拜占廷帝国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1]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12 世纪文艺复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2] [法] 朱利安·班达. 对欧洲民族的讲话[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3] 许嘉璐. 语言文字学论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 光 翟)

我国农地使用权法律设置的取向及其主旨精神*

王 曦

(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明确意义重大。它利于稳定农地使用关系,提高农地使用效率,利于促进农地市场流转,充分实现农民土地利益,利于增强农地社会保障性,提升农地综合效益。但该法律设置仍需进一步完善。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必须明确贯穿始终的法律精神与各项具体内容。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法律精神是农地使用权权利内容法定化设置的主旨核心,平等、公平、自由、公开原则的体现是农地使用权取得与流转法定化设置的重要任务,效率与秩序共同实现是农地使用权依法登记制度设置的目标追求。

[关键词] 农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物权化; 法律精神

[中图分类号] D9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12-05

当代中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从1978年开始在我国农村出现包产到户,到逐步在我国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称为“家庭承包经营制”。这些制度的实施,都曾一度快速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土地发挥出良好的综合效益。但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问题也在不断显现。由于原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所存在的欠缺,致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土地利益未能很好实现。《物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用益物权的范畴,这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即便于此,笔者认为就当前的农地使用权设置而言,仍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明确与完善之处。

一、两个重要概念的明晰

梁慧星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使用了“农地使用权”这一表述方式,指出:“农地使用权,是指以种植、养殖、畜牧等农业目的,对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农用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1] (P. 511)}这一权利我们可视之为与现行立法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就同一标的所言的权利。

它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第3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及《物权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内涵上一致,它们都是以农业生产作为土地使用目的这一标准来界定权利种类的。《物权法》第125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享有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更明确地反映出这一点。不止于此,二者在农地使用权的标的物范围的界定上都表现为不仅限于集体所有的农用地,即农村土地,还包括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在本文中,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梁慧星教授所称的农地使用权是表示物权法意义上的概念用语,文章借用这一称谓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设置后的概念名称。而文章所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则是原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中的概念表述方式,以此避免因现实中对农地使用权上的不同表述方式而带来的不便。尤其

*[收稿日期] 2011-02-18

[作者简介] 王曦(1972-),女,湖北武汉人,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是《物权法》中使用了在“用益物权”部分下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表述方式。显然,如果不加说明,这诸多种表述极易引起概念上的混淆,不利于讨论的顺利进行。

要厘清的另一个概念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笔者认为这是两个概念的复合,即土地承包权利与联产生产经营方式的复合。承包,更多是倾向于对农村土地使用权利归属的表述。联产,则更多是倾向于指农户基于所获土地进行土地生产经营时相互关系的表现形式。如前所述,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经历了逐步发展的过程。虽然在不同阶段,农地使用制度的表述方式各有不同,但其内涵组成并无改变,都表现为使用权归属与生产经营方式两个方面的复合。基于这两方面都发生在农村土地使用问题上,它们是密切相关却并不相同的概念,但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却都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土地综合效益实现程度。对此概念的厘清便于对我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问题进行分别地、更富实效地研讨。这里,文章仅就农村土地使用权设置问题进行探讨。

二、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设置取向的确立及其重大意义

《物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放置于用益物权下,这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设置取向立法确立的重要标志。原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基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属于债权债务关系。在法律上,物权具有普遍排他性,而债权无此特性,债权的法律效力不及物权。这就必然使得基于承包合同而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像作为物权的权利一样得到同等法律保护。而在承包合同中,承包人的权利与义务能否对等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合同双方地位能否平等。此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化色彩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不能充分发挥,又使得农户与市场需要无法更好结合进行生产经营,以充分实现其经济利益。充分实现农户土地使用上的安全性、效益性等诸多问题催生对这一制度的重大改革。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放置于用益物权之下,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存在,此项举措意义重大。

1. 稳定农地使用关系,提高农地使用效率。

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短期性、易变性的特点。而土地的变换、生产稳定性差无疑对农业生产

是相当大的破坏和侵害。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就是为借助物权的长期稳定性,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基于此确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制度(以下称其为农地使用权,以避免与《物权法》所使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称谓相混淆)意义重大。作为物权,农地使用权具有普遍效力,即排他效力、优先效力和物上请求的效力。其内容依法确定、受法律保护,非依法定原因,不得变更或消灭。与债权债务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相比较,农地使用权明显表现出长期性、稳定性,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生产资料分配、经营关系表现为法定的平等主体间关系。集体成员成为真正的独立主体,就真正具有了依法独立选择耕作物种类与方式的权利,如此就有效改变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下,农民耕作决定权过多受制于行政干预与约束,不利于农民土地利益实现和农地使用效率提高的状况。不仅如此,在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下,除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严重受限外,承包合同也极易受到发包方的单方面违约的影响。而由于双方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农民投诉无门,这必然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其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物法定方式确立稳定的土地使用关系,使集体成员不致因土地的不稳定性而保留对于土地的投入,使农民在较长时期内能够更系统地经营土地并获取利益,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这方面,物权的排他力就是使农民更充分享有合理使用土地的权利并有效减少对农地使用权妨害的有力保障。

2. 保障与促进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充分实现农民土地利益。

如何充分发掘出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潜力,让农村经济与农民收益有质的飞跃,内在要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转变,使农民真正拥有土地权利,使土地生产更具商品化、市场化因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立法确立成为物权,即可作为稳定的财产权利进入市场,通过土地权利的充分流转以有效实现其交换价值并充分实现农民的土地利益。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性质上的含糊不清,使得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时各种法律关系中权利性质难以明确,而权利、义务的不确定使得权利的流转障碍重重,农民权益无法充分实现。基于物权法定原则的前提,农地使用权可以将农民对土地的各种权利和限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其法定权利与义务都成

为强制性规范,这样既使农民的权益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亦使国家的公共秩序得到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就是使对农用土地的使用权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中析出,与“联产”脱钩,成为一个独立的真正物权意义上的权利。^{[2] P.709)}

3. 增强农地社会保障性,提升农地综合效益。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制度建设,是以保持地权的稳定性为现实目的,以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有效促进农村土地综合效益提高为目标主旨。这一目标主旨是我国农村土地利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它的实现内在要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变革。地权稳定性的 大小,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土地投资行为,农地经济效益的实现,还严重影响农村的利益关系格局,考量农地的综合效益实现程度。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建设时期,地权稳定性较高的制度安排不仅有利于农地经济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农村与整体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各项保障投入,但土地对于大多数农村人口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生活保障。土地的产出物以及土地市场化收益是农民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农地使用关系的稳定直接影响农民土地生产的稳定,关涉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综合效益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在农地使用关系明确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农地使用权有效流转,不仅利于农地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更充分实现农民土地利益,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有效实现农地的综合效益。而这都需要土地承包关系的物权化确立,以物权关系改造和固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将农户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转变成物权性的农地使用权,实现农地使用关系的物权化,使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的分离方式,由签订承包合同形式转变为设定用益物权形式,使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平稳过渡到用益物权制度。^{[1] P.511)}

农村土地的物权化设置是农村现实发展的必要选择。它极大地推动我国《物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其中,成为用益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法律设置的主旨精神与主要内容

《物权法》的颁布无疑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设置的重要标志,但不表示这项工作的完成。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必然地要求农地使用权各项内

容设置上的法律规范性,这可以视为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内容构成。而这些具体内容又内在要求贯穿始终的法律精神成其内核。精神内核是具体法律制度的灵魂,其确立是制度内容不断完善的思想指导。基于此,对这一权利的主要内容及其主旨精神的研讨意义重大。

1. 农地使用权权利内容:权利法定的设置要求与权利、义务对等性精神的核心体现。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地的合理有效利用事关国计民生,闲置农地或者擅自改变农地用途皆为法律政策所不许。法律应明确规定,承包期内,无论以何种方式取得农地使用权,只要使用权人未按规定开发利用农地,或者擅自将农业用地改变为非农用地,集体所有者就有权收回承包地,依法终止其使用权,并可将收回农地重新发包。这些内容十分必要。它是农地使用权中承包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应有之意。但反向之,在符合农地的农业生产用途的前提下,农地使用权所含各项权利内容也应依法明确,并得到法律严格保护。并且,农地使用权的法定化还决定并蕴含着侵犯农地使用权的法律责任的法定化,即在承包权法定化以后,如果发包方侵害承包人利益,或者是发包人和政府对承包经营关系实施不正当干预,承包权人有权依法行使物上请求权,而当发包人以外的第三人侵害承包方权利时,能有效地以物上请求权对抗第三人。从而使土地使用者的权利享有充分,并实现自主经营。^[3]这同样是农地使用权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重要体现。对此,《物权法》第11章就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设置所做规定核心体现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真正实现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方能真正实现双方利益要求。农地使用权权利内容的依法确立就是要以充分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性法律精神为核心主旨。

2. 农地使用权取得与流转:规范化的设置要求与平等、公平、自由、公开原则的充分实现。

农地使用权权利内容的法定化进一步带来了权利取得与流转的法定化问题。建立与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相适应的权利取得与流转机制,法律应明确规定农地合法的取得与流转方式,农地使用权人依法取得及流转农地使用权受法律保障。

平等、公平的法律原则贯穿农地使用权取得全过程,根本改变农地发包程序的行政属性。农民是集体农地的真正所有人,依法享有自主决定农地使用的权利。集体土地的发包权属于农民集体全体成

员,不属于少数乡、村干部。有关集体农地发包的重大事项当由村民或村民代表按法定程序决议方为合理,法律对这些内容的明确是农民农地使用权得以实现的前提。《土地管理法》在第14、15条中规定了承包期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土地进行调整和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承包经营土地时的集体决定程序,而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初始合同的订立程序却未涉及。但恰恰是承包土地初始合同订立的公正、透明性,更密切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有充足理由让农民集体成员自己决定该项事务。基于此《物权法》第59条在前述规定基础上补充了土地承包方案应当依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的内容。但美中不足的是,在由多少比例成员通过生效以及如何操作等方面都不明确,不便于实践。笔者认为应该明确规定为依大多数农民的意见来制定、通过程序,即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出让或出租农地使用权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这就以制度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切实保护,并真正体现成员间平等和对所有成员公平的法律精神。

自由、公开原则的实现是农地使用权流转实效性的保障。物权化流转机制以实现农地使用权的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等权能为内容,充分实现农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的。农地使用权的合理充分流转,不仅有效避免耕地闲置浪费,实现物尽其用,还有效促进土地的相对集中,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更好实现农地综合效益,而我国加入WTO,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竞争力内在要求着促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这也需要农地承包权的流转以促进土地的集中使用。^[4]自身社会发展的需求、严峻的国际挑战都迫切需要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动作起来,实现农地使用权的充分流转,促进农地市场收益率和规模经济收益率的提高,其意义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农业经营(特别是小规模经营)的经济收入偏低,许多取得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弃农务工,他们保留土地承包权只作失业、养老保险之用,其意将土地转包或出租给他人使用,而那些有能力从事农业经营的人,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科技化和市场化的生产经营,并且的确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前景广阔。对此,现行法律就允许流转和允许以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做出了相应规定,为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奠定了良好基础。但

笔者认为,农地使用权流转实效性的实现不应仅限于此,还应进一步包括允许转给包括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经济实体或个人使用,更充分地实现农地流转,但是应明确规定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优先受让权,且对受让人做农地使用用途的限制,并依法进行使用权变更登记实现公开的监督管理,即以自由与公开促进权利流转的实效性实现。而为了防止基层干部以权谋私侵害本集体成员的土地利益,法律应严格规定凡集体经济组织向本集体经济组织外流转农地使用权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即以公开程序真正保障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人的土地权利的实效性。

3. 农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登记生效的设置要求与效率、秩序精神共同实现的目标追求。

一直以来,在侧重于以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的核心理念支配下,实施对土地的国家管控,使得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登记管理制度十分严格。相比之下,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目标指向的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与流转方面的登记制度明显不足。现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过《物权法》确立为物权,作为一项稳定的财产权利进入市场,就要实现其应有的经济效能。它内在要求建立农地使用权登记制度以及依法登记所带来的权利保障,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内在要求有法定的权利公示方式使之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使其权利实现不仅充分并且安全有序。基于此,有必要建立农地使用权登记法律制度,其内容应该包括农地使用权的初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等方面。

其一,农地使用权的初始登记。农地使用权是不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形式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是采取登记制度这一方式。在我国,原来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主要是以承包合同为依据。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的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规定其实质是对作为债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并非物权法上对权利的公示。而《物权法》第127条也只是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笔者认为,农地使用权作为不动产物权,其重要性决定了该权利的设定不仅应予以登记,即农户通过承包方式取

得农地使用权,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部门进行农地使用权登记,并由乡或县级人民政府发给农地使用权证书,更重要的是应明确“农地使用权自登记之日设定”^{[1] (P.518)},即未经登记,农地使用权人对农地不能产生物权效力,这就是说农地使用权的初始登记应采取登记生效主义。依法登记使农地使用权获得物权法上的独立地位,承包经营合同只应该是作为农地使用权设立行为和明确农户与集体间有关农地承包给付义务的依据。

其二,农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就是说,以互换和转让方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土地权利变动的效力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定,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达成协议,其互换和转让就发生法律效力,并不要求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只是说当事人办理了互换或转让登记手续的,其法律效力可以对抗第三人,而没有办理登记的,则不能对抗第三人,即转让或互换的当事人,在与第三人发生债务纠纷时,不得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转让或互换为由对第三人进行抗辩。据此可知,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采取的是登记对抗原则。所谓登记对抗主义,即土地权利的变动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产生法律效力,交易完成,土地权利即发生转移,当事人可以登记,也可以不登记,但不登记的,其权利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与登记对抗主义相对应的是登记要件主义,在此笔者要对登记要件主义的做法强调指出。基于前述笔者对于农地使用权权利流转持放开态度,这是因为权利动态的放开极有利于我国有限土地最大限度发挥与实现经济与社会效能,但这不表示对土地使用权不加以管制。恰恰相反,权利自身越是放开,对于权利的存在状态越需要予以密切地关注,否则我国农地的农业用途这一根本属性就无法确保。因此,对于农地使用权的变更应采取严格的登记管理制度,即登记要件主义。所谓登记要件主义,也称登记生效主义,即土地权利的变更,只有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方能生效,未登记的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当事人必须进行登记。只有“实施农地使用权变动登记制度,农地使用权物权效力的法定才有保障”。^[5]客观地看,就目前情况而言,在我国实施登记生效主义的

做法难度确实很大。因为在我国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数量很大,地块又很分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是非常细致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财、物力,这的确是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尚不健全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问题不构成不实施登记生效制度的充分理由。因为唯有以登记约束生效,农地使用权的流动方能充分且有序,其实施获取的效益远大于成本。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意味着权利的流转必须登记才能生效,这当然会增加农民的麻烦,但在增加麻烦的同时,得到的是现有利益与新增利益的法律安全性保障,反之则是利益风险的存在与增大。其中利害,无论是权利的转出者或是权利受让人都会自会权衡。

其三,农地使用权的注销登记。注销登记是权利人权利终止的标志,它的存在直接作用于对无权流转行为的防范与规制,其意义同样十分重大。但通常注销登记只是发生在发包人依法收回承包土地,或者是承包人主动交回承包土地的情况下,对其实现相对容易,在此不做详细的论述,但是需要明确注销登记作为登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以上三方面内容构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设置的主体框架。其中,权利内容的法定化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权利清晰、确定存在的坚实基础,权利的取得与流转的法定化为权利高效运行、利益实现充分提供必备环境,而严密的登记制度则是这一权利运行有效且有序的根本保障,也是利益最终实现的安全保障。这3个部分环环相扣,紧密配合,其法定化设置缺一不可,而其中蕴含与彰显的法律精神则是这一制度设置的精神内核。

[参 考 文 献]

- [1] 梁慧星.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2] 梁慧星. 中国物权法研究(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
- [3] 林庭霄.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几点思考[EB/OL]. 中国私法网 2002-03-28.
- [4] 史晓莎. 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的完善[EB/OL]. 中国法院网 2004-07-06.
- [5] 丁关良. 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责任编辑 光 翟)

公司捐赠相关问题探讨*

——以万科“捐款门”事件为例

段 冰

(江苏教育学院经济系,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震后全国各地涌现了为汶川地震捐款捐物的热潮,但在捐赠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万科公司因捐款数目有限及董事长王石的言论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非议。本文以此为契机,讨论公司捐赠的性质、公司捐赠所涉各种利益关系,并对完善我国公司捐赠立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公司; 捐赠; 利益

[中图分类号] 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17-05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一场意外的灾难,增大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了全体国民的爱国心,同时彰显了人性的真善。每个中国人都义不容辞地投入了抗震救灾的战争中,全国各地涌现了为汶川地震捐款捐物的热潮。但此次地震捐赠也暴露了一些问题,突出的像社会上热议的万科“捐款门”事件。笔者试图以法律的视角剖析这些问题,并对公司捐赠立法提出建议。

一、事件概述

汶川地震发生当天,万科迅速决定向灾区捐赠200万元,遭到许多网友的非议,认为万科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其捐赠数额与其公司实力不匹配。其后,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其博客中写道:“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然后,他又指出万科关于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一条对于员工的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王石解释说,其意就是不想让慈善成为负担。此后,

网络舆论一片沸腾。慈善没有成为万科的负担,王石的此番言论却很快成为了万科的负担,王石和万科一起深陷“捐款门”。很多人表示:“万科在我们心中一落千丈。”而在资本市场上,万科从15日到20日股价大跌12%。5月21日,万科发布了支出1亿元支援灾区重建的董事会决议。5月21日当天,王石也正面做出了道歉:“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是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关注,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6月5日,万科为追捐亿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万科临时股东大会以99.8%的高票通过向灾区捐赠一亿元的预案,投同意票的股东占股18.96亿股,万科捐款门事件至此才告一段落。

这次万科“捐款门”事件反映的问题实质上是:公司该如何捐赠,既可以尽到公司的社会责任,又不损害各股东的权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万科捐款门事件发展到最后,虽然最终几乎全部股东决议通过“1亿元重建”议案,但也有股东表示出一定的担忧,在会场上提出要求:“万科这次捐

*[收稿日期] 2011-01-20

[作者简介] 段冰(1977-),女,河南南阳人,江苏教育学院经济系讲师。

赠 打乱了我们自己的捐赠计划,我们投了很多钱在万科,希望万科能及时对捐赠作出公示,以免打乱我们自己的捐赠计划,造成重复捐赠。”甚至有中小股东决定对万科捐赠提起诉讼。这就反映了在公司捐赠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公司捐赠与股东捐赠是什么关系?在公司捐赠中如何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另外,在这次赈灾中,公司捐赠暴露出来的其他问题也很多:一是相比于美国等国家,我国的公司总体捐赠意识不强,捐赠规模有限。如何提高公司捐赠的积极性?二是部分国内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捐赠数额较大,例如中国移动捐款 5820 万元,工商银行捐款 8726 万元,如此迅速大额的捐款,尽到企业社会责任是好事,但问题是:如此大额的捐款是否合法,是否损害了股东利益?公司能否随意追加捐款额度,捐款信息是否应该及时向股东公开,公司高管是否可以任意支配资金甚至为自己谋利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公司捐赠的性质,其次要理清公司捐赠中所涉的几种利益关系。

二、公司捐赠的定义

我国目前对捐赠适用的法律最主要的是 1999 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该法并未对捐赠给出明确的定义。该法第二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适用本法。”从该条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捐赠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主体范围非常广泛。其二,捐赠的特征是“自愿无偿”,如果是被迫或以获取对价为目的的给予行为不属于捐赠。该法第四条也明确规定了“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其三,捐赠的受体是“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即财产的给予对象须是特定的两类: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依法成立的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目前此类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主要有依照 1998 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成立的社会团体、依据 2004 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成立的基金会和根据 1998 年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四,捐赠的财物必须用于“公益事业”。关于“公益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

活动(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由此可以看出“公益事业”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非营利的公益事业均可以归入其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给公司捐赠下个定义:指公司作为捐赠主体,为了社会公益事业或公共目的,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的行为。

三、公司捐赠的性质

首先,大部分学者认为,公司捐赠的合法性来源于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

依传统公司营利最大化的理念,股东利益至上,股东投入资金创设公司,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公司这一商事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直到 20 世纪早期,这一近乎铁的法则才遭到质疑。公司的社会责任最早由美国学者 Dodd 提出,它是现代公司制度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内容。在现代社会,公司规模日益扩大,其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单纯经济体的范畴。针对公司力量膨胀所带来的弊端,很多学者提出,现代公司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向社会攫取越来越多的利益,也为社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风险,因此,公司的责任不应仅仅是对股东的,还应当对所有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职工、债权人、客户、所在社区——乃至整个社会负责,这就是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给传统公司股东利益至上和公司利润最大化理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公司不应是利润至上的,而应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大多数州的公司法确立了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我国公司法也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

其次,捐赠不是公司的强制性义务。

公司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程度和范围依不同学说有较大差别。一个比较好的范本是 1984 年 5 月美国法律研究院制定的《公司治理的原则:分析与建议》第 2.01 条的规定:“商业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应以提升公司利润与股东利益为目标。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则不问公司利润与股东得得是否因此提升:(a)与自然人一样,负有在法定范围内行动的义务;(b)可以考虑与其所为营业行为的责任相应的合理的伦理因素(c)可以为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与慈善之目的,捐献合理数目之公司资源。”^{[2] P.24}可见,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按强制性的强弱分为 3 个层次:强制性责任:公司须同自然人一样,必须遵守

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道义性责任:可以适当考虑与公司经营中执行社会责任相符的伦理因素;劝导性责任:可以基于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目的,从事合理数额的捐赠。公司捐赠行为属于社会责任中的第三个层次,由于公司捐赠行为虽然在主体上有其特殊性,但并没有脱离赠与行为的单方法律行为和自愿性特点,所以公司捐赠作为社会责任的一种只能是劝导性责任,即通常只能通过一些制度性的安排给予一定的鼓励,从而公司捐赠行为也是公司社会责任中效力最弱的一层。值得注意的是,责任一词意义丰富,学界对违反法律义务而引起的一种国家强制拘束力这一点上基本能够达成共识,但所谓的“公司社会责任”,在特定层面上仅具有一种道义上义务的特性,与责任的强制力并不相符。而在公司捐赠这一层面上公司社会责任只能算是一种劝导性的规定,即只表现为制度上的激励而没有拘束力。^[3]故本次汶川地震,网友们对未捐款或捐款较少的企业“追打砍杀”在道义上可以理解,却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再次,公司捐赠不同于自然人捐赠。

公司是一种独立的法人组织,公司具有独立人格意味着公司是一个与其成员相区别的法律实体,具有独立于其成员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有其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权。虽然公司意志的行使有赖于股东和公司管理人员,但公司的意志绝对不等同于股东的意志或公司高管的意志。公司作为捐赠的主体,其捐赠由公司中有权决定捐赠事务的个人或机构代表公司做出,一旦做出,便具有法律约束力,由公司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根据公司分权理论,股东把资金投入公司,就丧失了所有权而仅享有股权,股东仅以自己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由股东出资而形成的公司财产的全部所有权,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公司行为与股东行为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区分而得以分离。所以,我们不能把王石作为董事长在其权限范围内决定的公司捐赠等同于万科股东个人的捐赠,更不能等同于王石个人的捐赠。很多网友搞不清楚万科捐赠与王石个人捐赠的区别而对王石本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公司捐赠中所涉各种利益关系

万科捐款门事件中涉及3种利益关系: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如何平衡三者的关系,对于用法律的手段合理规制公司捐赠至关重要。公司的本质是营利性,因此其一切活动皆应以股东创造最大的投资回报为依归。当公司实现了营利,股东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实现。所以,总的来讲,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时候也会发生矛盾。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有时呈现出矛盾的关系,但有时又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协调一致的关系。例如公司从事公益性捐赠,从直观的方面看,公司的盈利或资本减少了,股东的分红也会相应地减少,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成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但在很多情况下,公司捐赠不仅能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扩大公司的知名度,而且可以改善公司的外部环境,进而带来公司销售和利润的上涨,从长远上来看有利于公司的利益。这时候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又变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由此可见,如何平衡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的关系,促进三者协调发展,是解决公司捐赠中诸问题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与社会公益”课题组2001年至2003年对中、外企业捐赠的理念和行为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跨国公司和民族企业的捐赠范式显著不同,跨国公司的捐赠属于互利性捐赠,88%的捐赠价值具有公关、市场拓展、顾客和雇员关系维护等商业作用;民族企业的捐赠属于他利性捐赠,79%的捐赠价值指向了救灾、扶贫、支边、助学等传统慈善领域。^[4]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从比较法学的角度,研究了国外公司的战略性(策略性)捐赠,并对改善我国企业捐赠不足的现状进行了探讨。^①虽然有人批判这种战略性捐赠的功利色彩,但笔者认为,企业为了商业宣传等目的进行捐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捐赠既能使社会受益,也有利于企业品牌的建设,这样双赢的局面并无不妥。更重要的是,这种战略性捐赠很好地协调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的关系,使公司捐赠中的这一突出矛盾得到了解决,应该得到法律上的肯定和鼓励。所以笔者认为,要对公司捐赠制度以利益平衡为出发点进行制度设计,既鼓

^① 参见陈宏辉《战略性慈善捐赠探析》《现代管理科学》2007年2期;田利华、陈晓东《企业策略性捐赠行为研究:慈善投入的视角》,《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等。

励公司自愿主动进行捐赠,使社会福利得以增进,又不损害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五、我国公司捐赠的立法现状

我国公司法并未对公司捐赠行为做出规定,但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条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被视为公司捐赠合法的理论依据。实际上,不管法律有无明确规定,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公众观念都认为公司捐赠是合法的。1999年之前,关于公司捐赠,实践中通常认为应当适用《民法通则》中关于赠与的规定,认为公司捐赠属于民法中赠与的一种,但即使《民法通则》本身也未对赠与合同有明确的规定,仅在198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对一些特殊的赠与合同做了解释,但对公司捐赠并未涉及。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188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这些条款对公益性质的捐赠规定了比普通赠与更大的约束力、更严格的履行要求。通说认为,该条赠与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所以公司捐赠也适用该条规定。1999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则是一部专门规定公益性捐赠的法律,该法第二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适用本法。”该法中捐赠的主体包括法人,所以也当然应该包括公司。此条款以间接表述的方式认可了公司捐赠的合法性。公益事业捐赠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公益捐赠的法律,但还不是针对规范公司捐赠的法律,因此并没有对公司捐赠中所涉的利益矛盾及平衡予以特别的法律规制,也没有针对公司的内部管理做出相关的规定。也正是因为如此,面对震后捐款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我们很难从目前的法律中找到答案,完善我国公司捐赠制度势在必行。

六、我国公司捐赠制度的立法完善

就目前而言,我国公司捐赠制度的完善应重点

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公司捐赠意识不强的问题,要通过法律对公司捐赠予以激励。二是公司捐赠中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失衡的问题,通过法律对公司捐赠进行约束,以平衡三者的关系。

1. 公司捐赠的激励机制。

对公司捐赠的激励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公司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目前对公司捐赠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企业(不包括金融保险企业)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的救济性捐赠扣除的比例不能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的1.5%,超过部分不予扣除;企业通过中国境内的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灾区的教育事业、农村义务教育、红十字会事业、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和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等的捐赠,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为支持文化、艺术等事业发展,纳税人通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对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救济性捐赠范围,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0%以内的部分,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企业向依法成立的协会、学会等社团组织缴纳的会费,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向防治非典型肺炎事业的捐赠,允许全额扣除。以上规定中的企业,包括公司等企业类型,可以适用于公司捐赠的税收优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公司税收优惠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对公司捐赠的激励作用,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我国只有向税法所规定的可以接受捐赠的社会团体所进行的公益、救济性捐赠,才允许在法定的限额内扣除,并且对有资格的慈善组织实行的是特许制,从而使捐赠人获得捐款税收优惠的慈善组织过少,使日常发生的大批量、小金额、社区性的企业捐赠难以获得减免税优惠,致使中小公司缺乏应有的税收激励。其次,捐赠优惠比例低。由上所述,除少部分公司捐赠可以全额扣税外,大部分的公司捐赠的扣税比例仅有3%,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10%。这种过低的税收优惠比例可能会抑制大灾来临之时公司捐赠的积极性。再次,缺乏实物捐赠税收优惠的具体规定。公司进行实物捐赠,可以节约成本,推广产品,以较小的支出获得较大的收益,所以实物捐赠在我国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捐赠形式,但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实物捐赠税收优惠的规定,不利于调动公司实物捐赠的积极性。

2. 公司捐赠的约束机制。

其一 约束捐赠的目的和对象。公司捐赠是自愿性的行为,因此在捐赠的对象和目的上,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不同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必须以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出发点,公司捐赠的目的应该以扶贫、帮困、助他、利人为主要内容,即以公益性为目的,一切不符合公益的目的的捐赠都应被排除在外。公司捐赠的对象也应该是具有公益性质的机构或教育、医疗等社会机构。如果捐赠对象是个人,则应是处于社会的底层、急需资金而又无能为力加以解决的贫困群众或受灾人员。公司捐赠的对象不能与公司捐赠决策者有利害关系,捐赠决策者也不能因捐赠而获得个人利益。法律应明确假借公司之名实为谋一己私利的捐赠是无效的。

其二 约束公司捐赠决策权的归属。公司捐赠做为公司的一种财产处分行为,也是公司日常管理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绝大部分的公司捐赠行为,应该由董事会决定。公司章程中应对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的捐款数额做一个上限的规定,这个上限是公司捐赠的合理数额,应综合考虑公司资本规模、经营实绩、发展前景等方面做出规定。超过此上限规定的捐赠,须由股东大会决定。对于数额较小的日常捐赠,也可以由董事会授权经理决定。在这种授权之内,无论是董事会的决定抑或是经理的决定,都代表着公司,公司应对这种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董事会或经理的决定超出了此限额,公司是否仍应对此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以依据内部规定对越权捐赠的董事或经理予以处罚,但对外却必须承担捐赠的法律后果。这也和目前捐赠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相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十二条规定“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受赠人。”2008年民政部颁布的《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救灾捐赠受赠人。对不能按时履约的,应当及时向救灾捐赠受赠人说明情况,签订补充履约协议。救灾捐赠受赠人有权依法向协议捐赠人追要捐赠款物,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说明。”以上规定表明,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捐赠协议

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捐赠方有义务履行捐赠协议,如果不履行,受赠人可以要求支付,甚至可以起诉。当然,如果公司的董事或经理假借公司之名越权捐赠,目的是为了图个人私利,那么这种捐赠是无效的。还有,如果公司的捐赠严重影响其正常经营甚至导致其亏损破产,按照我国合同法第195条的规定,公司可以不再履行捐赠义务。除了以上两种情形,公司均应履行自己的捐赠承诺。

其三 规定股东救济权。在允许公司董事和经理进行捐赠的同时,也要进行一定的制度设计,以便为股东提供监督机制和利益救济机制,以实现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的平衡。笔者认为,根据不同情况法律应对股东的救济权予以不同的规定:第一,公司捐赠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而是以捐赠为名实现公司中个人的私人目的,则这种捐赠是一种恶意捐赠,无论捐赠数额是否超出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都是无效的,股东可以通过诉讼主张这种捐赠自始至终无效。捐赠物未交付的不再交付,已交付的,应予以返还,无法返还的,可追究相关董事或经理的赔偿责任。第二,捐赠的目的是出于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仅仅是捐赠数额超出了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那么这种捐赠是对外有效的,公司应履行捐赠义务,此时股东利益应让位于社会利益,股东仅可以追究越权决策者的赔偿责任。第三,捐赠的目的是出于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但捐赠造成了公司经营困难甚至濒临破产,这种情况下股东可以行使撤销权,使公司捐赠归于无效,公司无需再履行捐赠义务。

[参考文献]

- [1] [美] 贾克贝. 公司权力与社会责任[A]. 赵旭东. 新旧公司法比较研究[C].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 [2] 赵旭东. 新旧公司法比较研究[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 [3] 胡殿武, 李蓓蓓. 公司捐赠的法律问题探析[J]. 菏泽学院学报, 2007(2).
- [4] 葛道顺. 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选择[J]. 学习与实践, 2007(3).

(责任编辑 光 翟)

社会保障制度的中国模式初探*

李智勇 翟宇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 从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状况、工农业关系三方面讲,建立和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其本土化的要求也日趋明显。因此,探寻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不仅是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关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和必经阶段。

[关键词] 社会保障制度; 发展瓶颈; 转变; 中国模式; 本土化要求

[中图分类号] G6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22-03

一、当前制约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几个瓶颈问题

1. “大一统”与“碎片化”。

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1]当前,中国在如何实现社会保障“普惠型”战略目标上一直存在争议,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种覆盖方式的选择上:一种方案主张在维持现有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为“农民工”和“农民”分别建立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即“碎片化”社会保障模式。另一种方案主张重构当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打破城乡界限和职业界限,跨越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建立基于国民身份的单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全国一个制度、一种规则。

“碎片化”主张的最大理由就是中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建立大一统制度是不现实的,既不能体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间发展不平衡的差距,也不能实现再分配功能。而“大一统”主张则站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要求政府建立覆盖城乡的、无差别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2.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两难选择。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早期发展时存在的一个普遍必然现象,即

发展中国的经济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依靠自身的高额利润和资本积累,从传统部门获得劳动剩余并取得不断发展。^[2]

由于某些特殊的因素,中国走出了一条被学界称为“内剥削”的工业化道路,即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用行政干预手段将城乡分开,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由于过多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大大地削弱了农业资本积累,为建立全面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了难度。第一,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保障差别过大,形成了一定的利益落差,城乡劳动者的境遇不平等。第二,传统的以家庭和土地为中心的农民保障形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造成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的原因主要有: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的不同性质是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产生的社会根源;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是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形成的制度根源;国家相对的财力匮乏是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形成的经济根源;城乡居民权力的差异是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政治根源。中国从2004年开始已经提出了“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这为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遇。

*[收稿日期] 2011-01-28

[作者简介] 李智勇(1985-),男,陕西咸阳市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翟宇(1986-),男,陕西咸阳市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3. 风险危机下的困难重重。

社会保障制度是风险社会的产物。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在于绝大多数行业的内需不稳定。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扩大内需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大动力之一。但是社会保障发展的滞后性和社会保障预期的不确定性,又制约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经成为影响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这种制约在宏观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保障的不健全已经成为抑制社会消费的巨大阻力。其二,老百姓预防性储蓄的倾向是难以改变的。

4. 公平和正义——社会保障制度的道德底线。

一般说来,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必须依赖两个条件:其一,制度化。制度化和国家立法是紧密相连的,因此立法需要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其二,社会保障制度所引起的再分配问题。从本质上讲,社会保障是国民经济的再分配,要保证分配的持续不断,收入必须具有持续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作为其目标的;与此同时,公平和正义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道德底线。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多轨制的取向,这与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是相矛盾的。再者,多轨制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多轨制”必然导致“拉美陷阱”从而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样的社会发展状况绝不是任何国家的榜样,其根源就在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制度。所以必须要建立社会财富是天下共同财富的思想和意识。因此,必须完善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个过程必须分步实现,保持国家的稳定依然是前提。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上述困境是有原因的。其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水平较低、科技竞争力相对落后的现实决定一开始就无法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二,体制不健全是社保制度发展滞后的深层次原因。我国行政体制的单一化、无制约性导致了发展只注重经济层面上,而忽视了社会领域的制度建构和创新,从而使社会发展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的“压制”之下。其三,思想观念的陈腐、守旧是社保制度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总之,我国社保制度的滞后是与我国的国情密不可分的。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区域性向普惠性的战略性转变

现阶段,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制度的安全转轨

尤为重要。就社会保障制度而言,则由区域性(覆盖城市)向普惠性(统筹城乡)所转变。一般而言,世界上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普享理念主导型的,即一开始就建立全民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如英国和瑞典等高福利国家。另一种是经济水平拉动型,即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其覆盖面仅仅是城市居民,而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步建立起统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3]除了少数福利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这种政策,中国亦在其中。根据一般的国际经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时间点和社会背景、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该国工农业发展状况这三个指标是决定是否可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因素。

1. 社会背景。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轨时期,这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如果不能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中国的改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功亏一篑。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需要经济上的高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大势所趋,也是我国处于改革开放攻坚阶段的政策任务。和谐社会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更进一步表明了中央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决心和信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内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都为我国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很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2. 经济发展状况。

从根本上讲,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立足于本国经济的高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08年,中国GDP总量突破30万亿,人均22640元,三大产业之比为11.3:48.6:40.1,城镇化达到45.7%,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如果按照国际典型国家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经济条件(人均GDP为2003美元,城镇化68.5%)的统计数值要求来看,中国已经接近平均值。但是人均GDP偏低,符合其最低的条件,也就是说,从经济上讲,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但是这种社会保障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将处于较低水平。^[4]

3. 工农业关系。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国家发展规划已经实行。中央从2004年—2009年连续6年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并制定出各种惠农、支农的相关政策。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5]

总之,无论从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状况、还是工农业关系上讲,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但这一切,必须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尊重我国的传统。

三、对建立“中国模式”的政策建议

中国模式本来指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所特有的经验的总称。这里的“中国模式”特指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本土化出路。就目前来看,“中国模式”是在一个发展中的模式。因此,笔者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从制度设计理念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几点参考性建议:

1. 低水平、全面化和“三步走战略”。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既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福利国家”道路,也不可能仿照城市现行的社会保障模式。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只能依据现实情况,先走出一条“低标准”或“保基本”的道路,再根据今后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质量和水平。简而言之,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是当前保障核心。金刚认为:就目前而言,我国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可分为适度普惠、合理普惠、公平普惠3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12年之前,通过对不同保障对象之间进行差别性和多元化的制度安排实现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民,重点是在制度补缺的基础上建构覆盖城乡的以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养老金为核心内容的基础保障体系。第二阶段在2013年—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期间,初步实现城乡保障制度的整合,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发展社会福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满足公民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第三阶段是2021—2050年中国人均GDP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时,逐步统一城乡社会保障力度,以满足国民各项保障要求。^[6]

2. 梯次推进和“渐进式发展”。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要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其覆盖面的

扩大、标准的提高、体系的完善、管理的规范只能循序渐进、梯次推进。就目前而言,一方面应推动将实际进城与进入乡镇企业就业的近两亿农业剩余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使其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继续出台各种惠农政策,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使农业人口逐步享受与城市劳动者实质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完善转移接续办法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建立健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5]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可以先行一步,率先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乃至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衔接。在这些地区的示范和帮助下,在国家政策的更大程度的倾斜支持下,实现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向先进地区的农村看齐,最终建立比较完善的、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3. 尊重传统和“多元整合”。

建立在儒家“仁”、“爱”学说基础上的中国传统保障强调家庭(家族)保障、邻里互助,这与起源于工业革命、强调国家责任、社会互助的现代社会保障有着本质差别。中国在推进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应当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实现传统保障与现代保障的优势互补,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产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的多元整合。

[参考文献]

- [1]郑功成. 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2] [美]刘易斯. 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A].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3]郑功成.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思考[J]. 山东社会科学,2007(6).
- [4] 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
- [5] 确定“十二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N]. 人民日报,2010-12-13(01).
- [6] 金刚. 中国建立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条件分析[J]. 社会保障制度,2010(7).

(责任编辑 光 翟)

试论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处理的几对关系*

唐 彬¹ 侯贵文²

(1. 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2.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 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既符合时代要求,又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也是未来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提升文化软实力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硬实力与软实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及文化软实力中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等关系。

[关键词] 文化; 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25-04

当前,我们对文化软实力认识还不够深刻,存在认识的片面性和许多盲点,缺乏发展文化软实力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与对策。这与文化软实力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实际上,文化软实力在许多发达国家日益受到重视,必须从战略高度审视和发展文化软实力问题。那么如何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呢?笔者认为应首先正确处理好几对关系。

一、正确处理文化与软实力的关系

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第一要务是文化的发展,这是问题的核心。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过程其实质就是文化发展的过程,只有文化发展了,才能促进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如果离开文化谈论提高文化软实力,那么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无实质意义。因此,提高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首先,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文化成为软实力的核心,主要体现在文化是文明发展的基础、科技发展的动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源泉和民族认同的前提。我们谈论文化软实力主要针对文化的正面作用或积极作用,因此区分就显得尤其重要,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区分具有相对性。一般而言,那些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才具有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比如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它凝聚和浓缩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品质和文化精华,因此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软实力的属性来讲,它属于精神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本身属于文化范畴,如果我们离开文化谈论软实力就失去根本和源泉。

其次,软实力的提升促进文化繁荣。要正确理解软实力对文化的促进作用,必须弄清楚文化与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从广义角度理解,文化的外延极其广泛,生活中几乎所有东西都与文化有关,都刻上文化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二者没有绝对的区别,具有互通性,人们习惯上把软实力等同于文化软实力。从狭义角度理解,文化更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软实力和软实力是子集关系,软实力比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宽泛,但不可否认,文化软实力在软实力中处于核心地位,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无论是软实力还是文化软实力都强调文化的核心作用。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可以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调动人民群众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总而言之,文化与文化软实力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联系,是一个

*[收稿日期] 2011-01-23

[作者简介] 唐 彬(1984-)男,山东济宁人,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助教。

侯贵文(1985-)男,陕西紫阳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二、正确处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技等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软实力主要是以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念等隐性的东西。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首先,硬实力为软实力的提升创造条件。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越强越有利于软实力的发展。当今世界,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为后盾,大力推广美国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软实力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在硬实力增强的同时,中国的软实力也在不断增强,比如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道路以及中国的文化等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其次,软实力的提升是硬实力提升的前提。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一般原理,文化、制度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没有文化的革命、制度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的成功与我国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制度紧密相关,这些制度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由于硬实力的发展是相对有限的,软实力的发展是无限的,发展软实力可以为硬实力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最后,软实力提升具有相对独立性。虽然软实力的发展受到硬实力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硬实力的强大未必带来软实力的强大。美国的硬实力具有绝对优势,但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企图称霸世界,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使美国的国家形象遭到严重损害,表现为文化影响力的软实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正确处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意义重大。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硬实力,这样才能为软实力的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软实力,为硬实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和提供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三、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二者都是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素材,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现代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精

华,向传统文化借智。提升文化软实力,妥善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现代社会在深度与广度上迅速发展,中国文化面临巨大的冲击与挑战。有些人主张对传统文化采取完全否定态度,有意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割裂开来。任何否定传统文化甚至割裂二者关系的做法,其实就是否定历史、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源远流才能流长,根深才能叶茂。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许多东西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要求不相符合,是发展现代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阻力,必须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 (P. 391)}。第一,要正确区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文化糟粕要坚决否定,文化精华要发扬光大,使之与社会主义文化成为纽带关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二,发展文化要紧紧依靠人民,人民是文化的载体和河水源头,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人民的作用更加明显,不可忽视。总之,只有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使二者和谐共生,才能促进文化繁荣,增强文化软实力。

四、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批判与借鉴的关系,二者都是文化软实力的动力源泉。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之中必须立足本土文化,关照外来文化,向外来文化借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重点在于积极借鉴外来的优秀文化,并且把这一新鲜血液转化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新动力。伴随着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我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在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引起国内有些人士的担心,自觉不自觉地抵制起了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

其实我们的文化既不可能被西化,也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化能够持续几千年,关键在于中华文化拥有海纳百川的兼容性、包容性的胸怀与气度。一个民族的

文化要持续发展,必须吸收新鲜的血液和空气,才能新陈代谢,永远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历史充分证明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不可能被西化,它的文化根基不可能撼动,许多表面的东西看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从文化的深层看并没有西化。从现实维度看,我们不能实行文化锁国政策,既没有必要也完全不可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世界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要走出去,外国的文化要流进来,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我们不要去逃避全球化或者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侵略与扩张,而要以积极主动的心态适应全球化,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汲取和借鉴国外先进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方面要正视本土文化曾经并正在遭受的西方文化侵蚀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分夸大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威胁性和腐蚀性,许多表面的东西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相反,合理吸取别人的先进文化或文明,使外来文化的精华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利于自身文化的发展。从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

五、正确处理文化软实力中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宏观与微观是一对空间概念,空间概念具有相对性,采用不同的参照物,宏观与微观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严格的区分宏观与微观概念本身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般与个别、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被人们经常运用到科学研究中,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社会科学;不仅适用于政治经济的研究,也适用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过程中,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统一,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角度考察,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实质就是如何对待文化的过程,对待中华文化必须具有正确科学的方法,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宏观的研究方法就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对事物进行总体把握,寻求普遍规律;微观的研究方法可以对事物的各个部分进行分析,使事物的认识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坚持宏观

与微观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才可以避免走两个极端,才能真正做到既能总体把握,又能认识事物的各个部分。文化研究必须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对待文化软实力的科学的态度。

从现实角度看,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人们认识的片面性,对实践也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要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即要从宏观上对中华文化进行总体把握,使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在对文化进行宏观把握的同时,也要重视微观分析。由于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各个民族、各个地区文化都具有特殊性,因此,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提升文化软实力要在思想认识、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上都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六、正确处理提高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类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在哲学发展史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自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后,才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到:“哲学家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2][P.4)]}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决定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坚持理性的社会实践,反对空洞的理论,也要反对盲目的实践活动。正确处理提高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是要在文化软实力发展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首先,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工作者要研究人民群众的现实文化生产和生活。当前,要重点研究人民群众在文化实践中所表现出来对文化的需求程度和偏好、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困难、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实际情况等问题。这些都是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必须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其次,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前提是理论必须正确,必须符合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这是党带

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成果,这些重要理论成果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最后,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完善自己。虽然我们形成了一些关于文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但必须回到实践、回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去检验,因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文化发展特性等都在随时发生变化。

在现阶段,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建设活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四个方面的内容,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我国的主流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针对多元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采取‘面对外部多元,发展自身

一元,用一元引导多元’的立场。”^{[3] P.181}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和关键,必须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来开展具体的文化建设活动。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陈占安,侯学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导读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黄凯峰,唐志龙.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 89 页)明晰的视角与大胆的表达给予她的作品一种悲观超然的特殊美。作家的人生大部分在法国度过,大部分作品也法文发表,她的犹太根源却是她作品中永恒的材料源泉。通过在数部作品中被脸谱化的人物,我们似乎听见作者说:瞧,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永远不能逃脱的命运。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未能完成《法兰西组曲》。1942年,她被纳粹逮捕后死于集中营。同她千千万万的同胞一起,作家未能抗拒种族的集体命运。年轻的生命同她未完成的鸿篇巨著一样,在最精彩的阶段戛然而止,让生活在另一个世纪的人们不禁扼腕叹息。这部残缺的遗作,是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人生的最终篇章,也是她命运的绝佳注脚。作者在犹太人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描绘了战争中的第二故乡法国。战时的大混乱中,有慌乱,有勇敢,有亲情,有害人害己。从此时作者与出版社的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出作者深知死亡逼近,不可逃避。生活在法国人当中,却无法与法国人共命运。沦陷的法国出卖了她,将她交至敌人手中。无论是财富还

是名誉都不能救她于死神的魔掌。《法兰西组曲》中,对德国占领者的描述充满同情。冰冷的钢盔下露出的是好奇单纯的眼睛,这种客观平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与自己的生活交织的作品体系中,真实的结局早已凝结在文字中。现实与文字互为映照,互相定义。作者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她的作品,她笔下的文字又以强大的力量注定了她的悲剧人生。

[参 考 文 献]

- [1] [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 [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 [2]郭宏安.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3]袁筱一.《大卫·戈德尔》所开启的小说世界 [J].当代外国文学,2008(2).
- [4]Philipponnat, Olivier et Lienhart, Patrick. La vie d'Irène Némirovsky [M]. Paris: Grasset - Denoël, 2007.

(责任编辑 南 山)

关于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相关思考*

司 甜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江苏徐州 221009)

[摘要] 流动党员是新形势下党员队伍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教育管理工作复杂。目前其面临的难题是思想认识上有误区、体制滞后、内容方式陈旧等。新形势下,我们应创新理念,健全机制,改进方式方法,加大投入力度,积极探索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新途径。

[关键词] 流动党员; 教育管理; 制度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29-03

流动党员是新形势下党员队伍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产物。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党员动态管理机制”^[1]。这是实现对流动党员有效管理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党员动态管理,健全城乡一体、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配合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如何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是新时期党建工作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一、流动党员队伍的内涵及主要特点

流动党员,最初是指流动就业人口中的党员。随着流动党员群体的日益壮大,流动党员指的是这样一个党员群体:因务工、经商、求学、居住等自身原因,或因原单位改制等外部原因,离开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地,其组织身份游离于流出、流入两个地区之间,原单位党组织已无法对他们行使有效的管理的党员。

与传统体制中的党员相比,当前流动党员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流动党员个体差异较大。

按身份划分,流动党员包括农村流动党员、城市社区流动党员、部分转业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流动党员。因此,其所从事行业不尽相似,个人文化素质也存在差异。他们对待党组织教育管理的态度也有

区别。

其二,流动党员分布区域广、流动性大。

目前,外出的流动党员遍布全国,部分流动党员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由于流动党员所从事的工作是流动性较强的工作,其从业范围涉及建筑、运输、商贸等。部分企业不愿与之建立长期的雇佣关系,使流动党员在数量、分布上经常发生变化,流向上呈现出社会分布高度分散和“人往高处走”的特点,流动党员的组织关系变动也十分频繁,这些情况为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增加了难度。

其三,流动党员认识上存在偏差,不愿接受组织的教育管理。

流动党员长期脱离党组织,外出工作和生活,党性观念日益淡化,有些人认为过不过组织生活无所谓,缺乏参与组织生活的主体意识;部分流动党员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不愿在参与组织活动上花费时间,放松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传统的党员教育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流动党员群体的需要。

二、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面临的难题

对流动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

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收稿日期] 2010-11-12

[作者简介] 司甜(1981-),女,江苏徐州人,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教师。

一些基层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存在消极畏难情绪,认为流动党员情况复杂,外出党员难管,外来党员是负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放任自流;有的没把流动党员纳入自身工作范围,想起便管,忙起则不管;有的虽想对流动党员进行教育管理,但又不愿做艰苦的探索工作;有的甚至置党的规定于不顾,以各种借口拒绝接收持证的流动党员。另一方面,部分流动党员缺乏党性修养,思想滑坡。流动党员长期脱离党组织,外出工作和生活,导致一些党员组织观念淡薄,放松了对自身价值观的改造,不参加组织生活,不履行党员义务,甚至不缴纳党费,长期游离于党组织的日常教育管理之外。有的流动党员认为现在已脱离原工作环境,长期在外地,可以不接受教育管理了;还有个别党员思想上存在消极抵触情绪,刻意躲避党组织的教育管理,故意不按照党章行事。

第二 现行党员教育管理体制滞后。

目前,我国缺乏对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科学管理机制。流动党员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群体,传统的党员教育管理体制是根据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和人户结合的行政区域设置的。在城市,党的基层组织一直明显呈现“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的格局,这种格局对由于企业兼并、破产、重组以及各类党政机关精简所形成的流动党员和伴随新经济组织大量涌现所形成的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造成许多流动党员成为“口袋党员”、“自报党员”。在农村,由于经济的多元化,党的基层组织依照原有的行政村组设置,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教育管理空白点,由此带来教育管理的权责不清。户籍所在地党组织、工作单位党组织、生活居住地党组织都有责任为流动党员构建组织,但到底以谁为主,现有的制度规定并没有明确的答案。部分基层党组织根据实际作了一些规定,造成地区与地区不配套、不畅通。既有组织部门一家管、其他部门参与不多的问题,也有所在地党组织管、外地党组织配合不够的问题,还有行业管理与社区管理分工不清的问题。有的地方流动党员滞留时间过短,所在单位党员少,无法单独组建党组织。有的地方仍存在党组织架构只能依行政区划或单位组建。这些都制约了流动党员的组织架构和权责分明。

第三 教育管理内容方式陈旧。

首先,教育管理内容的单一空泛。流动党员流动区域大,从业范围广,加之年龄、文化结构不同,教育需求不同。一些党组织由于对流动党员的思想行为不了解,忽视了流动党员对教育需求的差异性,不

能做到因人施教。传统的党员教育管理内容较为单一,重在正面引导,已不适应新时期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模式了。流动党员群体内部差异大,党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较为活跃,适合他们的教育管理内容应是丰富的、与时俱进和多元化的,而实际中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内容上显得单一、空泛,不能贴近思想实际,不能解决党员深层的思想问题。

其次,教育管理方式的落后呆板。流动党员的流动性、分散性使党员教育在人员、时间上都难以落实,集中上课、统一培训的静态教育方式难以奏效。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方式已不能使用传统的行政控制手段,不能实行“强制手段”。大部分党建工作者过去已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经济手段等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如何能使流动党员自觉自愿地接受组织的教育管理,许多党组织感到束手无策,对新形势下创造新的教育方法缺乏认识和实践。

第四 活动经费和活动场所缺乏。

由于流动党员居住分散、联系松散,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要比传统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耗费更多的人、财、物力,且所需的人、财、物力在现行的党建体系中尚无明确的制度规范,导致这项工作缺乏稳定、可靠的物质保障。社会各界对教育管理流动党员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认识,因此,来自外部的支持也很少。

许多地方和单位虽然建立了流动党员党组织,但缺乏相应的活动经费,甚至连开展活动的场所都没有,造成了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难以开展。

三、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对策建议

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牵涉面广,工作难度大,应采取综合措施与对策,因势利导。

1. 走出思想认识误区,创新教育管理理念。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针对党员群体发生分化的现状,我们应走出传统的思想认识误区,创新教育管理理念。在传统党员的教育管理思路中,过分强调党员对义务的履行,忽视对党员权利的保障,对全体党员采用整齐划一的标准和要求。应在要求党员尽到义务的同时,保证流动党员享有党章规定的民主权利。让流动党员参与基层组织重大事务的决定,参与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的推选,调动流动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强化流动党员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引导他们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另外,切实保障流动党员的经济权利、生存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等,以权利的保障促进党员义务的自觉履行。

管理学理论表明,任何组织都有对其成员进行服务的功能,强大的凝聚力蕴藏在优良的服务之中。党组织在对流动党员实施教育管理时,要改变传统“领导一切、包办一切”的理念,实现向“服务型”领导的转变,把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寓于服务之中。党组织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推行柔性管理,即管理的人性化、民主化,针对流动党员的特点,主动与流动党员保持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从流动党员的利益角度出发,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既严肃认真又热情服务,使流动党员能够自觉并乐于接受管理,从内心愿意接近党组织,从而提升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效果。

2. 健全教育管理机制,规范教育管理工作

一是建立报告联系制度。党员外出前必须向当地基层党组织报告,基层党组织及时将外出党员的流动情况逐一登记,分类存档,使党组织及时掌握外出党员的动态,以便于进行有效的教育管理。基层党组织应主动联系流动党员,并使其通过制度加以规范。流动党员要保持与党组织的经常联系,定期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按时缴纳党费。基层党组织可委派联络员,主动与流动党员所在地党组织联系协调,了解党员外出后的活动情况,帮助解决流动党员的思想问题,同时及时向流动党员通报党组织的有关情况,传达党组织的活动安排。

二是建立责任管理制度。基层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不是孤立运作的,需与其他部门相互配合,因此要完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领导体系,建立目标责任管理制度。要把劳动、工商、民政、公安、教育等部门纳入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责任体系中,按照各自的职能明确其责任,统一协调流动党员流出地、流入地的党组织及条、块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整体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是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各级党组织要对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情况定期检查,建立对流动党员及其家庭的走访慰问制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加强督导检查,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对工作中不负责的单位和人员,应给予帮助和教育,情节严重的,做出必要的组织处理。定期分析流动党员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研究加强教育管理工作的政策措施和建议。

3. 丰富教育管理内容,改进教育管理方式。

首先,各级党组织要从实际出发,组织流动党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提高活动质量,根据本辖区流动党员的文化、技能和业务知识需求状况,创造条

件,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活动效果。如推荐流动党员就近参加学习、参观访问;举行专业知识讲座,解决流动党员在业务方面的困惑;举办业务大赛,为他们提供业务学习与交流的机会。各级党组织可根据本地实际,对流动党员设岗定责,年终对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进行综合评议,实行奖优惩劣。

其次,改进和创新教育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坚持传统做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在吸取传统党建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信息时代的先进技术来应对流动党员流动性大、分布广的特点。可运用互联网等高科技优势开展网上党建活动,把党的建设搬上互联网,在网上设立方便党员进入的版块,增强党员学习兴趣,提供其与党组织联系便利、快捷的途径,使流动党员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组织要求,接受党的教育管理。通过互联网增强党内事务的透明度,提高党员的信任度。

4. 加大物资投入力度,提高教育管理效益。

从党组织的角度讲,必要的经费保障是党组织开展活动的前提。流动党组织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辖区内单位的各种资源,为其装备基本的办公设施,当地党组织的会议室、资料室和电教设备能够方便使用。经费问题应灵活处理,通过党费专项补贴、财政专项拨款、企业和部门捐助等多种途径,解决流动党员党建工作所面临的经费短缺、场地匮乏等问题。

从流动党员的角度讲,有工作干、有好工作干,是流动党员最大的需要,也是党员流动的最大目的。可以尝试在体制内党委部门推动下,由流动党员通过民主选举,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教育管理的方式。流动党组织应积极向用工单位推荐流动党员,争取在工资福利、安全保障等方面提供合理待遇,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增进与流动党员之间的感情,提高教育管理工作的效益。

总之,社会的流动将是一种常态,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研究探索的课题。各级党组织应高度重视,建立健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机制,不断探索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01).

(责任编辑 光 翟)

用电视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做法探讨*

张秀文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西柳州 545003)

[摘要] 用电视剧促进旅游业具有成本和效益的比率很小的可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注意运用好这一办法。改善这一状况的做法有:加强学术研究和制度供给,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勇于投入公共资金,开展多地合作,善于利用非公资金,如满足公民出自个人目的制作电视剧的愿望等。

[关键词] 电视剧; 少数民族地区; 旅游业; 文学质量与商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 I05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32-04

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用电视剧促进旅游业的状况不理想

本文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简称民族地区,包括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县、乡行政区划所属的地域。本文所说的电视剧包括电影,指通过一般是虚构的故事来表现社会生活,可以在电视台播放的艺术形式。我们认为通过电视剧来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是存在以相对较少的成本,获得较多效益可能的好办法,如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电影《少林寺》就壮大了少林寺所在地河南省登封县的旅游业,2007年,该县接待的游客有50万人以上,光是2800多名武术人士进行的武术表演门票收入就有1000多万元。^[1]在目前旅游信息传播手段已经较多的情况下,之所以还应该运用电视剧这种投资额相对较高的传播形式,是因为其极强的功用其他形式无法取代。据央视—福克瑞媒介研究2004年的调查结果,我国当年观看电视剧的人占4岁以上总人口95.6%,平均每人一天看52分钟,全国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时间和广告收入分别占总播出时间和总广告收入36.28%和50%以上。^{[2]P.1)}其他任何传播形式都无法实现这样的受众接受水平。但近年来,我国以民族地区为地域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很少,其中以促进旅游业发展为目的的问世后效果十分有限。

二、少数民族地区用电视剧促进旅游业的做法

1. 加强学术研究。多年来,我国对电视剧艺术规律和商业规律的研究都做得比较少,乃至我国电视剧制作商制作电视剧,电视台及影碟商选择电视剧缺乏足够有效的理论指导,这不能不是导致以下情况的重要原因:我国2010年总共生产了14685集电视剧,在电视台极为缺乏优质电视剧的情况下,却有近6000集左右得不到播出,在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3000集中,观众有较强反响的只有600集左右。^[3]而细致到电视剧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这一领域的研究又更少。近年来,我国学术研究成果表面很多,但学术含量在整体上却很低,据教育部统计,我国从1996年至2005年间,高校发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300多万篇和专著30多万部,但在国际权威美国费城科学情报所社会科学索引(SSCI)收录的1962种学术刊物中,属于中国大陆主持的只有2种,而我国同期这类期刊有2700种左右。^[4]世界著名的出版集团励德爱思唯尔依靠其掌握的2000多种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期刊,近年来一年收取我国大学的论文下载费用就有1800万美元,而我国不少大学一年花在学术成果引进上的费用不少于1000万元。^[5]这说明,我国对学术成果是有需求但国

*[收稿日期] 2011-03-31

[作者简介] 张秀文(1961-),女,山东黄县人,广西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

内的有效供给有限。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由行政部门审批学术刊物创办的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学术刊物行政等级高,有权力就有一切。我国应该沿用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将办学术刊物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即允许国民自由办学术刊物,同时允许学术刊物收版面费,这样放开市场之后,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就会不愁发表。同样是市场的力量会使这些学术成果转变为电视剧的制作质量。

2. 加强公有资金的投入。投资民族地区题材的电视剧和其他热门题材的电视剧相比较,整体成本和预期效益之比更大,在主要由私人资本投资自负盈亏的电视剧制作市场上,私营企业不太肯涉足。所以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对旅游的软硬件建设都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投资制作具有促进旅游业发展明确目的的电视剧很少。由于这种做法和其他促进旅游业的做法相比较,具有一次投资大,成功把握性不大,财务风险较大等缺点,地方政府不重视进行这种投资可以理解,但须知,这种投资的风险和成功是同一深度,即虽然一次投资至少是以百万元人民币计数,但一旦获得成功,其回报却可以是十倍百倍甚至千万倍。1959年,广西区政府花不太多的钱,先组织全区多个剧种多种版本的戏剧《刘三姐》会演,而后留下部分作者合作创作出民间歌舞剧《刘三姐》,1961年拍成电影后,其影院、电视、影碟、音乐碟片等产品更是畅销至今。建立在这名声基础之上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2004年开演后到2008年底,票房收入6亿多元,已超出投资额5.3亿元。在桂林实地欣赏的国内外观众达到了300多万人次,以桂林和漓江为故事发生地的《刘三姐》,对桂林、柳州、宜州乃至广西的旅游业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至少那300多万观众就顺便游览桂林和广西其他地方。^[6]

这方面的投资一定要有耐心,要勇于反复尝试。由于文学不是逻辑严谨的科学,商业更是云谲波诡,电视剧收视效果无法准确预测,我国有70%的电视台购买电视剧决策人这样认为。^{[2] P. 115}所以即使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电视剧制作企业,对成功电视剧的谋求只能是不断尝试,以付出一定的数量代价来博低概率的成功。而我国许多以电视剧谋利的构想没有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拍第一个电视剧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后就泄气了,不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尝试。

同时还应注意,电视剧的文学质量和商业效果并不是和资金投入的数量成正比,即有时候花费资金并不多的电视剧一样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我国近年的不少电视剧,投资总额有的只有300至600万元,却获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和商业效果,^{[7] P. 101}但有一些电视剧确实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才能实现好效果,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不少电视剧题材本来非常有市场潜力,但成剧后不但受众很少,甚至连贱卖甚至白送也没有电视台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投入太少导致质量没保证。如不然,美国等国身经百战的大影视制作商家,常常投资数千万美元拍一个电视剧就是傻瓜了。美国老牌影视制作企业派拉蒙制片公司电视剧《干杯》1993年演季,25集所花的费用达6500万美元,此剧连播11年演季,收视率经常在全美前10名以内,最高时达45.9%,共获得26项艾美奖和111项提名,^{[8] P. 121-123}艾美奖是因评奖标准只讲艺术不讲收视率因而艺术威望较高的美国民间电视奖。所以,民族地区制作这类电视剧当然要努力寻找花最少资金也能收到好效果的途径,但在需要花大钱的地方也要勇于投资。

解决这种高投入的问题可以采取民族地区之间加强合作的办法。若干个民族自治县可以联合起来制作这类系列电视剧。这样,各地既可以共同出资制作一个电视剧,解决资金和人才短缺的问题,又可以独立制作自己的剧集,解决合伙制常常是人心不齐的问题。如新疆、西藏、宁夏、广西、云南等地的自治县,可以联合招标电视剧制作企业制作旅游系列电视剧,题材是不同类的国民到不同的旅游地点旅游时发生的故事。这些电视剧除了有吸引受众的电视剧元素外,还要将各地最能吸引人的旅游元素巧妙地嵌入剧情中,这就是所谓嵌入式广告。电影《庐山恋》之所以对人们前往庐山旅游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影片巧妙地嵌入了庐山风光绮丽,夏天的气候特别适宜避暑等内容。

还有一个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的办法是利用外资。发达国家不少电视剧制作和经营企业资本相当雄厚,如美国华纳公司2006年营业收入就有442亿美元,比我国广电业总收入1099亿元多3倍,^{[2] P. 139}这些公司有很高的商业水平。近年来,华人或华裔影人同外国大公司合作获得的成功,为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这种操作提供了经验。同外资合作还有其他意义。如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是世界性的,多年来桂林和西藏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来过

许多世界各地的游客,电影《少林寺》使许多外国人对少林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特地前往中国河南游览少林寺,都证明了这点。所以,用电视剧来促进旅游业的战略眼光也应该是世界性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在电视剧制作方面一直缺乏得到世界普遍认可的能力,如我国近年来每年制作13000集以上的电视剧,但出口收入一直很低,其中2010年只有约2000万美元,达不到美国一部电视剧的1/10。^[9]这主要是我国电视剧的编剧导演等水平太低,不知如何适应世界各国受众的普遍要求,而如上文所述,美国的同业人士这方面水平非常高,有些人可能说是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而导致这一结果,但日本和韩国也是儒家文化,电视剧的出口也取得非常不俗的成绩,如韩国2004年电视剧的出口额达7140万美元。^{[10] (P.151)}这足以说明是水平问题,故而同外资合作缩短这一差距的道路,肯定比我们自己探索的道路短。

3. 加强制度供给。制度供给内容是多方面的,如政府投资方面,并不一定是由政府直接运作,而是有多种经营方式,如由私人承包,对勇于投资的企业予以风险保险等,创造这样的制度给社会上的风险投资者,就是制度供给的内容之一。再如公有资金的操作制度,过去许多地方投巨资制作的旅游电视片,之所以没能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好效果,和在操作制度上首席长官权力没有受到科学的制约有关,这使得其常常是个人决定内容,决定操作者,在最后的鉴定时一锤定音,以权力来代替真理,因而没能很好地遵循规律,而受到了规律的惩罚。我们可将这些制度改为招标制,即某地决定制作这类电视剧后,是通过大媒体向社会公开招标剧作者,对剧作者按标的要求创作出来的电视剧剧本,用请外地专家匿名审读的办法,确认其达到一定的质量,支付一定的稿酬。在这一基础上再将入选的剧本也是用匿名的办法,请数量足够的多名本领域的艺术和商业专家评估,选定剧本,然后用招标的办法选择制片人,制片人工作的最终成败,要与他的个人利益彻底挂钩,即电视剧制作后,如得到那一级多少家电视台播出多少次即得多少报酬,收视率达到多少即得多少报酬,如不然,制作者则反而要赔偿委托方。

还应该强调一个常识,即制度应该是真有效的实际制度,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抽象制度。比如我国也不能说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上并不能保护电视剧本的知识产权,许多文

学专业的高材大学生抱怨,本来他们完全有把握编出文学质量高商业号召能力也不弱的电视剧,但社会上电视剧制作界随意践踏编剧知识产权的信息,如某些人说好给编剧多少报酬但就是拖着不给,编剧的追讨成本非常之大并且还不一定得到手,电视台购买电视剧时不是以科学公平而是以见不得光的潜规则为标准的传说,使他们疑窦丛生,电视剧播出实际似乎印证了这些传说,使他们最终畏而却步,这是我国近年来优质电剧本非常少的根本原因。美国等发达国家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但程度轻得多,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非常有效,法庭工作负责,司法水平高,总是能取得司法证据,判罚极为严厉,侵权者多须付出足够大的个人利益代价,从而促使人们不敢效尤。有了良好的制度以后,人们只要有高于竞争对手的艺术和商业才能,就能在招标市场上成为胜者,之后只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就会有相应的回报,而偷工减料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直至被竞争对手迅速取代,就会迫使他们掌握真本事并竭力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多年来我国电视剧粗制滥造,工作人员偷奸耍滑哄客户哄受众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4. 利用好普通人出自个人愿望制作电视剧的资源。国际上多年来,我国近年来都出现了国民为满足私人愿望而希冀制作电视剧的现象。这种电视剧往往在艺术上都相当精良,内容上也非常注意符合人类普适的道德伦理标准,因而总是取得令人鼓舞的收视效果。荣获第23届金鹰电视节优秀长篇电视剧奖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是乔家的后人投资制作,由于艺术和思想俱佳,促使在山西省祁县的真乔家大院一天的游客数量超过6万人。^{[7] (P.203)}此外还有不少人向有关部门表示了这种意愿,如某国民党抗日名将的后人就曾向有关部门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在电视剧制作出来后,按国内目前的标准公平地审查,如合格即允许电视台播出的话,愿意自费制作前辈抗日内容的电视剧。这种电视剧之所以艺术精良是因为制作者非常重视其艺术质量,内容之所以总能符合人类普适的伦理道德而极少非高雅内容,是因为制作者虽然也考虑商业利益,但尽量努力做到商业和艺术的统一,决不为了商业利益而降低艺术和伦理道德要求。民族地区这种情况也非常多,利用好这一资源,是民族地区政府无须开支公共资金,也能多快好省地实现用电视剧促进旅游业的捷径。

5. 充分利用人才资源。人类全部文学史实表明,文学作品只要具有一定程度以上的艺术质量,就必定有相应数量的受众,电视剧问世近80年来的实践证明也不例外,所以要保证电视剧不至于没有人看,最可靠的办法是保证其具有一定程度以上的艺术质量。要想做到这点,物质资源、制度、人才3个因素缺一不可,对人才这一因素,我国社会存在一种误区,即认为文学创作人才不需要经学校培养,科班训练出来的人才反而搞不好文学创作,许多人还举出许多优秀作品的作者并未读过大学文学专业,许多名牌大学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一辈子都不曾出版过得到普罗大众青睐的文学作品例子为证。这种意识是我国的电视剧制作商,不重视利用大学生人才资源创作电视剧的重要原因,而这又是我国电视剧文学质量和商业质量和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相差甚远的直接原因。现代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电视剧市场也不例外。

许多人没有读过大学,或者读大学时专业不是文学也创作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这种情况我们不予否认,但就整体而言,说受过文学专业训练的大学生创作不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实在是误解,我国许多既得到业内认可又得到收视市场认可的优秀电视剧编剧,是文学专业大学生是证明,美国电视剧实际的证明还更深刻。美国在1990年代就已普及,目前一年在校硕博硕士生达300万和8万人的高等教育事业支持下,光是编剧协会就有1.2万多名会员,这些会员多数具有大学一个以上的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11]2008年主要依靠出卖所编电视剧的人均收入达20万美元,是美国人均收入的4倍以上,业内人士多承认,假如放开世界电视收视市场即自由竞争,美国将以5%左右的产量,自然地占据75%以上的份额,开放度高的电影市场多年来的事实就是佐证,即美国电影产量仅占世界电影总产量6%,却占据了世界电影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我国最近5年来一年出产的电视剧都超过了13000集,却极少能连续制作出续集播放两年以上,美国这些编剧编创的电视剧近年来一年不过是3000多集,不少却能延续播出几百集,几千集,连播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指路明灯》从1952年开播至今已不间断地播了57年,总共已创作和播出了16000多集,^[8] [PP. 2-58] 这些电视剧

虽然是连集播出若干年,但由于编得巧妙,受众不管中间断看多少集,都不影响观看新集时对剧情的理解和兴趣,这不是编剧能力是什么?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国大学生的质量得到了保证,数量也得到了不断增长,这些大学生中许多是学文学专业,还有不少人在文学专业毕业的基础上加学了其他专业,另外多种专业的大学生还可以进行合作,这些大学生只要得到重用,并用制度迫使他们不得不努力,必定会创作出文学和商业质量都精良的电视剧。如,我国历史上不少大学生创作不出优秀文学作品的原因,在于生活轨迹是从家门校门到机关门,社会生活材料积累少,我们可以用不出门调查,不创作出贴近生活的优秀电视剧剧本,即没有报酬的制度,迫使他们到社会采集材料,就像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人员深入社会调查,然后研究出符合社会实际的成果一样。

[参 考 文 献]

- [1] 张兴军,陈泽伟.河南登封:中国武术产业化的样本[J].环球,2008(14).
- [2] 邵奇.中国电视剧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 [3] 王磊.“影视‘钱’景”?一冷静便纠结[N].文汇报,2011-03-21(01).
- [4] 祁钰,周凯.学术不端都是期刊惹出的祸?[N].中国青年报,2009-07-13(07).
- [5] 张国.国际出版大鳄大幅提价部分高校面临学术断粮[N].中国青年报,2008-06-04(03).
- [6] 刘昆,李静.广西:多民族文化共繁荣[N].光明日报,2009-07-26(01).
- [7] 高福安,宋培义.电视剧制片管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 [8] 苗棣,赵长军.论通俗文化——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 [9] 夏静.全国电影票房破百亿[N].光明日报,2011-01-05(04).
- [10] 张胜冰,徐向昱,马树华.世界文化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 [11] 黄晴.好莱坞的“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08-02-15(06).

(责任编辑 师 语)

新课程背景下历史问题教学的新思考*

蒋华强

(江苏省宜兴中学, 江苏宜兴 214200)

[摘要] 本文依据新课程背景下“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教学基本思想,围绕“问题”这一中心,通过多种方式创设历史情境呈现问题,启发学生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自主探究的方式解决问题,让学生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基于“问题情境—自主探究”的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力图改变教和学的方式,追求课堂效率和课堂活力,全面提高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关键词] 新课程; 历史问题教学; 情境; 自主探究

[中图分类号] G6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36-03

问题教学是历史课堂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它的特点是以问题的设计和回答为主要形式,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将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进行层次性解决,形成波浪式、递进式、开放式的课堂教学结构。

新课程背景下的问题教学必须体现“自主、合作、探究”的思想,在师生的和谐互动中建设新型的生态课堂,进一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辨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近年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围绕呈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实践。

一、通过创设历史情境呈现问题,有助于启发学生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 历史情境的创设。

创设历史情境要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要针对性,应考虑教材特点、学生的年龄特征、学生学习的心理规律、学生的认知程度,做到有的放矢;要有方向的引导性、目的性,让学生的思维沿着正确的方向扩散、发展,去发现知识、探究知识、运用知识,要选择有效的手段,可以依据教学设计选择适合的多媒体创设情境、通过语言描述创设情境等等,也

可以依据教学设计选择学生活动方式创设情境,如同桌互助、小组合作、模拟表演等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以此为媒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 问题的设计。

其一,设计问题必须有明确指向。

问题必须围绕课时三维目标,三维目标包括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问题的设计必须根据教学目标,针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例如,在人教版必修一《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课中,可以设计的一个问题是: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引导学生把握教材的总体结构,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个方面的建设。设计的另一个问题是:新中国三大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作用和特色是什么?培养学生分析、比较和概括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认识。

其二,设计问题必须有递进梯度。

人们认识问题往往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由表象到本质,由已知到未知。因此在设计问题时,问题要由易到难,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这样才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地去思维、去想象、去创造,从而培养学生的能

*[收稿日期] 2010-10-29

[作者简介] 蒋华强(1968-)男,江苏宜兴人,江苏省宜兴中学教师。

力,提高学生的认识,升华学生的情感。如在人教版必修一《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一课中,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组问题:第一层次回答“是什么”:罗马法是如何演变的?其主要内容是什么?第二层次回答“怎么样”:简要分析罗马法的作用和局限性是什么?第三层次回答“为什么”:罗马法为什么影响如此深远?

其三,设计问题必须具有启发性。

问题教学是一种启发式教学,层层设问即层层启发。问题提出来以后,不是由教师越俎代庖,而是诱导学生的思维,启发他们跟着老师,跟着问题的思路,进行逻辑推理,得出正确结论。在人教版必修二《“斯大林模式”的得与失》一课中,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组问题:(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哪些非常措施使苏联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2)在苏联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哪些是有积极作用的?还存在哪些弊端?(3)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的特征是什么?(4)怎样评价“斯大林模式”?(5)“斯大林模式”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后来又是怎样突破这一模式的?

其四,设计问题必须具有开放性。

开放式教学,就是鼓励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每个历史问题不一定只有一个答案,有的问题会有几种结论,教师要鼓励学生去大胆探索,对不同的结论,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学生各执一词时,教师既可以放手让学生去自由争论,也可以参与辩论,但绝对不能压制学生的思维。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提高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又留下课后问题,将课堂教学引向深入。例如,人教版必修二《开辟新航路》一课,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关于哥伦布及其航行美洲的评价,我国史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哥伦布是将美洲纳入近代文明社会大家庭的先驱;有人认为哥伦布是殖民主义强盗;有人认为哥伦布航行美洲具有建立在非正义行为上的客观进步性,你认为哪一种观点合理?请结合史实说明你的看法。

其五,设计问题必须注意形式的多样性。

问题的形式往往决定着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良好的课堂气氛,也决定着是否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思考,有利于解决问题。我们一般可以采用教师直接提问,也可以提供影像、文字、图片等资料或组织活动,创设情景引出问题,也可以在组织学

生自学、讨论和思考的基础上,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在讲人教版必修一《祖国统一大业》时,我们利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了香港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的片断,然后提出问题:中国是怎样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的?

其六,设计问题必须注意知识之间的联系。

中学历史教材内容多、头绪杂,因此设问时还要注意知识的前后联系,既要注意章节之间的联系,也要注意单元之间的联系,还要注意中外历史的联系。对同类历史问题,可以打破章节的界限,放在一起进行设问,通过类比或对比,使问题中心教学法在帮助学生形成纵横交错的历史知识体系方面发挥其独到的作用。例如,在讲人教版必修一《夏商周政治制度》中“西周的分封制”时,就可以让学生比较中国和西欧分封制的不同点。

二、通过自主探究解决问题,有助于学生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1. 解决问题的过程必须是学生自主探究的过程。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在体验问题情境、产生问题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自学探究分析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讨论交流整理信息,完善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所扮演的是引导者的角色。

例如,我们上历史课《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时,就可以这样设计教学过程:

首先出示一张图片《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袁隆平院士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稻田,这位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科学家,就像一位普通的农民,经常两腿沾满了泥点子,穿梭在田间地头。为了全方位地掌握稻谷的习性,不管是风吹日晒,还是打雷下雨,他都一直在田间和他的禾苗在一起。

老师导入:在吃着白米饭长大的中国人眼里,袁隆平是个身高只有1.69米、戴着草帽、土得掉渣的老头,然而却是个才高八斗、见到老外不用找翻译的中国科学家,这样一位平凡的老头却获得了很多奖项:1981年获中国第一个特等奖发明,1985年获联合国金质奖,1987年获联合国科学奖,2001年获中国最高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且获得了500万元的奖金。这位在中国人眼里很平凡的老人,在西方人眼里却是个很有价值的人,他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再出示以下几幅图片：

第一幅：恺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女孩》。画面没有一点悦目之处，干枯的土地，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一只紧盯着这个孩子、急不可耐要扑向“猎物”的老鹰。恺文·卡特用一张照片向人们展示了整个非洲的绝望。

它获得了1994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和1994年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1993年，卡特到北部边界去拍摄苏丹的饥荒。当飞机一降落在伊阿德村，卡特马上着手拍摄那些饥民。为了让自己从成堆的快要饿死的人的悲惨景象中放松一下，他走进了灌木丛。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一只秃鹫落在镜头里面。卡特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尽可能不让那只秃鹫受惊。后来他说，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希望那只秃鹫能展开翅膀。拍完照片后，卡特赶走了秃鹫。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然后坐在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第二幅《埃塞俄比亚难民营》。这是巴西著名摄影记者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1984年拍摄的，曾获1985年奥斯卡·巴拉克奖。在埃塞俄比亚难民营里，饥民们挤在牢房一样的大栅子里，望着脚前的空罐子……骨瘦如柴的孩子在妈妈胸前掏着什么，但妈妈什么也不能给他……

第三幅《两只手》。画面上丰润的大白手和枯瘦的小黑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孩子的手像瘦弱小鸟的爪子或者说像化石，这只是因为饥饿而走向死亡的千万个个案之一。

通过这几幅照片，自然生成问题：这些图片的主题是什么？看到这幅图片，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和反应？如何解决饥饿和粮食问题呢？

接着老师组织学生围绕问题进行讨论，学生很自然地就理解了袁隆平的价值，最后老师归纳（1）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也有利于解决世界性的饥饿问题（2）袁隆平的贡献有利于推进中国农业走向世界（3）国际上把杂交水稻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在这一案例中，对于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价值，老师不是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通过图片的形式让学生进入到教学情境之中亲身体验，通过讨论的形式使学生加深理解，自己得出结论，同时也使学生的认识得到提高，情感得到升华。

2. 解决问题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第一，必须针对全体学生。

学生最反感教师提问集中在少数同学身上，影响课堂教学气氛和师生关系。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面向全体同学，充分发挥课堂民主，调动每一个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当然，浅显的问题和有难度的问题一定要因人而问，使所有学生都能参与到课堂活动之中，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第二，必须采用多种方法。

解决问题的途径可以由学生直接回答，教师总结；可以由学生课堂讨论，教师总结；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相互辩论，教师总结；也可以通过情景再现或情景模拟，教师点拨，等等。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最合适的方法。

第三，必须追求目标达成。

在实际操作中，学生往往回答问题不全面、不深刻、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根据课堂实际情况，或由教师补充完整，或由其他学生补充完整，或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组织作答。不管是采取哪种形式，一定要引导学生围绕三维目标的落实，务求问题的彻底解决，使学生有满足感。教师备课时也要充分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预先准备好各种对策和教法，这样才会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目的，帮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能力，激发学生情感，提高学生素质。

总之，我们提出的新课程背景下问题教学的操作范式并不是一种机械的模式，它是以“问题”为中心，通过创设情境呈现问题，通过自主探究解决问题，它改变的是教和学的方式，追求的是课堂效率和课堂活力。

（责任编辑 光 翟）

浅论历史教学中的社会责任感教育*

曹 琴

(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中学, 江苏南通 226001)

[摘要] 历史课除了教给学生必要的历史知识外, 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教学中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使他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勇敢地承担起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 历史教学; 社会责任感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1)04-0139-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育人为本”写入“二十字”工作方针, 明确“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那么怎样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实施素质教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这样的路径: “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敢于对他人负责, 对社会负责, 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是文明社会公民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 是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 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重要条件。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写到: “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 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社会责任在维系社会发展、推动人类进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的学生, 作为未来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与实现者, 理所当然应该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担当起起码的社会责任。

然而, 观察今天学生的现状, 却不难发现, 有许多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严重缺位, 他们以一种麻木的心态冷眼旁观社会, 过分看重个人的利益得失, 对他人、对社会漠不关心, 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 这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因此, 学校教育必须帮助学生形成

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使他们走出校园后能够为国家积极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作为历史课教学, 更要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 重视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一、挖掘历史资源, 树立学生的社会 责任意识

“学习历史的目的是养成责任心、树立自信心; 在有智慧地参与社会生活; 在有能力地选择生活方式、解决我们可能遇到的这样那样的生存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等。”^[1]通过历史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起基本的社会责任意识, 是历史教师的基本职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记载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振兴, 奋发图强、勇担社会责任的英雄事迹和豪言壮语, 他们是后辈效仿和学习的楷模, 也激励着后人以民族振兴为己任, 勇敢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社会责任。因此, 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善于用历代先贤的壮丽言行激励学生, 如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等, 这些话语慷慨激昂, 振奋人心, 能够使学生明白正是这种“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 铸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不朽历史, 今天, 作为一个社会公民, 富有社会责任感, 积极为社会、为他人做贡献, 更是自己义不容辞的社

*[收稿日期] 2010-12-21

[作者简介] 曹琴(1965-), 女, 江苏通州人, 南通市第三中学教科处主任, 中学高级教师。

会议务。

二、结合社会热点,调校学生的社会责任认识

青年学生涉世未深,社会阅历较少,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最后形成,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比较片面,有时表现较为偏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屈辱的感受。比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犯下了滔天罪行,很多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民族仇恨情绪,因此,历史教师在结合历史事件教学时,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结合时代的发展,帮助学生正确地学习和认识历史,使他们在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的同时,其社会责任感也能够不断得到调校。要教育学生既要牢记日本血腥的侵华历史,又要看到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和平友好发展关系。要通过教学,使学生明白学习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要以发展的眼光,开阔的胸襟认识历史,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圈囿,做到既要牢记历史,又能面向未来。

三、重构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热情

长期以来,由于受制于对高考升学率的追求,历史教学也无奈地陷入了对历史知识的简单传授与记忆的图囿之中,忽视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使教学活动偏离了其本真的价值追求。“传统教育深受科学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专注于人的智力发展,把教育目的定位于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在实际教学中注重为个人升学服务,而忘记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格完善。”^{[2] (P.135)}从历史教学的终极价值追求出发,教师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民主、平等的互动中得到一种价值体验,逐步激发起学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热情。如在标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中,广大的青年学生勇担社会责任,唤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起到了先锋作用,如今,时隔近百年,青年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当年的五四精神呢?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就相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如对于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来说,传统的五四精神是否还适用于他们?现在的青年更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当代青年应该如何继承五四传统,发扬开拓创新、勇于奉献的精

神?同时可以要求他们在课后以书面形式展示他们讨论和思考的结论。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调动,学生关注社会、奉献社会的热情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激发。

四、调动本地历史资源,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情感

历史所记载的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由于时空间隔的原因,许多内容学生可能难以理解。如果教师可以巧妙地运用本土历史,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缩短历史与学生的距离,消除他们对历史的遥远感。“我们不能用眼睛真实地感受历史上的变革和发展,但却可以踏足于那些曾经发生过波澜壮阔历史场面的土地,面对眼前的建筑、景色,去想象当时的场面,这是宝贵而有效的历史课程资源。”^{[3] (P.278)}学生对本土历史人物和事件具有一种亲切感和真实感,通过本土历史的学习,更加容易使学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们的社会责任情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如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课中提到了张謇,南通本地的历史教学就可因势利导,教师可以组织同学例举张謇当年在南通所举办的民族实业,从创办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到建立国内第一所博物院(馆),从创办图书馆、盲哑学校到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等。这一系列在当时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虽经历了历史沧桑,但如今依然完好保留,甚至得到更好发展,许多同学每天都从这些历史遗迹旁边经过、流连,是他们最熟悉的历史身影,与学生有一种特殊的历史亲近感,透过岁月,同学们更能够感受到张謇作为清末状元所背负的社会责任以及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凝重而坚毅的步伐,从而使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可以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参 考 文 献]

- [1] 赵亚夫. 新时期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03(4).
- [2] 石鸥. 结构的力量——《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理解与实施[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3] 朱汉国, 王斯德.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晨 晓)

***Tao-te-chin*——a Tao-gotten Theory**

ZHANG Cheng-q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School of Humanity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 Fujian , 361005 , China*)

Abstract :Laozi is a speculative philosopher ,and he developed the tao-centered philosophical system. Laozi 's theory about " tao " does not merely lie in the academic exploration ,meanwhile his aim is to have " tao " ;his theory of " tao " is associated with life ,ethic ,and politics. His whole teaching is to expound that what is " tao " and how to get " tao ". *Tao-te-ching* , so to speak , is a " tao "-gotten one. The philosophy of Laozi gives us the inspiration that " tao " is an endless progress of developing ,and that the probing concerning " tao " and " tao "-gotten is indefinite. This just is Laozi 's perpetual enchantment of thought.

Key words :Laozi ; tao ; tao-gotten

Reflection of Educators ' Founding Schools

GAO De-sheng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Nanjing , Jiangsu , 210097 , China*)

Abstract :Specialization resulted in the dying away of existing condition for educational masters. Besides ,there is no acquisition of the essence of western education ,and no freedom of social environment ,so masters do not exis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 Educators should have their own original educational system ,a wide range of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mpact ,and success in practice. Therefore ,neither in the field of theory nor in the field of practice exist educators. Since there is no independence of education and schools ,the educators cannot develop a good education.

Key words :educators ;educators ' founding schools

An Outline of Research Method on Education

ZHOU Yue

(*Jiangsu Provincial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 Suzhou , Jiangsu , 215104 ,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education needs some corresponding scientific methods. The ways of thinking can decide the choice of the specific method while the use of the specific method shows certain ways of thinking. The ways of thinking on education research originate from philosophy. Research on school education can draw lesson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pragmatism concerning the empirical proof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problems from the practic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the research process (Problems and assumptions-Information and evidence-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include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Key words :research on educ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way of thinking ;specific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ison and Value Consider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 Affair Administration

SONG Zhen-chao HUANG Jie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 Nanjing , Jiangsu , 210046 , China*)

Abstract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college student affair administrations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 ,but also differ to a large extent. As 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aditionall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ents ' work ,forming a complete set of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having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student affairs administr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modes of student affairs management ,coupled with localization ,can help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administration ;qualitative comparison ;value consideration ;U. S. China comparison

Analysis on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Seclusion

CAI Huai-shun

(*Library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Nanjing , Jiangsu , 210013 , China*)

Abstract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of Knowledge* , which was compiled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Dynasty , is the largest set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and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China.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the mu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he Catholicism and the compilation of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of Knowledge* ,and it also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books on the stream of Chinese culture ,then it clarifies the books were the cultural product under Emperor Qianlong 's cultural seclusion policy. Therefore ,it evaluates the books from a brand-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of knowledge ;cultural seclusion ;missionary ;cultural stream